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哲学专业试用教材）

肖　前　李秀林　汪永祥
主　　编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教研室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哲学专业试用教材）

肖　前　李秀林　汪永祥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教研室

校　内　用　书

●

197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79,000 册数：15,000
统一书号：2011·94
定价：1.25元

说　　明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出版，一是为应教学之急需；二是为高等学校哲学原理专业教材的编写提供一份讨论的稿子。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以仓促成书，从内容、体例到文字表述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点，有些已经发现问题的地方也来不及修改了。恳望读到本书的同志，提出宝贵的批评和修改意见。

参加本书编写和讨论的，除主编者外，还有：李淮春、梅岱、孟宪鹏、黄仲池、金羽等同志。李淮春同志还同主编者一起进行了全书的审阅和校改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教研室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1
一、哲学和哲学基本问题……………………………………2
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发展史……13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24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38
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性………………………………………45
一、世界的物质统一性………………………………………45
二、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66
三、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存在的形式………………82
四、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95
第三章　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102
一、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103
二、意识是人脑的机能………………………………………116
三、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129
四、意识对客观存在的反作用………………………………139
第四章　对立统一规律……………………………………146
一、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147
二、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154
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160
四、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175
五、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182
六、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191
第五章　量变质变规律……………………………………196
一、质和量的对立统一………………………………………196

二、量变和质变的互相转化 …… 205
三、量变和质变的互相渗透 …… 214
四、飞跃形式的多样性 …… 220
第六章　肯定否定规律 …… 225
一、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辩证的否定 …… 225
二、否定之否定，螺旋式的上升或波浪式的前进 …… 237
三、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 250
第七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 257
一、唯物辩证法范畴的实质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 …… 258
二、原因和结果 …… 261
三、必然性和偶然性 …… 276
四、可能性和现实性 …… 288
五、形式和内容 …… 299
六、现象和本质 …… 309
第八章　实践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 …… 317
一、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 318
二、科学的实践观 …… 332
三、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 350
第九章　认识的辩证运动 …… 364
一、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 364
二、理性认识到实践 …… 382
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 393
第十章　真理 …… 402
一、客观真理 …… 403
二、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 410
三、真理和谬误，为真理而斗争 …… 418
四、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 …… 425
第十一章　辩证逻辑 …… 438
一、辩证思维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 439

二、概念、判断、推理、假设 …………………………………… 448
三、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具体和抽象 ……………………… 479
四、逻辑和历史的辩证统一 ……………………………………… 502
五、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一致 …………………………… 512

第一章　绪　论

一、哲学和哲学基本问题

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发展史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中，“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5页）。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和彻底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切方面，形成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必须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南，它的思想光辉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照亮着我们胜利前进的道路。为了胜利实现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我们必须努力学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科学世界观，掌握这一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往哲学和科学发展的光辉结晶，是人类思想史中的最高成果。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必要对哲

学的一般问题，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作一初步的考察。

一、哲学和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原由“爱”（“朋友”）和“智慧”两字组成，意思是“爱智慧”。在汉语中，哲字有“智慧”、“聪明”、“贤明”等意思。哲学从字面上讲就是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这里所说的“哲”或“智慧”，不是指玩弄小聪明、施展雕虫小技，而是含有通晓世事、深明大道理之意。略知哲学一词的词源，有助于我们了解哲学这一术语的含义，但是这还不能确切表达它的科学内容。

要对什么是哲学有一初步的了解，至少应把握以下几层含义：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一定阶级的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的理论体系；是关于各种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人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观、那个观，就是对某一事物、问题的根本看法、根本观点。如对于形势、对于国家、对于道德、对于人生……等等的根本看法，就是人们的形势观、国家观、道德观、人生观。所谓世界观（宇宙观），就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统统在内的根本观点。如：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宇宙间万事万物是从来如此还是变化发展的，变化发展是杂乱无章的还是合乎规律的，人们能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以及如何去认识，人们能不能改造世界以及如何去改造等等，这类问题，就属于世界观的范围。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除了不懂事的婴孩外，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有一定的看法，就是说，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人们的世界观不是空的，它总是通过人们怎样

待人接物，怎样观察、对待和处理问题表现出来。作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时所遵循的总的方法，在哲学上叫做方法论。怎样看世界，这是世界观；用这样的看法、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议论事情，支配行动，这就是方法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此外并没有脱离世界观的单独的方法论，正如没有不表现为一定方法论的世界观一样。哲学就是研究世界观和一般方法论问题的一门学问。

哲学是适应人的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人生在世，时刻要同周围世界的各种事物相接触，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对于这些事物的一定的看法，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不过，在人们没有专门学习哲学之前，他们的这种观点往往是自发的、不系统的、不是首尾一贯的。哲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的系统化了的理论体系。这就是说，哲学来源于生活，但它又区别于生活；人们在对各种事物的观察和处理中就表现了自己的世界观，贯穿了一定的哲学观点，但这还不等于掌握了完整的哲学理论；世界观人皆有之，但不能说人人都是哲学家。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一方面，哲学并不神秘，不是高不可攀的，不应是少数人垄断起来的圣物，哲学的殿堂人皆得而登之。另方面，哲学又是一套专门的学问，有自己特定的内容，要了解它，就得学习，要登堂入室，就得下一番功夫，不学自通的事是没有的。

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同其他各门具体科学一起，共同组成人类知识的体系。毛泽东写道："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

识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3—774页）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关于世界某一局部、某一领域的规律性知识，哲学则是关于整个世界的一般性的知识。哲学和其他科学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二者既不能相互割裂，也不能相互代替。

以上我们从哲学的对象、内容及其同其他专门科学的关系等方面，叙述了哲学最一般的特征。可是，只要我们再前进一步就会发现，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哲学，是很不相同的。哲学虽然包含有给人以智慧的意思，但是有的哲学能使人聪明，或部分地使人聪明，有的哲学反而把人弄胡涂，或部分地把人弄胡涂；哲学虽然讲的都是世界观的大道理，但有的是真道理，有的却是假道理；哲学虽然都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但有的是科学的总结，有的则是歪曲的总结。为了从各种哲学思潮、哲学流派中区分其正确或错误，就必须懂得哲学的根本问题（或基本问题），懂得围绕它而展开的哲学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哲学所研究的世界观方面的问题，上面我们列举了一些，还可以列举很多。在这许多问题中，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关于什么是哲学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些杰出的哲学家，曾经作过有益的探讨。譬如费尔巴哈就说过："神是否创造世界的问题"，"就是精神对感性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哲学上最困难的问题……，全部哲学史就是在这个问题的周围兜圈子"（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63页）。列宁在这段话的旁边批道："参看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中的同一问题"（同上）。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第一次作出了准确、全面的概括。他指出："全

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这个问题所以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是由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这一特点所决定的。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必须要同现实世界打交道。这种活动尽管千差万别，说到底无非是做着两件事，一是认识世界，一是改造世界。认识世界，就是主观反映客观；改造世界，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无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哲学既然是全部实践经验的最高概括和总结，因此，它就不能不对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作出一定的回答和处理，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总的原则和方法，否则，就失去了哲学的职能，就不成其为哲学。历史上各派哲学所阐述的一切哲学问题，都是围绕着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而展开，并且都是为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最高问题。

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包括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是物质和精神，何者是第一性的，何者是第二性的。哲学上所说的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指的是谁先谁后、谁产生谁、谁决定谁的问题，谁是根源、谁是派生的问题，从对立双方的地位说，也就是归根到底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的截然相反的回答，形成为哲学中的两大派别、两大营垒。正确的回答是，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质、根源是物质，精神不过是高度发展的物质——人脑的产物，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错误的回答是，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质、根源是精神，物质不过是精神的产物和体现。持前一种观点的，属于唯物主义

阵营，持后一种观点的属于唯心主义阵营。唯物主义，就是认为唯有“物”（物质）才是世界本源的哲学；唯心主义，就是认为唯有“心”（精神）才是世界本源的哲学。“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唯物主义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照世界本来面目解释世界的学问，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唯心主义则相反，它是从主观愿望、幻想出发对世界本来面目的歪曲和颠倒。古往今来，哲学上的千流百派，归根到底，分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各派哲学家，实际上总是或者唯物地或者唯心地对待哲学的基本问题，不管它们口头上是否承认这一点，都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而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则决定了各派哲学在其他一切哲学问题上的根本路线和方向。全部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发展史，任何真正独立的第三派别，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哲学史上的二元论和折衷主义，不过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混杂，而不是超出二者之上或之外的“中立”的哲学。总之，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哲学基本派别、决定哲学基本路线的唯一标准，这就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成为哲学的根本问题。

按照恩格斯的意见，思维和存在关系这个哲学的根本问题，还有第二个方面，这就是思维能否认识存在，现实世界究竟是不是可知的。恩格斯借用哲学史上的术语，把它叫做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绝大多数的哲学家，包括彻底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在内，都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主张世界是可知的，思维和存在是具有同一性的。另外一些哲学家则否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如英国的休谟

及其门徒），或者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如德国的康德及其一些追随者），这在哲学史上被称为不可知论。全部人类的实践史和认识史表明，世界及其本质是能够被人们所认识的，不可知论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指出不可知论的荒谬，并不等于说凡是主张世界可知的哲学都是正确的。因为，在坚持世界可知的哲学中还包括了一大批唯心主义者，他们虽然主张世界能够认识（这一点应当肯定），存在和思维具有同一性，但他们却把世界、存在的本质归结为精神，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世界的本来面貌。而这样的观点，是由他们在哲学根本问题第一方面的立场所决定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哲学根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关系中，第一方面是更为根本的。

要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不得不涉及这个问题多方面的辩证内容，其中包括：思维和存在是不是一对矛盾，二者是否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是怎样地对立和怎样地统一的，它们的同一是凝固的、死板的还是历史的具体的，在矛盾双方中何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等。思维和存在这对矛盾产生于人类实践和认识的活动之中。对于这些问题，只有科学地肯定社会实践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既唯物又辩证地作出唯一科学的回答。其他的哲学都不了解社会实践的意义，因而它们有的只看到对立，否认统一（如二元论和不可知论）；有的只讲统一，否认对立，把统一（同一）歪曲为等同（如主观唯心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有的把二者的统一，看作是机械的、死板的、凝固的（如机械唯物主义）；有的虽承认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但却认为它们统一于某种客观的精神，即否定了这一问题的唯物主义基础（如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总之，用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观点，都不能正确地或不能完全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

从对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不同解决中，我们已经看到，在哲学上除了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还存在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毛泽东说："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页）

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首先要解决物质和精神何者是第一性的，即世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同时，还不可避免地要回答另一个问题，这就是世界（包括物质的现象和精神的现象在内）的状况是怎样的。现实世界的各种现象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还是彼此孤立、相互割裂的，是运动变化的还是静止不动的，运动变化是不断地新陈代谢还是只有位置的移动、数量的增减或简单的循环，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还是由于外力的推动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区分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辩证法肯定前者，形而上学坚持后者，它们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和方法论。这两种宇宙观和方法论对立和斗争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是否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辩证法一词，在希腊文中的原意是在进行谈话、论战中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方法。就是说，辩证法一词从一开始就是和矛盾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形而上学一词的演变要复杂些。形而上学在希腊文的原意是"物理学之后"。这个词的来源是这样的：亚里士多德的后继者们编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把论述关于有形体的东西的学问（物理学）放在前面，把论述概念以及一般宇宙观的学问放在物理学之后，于是形而上学一词就流传下来。在中国哲学史上

也有形而上、形而下之说，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所以，把“物理学之后”译作形而上学，意思是相近的。我们现在所说的形而上学，通常是指同辩证法相对立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人类的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证明，辩证法是正确的，形而上学是错误的。

从这里可以认识到，关于世界是怎样的状况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事物中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也是任何哲学都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同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二者谁是第一性的问题），是相互联系着的。只有对世界“是什么”和“怎么样”这两个问题，都作出一定的回答，才能形成一定的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历史上任何的哲学体系，都要在这两个问题上，作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回答。因此，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总是同时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当然，这两个问题并不是平列的，“是什么”的问题更为根本，相对于它来说，“怎么样”的问题则具有从属的意义。因为，在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要先知道它“是什么”，然后才能进一步了解它是“怎么样”；而且究竟是辩证地还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归根到底是为了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即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处理着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只有坚持辩证法，从世界本身的矛盾运动出发，才能如实地反映世界的真面目。在这个意义上说，辩证法本质上倾向于唯物主义。反之，如果形而上学地抹杀矛盾，割断联系，否认发展，那就是对世界本来面目的歪曲。在这个意义上说，形而上学实质上又倾向于唯心主义。所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的最基本的分野，作为区别二者标准的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就成为哲学上的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或者象恩格斯所说的，是“全部哲学的最

高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就是说，哲学上虽有两个“对子”，但哲学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哲学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从总体上说它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世界观。世界上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多少世界观，甚至同一阶级的不同阶层，也有不同的主义、不同的世界观。各个阶级的哲学，作为理论化系统化了的世界观，最集中地反映了本阶级的要求，从属于和服务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哲学中的一定派别倾向的贯彻，是它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经济政治要求的哲学表现。

在阶级社会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一般说来，是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对立和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历史上，新生的、进步的、革命的阶级和集团，由于它们的阶级利益程度不同地和历史前进的方向相一致，由于它们不满足于现状，具有程度不同的变革现状和发展生产的要求，因而敢于面对现实，正视现实中的矛盾，冀求在事物的发展中满足自己的利益。这样的地位使它们能够程度不同地认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决定了它们倾向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过来说，唯物主义、辩证法总是符合于这些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并直接或间接、明显或隐晦地为它们服务的。历史上一切落后、腐朽、反动的阶级和集团，由于它们的利益同历史发展的潮流相违背，由于它们要维护和恢复自己的反动统治，因而它们就不敢面对现实，竭力掩盖和歪曲客观的矛盾，拚命反对事物的前进运动。这样的地位使它们不能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决定了它们要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反过来说，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总是有利于反动派而不利于革命人

民，往往是作为反动派的思想工具，用来欺骗群众、安慰它们自己的。

综上所述，哲学上存在着党派，贯穿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斗争；哲学上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上阶级对立和斗争的反映；超越于“两个对子”之上的“超党派”的一般哲学，在阶级社会中对各个阶级都一视同仁的“超阶级”的哲学，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哲学的党性。紧紧地把握党性原则，坚定地贯彻这一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要求。

“两个对子”的对立和斗争，除了社会阶级的根源而外，还存在着认识论的根源。

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根源于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主观是客观的反映，认识是实践的产物。人们在实践中，在主观和客观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就会逐渐地意识到自己所接触的周围事物及其变化发展，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每一个实践着的人，实际上都要受这个观点所支配，否则就无法生活下去。这种自发形成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萌芽，由进步的或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哲学家加以总结和提炼，就形成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哲学。

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根源于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分裂。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是对立的统一，它们的统一存在于它们的差别和对立中。主观认识不仅同客观实践存在着差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是一个复杂的、曲折的、矛盾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存在脱离客观实践的可能。譬如，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如果脱离客观实践，片面地夸大感性认识，把主观感觉看成是唯一实在的东西，这就产生了主观唯心主义；

如果脱离客观实践，片面地夸大理性认识，把概念看成是离开人和事物而独立的“客观”实在的东西，这就产生了客观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五光十色，归结起来不外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两种基本形式，而这两种形式都可以从人们的认识过程中找到产生的根源。再如，人们在实践中所接触到的客观事物，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相互区别的；既是运动变化的，又是在一定条件下相对稳定的；既是它自身、又是包含着他物，等等。人们在反映这种复杂情况的过程中，如果脱离客观实践，把区别夸大为绝对的分离，把稳定夸大为绝对的静止，把质的规定夸大为绝对的无矛盾的自身等同，并把这种片面的认识系统化，就会形成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列宁指出：“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同样地，这也是形而上学宇宙观的认识论根源。在这里，我们进一步看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仅在阶级根源上往往是一致的，而且在认识论根源上也是彼此相通的。现实的斗争也是这样。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唯心主义横行和形而上学猖獗，正是他们同一个反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两种表现，是一回事的两个方面，是他们手中相互为用、相得益狂的两件“法宝”。

毛泽东曾经说：“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实践论》）这是对哲学中“两个对子”的认识论根源的科学总结。

从“两个对子”及其根源的分析中，可以明确地认识到以下几点：第一，“两个对子”是同哲学共始终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即使到了彻底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在社会成员中还存在先进和落后、革新和保守的矛盾，存在着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对立统一，那就仍然会存在着产生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根源，“两个对子”还将继续下去。只是那时的认识上、理论上的分歧，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罢了。而且由于生产的高度发展，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和极大普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消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从总体上不再会居于统治的地位。第二，我们对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的批判，首先要着重于揭露其阶级根源和反动实质，同时也要分析它的认识论根源，指出这朵“不结果实的花”，是怎样从“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生长起来的。这样的批判，才是全面的，深刻的，有说服力的；同时也有利于肃清流毒和影响，使革命的人民从人类思维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获得教益。第三，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必须要有正确的坚定的立场，同时又要时刻警惕、力求避免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实践而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性质的错误。为此，要把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永远作为我们的座右铭。

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发展史

列宁说过：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

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那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对于哲学和哲学基本问题，对于围绕着哲学基本问题而展开的对立和斗争，同样需要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的考察。只有这样，我们对哲学这门世界观的学问，对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基本，对“两个对子”之贯穿于哲学发展的全过程等问题的理解，才能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怎样在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发展和丰富起来，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作了思想的准备。

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人类由于劳动，从动物界、从一般自然界分化出来之后，随着智力的发展，开始形成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有了自己的精神生活。于是，人和周围自然界的关系、人的精神活动和肉体的关系问题，就呈现在面前。在原始社会，由于实践水平低下所决定的智力水平的低下，人类一方面产生了必须承认自然界客观实在性才能生活的朴素观念；另方面产生了灵魂（对精神现象的错误看法）不死、灵魂可以离开肉体以及万物有灵等观念。这实际上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对立的最初萌芽。但在那时，人类的全体为维持起码的生活而整日奔忙，还没有余暇去从事专门的脑力劳动，所以，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的哲学还不可能产生。

正式形成哲学，是奴隶社会的事情。在奴隶社会，随着阶级的产生，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这种现象，体现了少数剥削阶级对多数劳动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同时也是科学和哲学能够产生的必要条件，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历

史的进步。那时由于手工业、农业、商业和航海业的实际需要，引起了天文学、气象学、数学、力学、地理知识的产生和发展，使人们有可能摆脱氏族宗教观点的束缚，把包含在这些科学知识中的唯物主义观点的萌芽加以系统化，创立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反过来促进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一般反映奴隶主中某些进步派别（在古希腊是从平民中产生的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它遭到依靠传统宗教维持其地位的奴隶主保守集团（在古希腊是奴隶主贵族）的极端仇视。代表奴隶主保守集团的思想家，为了维护其等级特权，反对唯物主义，则把原始氏族宗教观点系统化、哲理化，建立起唯心主义哲学。哲学从一产生，就立即展开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基本路线的斗争。

古代的唯物主义是朴素的，带有直观的性质，缺乏科学的论证。它否认世界是神创造的，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是，它把世界的物质性归结为某一种或某一些具体的“原初”物质。在中国古代，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在古希腊，被认为是“原初”物质的有水、火、气、土、原子等，其中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认为万物都由微小的不可分的原子所构成）学说，是古代希腊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式。同唯物主义路线相对立，古代希腊的唯心主义者认为世界的本质不是物质而是精神，这种构成世界的精神本质，有的说是抽象的“数”，有的说是决定一切的“目的”，有的说是神秘的“理念”。其中，柏拉图是希腊古代唯心主义的最大代表。柏拉图提出一种荒谬的“理念论”，认为“理念世界”是现实世界的本质，现实世界反倒是它的影子。哲学上德谟克利特路线和柏拉图路线的斗争，反映了奴隶主民主派和奴隶主贵族之间的政治斗争。

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得相当

突出和激烈。春秋战国是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过渡时期，当时社会的变动、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在学术思想领域，出现了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局面。虽称“百家”，在哲学上实际只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代表没落奴隶主利益的思想家孔丘，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为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礼治”）作辩护。孟轲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主观唯心主义，提出了“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等一整套唯心主义理论。和孔孟唯心主义相对立，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荀况、韩非等，坚持唯物主义路线。荀况反对孔子的天命论，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思想，承认事物的发展有着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反对孟子的“天人合一”，主张“天人相分”，特别还提出了“戡天”的思想，要“制天命而用之”。荀子的学生韩非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唯物主义思想，他反对天命，主张“争于气力”。他还针对孔孟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提出了“参缘理”（按照事物的规律办事，才能成功）、“参验”（依据实际效果检验某种言论是否正确）等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

在古代社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古代的唯物主义一般都具有初步的辩证法思想，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朴素的结合。在这方面，赫拉克利特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他有一段彪炳于世界哲学史的名言：“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息灭着的永恒的活火。”列宁高度评价了这一可贵的思想，指出：“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5页）在其他唯物主义哲学中，都程度不同地包含有许多辩证法思想。如：中国古代“五行”说中，有“以土与金、

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的说法，就包含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东西相结合而产生新事物的辩证法观点；韩非的“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解老》），就包含了事物在矛盾中发展和变化的思想。与此相反，许多古代的唯心主义者同时也宣扬否认发展、抹杀矛盾的形而上学，如毕达哥拉斯的永恒的“和谐”，巴门尼德的唯一不动的“存在”等等。但是，在古代唯心主义哲学中，有时又加杂了程度不同的辩证法思想，有的（如在柏拉图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中）还相当丰富。而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又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说明，哲学上“两个对子”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又不能完全等同起来。

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仍然继续进行着。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时代，基督教占绝对统治，渗透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古代社会那种脱离宗教而独立的哲学几乎绝迹。但在直接为宗教和教会服务的经院哲学内部，仍然展开了唯名论反对唯实论的斗争。唯名论认为，个别事物先于一般概念而存在，这就是承认事物是第一性的，概念是第二性的，概念不过只是事物的名称。唯实论则相反，认为一般概念先于个别事物，概念是独立的实体，具体事物是由概念产生的。马克思说：唯名论“是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列宁说：“中世纪唯名论者同实在论（唯实论的另一译法——引者）者的斗争和唯物主义者同唯心主义者的斗争具有相似之处。”（《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5页）这说明，即使是宗教唯心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虽然严重地束缚了哲学的发展，但毕竟不能完全窒息唯物主义对于唯心主义的抗争。

中国的情况同欧洲有所不同。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虽然统治思想主要是儒家中的以及儒、道、佛相结合的唯心主义学说，但在长时期内，代表着反对大地主阶级专横统治、要求生产力发展和工商业发展的社会势力的唯物主义哲学，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在人类哲学发展史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东汉时的王充用“天与地皆体也”、“天道无为”、“天与人异体”等唯物主义观点，否认了有人格的上帝的存在，反对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唯心主义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有裴頠的唯物主义的“崇有”论反对玄学唯心主义“贵无”论的斗争；有范缜的唯物主义的“神灭论”反对佛学唯心主义的斗争。在唐朝，有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不相予”、“天人交相胜”的唯物主义，反对“天”能“赏功罚祸”的唯心主义的斗争。宋朝以后，围绕着“理”与“气”、“心”与“物”的关系问题，有王安石、陈亮、叶适、王廷相、王船山、颜元、戴震等一大批唯物主义者，反对程（颢、颐）朱（熹）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反对陆（象山）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的斗争。中国封建社会的唯物主义哲学，无论从立场的鲜明和内容的丰富上，都远远地超过了欧洲中世纪的“唯名论”。

在封建社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同样贯穿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一方有董仲舒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长期为反动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另方面，运动发展、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也在发展着。例如，柳宗元提出天地万物含有阴阳二气，由于阴阳的相互作用而发生自然界的“自动自休，自峙自流”、“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柳河东集·非国语》）的变化。王船山更进一步，指出万物的变化，都由于“阴阳相感”，他说：“万物之所自生，

即此动几之成也”（《张子蒙注·乾称下》），“动几”即运动的源泉在于事物内部的“阴阳相感”，而“非阴阳相感之外”（同上）。这说明，王船山是把朴素的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的杰出代表。此外，有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如朱熹等，也有不少的辩证法思想，也呈现出“两个对子”错综交织的复杂情况。

在世界历史上兴起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要求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政治上反对封建的神权统治，反映在哲学思想上，就迫切需要能同封建神学直接对抗的唯物主义哲学，因而一些杰出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运而生。

十四至十六世纪，是欧洲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中世纪的教会统治，几乎“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面对这一政治黑暗、文化凋零的局面，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发端于资本主义关系最早发展的意大利，随后遍及西欧各国。在中世纪长期“冬眠”之后，“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这一时期，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联，诞生了哥白尼、伽俐略、布鲁诺等一批反对唯心主义宗教神学的无畏战士。

十六世纪后半期到十七世纪中叶，欧洲的工商业和科学文化中心，从意大利移到了英国、尼德兰（荷兰）和法国，到了十八世纪，法国成了资产阶级革命风暴的中心。这一时期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英国有培根、霍布斯和洛克，在荷兰有斯宾诺莎，在法国有拉美特里、狄德罗、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等人。这是唯物主义冲破唯心主义宗教神学而凯歌行进的

时期，是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期。这些先进的思想家在哲学上的革命，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变革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要求，有的（例如在法国）则成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直接先导。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一次较彻底的革命，因此，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也就成为资产阶级唯物主义最杰出的典型。它被列宁誉之为“战斗的无神论”，说明了在反对唯心主义、宗教神学方面，它达到了资产阶级所可能达到的高度。

然而资产阶级毕竟是剥削阶级，它的革命性不可能是彻底的，而且也不可能是长久的。资产阶级在从封建贵族那里争得了统治权之后，它就逐步丧失了原有的革命性，而趋向于保守和反动。这种情况在贝克莱唯心主义哲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英国大资产阶级在一六八八年取得了政权以后，便一心镇压人民，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宗教便成为它的重要思想工具。贝克莱大主教的以“存在就是被感知”为核心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就适应了这一反动的需要。贝克莱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鼻祖，他疯狂地向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进攻，竭力用宗教神学为反动势力服务。他的哲学是对十七世纪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一种反动。

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虽然程度不同地包含了一些辩证法思想（在斯宾诺莎哲学中最为明显），但整个说来，它具有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而且没有把唯物主义坚持到底，在社会历史领域仍然是唯心主义。它的这种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是由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和剥削阶级的偏见所决定的。

欧洲近代的自然科学是从十五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从这时起直到十八世纪末，“在所有自然科学中达到某种完善地步的

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刚体（天空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量的力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这种情况就决定了，以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立足点的唯物主义哲学，就不能不带上浓厚的机械论的色彩。从研究方法上看，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得不经历一个搜集材料的阶段。为着深入地认识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的规律性，自然科学家首先要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撇开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变化，孤立、静止地对一个和一类材料进行考察。培根和洛克等人把这种研究方法带入哲学领域，就形成了这一时期占支配地位（辩证法处于从属地位，但并未绝迹）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这一切，就使得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往后，我们还将分析到，用这样的形而上学方法，决不可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

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同时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处在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既是反封建的阶级，又是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它既要唤起群众反对封建压迫和教会统治，又害怕群众进而奋起反对资本剥削，弄得引火烧身；它既有一定的面对现实、揭露事实真相的勇气，又有不敢完全正视现实、彻底揭露事实真相的耽心；它既要对群众做启蒙工作，又要蒙蔽群众。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为了实现这样的革命，资产阶级需要拿起唯物主义的武器来批判封建专制，特别是批判其精神支柱宗教神学；同时，又需要用形而上学来掩盖资本主义关系下的内在矛盾，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完美”和永恒性。所有这一切说明，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所以能够结合在一起，又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在德国也酝酿着资产阶级革

命。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不发达，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落后，在政治上软弱。它羡慕法国革命，但又被法国群众革命斗争的风暴所吓倒；它反对专制制度又割不断同君主的联系；它赞赏法国资产阶级破除迷信、尊重理性的精神，又不敢同宗教决裂。德国资产阶级既想革命又怕革命的二重性，表现在哲学上，就是辩证法和唯心主义的奇特的结合。同法国一样，在德国，哲学上的革命也是作了政治变革的导言。但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准备，在哲学上主要地不是表现为唯物主义，而是表现为具有不同程度的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和当时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康德，以其包含有辩证法思想的天体演化学说（星云说），第一次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尔后，辩证法思想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黑格尔关于一切都在矛盾中运动的思想，反对了形而上学，猜测到了事物本身的辩证法。但是，他的辩证法是同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是概念的辩证法，唯心的辩证法。在他看来，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以前，就存在着所谓"绝对观念"，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绝对观念"的体现和派生物。这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而又神秘莫测的"绝对观念"，实际上并不存在，它不过是用哲学术语表达出来的"上帝"而已。黑格尔所讲的发展，就是"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这样，黑格尔的辩证法，第一，由于把

“绝对观念”而不是客观物质世界看作矛盾发展的主体和承担者，因而是头脚倒置的，违反科学的；第二，由于唯心主义体系的需要，他把自己的哲学看作是“绝对观念”发展的顶点，是一个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既能包括一切科学又能代替一切科学的“科学之科学”，是一个穷尽了一切真理的最终的绝对真理的形而上学体系，因而他的辩证法又是不彻底的。矛盾发展的合理思想被坚硬的唯心主义外壳所窒息，这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尖锐矛盾。克服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在于：炸掉它的外壳，把辩证法拯救出来。

勇敢地炸掉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是德国资产阶级古典哲学最后一个杰出的代表费尔巴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日益成熟，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反映在哲学上，就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唯物主义的兴起。费尔巴哈作为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派的思想代表，尖锐地批判宗教，反对神，要求尊重人。他的巨大功勋在于，打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的权威，把自然界和人当作哲学的出发点，摒弃了自然界和人以外的独立存在的精神。所有这一切，对于使当时先进的人们（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最前列），从唯心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但是，由于他遭受政治迫害，在乡村过着隐居生活，脱离社会，脱离群众，脱离火热的斗争，脱离飞跃进步的自然科学，使他的哲学没有超出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范围。他全盘否定黑格尔，把黑格尔的辩证法连同他的唯心主义一起简单地抛在一旁，而以许多方面都比黑格尔思想贫乏得多的哲

学来取而代之，因此，他就不能真正制服黑格尔哲学而产生出划时代的结果。恩格斯说：“象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只有无产阶级的思想家和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真正完成了这一任务。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是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坚实的阶级基础。

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由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普遍地发展起来。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矛盾的明朗化，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经济活动在民族的、以至世界范围内的紧密联系，阶级关系的简单化及其同经济地位、物质利益之间的直接联系，所有这一切，都充分显示出社会历史的辩证的唯物的性质。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也随之发展起来，队伍不断增长，组织性不断加强，战斗力不断增长。从三十年代起，先后爆发了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德国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等等，说明无产阶级已由原来的资产阶级附

庸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的身上。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无产阶级迫切要求代表自己利益、指导自己行动的革命的理论和世界观。当时的德国处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革命的中心已由法国转移到德国。德国工人阶级受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具有更强的革命性和战斗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思想家和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德国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故乡。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自然科学飞跃发展的产物。生产力的大发展，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大发展。进入十九世纪以后，自然科学由原来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发展为“整理材料的科学”，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发现。其中，特别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的原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242页）这就是说，从哲学上概括自然科学的成就、全面深刻地揭示自然界辩证唯物性质的条件，这时也完全成熟了。

同样，哲学史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传统，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而德国古典哲学则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当时的德国既处在革命风暴的中心，又富有浓厚的哲学色彩。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起先受到黑格尔哲学的熏陶，而后又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洗礼。然而扎

根于劳动群众、时刻倾听实践呼声、密切注意科学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是用批判的眼光来对待他们的哲学先辈的。特别是在他们由激进的民主主义立场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以后，在哲学上的批判、改造和创新的工作就大大地加强了。从德国古典哲学阵营中走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了解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最能珍惜它们的成果，也最能击中它们的要害。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总结工人运动的丰富经验和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剥掉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外壳，批判地吸取了它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排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宗教的、伦理的唯心主义杂质，批判地吸取了它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并溶入自己的新发现，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总之，“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矛盾论》）在这样成熟了的历史条件下，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这一成熟了的任务，这“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条件也是不能成功的”（《实践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中的空前大革命，是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变革。这一革命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哲学的对象（以及它同具体科学的关系）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束了所谓

"科学之科学"的统治。

哲学的对象问题，哲学和其他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古代，由于实践水平的低下，人们对于周围的世界认识得很笼统、很肤浅。与此相适应，在最初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中，哲学和其他科学之间，其他各门科学之间，还没有明确的界限、严格的分工，它们松散地、浑然一体地掺杂在一起。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哲学和其他科学分化的过程。然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哲学家并没有明确认识、自觉顺应这一人类认识史的进步趋势。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哲学看作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所谓"科学之科学"。他们抱着解答一切疑难、穷尽一切知识的奢望，君临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上，这就难免要用主观幻想的联系代替尚未知道的真实联系，用臆想的论断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认识上的空白。总之，是用自己的哲学原则和逻辑方法来编织自认为天衣无缝的绝对真理的体系。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有的虽然也多少概括了一些科学的成就，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但更多的则是错误的甚至荒唐的结论。如前所述，黑格尔哲学就是最突出的典型，费尔巴哈哲学也未能脱开"科学之科学"的窠臼。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宣告了"科学之科学"的终结，而以关于自然、社会和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取而代之。这一深刻的革命，使哲学摆脱了包办一切的重负，能够在概括和总结具体科学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地丰富自己；同时又以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般指导武装各门科学，使它们挣脱形而上学框框的束缚，能够在正确的轨道上得到蓬勃的发展。这无论对于哲学本身和各门科学，都是一个巨

大的推动。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1页）包括而不能代替是指：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所揭示的普遍规律，贯穿于和支配着一切科学部门，任何科学的研究和实践都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观为指导；另方面，普遍规律并不能代替它在各个领域中的特殊表现，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不能代替各门科学的具体方法和具体结论。这是对于哲学和具体科学相互关系的唯一正确的规定。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方面实现了革命的变革之后，任何想使已被否定的"科学之科学"重新复活，重操"越俎代庖"之旧业的企图，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然而，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王张江姚"四人帮"居然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拣起"科学之科学"这个早已发了霉的破烂，鼓吹哲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的谬论，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开倒车的行为又是什么？！

第二，从哲学的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高度统一、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高度统一的完整的科学体系代替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从上一节的简要叙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产生以前，唯物主义经历了两种历史形式：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辩证法也经历了两种历史形式：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由前者向后者的发展，无疑是哲学思想史的重大进步，然而这个进步是以牺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来那种朴素的、直观的统一为代价的。现实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由内部矛盾引起发展，换言之，它的客观性和辩证性，本来是统一不可分的。按照事物本

身的逻辑，唯物主义本质上应当是辩证的，辩证法本质上应当是唯物的。然而，由于阶级的和科学水平的局限，在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分离，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唯心主义窒息着辩证法，形而上学限制着唯物主义，使得辩证法和唯物主义都不能得到彻底的贯彻。哲学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克服这个矛盾。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哲学，整个说来在社会历史观上都是唯心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固然是这样，唯物主义哲学也不例外。本来唯物辩证法的客观规律既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社会中。然而在旧唯物主义那里，只在自然观上是唯物的（由于形而上学作祟，在这方面也不可能十分彻底），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它就毫无例外地背叛了自己，陷入了唯心主义。"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实践论》）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和社会观上的唯心主义，这是哲学发展中必须加以排除的又一尖锐矛盾。

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地解决了上述矛盾，在实践的基础上，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高度地统一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辩证法，使唯物主义、辩证法都提高到它的第三个、也是最高的历史形式。在这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双璧合美，相得益彰。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把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推广和贯彻于社会历史领域，破天荒第一次把关于社会的学说变为科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就形成了十分完整、系统、周密的科学体系。我们通常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把这一名称所包含的内容同旧哲学加以比较，那就会体会到它的革命意义是多么地深刻啊！列宁曾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作一块整钢，他

说："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4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要求我们完整准确地去领会和掌握它，否则，就是对它的歪曲和背离。一切修正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任意地割裂和肢解这块整钢，在这方面，"四人帮"达到最疯狂最无耻的程度。他们经常打着"辩证法"的旗号攻击唯物主义，胡说"存在第一、思维第二"的原则是什么"反动的形而上学"。其实他们那种背离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不过是形而上学诡辩论的别名而已。

第三，从哲学的阶级本质和实际作用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服务的理论武器否定了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哲学。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论》）在哲学与阶级斗争、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它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全部意义，最集中地体现在这两个特点上。

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哲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绝大多数属于剥削阶级哲学，反映少数的剥削者的利益，为剥削制度作论证，而同广大劳动人民相对立。少数剥削者的狭隘私利，决定了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掩盖自己哲学的阶级性，而把它冒充为"全民哲学"。这种"超阶级"、"无党性"的宣传，并不能真的就抹掉它的阶级性，恰恰相

反，这正是表现了它的阶级地位，反映了它的阶级利益，贯彻了它的阶级意图。一句话，“无党性”正是剥削者的党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它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大公无私、襟怀坦白、热爱真理、实事求是。作为这样一个阶级的哲学，当然不屑于隐瞒自己的阶级主张、掩盖自己的阶级面貌，而敢于公开申明自己的阶级性，理直气壮、光明磊落地为贯彻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而斗争。愈是承认和揭露事实真象，就愈能启发群众的觉悟，愈符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相反，如果隐瞒自己哲学的阶级性，不但违背了客观事实，而且会模糊无产阶级哲学的斗争任务，这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是不相容的。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决定了它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正如列宁所说：“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列宁全集》第1卷第81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它的实践性是紧密相联的。以往的一切哲学理论，都不懂得实践、特别是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的意义。唯心主义者是这样，旧唯物主义者也不例外。当然这不是说，他们的哲学在社会实践中不发生什么作用。任何阶级的哲学，既然要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那就必定要力图用本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

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是，旧哲学在理论上否认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把实践排斥在哲学理论之外，因此也就提不出用实践、特别是广大群众的革命实践去改造世界的哲学主张。例如，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他们是要用自己的世界观去改造封建社会、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但是他们认为，达到这一目的途径在于对封建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对“愚昧”的群众进行“启蒙”，即把封建的神学的黑暗统治加在人们思想上的蒙蔽物“启”开，使人们恢复天然的“理性”，这样资本主义的“理性王国”就会到来。所以，他们的哲学，实际上是把改造世界的任务归结为对世界的说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引入哲学，当作全部认识论的基础，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包含这样相互联系的两层意思：第一，它在理论上全面地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和在哲学中的地位，说明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理论都是要付诸实践，变为群众的行动，化作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泽东说的“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张，又是它发挥实际作用的现实道路。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概括了宇宙普遍规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统一的完整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这就是它区别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根本特征，也是它

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主要之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但不是哲学发展的结束；是哲学史上“两个对子”斗争的科学总结，但不是这一斗争的终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在更高的基础上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道路，展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新的斗争，并随着实践的发展、斗争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战斗的一生中，坚持不渝地运用他们所创立的崭新世界观，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指导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并在总结实践经验和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把自己的学说不断地推向前进，使之臻于完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光辉哲学思想，贯穿在他们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特别集中地反映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他们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一系列通信中。我们现在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项原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和一般理论著作中已经奠定了基础，或者可以从那里找到理论的渊源。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的斗争中，在总结新的历史经验和科学新成就的基础上，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全面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把马克思

主义及其哲学推向了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

列宁同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最腐朽的哲学潮流——以马赫主义为主的主观唯心主义潮流的斗争中，写下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这部光辉巨著和其他著作中，列宁发挥了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明确提出并全面贯彻了哲学的党性原则；概括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即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客观世界的可知性和认识发展的辩证法，第一次明确提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34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为了分析帝国主义制度的尖锐的、复杂的矛盾，为了批判"回避和掩饰了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列宁选集》第2卷第835页）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叛徒们，列宁深入地研究了唯物辩证法，写下了收集在《哲学笔记》中的一系列光辉论著。在《哲学笔记》和其他有关著作中，列宁第一次明确提出对立统一学说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原则上解决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来不及"详细地考察"的关于唯物辩证法诸原理内部相互关系的问题（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5页）；进一步阐明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及对立面统一的相对性和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的原理，规划了关于矛盾规律基本内容的纲要；进一步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的过程，提出了"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及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相一致的著名原理。

列宁在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在同主观社会学等形形色色唯心史观的斗争中，写下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等不朽著作。列宁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是一个自

然的历史的过程，即客观的、辩证的、合乎规律的过程的思想，以及主观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高度概括地揭示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两点主要区别，这就是：能否找到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背后的客观动因、社会关系体系的物质根源，是否肯定和科学地说明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在有关阶级斗争规律、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上，以新的实践经验大大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继承列宁的遗志，同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同德波林派的唯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捍卫和发展列宁主义及其哲学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他在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在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和运用上，存在有某些缺点，但总的说来，他是功大于过的，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他在一系列哲学问题上，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客观经济规律和人们对它的掌握和运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等问题上，还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中国人民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这个思想武器，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事情，曾经创造了灿烂文化的中国，近几百年来，由于腐朽的封建统治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经济、政治和哲学上，都落在后面，直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才进入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时代。半殖民半封建旧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软弱，当时代表资产阶级进步要求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和孙中山等，虽然努力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历史观点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中，寻找救中国的真理，但他们始终没有形成象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唯物主义

那样成熟的哲学体系，更不可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由于世界各种矛盾在中国的集中表现和激烈冲突，使中国成为新的革命风暴的中心。成熟了的历史任务，要求在最先进的革命理论和世界观的指导下来实现。正在暗中摸索的中国的先进的人们，从列宁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0页）从此，中国的无产阶级就以崭新的思想武装，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开辟斗争的新航向。在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斗争中，诞生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的斗争中，在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的光辉著作和伟大实践中贯穿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纸老虎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等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列宁曾经指出，对立统一学说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选集》第2卷第608页）。遵照列宁的哲学遗训，毛泽东以充分展开的形式说明和发挥了对立统一的学说，详尽地阐明了矛盾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

心地位；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的丰富内容，使这一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具有更加完备的理论形式；创造性地作出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新概括，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哲学基础。

毛泽东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其中包括：关于实践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从各方面充分阐述了实践第一的观点；关于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问题，提出了认识过程的两个能动的飞跃的思想，概括出“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认识论公式；关于认识的运用问题，制定了一套唯物辩证法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等等。贯串一切的，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就是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而我们党奠定了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把矛盾分析方法和实践第一的观点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立统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等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毛泽东彻底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以及由此所规定的群众性，提出哲学应当从哲学家的讲坛和书斋里解放出来，变成广大干部和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他不仅反复论述了哲学解放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而且以自己的光辉实践树立了把哲学群众化的伟大典范。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培育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在我国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了根，从而使它的进一步发展获得了无限生命力的源泉。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说明，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以纯粹的理论形态出现的，而是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出现的。它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个别人在书斋中空想的产物，而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斗争经验的总结。它集中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整个人类的智慧，反映着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伟大创造性和革命毅力；又反过来指导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斗争。

马克思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批判旧世界、创立新世界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恩格斯把唯物辩证法当作自己手中“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同上，第4卷第239页）；列宁把马克思的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看作是交给人类，特别是交给工人阶级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比作射向革命之“的”的“矢”，把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比作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8页）。总之，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总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武器来使用，并在使用中对它加以考验，从而把它锻造得更加锋利。

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历史，半个多世纪来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曲折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要是坚定地、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的指南和行动的向导，就会排除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地取

得胜利；而如果不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就会产生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就会使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就不能对事物作恰当的分析，就会犯教条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错误，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甚至把革命引向失败。在我们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切做对了的事情，考究起来都是合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而一切错误，无不是违反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饱经风霜、千锤百炼的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备尝过毛泽东哲学思想胜利的欢乐，也吃尽了作为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思想基础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苦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切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不可须臾离开的。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是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这一任务的实现，是一场艰巨的、持久的硬仗。打胜这一仗要有武器。既然我们以往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胜利，那么毫无疑问，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更加需要我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这一百战百胜的武器。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这里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加深我们对于新时期总任务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事物都有其固有的规律。用这个观点看问题，就必须承认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有其固有的规律，不能主观上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无产阶

级夺取政权，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统治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必须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这方面来。对此，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曾一再作过明确的指示。可是，从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现在二十多年了，由于种种原因，使我们工作重心的转变一直没有完成，耽误了宝贵的时间，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带来了人民的痛苦。这说明，客观规律必须遵守，违反它就必然受到惩罚；同时也说明，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顺乎历史的潮流，合乎群众的需要，果断地作出党的工作重点转变的决策，是多么正确，多么重要。在这个时候，我们结合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认真学一点哲学，就一定能够大大提高我们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自觉性，增强我们加速四个现代化进程的紧迫感。

第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更有力地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思想体系。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是破坏四个现代化的罪魁。“四人帮”为了篡党窃国，乱我中华，不仅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组织了一个反革命的帮派体系，而且拼凑了一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反动理论体系。多年来，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搞乱了思想、理论和路线，其危害之烈，破坏之大，每个革命的同志都有切身之感，切肤之痛。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拨乱就不能反正。不廓清林彪、“四人帮”一伙所施放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毒雾，人们的思想就不能彻底冲破牢笼，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就没有切实的保证。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斗争，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证明，要把他们那套用“革命”的外衣、“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伪装起来的反动货色批深批

透、批倒批臭，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牢牢地掌握起唯物论、辩证法这个解剖刀和照妖镜。

第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为我们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指明正确的方向。

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向科学的进军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坚持以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为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比如，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不同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等等原理，作为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任何科学的研究，对于科学研究的每一个环节，从确定课题、搜集和整理材料、明确主攻方向、进行实验、得出结论到实际运用，都是绝对必需的。没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2页），更谈不上会有什么科学上的建树。在任何有成果的科学思维中，都是贯穿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区别只在于自觉还是不自觉，彻底还是不彻底。我们的任务是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一个自觉的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这样才能不断排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对科学事业的干扰和侵袭，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和实验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列宁说：任何自然科学，“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列宁选

集》第4卷第608—609页）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从自然科学中吸取营养，以不断地丰富自己。哲学理论工作者应当尽可能地学习一些自然科学，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列宁曾经号召：战斗唯物主义要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同上，第608页）。在为新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一教导，并努力使它付诸实现。

第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进一步端正我们的思想路线，提高我们的思想和工作水平。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是一场极其广泛深刻的革命。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所不熟悉的新情况、新事物，许多我们没有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解决。换句话说，就是迫切要求我们解决主观认识同客观实践、客观规律不相适合的问题。要把不适合变为比较地适合，我们就应当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科学世界观，端正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树立科学的思想方法，使我们的头脑中多一些唯物辩证法，少一些主观主义、形而上学。这样，也就会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比较地易于适应新形势，接受新事物。只要真正按照唯物辩证法看问题、办事情，我们在攀登四个现代化高峰的历程中，就会少走些弯路，少付出些代价，而多作些贡献，多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武器，决定了学习它的重要意义和根本目的，同时也决定了学习时所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党

性的科学，那么要学习和掌握它，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认真进行主观世界的改造和党性的锻炼。否则，就是南其辕而北其辙，至多只能记住一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词句，了解它的一些皮毛，而不能掌握它的精神实质。这一点，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当然，这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把立场问题完全解决了，才能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的过程，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过去和现在都有无数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已经转变成为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革命战士。一切愿意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人，只要抱着真诚的目的，经过刻苦的学习、锻炼和改造，都能够成为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那么要学习和掌握它，就必须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灵魂，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正确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要认真读书，掌握理论。不读马列和毛泽东哲学原著，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但是，学习理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同现实的生活、群众的斗争、现代工农业和自然科学的新发展、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如果学习哲学只停留在书本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味在概念中打转、“天空中飞翔”，就会把活生生的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采取这样的态度和方法学习哲学，即使把许多词句和条文背得烂熟，也还是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这实际上是把本本上的东西当成第一性的，把它变成同客观现实的辩证法相隔绝的抽象公式，就是说，这种态度和方法本身，就是违

反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只有尊重实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才是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才能真正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百三十多年前，马克思说过：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这样的“精华”和“灵魂”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了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为了发展我们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一定要下苦功攻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坚持无产阶级立场，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让这一百战百胜的思想武器，在新时期新长征的途程中发挥出更大的威力。

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性

一、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二、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三、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存在的形式
四、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

列宁说："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外部世界，承认物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列宁选集》第2卷第79页）。承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把世界如实地看作永远在一定空间、时间中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这是唯一正确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彻底贯彻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根本出发点，是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认识世界，遵循世界固有的发展规律改造世界的坚实的哲学基础。

一、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纷繁复杂，气象万千。这个无限多样性的世界有没有统一性？如果有，它统一的基础、共同的本质又是什么？对于这两个问题，各派哲学的回答是很不相同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认为世界是统一的，世界只有一个本原，它们都是一元论的世界观；但是，对于这个本原是什么的问题，它们则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唯物主义认为是物

质，唯心主义认为是精神。另外还有一些哲学家否认世界的统一性，主张多元论的世界观，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主张世界有精神和物质两个本原的二元论。一切唯物主义哲学都主张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对于统一性与多样性（一与多）的关系以及物质的本性是什么等问题的理解是不科学的，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唯一科学地解释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彻底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

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统一的物质整体。世界上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事物和现象，其中包括意识这种现象，都是物质的种种表现形态。所谓物质，就是不依赖于意识、精神而独立的客观实在。

承认世界的物质性，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信念。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在他们的一切活动中，都不可能摆脱同自己矛盾着的对立面——客体、外部世界的制约，因而被迫不得不承认这些被认识被改造对象的物质性，即客观实在性。人们不能脱离现实的物质世界胡思乱想、妄作非为，否则就只会给自己带来挫折和失败。最简单的事实是，人们要活着就得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即离不开物质生活资料。谁要是只靠主观的精神、美好的愿望和奇妙的幻想过日子，那是绝对活不下去的。关于世界物质性的朴素信念，尤其深深扎根在处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第一线的劳动人民心中。他们在生产中要和大自然作斗争，要和物质生产资料如土地、厂房、机器、农具、原料、种子等等打交道。他们在反抗剥削和反动统治的斗争中，会遇到剥削者和反动派的镇压和顽抗。这一切生活的现实，都使人们认识到在自己的主观意识之外，有着一个客观世界，这个客观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这种唯物主义

的观点，随着实践的发展、科学的进步，适应社会上先进阶级的需要，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提高。

如果说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根植于人类的社会实践，那么脱离实践则是产生唯心主义、二元论等错误世界观的认识论根源。人类的劳动和一切活动越发展、越复杂、越完善、就越带有周密的计划性和明确的目的性。这种计划性和目的性都是头脑思维的产物。所以，思维的头脑的作用也就越来越显得重要。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思维着的头脑在支配着整个人类的行动，统治着人类的社会。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曾作过深刻的分析："在所有这些首先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统治着人类社会的东西面前，由劳动的手所制造的较为简易的产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何况能计划怎样劳动的头脑在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执行它所计划好的劳动了。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到头脑中，是被意识到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代世界崩溃时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515页）这里所说的古代世界的崩溃，也就是阶级社会的出现。由于剥削阶级的出现及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就大大巩固、加强了唯心主义。剥削阶级依靠他们占有的物质生产资料，摆脱直接的生产斗争的实践，强迫命令劳动人民按着他们的计划，为实现他们的目的而辛勤地劳动。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仅仅动动脑筋、出点主意，依靠占有的生产资料和上层建筑的力量坐享其成，攫取劳动人民的大部分劳动果实，而且是其中最好的部分。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强

调精神的作用，否认世界是物质的统一体，把精神说成是世界的本原，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由精神所构成的。这就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

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一切事物都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之中，世界不过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陆象山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说："心外无物"。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马赫说："物是感觉的复合"。杜威说："世界是我的观念，我的活动，我的经验"。这种种主观唯心主义有三点共同的谬误：第一，既然世界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那末在人和人的意识出现以前就不可能有世界，不可能有地球、日月星辰等等一切的一切。这显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的普通常识。第二，既然一切事物都是思想的产物、感觉的产物，那末大脑也成了思想的产物，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也都成了感觉的产物。因此，也就无需大脑来思维，感觉器官来感觉，这些主观唯心主义者也就成了"无头脑"的哲学家。第三，按照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只有他们个人自我的思想，于是必然逻辑地得出，世界上的一切人（包括他们的父母在内），都无非是他们的思想的产物，不是父母生了他们，而是他们的感觉生出了父母。这种荒谬绝顶的唯我论的结论，是主观唯心主义者怎样进行诡辩也逃脱不掉的。由此可见，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可是这种荒唐的观点，却在林彪、"四人帮"那里得到卖力的鼓吹和推行。他们以"我"为中心，宣扬"精神万能"，妄想"调动一切，指挥一切"，让世界上的一切都围绕着他们野心横溢的"自我"来旋转。他们把自己驾凌在党和人民之上，完全否定了党和人民的一切，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要被党和人民所否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某种精神，这种精神先于自然界而存在，自然界是它活动的产物和表现。朱熹认为，“理在事先”，在宇宙形成之先有一个绝对的独立存在的“理”，这个“理”产生了物质的“气”，而后演化出形形色色的事物和现象。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绝对精神”，自然和社会都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表现。这种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同主观唯心主义一样是极端荒谬的：第一，既然客观唯心论者断言世界是某种“宇宙精神”的表现和产物，这就是要人们相信，世界上的事情都取决于某种神秘莫测的“绝对精神”或永恒不变的思想公式。第二，既然客观唯心论者宣称这种“宇宙精神”可以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它就必然要与宗教创世说同流合污。在这里，所谓“绝对精神”、“天命”、“理念”之类，统统不过是上帝的别名而已。宗教教义实际上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粗俗化的形式，而客观唯心主义则不过是用哲学语言精制了的宗教创世说。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事情很清楚，无论是由某种“宇宙精神”统治世界，还是由什么神灵主宰世界，两者本质一样，同收异曲同工之效。第三，一切思想都是人的思想，脱离开人这个主体，任何精神性的“理”、“理念”、“绝对观念”等等，都是不可思议的。客观唯心主义者不管在“精神”前面加上多少“客观”的字眼，都不可能把它真的变成离开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东西。

客观唯心论和主观唯心论只有形式的差别，而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是反科学的荒谬理论。

哲学史上还有一种徘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企图调和这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的二元论。例如笛卡尔和康德的

哲学就是二元论的著名代表。二元论否认世界的统一性，把物质和意识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它们是世界的两个相互并行、各自独立的根源。但是，二元论并不能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基本的哲学路线之外，形成一条独立的第三条路线——中间路线。第一，它肯定有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的存在，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第二，它虽然肯定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包含了某种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是，二元论在说明物质和精神的联系时，总是把精神说成是唯一具有能动性的力量，而把物质说成是消极被动、受精神支配的东西；并且把那种能够使精神、物质两个独立本原结合起来的力量看成高于一切的神的力量。这都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观点。因此，二元论归根到底必然倒向唯心主义。

同唯心主义和二元论相反，辩证唯物主义主张：世界是统一的，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这个唯一正确的论断来之不易，它是全部科学和哲学成果的深刻总结。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世界的真正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页）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所以需要长期的和持续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证明，是由唯物主义哲学的本性所决定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页）。对于这样的世界观的论证，当然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依靠科学的事实，下一番气力，而不会象唯心主义那样省力。正如毛泽东所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

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9页）用气力来证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驳斥唯心主义和二元论，不能单用从自然科学发展中任意抽取个别事实和原理的办法，而是要依靠自然科学发展史中的基本的、系统的事实。其中，关键的部分包括：物质不灭和质量守恒定律，天体演化（天体力学、天体化学、天体物理学）的理论，生命起源和生物进化的理论，人类起源的理论和人类发展史，关于物质构造的原子论和基本粒子的理论等等。

物质不灭和质量守恒定律，揭示了自然界的物质能够依一定的规律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但不论怎样转化，在转化前和转化后的总的质量不会有任何增加和减少。这就是说，任何一种物质形态都是从另一种物质形态转化而来，又依一定条件向他种物质形态转化而去；物质是永恒存在的，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从虚无中产生），也不能被消灭（从实有变为虚无）。因此，创造物质世界的神秘力量、造物主也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神学唯心主义把宇宙分成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一个是人的地上的世界，一个是神的天上的世界。哥白尼创立了太阳中心说，证明地球和金星、水星、火星、土星、木星等一样，都是围绕太阳运行的行星。这是对神学唯心主义的一次巨大的挑战。牛顿力学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又证明了天体的力学定律和地上物体的力学定律是一样的。运用光谱分析的方法发现了其他天体和地球都是由同样的化学元素构成的。人类是首先从太阳中发现了氦的存在然后才在地球上找到了氦。同样，从对宇宙来客——陨石和宇宙飞船取回的月球的岩样的分析中，也可看到它们同地球的物质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天体物

理学的发展又揭示了天体和地球物理运动的规律是一致的，我们从地球上氢弹的热核反应中，找到了太阳能的秘密。来自遥远的天体的宇宙射线给我们带来了与高能加速器所产生的同样的基本粒子，这样就把对天体物理的研究同我们在地球上对高能物理的研究密切地联系起来了。所有这些都雄辩地证明了地球和无数天体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宇宙物质整体，从而彻底地驳斥了神学唯心主义。

由于生物有机体具有一些与非生物界明显不同的特点，有些思想家就否认生物界与非生物界之间的物质统一性。他们认为，生命的基础是某种非物质的“生命力”，它调整着生物有机体的生命过程。由于早期化学家只能把有机化合物转变成无机化合物，却没有能力把无机化合物转变为有机化合物，因此认为只有具有神秘的“生命力”的活的机体才能产生有机化合物。这种关于非物质的神秘的“生命力”的观点，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观点。1828年德国化学家维勒第一次从无机物中制造出有机物——尿素，开始突破了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由于化学特别是有机化学、生物化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现在已经充分证明了恩格斯的名言：“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自我更新”，“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8、79页）现在科学已发现，作为生命的物质基础的蛋白体包括蛋白质、酶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其中，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主要体现者。蛋白质由二十种氨基酸所组成，一个蛋白质分子可以含有几十、几百甚至几千个氨基酸，它们按一定顺序排列成链状的化合物。蛋白质的分子量之大达到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这样复杂巨大的分子，具有普通分子所没有的物质的

特性——自我更新的能力，即生命的能力，那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酶也是一种蛋白质，它是蛋白质进行新陈代谢的生命化学过程的催化剂。现在已发现有一千多种不同的酶。核酸是由许多核苷酸连接成的大分子，由于排列形式的不同，构成了不同的遗传信息，它们是生物遗传的物质基础。世界上有上百万种的生物，这些生物都是由不同的细胞组成的。细胞是生命的最基本的单位，不同的细胞又都是由各种不同的蛋白质、酶和核酸所组成，蛋白质和核酸又是不同的氨基酸、核苷酸组成的。现在人们已经大体弄清，各种氨基酸、核苷酸的化学成分都是组成普通无机物的那些炭、氢、氧、硫、磷、钾、钙、镁、铁等等化学元素组成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生物体不过是组成成分以及组织结构十分复杂的一种物质形态，生命现象也不过是一种物质的过程；生物界和非生物界，以及形形色色生物体之间，都存在物质的统一性。这里找不到什么神秘的非物质的"生命力"，也看不到所谓造物主的任何作用。

恩格斯曾经科学地预见到："如果化学有一天能够用人工方法制造蛋白质，那末这样的蛋白质就一定会显示出生命现象，即使这种生命现象可能还很微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2页）由于蛋白质、酶和核酸种类繁多，它们的成分和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结合的形式的极端复杂，人们至今尚未制造出人造的生命。但是，人类依靠现代的科学技术已经弄清了一些较为简单的蛋白质、酶和核酸的化学成分和结构。1965年我国科学工作者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了具有生物活性的牛胰岛素（一种蛋白质），这是对生命本质和生命起源问题的一次重大的突破。它初步证实了恩格斯的预见，而且令人信服地看到恩格斯的预见终将全部实现的光辉前景。仅从现在科学发展的成就已经充分说明，生物有机体的原始形

态是在特定的条件（早期的地球）下，由无机物通过复杂的漫长的化学过程转化而来的。这是一种物质形态向另一种物质形态的转化，并没有任何的神秘。

上百万种的生物物种在其生活过程中，它们各自的各个组成部分配合得如此“和谐”，它们又都能那么精巧地和周围环境相互适应，这曾经使人误认为，似乎只能用“全智全能的上帝”的合目的的创造来解释。由此产生了种种唯心主义的观点。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大量确凿的材料雄辩地说明了，现存的繁杂多样的生物界，原是由少数原生生物通过遗传和变异的交互作用，由于适者生存、自然选择，经过上亿年的漫长的演化过程而达到的结果。所有这些都只是物质自身的发展和变化，完全不是什么“上帝的智慧和创造”。

达尔文还指出：人也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恩格斯则进一步指出：是劳动促使类人猿转化为人。劳动，促使人的物质生理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直立行走、手的解放和大脑的发展；劳动，促使人们结成一定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生产关系，它是一切复杂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人类发展史的研究揭明，差不多经过二、三百万年的进化，才形成了大脑发达的、有意识地过着社会生活的现代人类。现代生理学、心理学的发展已证明，思维是大脑的机能，离开了大脑就没有思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证明了意识是对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所决定的，离开了社会物质生活也不可能有人的意识。这一切说明了，人、人的意识和社会生活都是物质长期发展的产物，意识总是和物质的人脑以及物质的社会生活密不可分的。因此，决没有什么天神和上帝，也没有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的主观的感觉和客观精神。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现实世界是无限复杂多样的，有“天上的”（地球以外的）世界和地上的世界；在地上的世界中，有无机界和生物有机界；有人类以外的万事万物和号称“万物之灵”的、有意识的、过着社会生活的人类。但是这种多样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统一性，它们都是统一物质世界的一个部分，是物质的特定的具体的形态。世界上的每个事物、每种现象，都有它的个性、特殊性；但是，他们之间又都有着共性、普遍性，这就是它们的物质性。

按照恩格斯的教导，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不仅需要自然科学发展的证明，而且需要哲学发展的证明，这个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从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中可以看到，同样的科学事实，按照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去总结，就会得出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哲学结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对于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哲学证明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在论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批驳唯心主义和二元论方面，曾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由于他们受科学水平的局限，不能自觉地、辩证地思考，在涉及到一与多、共性与个性、简单与复杂、量与质、相对与绝对等一系列问题上，陷入了形而上学，因而不能科学地论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不能彻底贯彻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不能完全驳倒唯心主义和二元论。要对科学的材料作出正确的哲学概括和论证，必须学习哲学发展的历史，认真总结和吸取人类思维发展史中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批判地继承旧唯物主义在世界物质统一性方面所提供的论据中的积极成果，同时克服其自发性、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以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特别是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解决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问题。

正确的哲学证明之所以必需，可以从哲学史上如何解决什

么是物质这个重大问题上得到充分的说明。世界统一于物质，这是一切唯物主义学说的共同的、基本的主张。那么，什么是物质呢？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总是要“在某种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找这个统一”（《自然辩证法》第164页）。中国古代的五行说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所构成。古希腊和古印度也有类似的思想，不同的哲学家分别把风、火、水、土等元素看成世界的本原。古代唯物主义的最高代表有中国的元气说和希腊留基伯、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元气说认为，一切有形的物体都是客观的元气生成的，而元气则是构成世界的本体。原子论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不可分割的颗粒（原子）和虚空构成的。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共同特征，是试图对物质世界穷根究底，寻找多中之一，说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根本方向，本质上是正确的。但是，第一，这种观点在当时只能是一种没有科学根据的猜测；第二，它把万物归结为一种具体的物质形态，这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这种朴素的物质观，反映了人类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尚处在初级的阶段。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产生了近代自然科学。直到十九世纪末以前，自然科学已揭明：自然界各种物质都是由不同的化合物组成的，分子是组成化合物的基本单位；分子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原子，它是当时科学认识已经达到的关于物质结构的最深层次。那时科学材料提供的事实，使人们认为原子就是组成万物的最小的物质单位；原子的属性，如质量不变、广延性、不可分性，被看成是一切物质形态的不变的属性。世界统一于物质也就是统一于原子；原子的特性也就是一

切物质的特性。这就是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论。从十七世纪到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就是这种物质结构论在哲学上的反映。这种以物质世界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状态和属性来解释自然，而不把世界看成是精神和神灵的创造的观点，发扬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大方向是正确的，对于反对宗教和唯心论起过积极的作用。同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相比，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具有自然科学的材料作根据，克服了自发的、猜测的性质；但是，由于对科学的材料缺乏辩证的哲学概括，却使它的形而上学的性质更加突出地发展和暴露出来了。机械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局限性表现在：第一，它把在质上无限复杂多样的物质世界归结为某种特殊的简单的物质粒子——原子在量的组成上的不同。它看不到原子这种物质的层次和状态本身的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看不到物质还有更深的层次，原子也是无限可分的，无限复杂的。这是一种抓住了量忘了质，抓住了统一忘记了多样，抓住了简单忘记了复杂的片面的形而上学机械论的物质观。第二，它没有对人的认识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哲学认识论的正确概括。它不了解人类对物质的认识，是一个由相对到绝对的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误把人类对物质的原子这个层次的认识，作为对物质的最后一个层次的认识，把对原子的认识看成了对物质认识的最后的不可逾越的绝对界限。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在物质观上的反映。第三，它不理解特殊和一般、个性和共性的辩证的统一，把某种特殊的物质形态误认为物质的一般，把原子的个性错看成物质的共性。与此紧密相联，它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关于物质结构的自然科学学说同哲学上的物质概念混为一谈，没有从世界中最广泛最基本的对立面——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中，概括出无限复杂多样的物质形态中最基本

最普遍的共性——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性，因而它势必割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物质统一性。它对世界物质性的理解，只限于自然界（诚然在这方面也不是完全科学和彻底的），而一接触历史领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唯心主义。

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由于有上述种种局限性，因而它不但不能制服唯心主义，反而给唯心主义留下可乘之机。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唯心主义哲学正是利用自然科学的发展突破原子的层次，得出“物质消灭了”，唯物主义被“推翻”了的结论。由此可见，仅仅有科学发展的证明，没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哲学的武装，就不可能完满地证明世界的物质性和它的统一性。

只有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才在总结全部科学材料的基础上第一次完满地论证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恩格斯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所写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针对机械论的物质观，对什么是物质做出了科学的辩证的说明。恩格斯指出：“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6页）。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共性就是他们的客观实在性，正是这种客观实在性体现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如果把物质的统一归结为它是由同一的最小粒子所组成，最终必然要把人们的认识引入歧途。恩格斯讲得很清楚：“如果自然科学企图寻找统一的物质本身，企图把质的差异归结为同一的最小粒子所造成的纯粹的量的差异，那末这样做就等于不要看樱桃、梨、苹果，而要看水果本身，不要看猫、狗、羊等等，而要看哺乳动物本身，要看气体本身、金属本身、石头本身、化合物本身、运动本身”。（《自然辩证法》第233页）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离开个性而独立存在的共性。物质性、客观实在性只能存在于所有的种种不同的事物之中，没有脱离各种具体事物而独

立存在的某种“物质自身”，也不能把这种“物质自身”归结为某种具体的物质的特殊层次，例如原子。恩格斯还站在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之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原子决不能被看作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的实物粒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8页），被认为简单的原子应该也是复杂的，可分的。由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扣压了《自然辩证法》这部光辉著作不予发表，连列宁也没有能看到这本书，因而恩格斯这些深刻的思想长期不为世人所知。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物理学上发现了某些元素的放射线现象，这些放射性元素会转化为另一种元素，并进而发现了原子中有电子等更小的微粒，电子的质量会随着它们速度的变化而变化，推翻了原子的不变性、不可分性以及质量不变等观念。这些伟大的发现引起了物理学的革命。然而一些受形而上学思想支配的物理学家，却由此做出了“原子非物质化”的错误结论。他们怀疑物理学对象的客观实在性，物理学规律的客观性和可靠性，陷于悲观、失望和混乱之中。这就是所谓的“物理学的危机”。这时唯心主义便乘机向唯物主义发动进攻。例如马赫主义者打着“自然科学的最新哲学”的招牌，歪曲物理学新发现的真正意义，利用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中的困难，大叫“物质消失了”，“唯物主义已被驳倒了”。他们宣传一切客观对象和客观规律都无非是人的主观经验（感觉）和对主观经验的整理。这是一种披着科学外衣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这种反动思潮也侵入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被一些修正主义者奉为至宝，极力鼓吹，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为了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列宁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写出了伟大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虽然没有看到过《自然辩证法》，但在自己的著作中却发挥了

与恩格斯完全相同的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给唯心主义、修正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列宁指出：绝不能把物质的特殊结构、属性和形态同物质本身混为一谈，不能把人们对物质认识的旧界限的打破误认为物质本身的消灭。他写道："迄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从前以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特有的。因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一般马赫主义和马赫主义新物理学的错误在于：它们忽视了哲学唯物主义的这个基础，忽视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差别。承认某些不变的要素、'物的不变的实质'等等，并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原子的可破坏性和不可穷尽性、物质及其运动的一切形式的可变性，一向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支柱。"（《列宁选集》第2卷第266、267、268、288页）

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他给物质概念下了一个完备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物质这个概念在认识论上"指的只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且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

观实在，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列宁选集》第2卷第128、267页）这一经典的物质定义，言简意赅，高屋建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它从物质与意识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来把握物质，这就彻底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贯彻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对于任何问题，都必须从它的矛盾性中来研究，只有把矛盾的此一方同与它对立的另一方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才能准确地、科学地把握它。对于物质的研究也是如此。列宁从人类认识和实践中所遇到的世界上最广泛、最普遍、最基本的矛盾——物质和意识的相互关系中把握物质，来给物质下定义，指出物质对于意识的独立性、根源性，意识对于物质的依赖性、派生性，这就贯彻了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的解决。列宁的物质定义还表明，物质和意识的对立，只是在指出那个是第一性的、那个是第二性的这一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148页）既然意识不过是物质的“复写、摄影、反映”，很显然，反映者是不能同被反映的对象相脱离的，因此，意识不过是世界的唯一本原——物质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而不能成为与物质绝对对立的另一个本原。这样，就彻底驳斥了唯心主义和二元论。

第二，它指出了物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这就彻底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可知论。列宁的物质定义表明，物质是现实存在的、可以认识的对象，而不是虚无飘渺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当然物质的这种可感知性并不意味着它的一切形态和特性都能够被人们的肉体感官所直接感觉到。事实上，有些东西，如原子和原子内部的微观粒子以及电磁场等等，是我们感官不能直接感觉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现代的科学

技术、科学仪器感知它。尽管由于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目前还有一些无法感知的客观实在，但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它们一定会逐步被人们所感知。因此，列宁并没有限制人们对于物质的认识，而是为人们无限地认识客观世界增强了信心，指明了方向，从而彻底驳斥了不可知论。

第三，它指出客观实在性是物质的唯一“特性”，这就把哲学的物质概念同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学说区别开来（当然它们也是密切联系着的），从个性中看出共性，从相对中找到绝对，从暂时中把握永恒，彻底贯彻了唯物辩证的认识论。客观物质世界，不管它的形态、属性和结构多么复杂特殊、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它都会保存着客观实在性这个唯一的“特性”。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它的普遍的、绝对的、永恒的客观实在性。随着实践和科学的无限发展，永远不会推翻这个结论，而只能不断地证实和丰富它。这样，又同形而上学的物质观彻底划清了界限。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不仅深刻地说明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且内在地包含了物质世界的多样性；它既是对关于物质结构学说的科学总结，又展示了深入研究物质结构内部奥秘的广阔前景。恩格斯曾预见了原子的复杂性和可分性；列宁曾预见了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原子里头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内部质子和中子，以及质子和反质子、中子和反中子等等，都“充满矛盾的统一”（《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6页）。全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证实了和继续证实着这些观点。

人类的认识现在不仅深入到原子内部，而且已经深入到原子核的内部，发现了二百多种基本粒子，电子不过是其中的一

种。这些基本粒子各自具有自己的特性，但是它们不是相互隔绝，各不相关，而是相互作用和转化的。这些基本粒子可以归结为四类：光子、轻子（包括电子）、介子和重子（包括中子、质子），可以用类似门德列也夫元素周期表的形式排列出一个更为复杂的基本粒子的周期表。这就清楚地表示，各基本粒子之间存在有机联系，它们受着统一规律的支配。化学元素的周期性变化是由原子结构的变化引起的，那末，我们同样可以设想，基本粒子的特性的周期性变化，也是由于基本粒子内部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在唯物辩证法的自觉指导下，我国的高能物理学家对基本粒子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层子（在外国叫做夸克）模型的设想，对物质结构的进一步研究做出了贡献，并反过来对证明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新的材料。层子的研究说明，“基本”粒子并不基本，它们是由物质的更深的层次——层子所构成的。从电子除有质量和电荷以外还有自旋和磁矩的事实，我们也可以看出电子也是有一定体积和内部结构的。同样，我们也深信，层子也是不可穷尽的，它必然也是有其内部结构的。总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从一个层次到再一个层次，如此步步深入，以至无穷。

物质的无限可分的可能性，只不过是物质多样的一个方面，物质的多样性还从其他许多方面表现出来。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一点，我们也无法把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原理坚持到底。

我们知道，原子是由质子、中子和电子（带负电）所组成。现代科学的发展又发现了反质子、反中子和正电子，物理学家把这些新发现的粒子叫做“反粒子”，并进一步发现所有的基本粒子都有自己的反粒子。物理学家们由此设想有由这些反粒子组成的“反物质”，在无限宇宙的某个遥远的地方可能存在着反粒子组成的“反物质”的世界。这种设想当然不无根据，

但是，如果把物理学中的“反物质”概念同哲学的物质概念对立起来，用以否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那就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物理学中的所谓“反物质”，也是脱离我们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物理学中的“反物质”和“物质”不过是两种不同的物质状态，它们实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即都是物质。

物质的质量特性的表现也是多样的，因而质量守恒定律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在牛顿力学中只了解物质的静止质量、惯性，使得有的人看到光子没有静止质量的现象就否认它的物质性。唯心主义者还利用电子和正电子相遇转化为一对光子的事实，宣布质量守恒定律的破产和物质的消灭。实事上，光子虽然没有静止质量，但它却有运动质量，光压现象就是有力的证明。电子和正电子向光子的转化，只是由静止质量向运动质量的转化。这只是说明了静止质量不一定守恒，却不能因此推翻质量守恒定律，宣布物质的消灭。因为，就变化前后的质量（静止质量和运动质量）的总和来看，仍然是守恒的。在这里，质量守恒定律只不过有了一个与它在牛顿力学中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这些科学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列宁的物质概念的正确性；证明了列宁对那种把质量、惯性看做物质的不变特性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批判是正确的。人们在研究微观世界的高能物理学中，发现了除质量守恒定律以外，还有电荷守恒、重子数守恒、轻子数守恒……等等守恒定律，这些定律也分别从各个方面进一步论证了物质的不灭。唯心主义者想要从科学发展中捞到一点真正的好处，完全是徒然的。

再有，并不是所有的物质形态都具有质量。古代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把世界看做是有质量的原子和没有质量的虚空组成的，其中，只有有质量的原子才是物质。这样，就把世界看成了物质和虚空的统一，没有真正理解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这种

观点被牛顿经典物理学所接受并加以发展，认为：物质是由不连续的实物粒子（原子）所组成，虚空则是一无所有的连续的绝对真空。现代科学证实这种绝对空虚的“真空”是没有的。具有连续性的“真空”虽没有质量，在它上面却充斥了各种“场”，如电磁场、引力场、核力场……等等。这些“场”都是不依赖于我们意识的客观实在，它们对物体或各种实物粒子都起着不依赖于我们意识的客观作用，因此，它们也都是物质。这种非连续的实物粒子和连续性的场的统一，进一步说明了物质世界多样性的统一。从这里看到，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元气论”比起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来，确有其高明之处。“元气论”把世界看做是连续性的“元气”和由它所产生的非连续的“形”所构成的统一体。现代科学所揭示的物质的微粒性和波动性的矛盾统一，是对非连续性和连续性的矛盾统一的科学论证。

总之，现代自然科学已经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复杂多样的图景。诚然，这幅图景远不能概括物质结构、特性本身的无限多样性，因而它是有限的、相对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的物质统一原理和物质观的指导下，我们却能够沿着健康的发展道路，日益全面而清晰地描绘物质结构、特性的无限复杂的图景，逐步地、无限地接近它。

综上所述，对于世界物质统一的原理，既要由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又要由哲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要把可靠的科学材料和正确的哲学概括紧密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坚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彻底批判唯心主义、二元论和形而上学的机械论。也只有这样，才能坚信唯物主义这一基本的前提，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找到坚实的、唯一正确的出发点。没有这个基本前提就没有唯物主义

哲学，离开了这个正确的出发点，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就失掉真实的对象，就要落空，就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毛泽东指出："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8页）。在我们的学习、研究和工作中，必须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掌握了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原理，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坚持这一原则的自觉性。

二、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的原理，就内在地包含了一切物质的具体形态都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思想。要坚持世界的物质性，就必须进而研究物质和运动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运动的，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的，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形式。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世界，物质的多样性是和运动的多样性密切联系着的。恩格斯指出："运动着的物体的性质是从运动的形式得来的。"（《自然辩证法》第226页）"如果我们认识了物质的运动形式……，我们也就认识了物质本身，因而我们的认识就完备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2页）毛泽东也告诉我们："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83页）。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基本原理，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和根本属性，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又一个基本原理。只有把这两个基本原理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这一世界观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是从运动的物质或物质的运动出发。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和根本属性的原理，包括以下三点相互联系的基本内容：运动是物质的运动；物质是运动着的物质；物质运动具有多样的形式。

运动是物质的运动，是说世界上不存在没有物质的单纯的精神的运动；运动是物质的自身的运动，不能在物质之外，在精神中寻找物质运动的原因。

同辩证唯物主义根本对立，宗教、唯心主义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认为运动是精神的运动，把精神看作产生物质和物质运动的根源。主观唯心主义者王阳明的弟子钱绪山认为，“知”（主观意识）是宇宙的本体，运动只是“知”的运动。他说：“充塞天地间只有此知，天只此知之虚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妙用，四时日月只此知之流行，人与万物只此知之合散，而人只此知之精粹也。”马赫主义者毕尔生说：“万物都在运动，但只是在概念中运动”。客观唯心主义者朱熹认为，万物的运动都是由精神性的“太极”所推动和产生的，他说：“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从而产生出自然界来。黑格尔把世界的发展看做“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所有这些唯心主义运动观都是完全错误的。唯心主义关于运动的观点是和它否定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观点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前一节中，我们看到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发展证明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指出世界上根本没有离开物质而存在的精神。因此，同物质完全脱离的精神运动，也是不能设想的，把这种根本不存在的精神力量作为物质运动的根源也是荒唐的。精神的运动，概念的运动，是依赖于物质运动的，它不过是人脑对客观

存在的反映，是人脑这种物质的运动，而人脑则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最高产物。

“唯能论”是一种披着最新科学哲学外衣的唯心主义运动观。在前一节中讲到，由于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的革命的不理解或故意歪曲，产生了“物质消灭了”的唯心主义谬论。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另一种谬论：认为物质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运动，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这种“纯粹的”运动构成的。这就是德国“伟大的科学家”和“渺小的哲学家”（列宁语）奥斯特瓦尔德提出的“唯能论”。这种理论妄图绕开哲学基本问题，回避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奥斯特瓦尔德号召放弃唯物论和唯心论，而代之以“唯能论”。他写道：“如果把‘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概念包含在能量概念之中，那么，怎样把‘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的老大难问题就会简单地、自然而然地消失掉”。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从哲学和自然科学两个方面驳斥了这种理论。“唯能论”的错误在于：第一，既然存在的只是能量，物质和思想都是不存在的，那末，奥斯特瓦尔德自己的“唯能论”的思想也就不可能存在了。第二，把物质和精神包括在能量的概念之内，是一种在字面上取消物质和精神的对立的诡计，它只是把是物质还是精神在运动的问题，变成了能量究竟是物质还是精神的问题，它在实质上并不能回避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重要的是：**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这种意图偷运着和物质分离的**思想**，而这就是哲学唯心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74页）第三，它违背科学事实。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就驳斥了这种打着“科学”幌子的唯心主义谬论。由于原子的电磁本性的发现，迫使奥斯特瓦尔德本人在1908年也不得不承认原子的客观实在性和它的物质性，这就宣告了

"唯能论"的彻底破产。但是，由于现代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在对原子内部、原子核内部基本粒子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些从来不知道的新的过程，使得"唯能论"又有某种复活。然而，"唯能论"终究经不住自然科学的考验，也驳不倒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现代唯能论者根据粒子和反粒子相互作用转化为电磁场的量子（光子）的事实，做出物质转变为"纯粹的能"的唯心主义结论。其实，电磁场也是物质的一种形式，决不能把它归结为非物质的"能"。再有，他们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质能相关式——$E=MC^2$（能量等于质量乘光速的平方），根据核聚变前核子质量总和大于核聚变后核子质量总和（人们把这种差额叫做质量"亏损"）的事实，作出质量转化为能量，物质转化为能的结论，而且认为那部分"亏损"的质量是按质能相关式转化为能量了。其实，质能相关式说明的恰好是质量和能量不可分，物质和运动不可分。所谓"亏损"的质量，只不过是从核子的静止质量转化为光子等场量子的运动质量，并以光能等能量形式释放出来罢了。这只是说明质量除了静止质量还有新的质量形式——运动质量。光能并不是没有质量的能量，光的运动也不是没有物质的运动。而且，在核聚变前后静止质量和运动质量的总和仍然是守恒的。可见，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并没有论证而是驳斥了"唯能论"，再一次证明运动和物质是不可分的，没有物质的运动是没有的，设想这种"纯粹"运动的唯心主义观点是错误的。

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的另一方面的含义，就是凡物质都是运动着的物质，世界上没有不运动的绝对静止的物质。辩证唯物主义承认静止，但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才是绝对的，静止不过是运动的一种特殊状态。

同辩证唯物主义根本相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设想没有运

动的物质，把静止看成是物质的本质属性。全部自然科学的成就都驳斥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揭示了物质世界的一切都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在无垠的宇宙中，总星系、星系、各个天体都不停地在太空遨游。太阳系的各行星随着太阳绕银河系中心旋转，行星又绕着太阳旋转，同时它们又都绕着自己的轴心自转。更重要的是，宇宙各天体、星系包括我们人类所在的太阳系和地球并不是永恒的，它们都有一个生成、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太空中，经常不断有旧的天体毁灭和新的天体产生。今天人们已推算出地球的年龄约有50亿年左右。太阳是一个不断放射出大量能量的氢的热核反应堆，它的存在已有50亿年的历史，估计还有50亿年太阳就会由于自己的能量大量消耗而变成一个不发光的天体，最后走向毁灭。天体同地上的物体一样，也是由分子、原子、基本粒子所构成的。但是，许多天体上却具备有地上实验室所不能得到的或者目前尚不能创设的极端条件。大尺度、大质量、高密度、高压力、高能量和持久的高温等等，这为研究物质的结构及其变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对天体演化的研究和地上实验室中对构成物质的微观粒子的研究，同时发现了这些微观粒子中都处在永恒变化之中，都有着自己生存、发展和灭亡（转化为其它粒子）的历史。组成万物的化学元素也有一个由轻元素向重元素演化的过程。对微观粒子的变化的研究，又反过来为我们提供了打开宇宙天体演化秘密大门的钥匙。总之，大尺度的天体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小尺度的微观粒子也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因而世界上一切形态的物质都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这个道理很明白：既然，我们所在的太阳系和我们所居住的地球都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有着自己形成、发展和灭亡的历史，那末，就无法设想地球上

还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事物。既然，微观粒子是永恒地运动变化发展的，那末，就不可能设想由微粒子所构成的物体，反而会处在绝对不变的状态之中。

事实也正是如此。科学已经证明：生物有机界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任何生物有机体，如果没有新陈代谢、自我更新的运动，就会丧失生命。生物有机体是由无机物在特定的条件下变化而来的，人们并且初步弄清了这种变化的机制。现存的上百万生物物种是由少数单细胞生物进化发展而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有新物种的产生和旧物种的被淘汰。同样，人和人类社会也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之中。人是由类人猿演化而来的，没有永远不变的社会形态，任何社会形态离开了生产运动都是无法存在的。因此，整个宇宙从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以至到无比庞大的天体，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生物界到人类社会，无一不在运动着，无时不在变化、发展着。

辩证唯物主义肯定物质处在永恒的运动之中，但不否认物质也有着某种静止的状态。它所反对的只是把静止绝对化、把静止看成物质本质属性的形而上学。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静止是相对的，它只是物质运动的特殊形式。承认静止状态，并不否认物质运动的绝对性。我国明末清初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船山就已猜测到了这个道理。他说："静者静动，非不动了"。他否认"废然之静"，即绝对的静止。

一个人是坐着还是行走，这里有静和动的区分。这种区分是客观的，是每个正常的人都必须承认的。但是，这种静和动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只是就他对地球的相对位置来讲的。人坐着算是静止吧，即使撇开体内进行的时刻不停的生理运动不讲，也要看到他同地球一起绕地轴旋转并遨游太空的运动。这就是毛泽东诗句中讲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一个生命有机体维持其自身的存在，这是静止，但这种静止是相对的，暂时的，因为生命有机体终究要死亡，不能永远地活着。而且这种静止只是运动的一种特殊状态，是生命有机体不断新陈代谢自我更新的运动的状态，没有这种运动就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定时期是处于相对稳定和相对静止的状态，但即使这时它也是处于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不断运动之中，而且这种静止状态最后必然会被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社会运动所破坏，使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任何一个看来静止不变的物体，它内部都包含着分子、原子和基本粒子的永恒的运动，同时，这个物体最后必然会转化为其他的事物。这一切都说明，静止的状态是存在的；但它是相对的，只是运动的一种特殊状态。

毛泽东讲："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就是这样一种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3页）绝对的运动和相对的静止是矛盾的双方，它们也是对立的统一。处于绝对运动中的任何事物都有其相对静止的一面，没有相对静止的"净是动"是没有的。就拿光子来讲，它处在永不止息的高速运动之中，连静止质量都没有，可是，在整个光的运动过程中，光子始终是光子，这就是它相对静止的一面。有些基本粒子真可说得上瞬息万变，它存在的寿命极为短促。一种ε°（读艾普西隆）粒子仅能存在10^{-20}秒，比"一瞬间"还不知要短多少万万倍。可是，在这个难以想象的短促时间之内，它并没有衰变为其它粒子，这就是它的相对静止的一面。

辩证唯物主义在坚持运动绝对性的前提下又肯定相对静止

的存在，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运动和静止对立双方是相互依赖的，不了解静止一方，就不能了解运动一方。要真正理解物质的永恒的绝对的运动，就不能不理解相对的静止。恩格斯指出："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运动表现于它的反面，即表现在静止之中"，"运动应当从它的反面即从静止找到它的量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1页）我们谈论任何一个事物的任何一种形式的运动，其基本前提是，这个事物仍然是这个事物，这种运动形式仍然是这种运动形式，就是说它是处于某种相对静止的状态之中，否则，那它也就不再是这个事物或这种形式的运动。离开了相对静止来谈论运动，我们就不知道这个运动究竟是什么事物或什么形式的运动，运动也就成了不可捉摸的神秘的东西了。任何事物的相对稳定、相对静止的现状都是它过去的运动所造成的，并且是它将来运动的出发点。只有了解了事物的相对稳定、相对静止的现状，才可以清楚地了解它过去的运动，预测它将来可能发生的运动。

第二，不了解相对静止，就不可能理解物质的多样性。物质的多样性是从物质自身的永恒运动中产生的，但是它却只能在相对静止中才能显示出来。如果说绝对运动是形成形形色色不同的物质形态的根源，那末相对静止就是这些形形色色不同形态的物质存在的根本条件。没有相对静止也就不可能有形形色色不同形态的物质。恩格斯指出："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3页）物质所以表现为千千万万的不同形态，正是由于它们有相对静止和暂时平衡的状态。只有承认事物的相对静止和暂时平衡的状态，才能区别事物，才能肯定和把握千千万万事物

的具体形态，才能分别对不同的事物进行具体的科学的分析和研究。

第三，否认相对静止，就会把一切具体物质形态连同它们的具体的运动形态都变成不可捉摸、无法认识的东西。这就是相对主义和诡辩论。这种哲学思潮过去有，现在也还有。它是和唯物辩证法根本对立的。例如中国的庄子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他把生和死，可和不可之间的转化看成是无条件的，从而抹煞了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和它们之间的质的差别，得出了"万物一齐"的结论。古希腊的朴素辩证法者赫拉克利特曾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的学生克拉底鲁却修改了他的思想，认为人甚至一次也不能踏进一条河流。克拉底鲁甚至认为万物只是一阵风，因此他拒绝给事物以名称，按照他的意见，"什么也不能说"。克拉底鲁是由于否认事物的相对静止而陷入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泥坑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同辩证法毫无共同之点。列宁说："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诡辩术的桥梁。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做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列宁选集》第2卷第850页）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和诡辩论一样，它们都不理解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对立统一，都是片面性的错误观点。所不同的是：前者片面地抓住了相对静止，把它歪曲为绝对的静止，而否认了事物的运动；后者则片面地抓住事物的绝对运动而否认了它的相对静止。片面性的理论必然导致唯心主义哲学。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把静止看成是物质的绝对的本质属性，它必然要在物质之外寻找物质运动的最后源泉。就是这样，

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得出了上帝是“第一推动力”的结论。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由于否认任何相对稳定、相对静止的状态，则把世界看成了一堆变幻不定、无法捉摸的感觉，马赫主义者就是如此。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运动观还认为，同物质的多样性相联系，运动的形式也是多样的。我们应当从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对立统一中来把握运动。

同辩证唯物主义运动观相对立，形而上学机械论不理解多样性和统一性、特殊和一般的对立统一，把多种多样的物质运动形态归结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机械运动，即物体在空间位置的移动和数量的增减。这样，机械论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什么是运动。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直到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1页），运动就是一般的变化。

辩证唯物主义肯定物质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同时也肯定同物质不可分的运动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根据当时科学达到的认识，把宇宙中各种各样的物质运动归结为五种基本运动形式，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这就是：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运动形式。在每一种基本运动形式中，又包含着许多具体的运动形式。例如，在物理运动形式中就包括：声、光、热、电、磁等等运动形式。物质的运动形式和物质的形态一样，是无限多样的。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有不同的物质基础。关于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的物质基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也作出了精辟分析，其中除个别观点因受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已经过时外，至今还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机械的运动是物体的机械位移，它是最低级的一种基本运

动形式。恩格斯曾把物理的运动看成是分子的运动，同时，恩格斯也看到了当时科学知识的局限，指出应当去弄清楚“什么是电运动的真正物质基础，什么东西的运动引起电现象”（《自然辩证法》第101页）。现在不仅已经发现了电子，弄清了电的现象是由电子的运动所引起的，而且还发现了其他的基本粒子和它们所引起的一系列的新的物理现象。由此我们可以说，物理运动的物质基础，除分子以外，还有电子和其他基本粒子等等。化学运动的物质基础是原子，它是原子的化合和分解。生命运动的物质基础是蛋白体。社会运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方式。我们要弄清楚任何一种运动形式，必须要弄清楚它的物质基础。我们只是由于弄清楚了光运动的物质基础是光子和电磁这两种物质状态的对立统一体，才弄清楚光运动的本质。

正如各种物质形态可以互相转化一样，各种运动形式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例如，摩擦生热、生电，就是机械运动转化为物理运动。热引起燃烧，物理运动又转化成了化学运动。在地球发展过程中，物质经过长期的机械的、物理的、特别是化学的作用，逐渐形成愈来愈复杂的化合物，出现了蛋白质、酶和核酸，并由它们组成了蛋白体，产生了生命的运动。由于生物长期发展出现了类人猿，在劳动中类人猿变成了人，产生了人类社会的运动，其中包括思维的运动。物质运动形式的相互转化，证明了多种多样运动形式的统一性，也进一步证明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发现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相互转化，而且发现转化前后运动（能）的量是不变的，能量的总数在从能动（机械力）转化为电、热、位能等等的过程中，以及在发生相反的转化过程中，都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这就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恩格斯把这个定律叫做“伟大的运动基本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页）。这个定律证明了：运动是不能被创造或被消灭的，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也就是说，运动是永恒的、绝对的。这个定律是我们对丰富多彩的运动形式的相互转化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

十九世纪下半世纪，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歪曲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提出了“宇宙热寂说”。他认为，一切形式的能量都必然要转化为热能，而热能只能由温度较高的物体传到温度较低的物体，使得热能逐渐均匀地消散在整个宇宙，直至热的平衡，致使热能失去了进一步转化的可能，于是“宇宙热寂”就来临了。那时，宇宙的总能量丝毫没有减少，但是它却再也动不起来了。针对这种错误理论，恩格斯指出，对于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不能仅仅从数量上去把握，而且还必须从质量上去把握。任何一种物质运动形式都能够从自身产生出转化为其他运动形式的条件。这就是说，在运动形式的相互转化中，不仅能量的数量是不变的，而且一种运动形式向他种运动形式转化的能力也是不会消失的，这种转化的能力是物质本来具有的。“一种运动，如果它失去了使自己转变为它所应当具有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能力，那末即使它具有潜在力，但是不再具有活动力了，因而它部分地被消灭了。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0页）宇宙热寂说实质上是把绝对的静止看成了宇宙发展的归宿。因为它所说的宇宙最终的热寂状态，是没有运动而且不可能再发生运动的状态。这种理论最后必然要导致宗教唯心主义。既然把整个宇宙的运动归结为一个由热能高度聚集的炽热状态向热量均匀分散的冷却状态转化的过程，那末就必须回答这个最初的炽热状态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因此，就必须设想有上帝存在了。牛顿的第一推动力变成了第一炽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卷第267页）而且当宇宙处于死寂状态后，只有出现奇迹，靠某个上帝重新上紧宇宙大钟的发条，宇宙才可能重新运动。总之，热寂说的主要错误是：它是只从量的方面、没有从质的方面把握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片面性理论；它把绝对静止看成了宇宙的归宿；它最后必然导致宗教唯心主义的创世说。

辩证唯物主义肯定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运动形式转化的能力是永不消失的，运动形式的多样性正是在运动形式的相互转化中产生的。高级运动形式是由低级运动形式转化而来的，是在低级运动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高级运动形式包括了并改造了它所由产生的低级运动形式，同时高级运动形式又是一种与以前所有低级运动形式有着根本质的区别的崭新的运动形式。我们在研究各种运动形式的关系时，既要注意到高级运动形式和低级运动形式之间的联系，又要注意把它们区别开来。

把高级运动形式和低级运动形式割裂开来，看不到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就无法说明无限多样的运动形式之间的统一性，也无法理解运动按其本质来说是绝对的，按其具体表现来说又是相对的。这样，也就无从说明高级运动形式，例如生物运动和社会运动的起源。生物运动或社会运动都是统一的物质运动中的一个具体形态。运动是绝对的，但它的具体表现却是相对的。运动是永恒的，生物运动却不是永恒的。生物运动有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运动没有起源，生物运动或社会运动却都有起源。正如前面讲过的，生物运动是在适宜的条件下，在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长期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当地球发展到丧失生命存在的条件时，生物运动也就会在地球上消失，转化为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运动。现代科学的发展甚至证明化学运动也不是最原始的运动形式，它并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存在的运动形式。一些天体只有

机械运动和热核反应等物理运动，其中并不存在化合物。1968年发现的中子星（脉冲星），基本上是由中子构成的。其中没有原子，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化学运动了。现在看来作为各种运动形式的基础的原始运动形式，是机械的和物理的运动。我们所以要注意到高级运动形式和低级运动形式的联系，注意到高级运动形式的起源，是因为唯心主义者常常把高级运动形式（特别是生物运动和社会运动）看成是与低级运动形式没有联系的，是由某种特殊精神力量、神所特创的运动形式。

高级运动形式来源于低级运动形式，它必然包含着低级的运动形式，但决不能把它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因为它具有不同于低级运动形式的本质特点。例如有机体的生命运动，一刻也不能离开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过程。然而，认识了生命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过程，并不等于了解了生命本身。要了解生命的本质，必须把握生命运动形式所特有的基本特征及其规律性，如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遗传变异等等。这些运动形式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机械的、物理的或化学的过程。机械唯物主义者把物质世界复杂多样的运动形式归结为机械运动一种形式，或把高级运动形式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显然都是错误的。这是一种应该彻底批判的“还原论”思想。现代反动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学，如新实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等，都把社会这种高级运动形式归结为生物运动形式。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理论。

我们在批判“还原论”时要注意，绝不能把对(于)高级运动形式中所包含的低级运动形式的研究，统统说成是“还原论”。“四人帮”一伙打着批还原论的旗号，把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量子化学等等最新科学，一概诋毁为还原论，不准人们研

究。这是一种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破坏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反动思潮。在哲学上，它是割裂高级运动形式和低级运动形式之间联系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观点的翻版。生物运动是一种崭新的运动形式，把它归结为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过程，当然是错误的。但是，要脱离这些过程来了解生命的本质也是办不到的。恩格斯明确指出："只有在这些关于统治着非生物界的运动形式的不同的知识部门达到高度的发展以后，才能有效地阐明各种显示生命过程的运动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1页）生物运动中所包括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过程又都是经过改造的，有着新质的特点。我们只有对这些具有新质特点的低级运动形式进行专门的研究，才能弄清楚生命运动形式是怎样从统治着非生物界的运动形式转化而来的，才能解决生命起源的问题，因而也才能够弄清楚生命的本质。在辩证法看来，对任何一个事物，我们不理解它的起源，是难以把它的本质弄得十分清楚的。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等科学，研究了蛋白质、酶和核酸等分子的化学成分、分子结构以及它们的化学反应过程，有助于揭示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遗传和变异过程的机制，因而使我们对生命的起源和生命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这哪里会有什么还原论！当然，这并不排除一些受旧哲学支配和影响的科学家，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地歪曲这些科学的积极的成果，从中做出某种还原论的结论。对这种观点，我们是必须批判的。但是，这和"四人帮"把这些最新科学本身当作还原论来妄加批判，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阐明各种运动形式之间质的区别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对我们了解科学发展的规律是十分重要的。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质的差别，是我们区分各门具体科学，确定它们的研究对象的客观基础。显而易见，机械学（力学）、物理

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它们分别研究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运动。运动形式之间的转化，是一个由简单低级的形式逐渐过渡到复杂高级的形式的过程。我们对运动形式的科学研究也应如此。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研究运动的性质，当然应当从这种运动的最低级、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先理解了这些最低级的最简单的形式，然后才能对更高级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有所阐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1页）在研究低级运动形式的科学得到充分发展以前，研究高级运动形式的科学是难以得到充分发展的。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力学，然后才有物理学的发展。化学差不多与物理学同时得到发展，有些地方化学还先于物理学而发展，但是，没有物理学的高度发展，化学难于从经验科学发展到理论科学。就以化学元素周期表为例，它原来不过是化学家根据经验材料整理出来的经验规律，最初只知道有这样一个规律，但不能说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规律。只是在原子物理和量子力学高度发展以后，才可能在理论上对元素的周期性变化做出深刻的科学说明。现代物理学的高度发展，已创造了分子设计的可能，使化学家在寻找某种理想的新化合物时能够避免盲目摸索的过程。现代物理学和化学的发展，产生了生物化学、生物分子学、生物物理学等等崭新的学科，现在正在酝酿着生物科学发展中的重大突破。遗传工程学的产生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它预示着农业科学的大突破，人类将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需要设计并创造出新的生物物种。前面讲到过，物理运动（包括机械运动在内）是物质运动的最原始的形式，其他一切形式都是在它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因此，物理学的发展对其他一切科学的发展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发展物理学和数学（关于数学我们留在质量互变规

律中再讲），是发展现代科学的基础。再有，由于运动的各种基本形式是相互联系的，是可以按一定规律相互转化的，因而出现了一些研究基本运动形式之间相互关系的中间学科。这些崭新学科的出现，对说明运动形式的多样性的统一、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对于推动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有着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运动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是多样的。掌握了这三点基本内容，我们就可能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把它同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的唯心主义，设想没有运动的物质的形而上学，否认运动和静止的对立统一——否认相对静止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以及否认运动形式多样性的机械论等等错误思想，严格区分开来。同时，我们就可能进一步理解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既是无限多样的物质形态的统一，也是无限多样的运动形式的统一。

三、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存在的形式

物质的运动总是在时间和空间之中进行的。我们知道，机械运动是无论哪一种物质运动形式都包含的物质运动的最简单、最低级的形式，而机械运动则是物体或物质微观粒子在一定时间内的空间的位置移动。仅从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一切物质运动都离不开时间和空间。列宁说："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列宁选集》第2卷第177页）这就是说，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没有这个形式，物质的运动就不存在。

什么是时间？时间就是物质运动的顺序性、间隔性和持续性，它表明一事物和另一事物、一现象和另一现象、一运动过

程和另一运动过程依次出现的先后顺序；表明它们之间间隔的长短；表明一事物存在和一种运动过程进行的持续性的长短。这种物质运动的顺序性、间隔性和持续性，可以用一条直线上一点对原点的位置和距离来表示，可以用一个数字来表示，这就是时间的一维性。例如以目前为原点，可以看出一个物质现象的出现是在目前之前还是在目前以后，即它是过去出现的还是在将来出现的，它是多少年以前出现的还是多少年以后出现的，以及它的存在一共持续了多少年，等等。时间的流逝是沿着直线永远向前的，一去不复返。所谓“时乎时乎不再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都是说的时间的一维性即不可逆性。

什么是空间？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伸张性。它表示物体彼此之间的并存关系和分离状态，表示着它们的体积、形状和彼此的排列秩序。简言之，空间是说明事物的位置、体积和形状的特性的。几何学是研究空间特性的科学。我们必须用三根相互垂直并相交于原点的直线（即立体坐标）区分出前后、左右、上下，并用三个数字才能表明一点相对于坐标的位置。我们用包含X、Y、Z三个变数的方程式，靠立体解析几何的帮助，可以在立体坐标上明确地描绘出物体的形状，并进一步靠其它数学方法求出其体积。这就是空间的三维性。说得简单些，空间的三维性表现在，只有知道长、宽、高三个数字，才可能求出物体的体积。几何学靠思维的抽象，曾设想出只有位置没有长短的点，只有长短没有宽窄的线，只有长宽没有高低的面。人们把这种理想的线叫一维空间，理想的面叫二维空间。研究二维空间特性的几何学是平面几何学。这些科学的抽象，对人们弄清空间特性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但是，一维空间（理想的线）、二维空间（理想的面）在实际上是不存在

的，它们只是从实际存在着的三维空间中抽象出来的。实际存在的空间只能是三维空间。

作为运动着的物质存在形式的时间和空间，是和物质运动不可分离的。

一方面，时间和空间离不开物质的运动，离开物质运动的时间和空间，是神秘莫测、无法度量的，是根本不存在的。恩格斯说："物质的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存在的空洞的观念、抽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6页）时间是以物质在空间的运动来度量的。测量时间的单位年、月、日等等，是靠天体在空间的运动来确定的。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是一年。月球绕地球公转一周是一月。地球绕地轴自转一周是一日。测定时间的方法也离不开物质在空间的运动。自古以来测定时间的方法，如铜壶滴漏、信香、日规、钟表等，无一不是如此。天文台测定标准时间，也是靠对天体运行的精密的观察。空间同样也是以物质在时间中的运动来度量的。有人会说，这不对了，我们不是用尺子来测量吗？这的确是测量空间距离大小的一个方法，但这也是用物质的尺子的运动来测量的。撇开这一点不谈，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测量方法是有极大的局限性的。它既无法作为测量天体间大宇宙空间的方法，也无法作为测量微观粒子的小宇宙空间的方法，而且在可以用尺子测定空间长度的地方，它也不能保证测量的精度。真正普遍适用又可以保证测量精度的方法，只有特定的物质的运动。测定宇宙间天体相互距离的单位是光年（光在真空中的速度是每秒30万公里，光运行一年的行程叫光年）。例如除太阳以外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比邻星，离我们4.28光年，等于太阳同地球距离的25倍。对普通长度的精微测量以及对微观世界内极小长度的测定，都得用电磁波（包

括光波、X射线、γ射线等）以及其他基本粒子的物质波的运动来测定。用激光测长干涉仪测定数米以内的长度，可以保证测量精度在0.1微米以内。只有高精度的测量，才可以满足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的精密化需要。这些事实都说明，时间空间是离不开物质运动的。

另方面，物质运动离不开时间和空间，离开时间和空间的物质运动也是不可理解的，无法存在的。现代科学的发展雄辩地证明，没有在时间以外的物质运动。物质运动的速度是有限的，最大的速度是光速，每秒30万公里。超光速的运动是没有的，更谈不上有什么无限大的速度。只有具有无限大速度的物质运动才谈得上是不需要时间的，是存在于时间之外的，可是这样的物质运动是没有的。现代高速电子计算机每秒可以计算百万次以上，这就是说每次计算只需百万分之一秒，尽管时间极短，但还是要有时间。如果计算一次根本不需要时间，那末电子计算机每秒可以计算无限次，这样的计算机是永远造不出来的。其实无须科学论证，每一个正常的人都知道，没有存在于时间以外的东西。如果说一个东西，过去从没有过，现在也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那就是说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既然物质运动都是在时间中的运动，那末我们做任何工作都需要时间，没有时间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马克思指出，一切浪费归根到底是时间的浪费。鲁迅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我们必须珍惜时间，争分夺秒地做好我们的工作，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时间是这样，空间之于物质的运动也是一样，根本没有在空间以外的物质运动。前面我们以一切物质运动都包括机械运动(位移)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另外，每一个运动着的物质必须在空间有一个位置，而且它必须占有一定的空间，也就是说它必须有一定的体积。有的物理学

家曾经把基本粒子设想成没有体积的数学的点，这是错误的。现代科学不仅证明微观粒子有体积，而且测出了它们的半径。存在于空间之外的东西，就是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是根本没有的。对每一个理性正常的人来说，这也是不言自明的。

在肯定了时间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时间空间同物质运动不可分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懂得，物质运动的特性决定了时间空间的特性。这包括如下三点基本的内容：第一，物质和运动是客观的，时间和空间也是客观的；第二，物质和运动是绝对的，它们的具体表现形态是相对的，同样，时间和空间也是绝对的，而它们的具体表现形态也是相对的；第三，世界上除了运动的物质或物质的运动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物质和运动是无限的，因而时间和空间也是无限的。弄清这些道理，对于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具有决定的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坚持时空的客观性，而同否认时空客观性的唯心主义根本相对立。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既然承认客观实在即运动着的物质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也就必然要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列宁选集》第2卷第176页）唯心主义否认世界是物质世界，否认物质的客观存在，也就必然否认时间和空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把时间和空间看作是意识、观念的产物。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空间和时间是绝对观念发展的产物。只是在绝对观念外化为自然以后才出现空间，自然界在时间上是不能发展的，只能在空间上展开自己的多样性。在绝对观念发展到人的精神活动阶段，才有时间。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

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5页），是十分荒唐的。这种谬论把自然界、物质看做是绝对精神（即神）的创造物，自然物只能按它被创造出的原始状态在空间扩张，只能有数量的增加，不会有新特征、新事物的出现。这实质上是否认了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这种观点早已被自然科学所驳倒。主观唯心主义者把时间和空间看作是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中的观念形式，这和它否认世界的客观存在是分不开的。康德认为，空间和时间是人类感性直观中的先天形式，人们通过这种先天形式去感知事物，才给予事物以时间性和空间性。马赫断言，空间和时间是“感觉系列调整了的体系”，是用以整理认识材料的工具，调整认识材料先后顺序的就是时间，调整这些认识材料相互之间上下、前后、左右排列秩序的就是空间。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时空观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科学证明，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就存在着，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发展着。这个事实，是对主观唯心主义时空观的致命的一击。

同旧唯物主义“绝对的”时空观根本不同，辩证唯物主义在肯定时空客观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时间空间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对立统一。旧唯物主义肯定了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但是，它把时间和空间同运动的物质割裂开来，认为时间和空间可以脱离运动的物质而独立存在，具有不受物质形态和运动形式的变化影响的绝对不变的特性。它认为，时间是和物质运动无关的绝对均匀流逝的纯粹的持续性；空间是和物质相脱离的绝对空虚的空框框，这个空框框虽有物质充塞其中，但它本身是不动的，有着绝对不变的特性，欧几里得几何学被认为就是对这种绝对特性的反映。这种时空观是形而上学、绝对主义的机械时空观，牛顿经典力学的时空观是这种时空观的典型代

表。牛顿提出了"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概念。他写道："绝对的、真正的和数学的时间自身在流逝着，而且由于其本性而均匀地，与任何其他外界事物无关地流逝着"；"绝对的空间，就其本性而言，是与外界任何事物无关而永远是相同的和不动的"。牛顿还设想了度量这种绝对时空的标准钟和标准尺。

辩证唯物主义反对这种机械论的时空观，它认为，作为物质运动存在的形式的时间和空间，同物质和运动一样，它们的存在是绝对的，但其具体的表现形态和特性则是可变的，相对的。时间和空间特性的变化，是同物质和运动的变化相对应的。这就更加深刻地说明了，时间和空间同物质和运动是密不可分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绝对的时空观，牛顿本人就已经察觉到它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牛顿认为，宇宙中各个天体通过万有引力相互作用着；他又认为，存在于各天体之间的宇宙空间是绝对的空虚，即没有任何物质的空间。那末，人们必然要问：作用于各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究竟是靠什么东西传递的？按牛顿的观点必然要承认存在有某种无需任何物质作媒介的"超距作用"。牛顿本人也认为承认了这种神密的"超距作用"是"尤其荒谬"的，但是他无法摆脱这一荒谬的结论。现代科学已证明，绝对空虚的空间是不存在的，宇宙空间中存在有引力场、电磁场和宇宙射线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客观的实在，都是物质。特别是宇宙背景幅射的发现，更进一步证明了没有绝对空虚的宇宙空间。万有引力并不是什么神秘的"超距作用"，而是通过物质的一种特殊形态——引力场来传递的。

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创立、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和证实，都揭示了时间和空间同物质运动的深刻的联系，证明了物

质运动的特性制约着时间和空间的特性。

欧几里得几何学，长期以来曾经被人们看作是揭示空间特性的绝对真理的体系。它的公理和定理受到人类实践无数次的反复检验，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反映着绝对不变的空间的特性。可是，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则不承认有什么绝对不变的空间特性，它提出了不同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和定理，建立了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例如，欧几里得几何学认为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则认为三角形三内角之和不等于180°，它既可以大于也可以小于180°。究竟是哪一几何学正确地反映了空间的特性？科学证明：它们都是运动着的物质的空间特性的反映。欧几里得几何学只是近似地反映了普通有限的地面空间的特性，它被人们在地面的普通的实践活动所证实；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则反映了天体运行的大尺度宇宙空间或微观粒子活动的小尺度的微观空间的特性，它的正确性被人们对天体活动的精密观察和对微观粒子的深入研究所证实。同时，科学也证明了：欧几里得几何学认为空间有某种与物质运动无关的、绝对不变的特性的观点是错误的；只有非欧几里得几何学认为空间并没有什么绝对不变的特性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前者的错误产生于人类实践的历史的局限性，是由于实践活动的广度和深度的不足而引起的。因此，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创立证明了，没有不受物质运动制约的不变的空间的特性，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驳斥了形而上学机械观的时空观。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包括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否定了牛顿力学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概念，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爱因斯坦指出：没有绝对的同时性，没有流逝均匀快慢不变的时间，没有牛顿所说的那种能表示不变的时

间特点的“标准钟”；也没有作为绝对不变的长度标准的“标准尺”。就拿牛顿所谓的“绝对同时性”来说吧。我们通常把两个同时看到的现象当作同时发生的现象，其实它们果真同时发生吗？不一定。这种同时性是相对的，因为，有关现象的信息传到我们眼中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它是需要不同的时间的。传递信息的最高速度就是光速（即每秒30万公里）。例如，我们同时观察到宇宙太空中两个现象，一个出现在距我们一万光年的地方，另一个则出现在距我们一百亿光年的地方，那末，这两个现象不仅不同时，而且它们之间的时间间隔长达近一百亿年之久，产生后一现象的天体很可能早在几千万年以前就消失了，只是关于它的信息直到今天才迟迟传到我们眼里罢了。这还不过只是对同时性的相对性的最简单的说明。现代科学已查明光速是不变的，无论对任何两个相对以高速运动的对象来说都是不变的。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就是在光速不变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揭示出了空间和时间特性的相对性。人们在考察地上的普通物体的运动和天体的较慢的运动时，不容易觉察物质运动对时间、空间的影响以及时间和空间的相互联系；但是，在考察接近光速运动的物体时，相对静止坐标系的观察者就可以觉察，随着物体运动速度的增长，沿运动方向的长度就会缩短，它上面进行的变化过程就会放慢，也就是说，它的空间延伸性就会减小，而时间的持续性就会加长。狭义相对论所揭示的“长度缩短”和“时间延缓”的现象，已被现代科学的精密实验所证实。但是，这常常不能为人们的常识所接受，不能被人们所理解。其实，这并不奇怪，这是因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习惯于对缓慢的（相对光速来说）物体运动的考察。牛顿力学的绝对时空观是对这种缓慢的物质运动的时空特性的近似反映（即它的误差小得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狭义相对论

所揭示的时空相对性的特性则是接近光速的高速的物质运动的时空特性的科学反映。要知道，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面临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航天技术的发展，高能粒子的广泛应用，这些都会使这种高速物质运动的现象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到那时，对于狭义相对论的时空相对性的观点，就将成为习以为常、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常识了。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进一步揭示了时间和空间的特性和物质运动的特性的紧密联系。在广义相对论看来，物质质量的分布和运动以及引力场的作用，决定着时空的结构，会引起时空的弯曲。同时，这种时空结构的变化和时空的弯曲又会反过来对引力场的变化和物质世界各种领域内的物质质量的运动产生影响。非欧几里得几何学所揭示的空间特性，就是弯曲空间的特性。什么叫弯曲空间？粗浅地讲，光线是按直线前进的，光线在空间的弯曲就显示了空间的弯曲。爱因斯坦根据他的理论断言，由于太阳本身巨大的质量产生强大的引力场，必然引起它周围时空的弯曲，当遥远的恒星光线通过太阳周围弯曲的空间时也就必然会发生弯曲。后来，天文学的精密的观察，完全证实了爱因斯坦的论断是正确的。

由此可见，现代科学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时空的特性是受物质运动的特性所制约的；物质运动的特性是相对的，时间和空间的特性也是相对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时间、空间同物质运动是统一不可分的，时间和空间也是统一不可分的。爱因斯坦曾经这样讲：过去人们都认为，如果世界上万物都消失了，那么空间和时间却依然存在；而从相对论来看，随着万物的消失，空间和时间也告消失。

我们还要附带谈一下多维空间的问题。前面谈过现实存在

的空间是三维的，由于爱因斯坦已证明时空是统一的，现在要用数学方程式来描述统一的时空，就必须在长、宽、高（即x、y、z）三个变数中，加进一个表示时间的变数t，因而产生了有四个变数（x、y、z、t）的方程式。在科学中，人们常常把统一的时空叫做“四维时空”，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有人居然把这叫做“四维空间”，并且根据数学演算中常出现多于四个变数的多变数的方程式的事实，而说什么有“多维空间”的存在。马赫就曾认为：不必设想化学元素存在于三维空间中，所以没有建立起完满的电学理论，是由于局限于用三维空间来说明电的现象。列宁坚决地驳斥了这种谬论，指出，唯一现实的空间是三维空间，设想多维空间的存在，只不过是为天堂、地狱找一个安放的地方，是为降神术服务的（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81—183页）。

总之，客观的时间和空间的特性是会变化的，人们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也是会变化的。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绝对时空观，否认时空特性的可变性，否认时空观念的可变性，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科学发展的事实的。唯心主义者正是利用旧唯物主义的这一错误来攻击唯物主义，宣扬唯心主义。

唯心主义者利用人们关于时空观念改变的事实，宣称时间和空间不过是人们意识的产物，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已不存在，唯物主义已被推翻。其实科学新发现所推翻的，仅仅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时空观，相反，却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即论证了时空的客观实在性的绝对性以及它们表现形态和特性的多样性和相对性。物质的时间和空间的形式是随着物质本身运动的变化而变化的；人们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观念是可变的、相对的，是随着科学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但是作为物质运动形式的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则是不变的、绝对的。列

宁说："正如关于物质的构造和运动形式的科学知识的可变性并没有推翻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一样，人类对时空观念的可变性也没有推翻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列宁选集》第2卷第177页）

辩证唯物主义从时间和空间同运动着的物质不可分的观点出发，还肯定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物质是无限的，运动是永恒的，物质运动存在的形式——空间和时间也是无限的。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不过是运动着的物质的无限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茫茫宇宙，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历史上许多时空有限论者，曾一次又一次地设想空间的半径，时间的开端，为时空设置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可是天文学的发展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打破这个界限，始终没有发现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没有界限这就是无限。在对宇宙的观察上，今天借助射电望远镜使我们察觉距地球一百亿光年以外的天体，这也就是我们察觉了存在于一百亿年以前的天体。但是，这仍然不是空间的边缘，也不是时间的开端。宇宙是没有边缘也没有开端的。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同样，运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客观物质世界永恒地存在着、运动着，因此，宇宙在时间上是无限的，宇宙的发展是没有开端也没有尽头的。对宇宙时间无限性的证明，同时也就是对宇宙空间无限性的证明。恩格斯指出："无限时间内宇宙的永远重复的连续更替，不过是无限空间内无数宇宙同时并存的逻辑补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1页）。

宇宙时间和空间无限性的观念似乎与我们的常识相矛盾。因为，在生活实践中，我们所碰到的任何一个具体事物的运动在时间空间上都是有限的。可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正是由这种无数的有限的时间和空间所构成的，这就是时间和空间的无

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统一。恩格斯指出："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可是事情就是这样。物质世界的有限性所引起的矛盾，并不比它的无限性所引起的少，……任何消除这些矛盾的尝试都会引起新的更坏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0—91页）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更坏的矛盾会把人们引向哪里。如果认为物质世界在时间上、空间上是有限的，就必然导致承认有一个存在于物质世界的时间和空间之外的世界——神的世界。那末，我们就要问，这个所谓"神的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究竟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如果回答是无限的，那末，关于客观物质世界时空有限性的观点，并没有排除矛盾的无限性，不过是把物质世界的时空无限性改换为"神的世界"的时空无限性罢了。如果还要说"神的世界"在时空上也是有限的，那末就得承认在"神的世界"之前和之外还存在一个什么离奇的世界。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物质世界时空有限性的观点，除了引入"神的世界"以外，并不能排除无限性的矛盾。想要排除无法排除的矛盾，必然会产生新的更坏的矛盾。因此，唯一正确的答案只能是：承认物质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和有限的矛盾统一。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答案。

以上关于时间空间的客观性，时间空间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对立统一，以及时间空间无限性和有限性的对立统一，都集中说明了一个根本观点：时间和空间同运动的物质是不可分的，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物质存在的形式。只有坚持这个根本观点，才能和一切宗教迷信、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划清界限，进一步贯彻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同时也使我们懂得，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就必须联系到时间和空间及其具体的特点，来把握运动的物质和物质的运动。

四、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

在时间和空间中永不停息的物质的运动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日月星辰按一定轨道运转，春夏秋冬四季依次更替，生物有机体的新陈代谢、遗传变异、不断进化，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等等客观过程，都具有某种反复出现、必然如此的基本秩序。这种客观过程的基本秩序，表明了各种物质形态都有它自己运动的规律性。列宁说："世界是物质的有规律的运动"（《列宁选集》第2卷第170页），没有规律的物质运动是不存在的。

前面我们多次讲过，我们的一切认识和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可是我们如果把物质运动看成是杂乱无章的，不进一步承认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那末我们的认识就会找不到头绪，我们的工作就会失去指导。因此，要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就必须承认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必须实事求是。毛泽东教导我们："'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什么是规律？"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1页）。"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这就告诉我们，所谓规律，就是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规律隐藏在事物运动的各种现象的背后，是现象和过程的内在本质，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的秩序。人们依靠自己的感觉器

官只能接触到事物的各种现象和外部联系，只有在反复的实践活动中，并借助于抽象思维，才有可能透过事物的各种表面现象，揭露事物的内在本质，发现事物运动的规律。规律性的认识，是人们对于事物本质的正确反映。列宁说："规律和本质是表示人对现象、对世界的认识深化的同一类（同一序列的）概念，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列宁全集》第38卷 第195页）人们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和掌握了事物的发展规律，才能指导我们的行动，提高我们行动的自觉性。

规律是客观的。辩证唯物主义肯定了物质运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也就肯定了物质运动本身所固有的规律的客观性。规律同物质一样，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人们认识它还是没有认识它，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它都存在着，都在起作用。人们既然不能任意创造或者消灭物质，当然也不可能任意创造或者消灭规律。人们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认识掌握客观规律，利用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如果违反了客观规律，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其结果必将一事无成，并且必然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整个人类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的历史都一再证明，规律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机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发展，早已经证明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在人类出现以前，地球就存在着，自然规律就在起作用；在人类出现以后，自然规律同样在起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肯定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而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揭露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使唯物主义关于事物运动客观规律的观点得到了彻底的贯彻。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自然界起作用的是受客观规律支

配的各种无意识的盲目的自发力量，社会现象则比较复杂。在社会生活中，一切事情都是要人来做的，离开了有意识有目的人的自觉活动，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历史。正是由于社会生活的这个特点，使人们往往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误认为在社会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似乎就是人的意志、愿望和思想，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的规律性。但是，这种观点显然无法解释这样一些现象：为什么不同的人们会有不同的意志、愿望和目的？为什么有的意志、愿望、目的能够实现，有的则不能实现？例如，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为什么一切进步阶级的革命目标终于能够实现，而一切反动派的反动企图又注定要破产？要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承认，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由人们的意志和愿望决定的，归根到底它也和自然界一样，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而社会规律起作用的根本特点在于，它是通过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活动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进步阶级的革命目标必然胜利，是因为它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革命愿望和要求；反动阶级的反动目的注定失败，是因为它违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脱离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革命愿望和要求。还要看到，不仅人们的愿望、思想能否实现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而且某种思想、愿望和动机的产生也是受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的客观物质条件所制约的。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根据全部历史事实，特别是根据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象的科学分析，才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历史经验，都充分证明了，社会的发展，是有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人们可以自觉地利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

规律，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这决不是意味着规律不再是客观的了，人们可以任意消灭或者创造规律了。斯大林说过："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把某些规律的破坏作用引导到另一方向，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给予其他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以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但是人们不能消灭这些规律或创造新的经济规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3页）。毛泽东在谈到价值规律的时候也指出："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只要我们尊重价值规律，并且善于正确地利用这个规律，就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多快好省地发展。反之，如果象"四人帮"那样，根本否定价值规律，拼命反对利用这个规律，肆意违反这个规律，结果就使我们的经济工作陷于严重混乱，产生极大的浪费和惊人的亏损，从而使整个社会主义经济遭到灾难性破坏，濒于大崩溃的边缘。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没有任何例外。

在规律的客观性问题上，如同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一样，各种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历来是根本对立的。

唯心主义者从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基本前提出发，根本否定规律的客观性。他们或者断言规律是某种超物质的精神的产物，是主观的东西，或者根本否认有任何规律的存在。宗教神秘主义者公开宣扬，自然界是按照神的旨意产生和运动的，世界的基本秩序是"创世主"建立的，一切自然规律和社

会规律都不过是神的意志的表现。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规律归根到底是“绝对精神”的变化发展的规律。主观唯心主义者声称规律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例如康德认为，自然界本身并没有自己的规律，是人们的理性把规律外加给自然界的。他有一句典型的话，叫做“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马赫主义者毕尔生硬说“规律，按这个词的科学涵义来说，实质上是人类精神的产物，脱离了人它就没有意义。它的存在应当归功于人的理性的创造力。确认人给自然界的规律，要比反过来说自然界给人以规律更有意义。”实用主义哲学则表现得更加露骨，公然否定规律的存在，胡说规律只是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作出的假设，胡适就是这种“人造规律”观点的吹鼓手。总之，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者都以不同方式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都把规律归结为某种神秘的精神力量或主观意志的产物。

历来的唯心主义者都特别否定社会规律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者也不例外。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是一切剥削阶级哲学的共同特征，这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利益归根到底是和社会发展规律相矛盾的，特别是当他们变成反动阶级的时候则更是如此。这就是他们否定社会规律客观性的阶级根源。而把意志的作用片面夸大到脱离并支配社会物质生活的荒谬地步，则是否定社会规律客观性的认识根源。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最愿意面对现实，最愿意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

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造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整个人类进到大同领域。”（《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7—1358页）

林彪、“四人帮”由他们反动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竭力宣扬“天才”论和“精神万能”论等唯心主义谬论，肆意否定规律的客观性。列宁说：“排除科学的规律，事实上只能是偷运宗教的规律”（《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6页）。林彪、“四人帮”正是这样干的。他们一方面排除马克思主义科学和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则随意地主观臆造，把所谓几百年出一个天才的“规律”，精神代替物质的“规律”，老干部由民主派必然到走资派的“规律”，有权就有一切的“规律”，卫星上天必然红旗落地的“规律”，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规律”，制造永动机的“规律”，以及三突出的文艺创作“规律”等等一大堆人造规律，偷运或者强加给现实世界。林彪、“四人帮”以为只要凭着他们的主观意志，就可以把客观规律一笔抹煞，就可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建立封建法西斯王朝的罪恶目的。但是，客观规律终究是抹煞不了也抗拒不了的，人造规律经不起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的考验，终究是要彻底破产的。肆意抗拒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几个反动小丑的一切倒行逆施，终于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无情惩罚，以自己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从林彪、“四人帮”的彻底垮台的反面历史教训中，再一次证明了客观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反动派都扭转不了的。

在客观规律的问题上，辩证唯物主义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也是有根本区别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否认物质的多样性，把物质归结为一种单纯的形态——原子；否认运动形式的多样性，把物质运动归结为一种最简单的形式——机械运动。因而形而

上学唯物主义也否认规律的多样性，把它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的规律。辩证唯物主义则相反，它认为，既然物质和运动是多样的，那末客观规律的表现也是多样的，不能仅仅归结为机械的规律。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客观规律问题上的机械论观点也必然导致唯心主义，这不仅表现在社会历史观上，而且也表现在对自然科学材料的解释上。过去的物理学一直被牛顿力学中机械论的规律观所支配，当量子力学发现了基本粒子运动中不同于机械规律的统计规律时，就有人喧嚷客观规律已被消灭了，否认基本粒子运动的客观规律性，说什么电子具有"自由意志"。唯心主义者乘机大肆攻击唯物主义，宣布唯物主义的"破产"。其实量子力学和其他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也不可能推翻唯物主义，它推翻的仅仅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机械论观点，而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基本粒子运动的统计规律仍然是客观的，基本粒子加速器的设计和制造的成功，以及一切有关基本粒子研究的科学实验，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基本粒子运动的客观规律性。物质运动客观规律的具体表现形态是可变的、多样的、相对的。但是，客观规律性的存在则是不变的、绝对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否认客观规律的存在，都不能忘了"实事求是"。

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2页）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为指导，深入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一切经过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努力掌握和正确利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客观规律，我们就一定能够尽快地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

第三章　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

一、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二、意识是人脑的机能

三、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

四、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

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但是，这并不是说世界上只有物质现象。自从自然界分化出人和人类社会以来，世界上除了物质现象以外，还出现了意识现象，产生了物质和意识的对立统一关系。物质和意识的矛盾同任何其他矛盾一样，只有了解了矛盾的这一方，才能深入地了解另一方；反之亦然。初步理解了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原理，为我们正确认识意识现象提供了前提。而只有进一步弄清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原理，科学地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

关于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的问题，曾是哲学上和科学上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它是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发生的古老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哲学路线和科学研究路线的重大原则问题；是长期以来哲学上和科学上众说纷纭而又未能彻底解决的一个困难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依据人类实践的总和与科学发展的全部成就，唯一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把唯物主义一元论贯彻到底，进一步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同各种唯心主义以及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之间的界限，为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并在这个前提下充分有效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据。

一、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恩格斯说："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这是对于意识起源问题的唯一正确的解决。

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在生命运动出现以后，由生命运动转化为社会运动时产生的。在地球产生以后的最初的漫长岁月里，地球上没有生命，也没有感觉；没有社会的动物（人），也没有意识。意识的现象是和物质的最高级的运动形式——社会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人们对各种低级运动形式有比较充分的、科学的理解以前，对意识的起源和本质很难有一个比较充分的科学的理解。长期以来，关于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的问题，曾经是科学和哲学上的最大的难题之一。

不了解一种事物和现象的起源，就不可能深刻地理解它的本质和作用。唯心主义者利用科学还不能解释物质是怎样产生意识的这个困难，便乘虚而入，发动进攻，散布种种谬论。他们完全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真实关系，断言意识是一种不依赖于物质的、独立的本体，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不是物质产生意识，倒是意识产生物质。各个唯心主义流派都以不同的方式重复着这种谬论。

一切唯物主义者都肯定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不可能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由于受到自然科学水平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都没有也不可能科学地解决意识的起源的问题。例如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曾设想人的灵魂也是原子构成的，不过这种原子比较精致圆滑而富有活动性罢了。当这种原子聚会在一起时，便产生灵魂，当它们分散时，灵魂也就消散了。这种观点直接批驳了灵魂不灭论，是唯物地解释意识现象的最初尝试。我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者提出了"神依于形"和"神灭论"的观点来反对唯心主义的"神不灭论"，认为在"形"（肉体生命）灭亡之后，"神"（精神、意识）随即跟着灭亡，不可能有脱离"形"而存在的永不消灭的"神"。东汉的王充以烛火比喻形神，他说："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蜡烛燃尽，烛火就要熄灭；那末，人死形毁，又怎么能有离开肉体独立存在的不灭的精神呢？南北朝的范缜认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是"神"的物质实体，"神"是"形"的作用和功能。形和神的关系正如刀刃和锋利的关系一样，两者是不能分的。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在原则上仍然是正确的。但是，这些论述只不过是机智的比喻，算不上科学的证明。它们只是指出了物质现象的共性——任何物质的运动或物质的属性（包括物质产生的意识活动和精神属性在内）都不能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并没有指明精神、意识这种物质的特殊属性的本质，更没有说明物质是如何产生意识的。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没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办不到的。

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欧洲的唯物主义者，根据自然科学的材料，对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作了若干具有科学意义的论证。例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认为，人脑中产生的

表象和概念是由物质的现实派生出来的，人的肉体结构决定他们的精神生活，他嘲笑了那种宣扬灵魂不死的宗教信条。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明确指出，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思维而客观存在着，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感觉是客观世界的映象。这一时期内，还有一些唯物主义者，虽然肯定意识只是物质的一种属性，但是他们不知道意识只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大脑的属性，认为一切物质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意识的属性，得出了“物活论”的错误结论。十九世纪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在意识起源的问题上的观点则更加荒唐，他们由于不能正确理解意识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即人脑的机能和属性，竟宣称意识是物质的特殊变种，是人脑的分泌物，就象胆囊分泌胆汁一样。这种解释显然是错误的。谁都知道，把人体解剖，胆囊产生胆汁经过科学实验可以证明，而把人脑打开，无论如何也是找不出思想实体来的。殊途而同归。如果说唯心主义者从一个极端把观念的东西同物质的东西等同起来，得出了极端荒谬的结论，那么，庸俗唯物主义者则从另一个极端把物质的东西同观念的东西等同起来，同样得出了极其荒唐的结论。这样，庸俗唯物主义者就根本否定了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抹煞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导致意识可以脱离物质而存在的错误结论，从而陷入唯心主义。

上述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包括十八、十九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在内，在意识起源问题上都没有辩证发展的观点，都不了解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社会的产物。他们离开生命的起源和进化，特别是离开人的社会性来考察意识，所以就不能科学地解释意识的起源问题，因而也就不能彻底驳倒唯心主义。这个事实同样说明，要正确地解

决意识的起源问题，必须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地球上物质运动形式及其反映能力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作一番历史的考察，特别是要对由无生命物质的反映形式到有生命物质的反映形式，由只具有刺激感应性的低级生物到有感觉能力的高级动物，由一般动物的感觉到人的意识的产生，这样三个决定性的环节作出科学的回答。我们知道，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在总结科学成就的基础上，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在上一章讲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运动观时已经指出，物质的意识运动是在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特别是生物运动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同社会运动一起产生的。现代自然科学告诉我们，地球早在四、五十亿年前已经形成了。在原始的地球上，很长时期内没有生命和生物运动，没有有感觉的物质，有的只是进行着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的非生命无机物。但是，物质世界是统一的，在这时已经包含着某种产生感觉的潜在的可能性。列宁指出："假定一切物质都具有在本质上跟感觉相近的特性，反映的特性，这是合乎逻辑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89页）。这种一切物质都具有的类似感觉的特性，提供了从无感觉的物质中产生有感觉的物质的可能，并提供了从有感觉的物质中产生能思维的物质的可能。只要具备了一定的条件，这种可能就变成了必然。恩格斯指出："物质从自身中发展出了能思维的人脑，这对机械论来说，是纯粹偶然的事件，虽然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处是一步一步地必然地决定了的。但是事实上，进一步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是物质本性，因而这是在具备了条件（这些条件并非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必然是一样的）的任何情况下都必然发生的"（《自然辩证法》第186页）。这种能发展出能思维的人脑的物质的本性，也就是列宁指出的"一切物质都具有"的"反映的特

性”，而意识则是这种“反映特性”发展到最高阶段的特殊表现。反映的特性是一切物质都具有的共性，意识这种反映的特殊形式则是物质的特殊的高级形态——人脑的个性。因此，意识不过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的多样性的一种表现，意识现象的产生和存在，并没有否定而恰恰是进一步说明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列宁关于一切物质都具有反映的特性的观点，已被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神经生理学和信息论、控制论的发展所证实。例如，物体的位置和运动速度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它受到了外部机械力的作用，而且反映了外力作用的方向和大小；石头的风化反映它受到了空气、阳光和水分等等的机械的、物理的以及化学的作用；雷达可以反映出敌机入侵以及入侵敌机的型号……等等。承认这种反映的特性也是和辩证唯物主义完全一致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宇宙万物互相联系、互相作用，构成一个统一整体，事物的互相作用所留下的“痕迹”也就是它们的互相反映。互相作用必然导致互相反映，而一切物质所具有的反映的特性则表现了事物之间的互相作用。

这种反映特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风化是石头对空气、阳光、水等等的作用的反映，而空气、阳光、水等等是不依赖于石头而存在的。没有敌机就不能有雷达屏幕上对敌机的反映，而敌机是不依赖于雷达而存在的。这种反映的特性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反映者所反映的是被反映者本身所具有的属性，但只是近似地反映了被反映者的部分的属性。如石头的风化所反映的是空气、太阳和水本身所具有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作用，但是，只是部分地近似地反映了这些作用。拿对太阳的反映来说，它只反映了太阳能的作用，完全不能反

映产生太阳能的物理过程，即使对太阳能的作用的反映，显然也是极不完全的。以上两点是有生命物质和无生命物质中的任何一种反映都具有的共同特征。

生物有机体的反映特性还具有自己独有的特征。我们知道，生命是蛋白体存在的方式，这种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蛋白体的不断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从无生命的物质到有生命的物质的转变，是地球上物质发展过程的一个质的飞跃。与此同时，物质的反映的特性也有一个质的飞跃。非生物对外界作用的反映，是以自身机械的、物理的或化学的反应来表现的。这个反映的过程，也就是事物自身改变其存在的状态或转化为他事物的过程。生物对外界的反映，则是通过与外界交换质量和能量，达到不断的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即达到维持自身的生存。

生物有机体与它的周围环境处在对立统一之中，这种对立表现为适应和不适应的矛盾斗争。斗争的结果，适者生存，不适应者自然淘汰。生物的特殊反映能力是为它能适应环境而服务的。生物为维持生命必须从周围环境中摄取营养物，使其同化于生物体自身。为了给同化过程提供能量，又必须消耗生物体自身，把其中一部分变成排泄物排出体外，这就是异化过程。生物就是靠同化和异化的矛盾运动，不断地与周围环境交换质量和能量，实现新陈代谢、自我更新的。因此，生物体与它周围环境是统一的，是不可分地紧密联系着的。同时，生物体与周围环境又是矛盾的。因为，环境是复杂的，其中有着许多不同形式的质量和能量，有的是维持生命所必需，有的对生命有害，有的对生命是无意义的。因此，生物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是选择性的关系。生物体为了维持生命必须有区别周围环境中的各种因素的能力，这也就是生物的特殊的反映能力。生物的反映使生物能够趋向营养物而摄取它，用以维持生命；能够

避开有害物不受其危害；不理会没有意义的东西，不为它白白浪费生命。没有这种反映能力，生物就不能解决它和周围环境的矛盾，不能适应环境，也就无法生存。再有，环境是不断地变化的，生物只有反映环境的变化，才能保持它对环境的适应，维持其生存。总之，生物的特殊反映能力产生于生物体适应环境、维持生命的客观物质需要。

生物体只有适应环境才能维持生存，这是不变的，绝对的。但是，生物体和环境的具体关系却是多变的、相对的，有的单纯、有的复杂，即便复杂的程度差不多，侧重的方面也各有不同。这就决定了各种不同的生物体反映外界环境的形式和能力是多样的、各不相同的，是随着生物体和环境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环境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由于适者生存自然淘汰规律的作用，生物物种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经历着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物同周围环境的关系也愈来愈复杂，生物的反映形式和能力也经历着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生物的反映形式，在植物和原生动物那里表现为刺激感应性。刺激感应性是生物的最简单、最原始的反映形式，是为了保存自己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的能力。如植物生长需要阳光、水、肥等条件，植物的枝叶就向阳光充足的方向伸展，它的根系扎向有水多肥的地层。刺激感应性是区分生物和非生物的特性，恩格斯把它归之为“最简单的生命要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2页）。刺激感应性和非生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反应有着根本的区别。如阿米巴（变形虫）受到食物刺激，就会接近食物（藻）把它吸入体内。如果食物太大，经过多次尝试，无法把它吸入体内，阿米巴就会放弃这个食物另寻其他食物，决不会老是守着这个无法到口的食物而活

活饿死。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某种有计划有目的的活动的最初萌芽。恩格斯曾说："凡是有原生质和有生命的蛋白质存在和起反应，即完成某种即使是由外面的一定刺激所引起的最简单运动的地方，这种有计划的行动，就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6页）。

刺激感应性已经包含了感觉的萌芽，感觉是在刺激感应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感觉能从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各方面分别反映外界客观对象的各种属性，同刺激感应性相比，它是一种较高级的反映形式，可以大大提高生物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的能力。原生动物和植物同周围环境的关系比较单纯、稳定，因而它们具有刺激感应性就足够了，无需要有感觉，也没有感觉。对较高级的动物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它们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复杂多变，如果仅仅具有刺激感应性，就无法适应环境，无法维持生存。于是，生物原有的反映形式——刺激感应性同生物适应外界环境的要求发生了矛盾，正是在这种矛盾的推动下，产生了生物的较高级的反映形式——感觉。

生物的感觉能力是很不相同的。动物的进化，它们维持生存的物质生活的客观需要的变化，决定着它们感觉能力的变化和发展。蚯蚓生活在地下，周围环境无声也无光，因此，它没有听觉和视觉。可是，它有分辨明暗的能力，以免在白天跑上地面，白白让鸡和小鸟吃掉。此外，它有比较发达的触觉，可以感知泥土的震动，逃避掘食它的田鼠。田鼠因为长期适应于地下的黑暗生活，视力极度衰退而成为瞎子。翱翔在高空的苍鹰为了觅食，必须有敏锐的视力，可以察觉地上奔跑的老鼠。蛇为了在黑夜捕食，它可以感知由动物体温发出的红外线。蝙蝠有感知超声波的能力，利用超声波导航，在暮色中飞翔，不

但可以敏捷地避开障碍物，而且可以准确地捕食飞虫。总之，动物的感觉能力的发展是服从它维持生命的物质生活的需要的。

一切运动形式都有它自己的物质基础。生物的反映能力也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器官。单细胞生物是通过细胞膜的外层——质膜，来感应外界刺激的。它没有感觉，所以也就没有感觉器官。动物的各种不同的感觉就有相应的不同的感觉器官。没有眼、耳、鼻、舌、身等器官，也就没有视、听、嗅、味、触等感觉。没有眼和耳的蚯蚓，也就没有视觉和听觉，它是靠皮肤来感知明暗和土地的震动的。田鼠的视力衰退和它的眼的退化是分不开的。靠着鹰眼的特殊构造才有鹰眼的敏锐。蛇之所以能感知动物的体温，因为它有特殊的热定位器。蝙蝠则因为有特殊的超声波定位器，才能利用超声波导航，躲避障碍物和捕捉飞虫。总之，一定的感觉能力必须有一定的物质的感觉器官。

动物有各种感觉器官和感觉能力，都是为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环境，给以适当的反应，用以保持自己的生命。动物周围的客观环境是一个统一整体，动物本身也是一个统一整体，动物对客观环境所作出的反应、它的行为，也必须是统一的、互相协调的。为此，动物必须把各种感觉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对客观环境的统一的反映，这就是动物心理。动物心理不仅包括感觉和简单的动机，而且包括知觉、表象和情绪。知觉就是对各种有关感觉的综合。动物的心理活动，不仅需要有已经分化出的各种不同的感觉器官，而且需要有把各种感觉联系起来的神经系统以及指挥这个神经系统的中心——大脑。感觉器官的分化和大脑、神经系统的出现和发展，说明了生物的反映能力的发展是分化和集中的对立统一，说明了动物心理活动已具有初步分析综合的能力。动物心理愈是发展和复杂化，它的活

动能力就愈大；反之，动物的活动愈复杂多样，动物心理对动物行为所起的调节作用也愈大。随着动物的发展，大脑的作用也就愈来愈重要。青蛙的大脑两半球被切除后，看不出它的行动有什么改变，一切正常。切除了鸽子的大脑两半球，鸽子就不能对刺激作出应有的反映，甚至给它喂食也不吃了，不过它还能飞，还能保持平衡。可是切除了大脑两半球的狗，就成了完全的废物。由此可见，动物愈是高级，愈是“聪明”，它的大脑就愈是发达，它的反映活动对大脑的依赖性也就愈大。

综上所述，从一切物质都具有的反映特性的基础上发展起生物的特殊的反映特性，从刺激感应性发展为感觉，这种生物反映能力的发展，决定于生物生活的客观需要，离不开生物反映的物质器官的发展。没有感觉器官和大脑、神经系统的发展，就没有感觉能力的发展。这就雄辩地说明，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感觉第二性的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列宁指出：“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思维、感觉是第二性的东西，因为明显的感觉只和物质的高级形式（有机形式）有联系，而‘在物质大厦本身的基础中’只能假定有一种和感觉相似的能力。”（《列宁选集》第2卷第40页）

到此为止，我们所讲的生物的感觉能力和动物心理，还不是意识。但是，生物感觉能力的发展和神经系统的完善，最后必然导致意识的产生。斯大林说：“第一个生物是没有任何意识的，它仅仅具有感受刺激的性能和感觉的萌芽，以后动物的感觉能力渐渐发展，随着动物有机体的构造和神经系统的发展而慢慢转化为意识”（《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8页）。

由生物运动形式过渡到社会运动形式，出现了人和人类社会，这是物质世界发展的又一次巨大的飞跃。与此相适应，物

质的反映的特性也经历着又一次巨大的飞跃：由动物心理过渡到人的意识。我们知道，生物的反映形式的产生和发展，是和生物体适应环境的生物物质活动的发展分不开的。人固然也是一种动物，但是，人是一种和一般动物有着质的区别的特殊的高级动物。动物为了自己的生存，只能适应环境。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再不是单纯地适应自然，而是开始改造环境，力图使环境适合于人类生存的需要。人就是在这种改造环境，改造世界的活动中，由猿转化而来的。人的意识也是在这种改造环境，改造世界的活动中，由动物的心理发展而来的。这种活动，最基本的就是生产劳动。因此，是劳动创造了人，是劳动创造了人的意识。而人的劳动，是离不开集体和社会的，就是说，劳动一开始就是集体的、社会的劳动。因此，离开了集体和社会，也决不会有人的意识。就是现代文明人的后代，如果一生下就与社会隔绝，他也会变成一个没有意识的野兽。人们从深山野林中找回的由母狼哺育长大的“狼孩”，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意识的人形野兽。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是同社会运动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密不可分的。马克思说：“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一般动物的反映形式同意识的最深刻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产生和发展服从于生物体适应外界环境的生物活动的客观需要；而后者的产生和发展则服从于人的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的客观需要。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它们之间一系列的质的区别：

第一，动物的反映是以具体形象的感觉形式即感性形式出现的，意识则主要是以抽象的概念形式即理性形式出现的。感

性的反映只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不能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本质，把握它的规律，它只能满足生物适应环境的生活的需要，不能满足人类改造世界的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种有计划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自觉活动。如果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人就无法自觉地有计划地改造世界，达到预期的目的，维持自己的生存。以抽象概念的形式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人的意识，正是由于人类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同时，也是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提供了意识产生和发展的实际可能。恩格斯指出："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界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发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0页）这就大大地推动了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动物的感性的反映形式不需要语言，而以抽象概括的形式反映客观对象的意识却离不开语言。列宁指出："任何词（言语）都已经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3页）。例如，"麻雀"这个词就概括了世界上无数麻雀，从中抽取出它们的共同的本质。"鸟"这个词的概括性更强，它不仅概括了一切麻雀，而且概括了一切的鹰、鸽子……等等所有的鸟类。"物质"这个词是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最高概括，从中抽取出它们的共同本性——客观实在性。语言是意识的物质外衣，没有词（言语）人类就不能进行抽象思维，也就没有意识。马克思说："'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

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语言和意识产生于人与人交往的迫切需要，而这种迫切需要却产生于劳动。恩格斯讲：“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达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0—511页）这就是语言。没有语言，人们不可能交流思想，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的集体的劳动。生产劳动需要语言，语言和意识一样，是劳动的产物。

第三，动物的反映和人的意识具有不同的物质器官。一切物质都具有反映的特性，一切反映特性都只是一定物质的一种属性，离开了物质就没有什么独立存在的反映特性。动物的感性反映是动物大脑（包括它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的属性。意识则是人脑的属性，离开了人脑就不可能有意识。在反映器官中，除了人脑以外，最发达的是猿脑，其中特别是黑猩猩的大脑，可是，它毕竟不是人脑，因而不能产生意识。人们曾经把刚诞生的黑猩猩和小孩一起哺育，给予同样的教育和训练。黑猩猩也可以学到很多本领，在初期个别方面甚至比小孩高明，但是黑猩猩终究不能学会说话，也不可能产生意识。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意识只是人脑的属性。人脑受到损伤，就会全部或部分地丧失意识能力。这种能意识的人脑也是劳动的产物。恩格斯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

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2页）人们对二、三百万年来人类发展史的科学研究，已完全证实了恩格斯论述的正确性。

以上我们用历史的方法，对于从无生命的物质向生物有机体的转变，从无感觉的物质向有感觉的物质的转变，以及从猿到人的转变的过程，进行了粗略的考察。这个历史的考察，说明了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社会的产物；说明了意识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人脑的机能，是包括社会在内的客观存在的反映。

二、意识是人脑的机能

关于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人脑是思想的器官的这种看法，在古代早就产生了，现在已为科学所公认。但是从古到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却一直企图推翻这个结论，反驳这条唯物主义的原理。例如，经验批判主义者阿芬那留斯就是一个恶劣典型。他甚至断言，头脑不是思维的器官，感觉不是神经系统的机能。列宁在揭露这种荒谬见解时写道：“既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每分钟所看到的感觉和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之间的联系的一切条件，因此，我们承认只有感觉才是存在着，阿芬那留斯的诡辩就是如此。”（《列宁选集》第2卷第46页）这样的诡辩是毫无根据的。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基本弄清了人脑和神

经系统的物质结构，并且已经深入到细胞和分子的水平。科学的发展也大体弄明白了人脑思维过程的机制，并且可以模拟人脑的思维过程，创造了“人工智能”。这一切都有力地驳斥了一切唯心主义的诡辩，证实了意识是大脑的机能，进一步揭露了大脑的秘密，说明了意识的本质。下面我们分别讲一下：脑的起源、发展和人脑的构造；人脑思维活动的机制；控制论、人工智能及其哲学意义。

大自然并没设计大脑。脑的出现，是生物适应环境、生存斗争的需要而长期进化发展的结果。动物为了迅速正确地反映外界环境给予的刺激，做出相应的反应，维持自己的生存，产生了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动物的感觉器官定位于头部，这是它移动时最先与环境相遇的部分。头部的神经系统最为发展，这便是脑的开端。原始的脑不过是头部神经组织的膨大。随着动物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脑的构造也就愈来愈复杂。在低等脊椎动物中，脑已分化为大脑、中脑和后脑，并且各自有着不同的功能。其中，中脑主要与视觉有关，而大脑则主要与嗅觉和味觉有关。随后，在动物发展过程中，大脑日益成为脑中最大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前面讲过的切除动物大脑的实验已能证明，大脑确实是动物心理活动的主要物质担当者。

大脑顶部复盖的大脑皮质，又逐渐成为大脑中最主要的部分。在爬虫类，管理视觉的中心已从中脑部分地转移到前脑；到鸟类则完成了这种转移。到最原始的哺乳动物，大脑皮质已扩展到整个大脑的表面，成为支配一切感觉和心理活动的总管。大脑皮质最初是平坦光滑的，随着进化到高等哺乳动物，它变得高低曲折，出现了许多皱折，即沟回。沟回的出现，大大地扩张了大脑皮质的面积，使高等哺乳动物的反映能力大大提高和复杂起来。

人和高等动物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是由成万上亿的神经细胞组成的极其精细的神经机构。每个神经细胞就好比电子计算机中的一个电子元件那样的神经元，当然它是一个个活的细胞，与电子元件有着根本的区别。神经元的形态千变万化，功能上也有很大差别。现代科学不仅深入到较详细地研究各种神经元的生理物质结构，而且已经开始深入到研究神经细胞的化学成分和分子结构。神经细胞中，核醣核酸（RNA）特别多，其含量几乎比体内任何其他类型的细胞都要丰富得多。现在初步推测，核醣核酸分子很可能是储存记忆的物质基础，一个人的脑子在一生之中能贮存一千万亿信息单位。RNA 的结构是很复杂的生物大分子，它可以组成不下于一千万亿种有特色的型式，用以储存种种不同信息是足足有余的。现在已发现，被迫学习的大鼠同在通常方式下生活的大鼠相比，其脑细胞中RNA的含量要高12％。

对神经元的研究使我们了解到，人脑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由 100 多亿神经元组成的十分复杂的神经元网络。这个神经网络具有非常复杂的“等级式”的结构。最简单的分析、综合和调节行为的职能，是由中枢神经系统的低级部分——脊髓、延髓、中脑和间脑执行的，而最复杂的职能则由大脑皮层来执行，由外界因素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引起的各种刺激，沿着神经纤维传达到大脑皮层专司不同职能的各个区域，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复杂的意识过程。整个大脑就是进行复杂的意识活动的中枢。

人脑和高等动物的大脑不同，它能进行比动物心理活动更高级的意识的活动，其原因就在于人脑比动物脑的重量更大，构造更为复杂。黑猩猩和猩猩的脑重不到400克，大猩猩体重远远超过了人，而平均脑重又大大低于人，只有 540 克左右。猿

人的脑重在 850—1000 克之间，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脑重大致相等，约重1500克。现代人的智力所以能超过尼安德特人，是因为现代人大脑发达，前额突出，而尼安德特人的脑凸向后方，前额低平。就脑和体重的比例来看，人脑约为体重的1/50，黑猩猩则为1/150，大猩猩则只有1/500，小猴子的脑和体重的比例远远超过了人，约为1/18，但是它的脑子绝对重量太小，脑的构造不可能包含必要的复杂性。象脑和鲸鱼脑的重量分别可以达到 6000 克和 9000 克，可是象的脑重只有体重的千分之一，大鲸的脑则是体重的万分之一，因此，所有的动物的脑的智力都远远不能和人脑相比。

总之，现代科学已从各个方面深入研究了人脑的内部物质结构以及它的特点，进一步证实了人脑是思想的器官，离开了人脑就没有意识。

那末，这样一个复杂的人脑，为什么能够进行思维，究竟又是怎样进行思维的？不彻底弄明白这个问题，还不可能彻底驳倒宗教唯心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人脑所以能思维是由于上帝赋予人脑以灵魂。心理活动和思维过程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历来被看作是一个只能作些主观推测、难以进行客观研究的无法解答的问题。但是，现代科学已经突破了这个难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开始了对动物心理的系统的客观研究。其中，特别是巴甫洛夫提出的条件反射的理论，对于解开思维活动之谜，具有重要的意义。

巴甫洛夫的研究说明，动物和周围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动物的各个部分和它的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通过反射进行的。这种反射是由于客观事物刺激感觉器官而引起，并且在大脑皮层两半球和中枢神经的参预下进行的。反射分为

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两大类。无条件反射是动物对外界环境作用的一种生而具有的反射，是由遗传而获得的，它不需要后天的学习。例如，狗见了食物就会分泌唾液，初生的婴儿会紧紧握住触及他手掌的指头，吸吮碰到他嘴唇的乳头，这都是无条件反射，是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可以使婴儿免于摔落和饥饿。本能可以是很复杂的，如蜘蛛不须学习就会织出完美的网，蜜蜂天生就会酿蜜和建造蜂巢。这种本能（即无条件反射）是在动物世世代代适应环境的过程中长期形成，并在遗传中固定下来的。本能的活动是一种无意识的活动。蜜蜂只会筑造蜂巢，破了它不会修理，它也不管破了的蜂巢会白白地漏掉蜂蜜，而照常把蜜往里面贮藏。条件反射是动物在其生命过程中，在无条件反射的基础上，由于自身的经验而建立起来的，或者说，是由于后天的“学习”而获得的。食物刺激，引起狗脑一定区域的兴奋，立即会产生分泌唾液的反射，这产生于消化食物维持生存的需要。食物刺激对狗的生命有着直接的意义，这种分泌唾液的食物反射是一种本能，是无条件反射。响铃会在狗脑一定区域引起兴奋，但对狗的生命并无直接意义，它不会引起狗分泌唾液的反射。但是，只要我们在每次响铃之后，紧跟着喂狗，这样，响铃对这只受训练的狗来讲，就成为获得食物的信号，成了对它生命有意义的东西。由于食物和信号的联系多次重复，在狗脑中响铃和食物引起兴奋的两个区域之间就会沟通，建立起暂时的联系。这时，一响铃狗就会引起分泌唾液的反射，这就是条件反射。只要这种训练继续进行下去，大脑中形成的这种暂时性联系就会加强，条件反射就会巩固。反之，如果在响铃以后不再喂食，这样重复多次，大脑中的这种联系就会削弱，最后使得这种条件反射归于消失。由此可见，无条件反射是由遗传获得的，是稳定的、不变的；而条

件反射是由后天学习（或受训练）而获得的，是可以变动和改换的。另外，无条件反射是中枢神经低级部分的活动，条件反射则是中枢神经的高级部分——动物大脑皮质两半球——的一种活动。无条件反射可以说是一种生理过程，条件反射则已经不是纯粹的生理过程，它同时也是一种心理现象。

大脑的条件反射活动，在动物发展过程中逐步地复杂化和完善化，反过来，它又为加速动物界的进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为动物的条件反射使得动物不仅能反映对生物生命有直接联系的那些事物和现象，而且可以反映那些与生物生命有间接联系的事物和现象，即反映那些与生物生命建立了暂时性联系的事物和现象。这样，就大大加强了动物的反映能力，从而产生了动物心理，加强了动物的活动能力，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条件多变的复杂环境。巴甫洛夫把这种接受现实刺激物的刺激而引起的条件反射，叫做第一信号系统。这个信号系统是动物的唯一的信号系统。

同动物的生物活动进化到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相适应，动物心理发展到人的意识。这时，第一信号系统就显得很不够用了。因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把原来对人的生命没有直接联系也没有间接联系的东西，即对人的生命几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改造成对生命有意义的东西。这样，人的意识所需要反映的东西就远远超过了其他动物。也就在这时出现了第二信号系统。第二信号也就是信号的信号——语言。我们已知道，言语已经是在概括。语言作为引起条件反射的信号，正是许多同类刺激物的概括和标志，它使人的条件反射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为一般动物所不能比拟的高度。在第一信号系统基础上产生的反映，是具体的形象的感性反映；而在第二信号系统基础上产生的反映，则是抽象概括的理性反映。第一信号系统是动物和人共

有的。在儿童生活的最初几年里，第一信号系统是主要的，对成年人来讲，第一信号系统也是必要的，但是起主要作用的却是第二信号系统。人脑在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的基础上进行的思维活动，就是意识。因此，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的学说，不仅说明了意识是大脑的机能，而且说明大脑产生意识的过程就是条件反射的过程。

现代科学不仅了解到大脑思维过程是通过一个复杂的反射过程来反映客观世界的，而且了解到神经细胞的活动过程：它通过传递生物电的活动在整个大脑和神经系统活动中发生作用。用现代电子学仪器已经能够对神经细胞的电特性进行精密的研究，测量出一个神经冲动的强度、持续性和传播速度等等。神经细胞并不是对任何电脉冲都发生反应，产生冲动，它只对具有一定强度（这个界限叫“阈”）的电脉冲发生反应。反应的表现就是，神经细胞突然放电，产生一个冲动，并沿着神经纤维传送出去。神经细胞冲动的大小是固定的，它不会因电脉冲的增大而增大。这就是说，每一个神经细胞在没有接受到电脉冲或接受到在阈以下的电脉冲时没有反应；而在受到超过阈的电脉冲时，则不管电脉冲的大小，它都发生固定大小的反应，即固定大小的神经冲动。神经细胞冲动的产生和传递是按“有”或“无”、即“是”和“否”的规律进行的。电子计算机中的电子元件，就是一种对神经细胞的模拟，它是按“有”或“无”的规律来传递信息的，这样就组成了电子计算机的“1—0”系统，和它的二进位制。

每个神经细胞的反应（“有”或“无”）是如此简单，那末，怎么会产生复杂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复杂的感觉，并产生极为复杂的思维呢？原来神经系统是由无数的各种神经细胞通过神经纤维联结起来的错综复杂的体系。其

中，有的神经细胞放电，有的则不放电，而且放电有快有慢，这就造成各种不同的复杂的波型。这种复杂波型可以随着刺激总体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产生出复杂的反映客观世界的功能。现代科学对脑电波的波型以及它的功能的研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我们现在还知道，神经细胞的放电有赖于离子通过细胞膜的运动，由于细胞膜内外离子浓度的变化，造成电位差引起放电。

以上所讲的种种科学事实，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大脑的思维过程是同生物的生理过程以及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分不开的，精神活动是同物质活动分不开的。我们知道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包括低级运动形式，只有对包括在高级运动形式内的各种低级运动形式的特殊表现，有了比较清楚的理解，才可能进一步清楚地理解高级运动形式。我们对思维过程中生理（即生物）过程、物理化学过程的理解，无疑对我们理解思维过程的本质，对批驳种种唯心主义的谬论，是有极大帮助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高级运动形式不能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以上种种科学知识还不足以使我们完全理解大脑以及思维运动的本质。恩格斯说过："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的和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这样一来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自然辩证法》第226页）恩格斯的意思是明白的，就是不能"包括无遗"。因为，人脑和思维是社会运动的产物，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意识一点也不能离开社会的实践。谁要是否认这一点，就会犯机械论的错误。

控制论（包括信息论）这个崭新的科学部门的出现和发展，接着是电子计算机的迅速发展，为对思维活动进行客观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现在已经能够用电子计算机计算复杂的数学问题；识别图象、声音、气味；证明几何定理或逻辑定

理；整理资料和翻译文章；进行经济管理，最合理、最有效地安排利用物力、财力和人力；甚至能用计算机来和人下棋，而且能下赢高明的棋手，等等。这些事实表明，计算机可以代替人的某种思维活动，同时也表明，人的思维活动不管多么复杂，归根到底奠基于客观的物质过程。神学唯心主义认为："上帝把不朽的灵魂给予每一个男人和女人，但不给任何别的动物和机器。因此，没有一个动物和机器能够思维。"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数学家维纳用事实驳斥了这种观点。但是，维纳同时提出了一种错误观点，他认为，人可以造出比人更聪明的机器。在西方甚至出现了机器"超过人"、"统治人"的奇谈怪论。应当看到，控制论和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对于揭示反映的本性和意识的本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在同时也造成了对这些科学成果加以歪曲做出错误哲学结论的可能。认真研究控制论的认识问题，从中作出正确的哲学结论，是我们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

控制论是关于一切控制系统的共有特点和规律的科学，它是将动物和机器的某些控制机制加以类比，从而抓住一切通讯和控制系统所共有的特点进行概括而形成的理论。控制系统包括动物、自动控制的技术装置和电子计算机等等。控制论认为，一切控制系统所共有的基本特点是信息变换过程和反馈原理。信息变换过程，包括信息的接收、存取（相当于记忆）和加工的过程。反馈原理，就是控制系统把信息输送出去，又把其作用的结果返送回来，并对信息的再输出发生影响，起到控制的作用。关于反馈原理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加以说明：动物的胃空了就会输出"饿"或"要吃东西"的信息，其作用的结果就是开始吃东西。当它渐渐把胃填满，再输出"饱了"、或"不能再吃东西了"的信号，其结果就是停止进食。这样就对

动物吃东西的行为起到了控制作用，使得动物不至于无休止地吃东西而把胃撑破。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关于信息的概念。在控制论中，信息概念是一个最基本的、又十分广泛的概念。例如，计算机程序是技术信息，遗传密码是生物信息，引起动物条件反射的第一信号系统的信号是信息，第二信号系统的信号语言同样也是信息——社会信息。信息论是研究信息传递和变换规律的科学，它是控制论的基础。控制论和信息论促进了电子计算机的发展，用机械的和电子的装置模拟人脑的功能，制造出了能代替人的某种思维活动的人工智能。这种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可以代替人的大量脑力劳动，对促进生产和科学研究的发展起着日益增长的巨大作用。

苏联在五十年代，全盘否定控制论的科学成就，指责它是"伪科学"、"现代机械论"。到了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在苏联又有一部分人，痛感由于蔑视控制论而造成的电子计算技术的落后，而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他们用控制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把反映论归结为信息论。

自从控制论产生以来，围绕着它而进行的哲学斗争，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信息究竟是什么，信息和意识是什么关系；另一个是机器能不能思维，意识和人工智能是什么关系。

什么是信息？对于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了各种看法。有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把信息说成是"非物质的精神实体的特性"。有的哲学家乘机想把信息概念纳入最重要的哲学基本范畴体系中，他们胡说：除了物质和意识的概念，出现了第三个更为广泛的概念——信息，信息概念的天职是消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它给唯物主义哲学带来了痛苦，证明辩证唯物主义是站不住脚的等等。由此可见，信息的本质问题，不仅是一个

自然科学问题，而且是一个哲学问题，它的正确解决对捍卫辩证唯物主义有着重大的意义。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讲："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任何唯物论，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在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他是指，把信息看做物质和能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站不住脚，至于信息究竟是什么，他并没有回答。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信息虽然不是物质实体也不是能，但绝对不能由此得出信息既与物质无关又与能量无关的错误结论。信息必须借物质的载体才能传递，而信息的传递又必须要有能量，否则是不可能的。例如，我们从广播中收得的信息，是由无线电波传递的，而无线电波就是一种物质的运动，离开了物质的运动就没有信息。某些人竭力歪曲信息的本质，企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肯定是徒劳的。把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归结为信息论，混同意识和信息两个概念的做法，也是完全错误的。列宁讲过，一切物质都有反映的特性。信息是一种反映，它是物质的一种属性，但不是所有的反映都是信息。我们知道电台发出的传递消息的电波是一种信息，但是对这种电波的干扰就不是信息。信息能使物质系统的有序性增强，减少破坏、混乱和燥音，因而与系统的组织和结构有关。同样，意识是一种信息，但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意识。动物心理活动的信息就不是意识，只有语言这种社会信息才能构成意识。因此，意识只是一种最高的信息过程，是反映的最高形式，混同意识和信息，把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归结为信息论，是一种机械论的错误。

那么，机器究竟能不能思维，可不可以造出一个功能与人脑完全一样，甚至超过人脑的人造"脑"、电脑、"人工智能"？正确的回答应当是：机器不能思维。机器虽然可以模拟人的某些思维活动，代替人的某些脑力劳动，但是，这与人的思

维是不同的。所谓人工智能，既有可能，又有局限；就是说，人工智能不能完全代替人脑的智能，更不能超过人脑的智能。但是，这并不是说人工智能不可能在某个方面超过甚至大大超过人脑的功能，例如，计算机数字计算的速度和精确度就都大大超过了人脑。可是，就整体来说，它不能完全代替人脑，更不能超过人脑。我们不同意那种认为机器根本不可能模拟人的思维活动的唯心主义观点；也不同意机器能够思维，可以制造与成人智力相等的机器的机械论观点；更不同意那种认为机器可以比人更聪明，机器将统治人类的说法，这是一种对人类前途失去信心的没落资产阶级的观点。我们的理由是：

第一，机器没有自己的思维，只能表现人的思维。电子计算机的一切活动都是人预先安排好的，机器不能输出任何未经输入的东西，它所得出的"结论"只不过是输入程序和输入数据的逻辑结果。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过，机器无论做什么，它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它永远不能提出哪怕是一个问题。爱因斯坦的话，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人的思维是有目的的、创造性的活动，这是机器所不能有的。电子计算机只能帮助人们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决不会自己再进一步提出新的问题。所以电子计算机（电脑）只能是人脑的延伸，人脑的帮手，但它本身还不是脑。

第二，电子计算机、电脑的活动（姑且叫做"思维"）过程和人的思维过程，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机械式的，而后者是有目的的认识过程。例如，电子计算的贮存系统是对记忆的模拟，人类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机器的记忆快、保存时间长而且准确，它对信息的容量亦大。但是，机器的"记忆"和人的记忆有着本质的不同。机器要从它贮存的全部信息中逐个挑选所需要的信息，而人脑就无须这样做，便可以找到

所需的信息，因为它有一个按意义去进行的系统。又如，把一项工程设计交给了电子计算机，它必须做出各种可能的设计（哪怕是最坏的设计也不放过），然后从中挑选最好的设计。可见，机器的“思维”是机械式的、死板的“笨”办法，任何一个工程师也决不会这样干。只因为它的计算速度极快，才弥补了它的“笨”的缺点，而显示出周密准确的优点。下棋机之所以能下赢高明的棋手的秘密，也就在于此。

第三，人造智能可以在某些方面具有比人脑更“高明”的功能，正象机器可以比手在某些方面更高明一些一样，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奥地利计算科学家泽曼奈克讲得好：“计算机不是大脑。车轮不是腿，挖土机不是手，扩音机不是嘴——为什么计算机就应该是一个大脑呢？技术解决办法总比自然原型要强些，但一般性要差一些；它们放大了一个特殊的机能。”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机器代替了人的大量的手工劳动，但是，不能完全代替和排除手工劳动。同样，历史也将证明，电子计算机可以代替人的大量脑力劳动，但决不会也不可能完全代替和排除人的脑力劳动。

第四，机器所以不能思维，还因为人脑以及它的机能——思维——是生物长期进化、特别是社会运动的产物。意识以及意识的器官人脑是社会的产物，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我们知道，即使象初生的婴儿具有那样的极端复杂完美的大脑，尽管存在着发展为思维器官的内在根据，但它毕竟还不是能够思维的人脑。婴儿的大脑只有在社会生活的影响和熏陶下，才能够进一步地成熟和完善起来，成为一个能思维的人脑。脱离了社会生活这个决定性条件的“狼孩”，他的大脑就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就没有意识的机能。在狼孩回到社会，重新过人的生活以后，由于错过了大脑完善发展的发育时

机，也只能成为一个白痴或低能儿。至于人们制造的“电脑”，既没有变成为人脑的根据，也没有过人的社会生活的条件，所以它终究不能成为人脑。

当然，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低估电子计算机的巨大作用。机器的出现曾经引起了一次工业大革命，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将引起又一次新的工业大革命。我们现在正面临这次新的工业大革命的历史关头，为了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光荣任务，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必须大力发展电子计算技术。

控制论是一门崭新的科学，它给我们提出了许多不熟悉的新问题。我们不能回避这些问题，不能听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任意歪曲这些科学成果，做出种种错误的结论。为了捍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必须认真探讨这些问题。在探讨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们坚信，这一科学成果必将进一步证实意识和意识的器官人脑是社会的产物，意识是人脑的机能，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三、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人脑是思维的器官，但还不是思维的源泉。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但是光有人脑还不能产生意识。人们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同外在的客观世界打交道，使人脑和其他反映器官同客观世界发生联系，才会产生意识。意识从其生理基础来看，它是人脑的机能；从其对象和内容来看，它又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把握意识的本质。

从意识的起源和生理基础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意识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就是说，它的形式是主观的，而它的内容则是客观的。这里需要进

一步阐明，作为客观世界主观映象的意识，究竟采取了那些形式来反映客观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意识是各种反映形式共同组成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包括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形式和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形式。

感觉是意识反映客观存在的开始。感觉这一反映形式体现了主观世界和客观外界的直接联系，是主体对客观对象的直接反映。列宁指出："任何一个没有被教授哲学弄糊涂的自然科学家以及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都认为，感觉的确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是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这种转化每一个人都看到千百万次，而且的确到处都可以看到。"（《列宁选集》第2卷第46页）感觉是大脑通过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与客观世界的直接联系。只要割断了这一切联系，大脑就无法反映客观存在，也就不会产生意识。事实非常清楚，一个人如果眼瞎、耳聋、鼻子堵塞、舌头和皮肤麻木，那末这个人就不会有感觉，也不可能有意识。

感觉是对事物的个别特性的反映。如视觉只能反映事物的颜色、形状等等，它不能反映事物发出的声音和气味。不同的感觉反映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的质和特性。列宁指出：意识的"最先的、最初的东西就是感觉，而在感觉中不可避免也会有质……"（《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6页）。在感觉中提供的事物的质包括有：红的、黑的；方的、圆的；甜的、苦的；香的、臭的；冷的、热的；等等。

感觉反映的是客观对象自身的特性，它的内容是客观的。可是，感觉的形式却是主观的，即对同一事物的同一特性的反映，由于感觉器官本身的结构和反映能力的不同，在形式上也会不尽相同。在正常人眼中能明确区分开的两种不同颜色，在

色盲病人的眼里就会混同为一种颜色。列宁说："感觉是客观世界、即世界自身的主观映象。"（《列宁选集》第2卷第117页）这个主观映象所反映的是客观世界，是世界自身，这也就是说反映的内容是客观的。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我们通常把反映譬喻为摄影，谁都知道照片的内容是客观的，可是照片的形式却受着照像机和胶卷的性能的影响而不尽相同。照像机的镜头有好坏之分，胶卷有黑白和彩色之别，因而对同一事物的照片，由于照相机和胶卷的不同，在形式上也有清晰和模糊之分、黑白和彩色之别。但是，谁也不怀疑照片的内容是客观的，是不依赖于照相机和胶卷的客观实在的形象，这些不同形式的照片都反映了同一的客观对象。

辩证唯物主义的感觉论是同主观唯心主义感觉论根本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片面地强调感觉形式的主观性，而否认感觉内容的客观性，从而断言，人的感觉是主观自生的东西，不是客观世界反映在感觉中，倒是人的感觉产生了客观世界。按照这种说法，无论外界的山川河流、花草林木、虫鱼鸟兽，还是产生意识的器官——大脑，都成了感觉的产物。这种荒谬的观点是同科学常识完全背道而驰的。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感觉的理论和机械唯物主义也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在前面曾以摄影的比喻来说明视觉，这是允许的，因为，其中的确存在类似之点。但是，我们要是忽略了摄影和感觉的根本区别，那就会陷入机械论的错误。要知道，前者是物理的和化学的运动，而后者是生命的运动。同样，我们也不能把动物的感觉和人的感觉混为一谈，因为，动物的感觉仅仅是生物发展的产物，而人的感觉就不只是生物发展的产物，更重要的则是社会的产物。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同时也改造了自己，改造了自己的感官，使自己的感官不断地完善化。

和动物不同，人们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来感知外部世界的各种事物和现象的，这就使得人的感觉无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比动物优越得多。恩格斯说：“鹰比人看得远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却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更敏锐得多的嗅觉，但是它不能辨别在人看来是各种东西的特定标志的气味的百分之一。至于触觉（猿类刚刚有一点儿最粗糙的萌芽），只是由于劳动才随着人手本身的形成而形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2页）

人的感觉尽管优越于动物的感觉，但它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客观事物是各方面的特性、属性和质的统一整体，而感觉只能反映它某一侧面、某一局部，不能反映它的整体。能够反映事物整体的是知觉。知觉是在大脑中把有关某事物的各种感觉集中在一起，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反映该事物各方面特性的统一完整的具体感性形象。简言之，知觉就是感觉的复合。例如，青里透红的美丽的色泽，淡淡的清香，甜甜的味道等，分别是有关苹果的感觉。把这些色、香、味等各方面的感觉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关于苹果的知觉。在人的知觉中，不仅包含着对事物的各种特性的了解，而且包含着对事物各特性之间的关系的了解，这样就大大扩大了人们的眼界。例如，时间空间这种物质运动存在的形式，只能在事物各方面的关系中才能显示出来。因此，人们的感觉不能感知时间和空间，而人们的知觉，在对各种不同感觉的综合中，却能反映时间和空间。知觉和感觉虽然有以上的区别，但知觉却和感觉一样，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的形象的直接反映，都属于感性的反映形式。而且知觉和感觉一样，都是意识和客观事物的直接联系，是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所不同的仅仅在于：感觉是一种外部刺激力所引起的转化，知觉则是有关同一事物或现象的各方面的

多种外部刺激力同时引起的转化。

感觉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同样，在感觉基础上产生的知觉也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由于知觉是大脑在各种感觉基础上综合而成的有关事物的整体形象，因此，在知觉形成的过程中，主观的作用就更为明显，更为强烈。主体对所感知的事物的各种特性综合加工，使它们互相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知觉。这就可以较全面、较完整、因而也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然而事情总是矛盾的。知觉形式固然有使我们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客体的一面，但它也有可能产生错误即错觉的一面。人的知觉，都受着他的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影响。知识不足和缺乏实践经验，常会使人产生错觉，而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会使错觉不断地得到纠正。

感性反映形式除了感觉和知觉而外，还有表象。表象是感性反映的最高形式。表象是大脑对过去的感觉和知觉的回忆。感觉和知觉是人们在与某些客观对象直接接触中，由外部刺激力所引起的。当人们不再和这些对象直接接触时，那些外部刺激力已经消失，但它们在大脑中所引起的反映并未立即消失，而是留下了痕迹，这就是记忆。表象就是对记忆中保存的感觉知觉的回忆，是此时此刻并不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的客观对象的形象化的知识。因此，它也是感性的反映。

表象也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表象是在过去的感觉、知觉的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的形象化的反映。大脑在形成表象时的主观作用，不仅表现在能够记忆和回忆，而且表现在进行回忆时，常常只是把握过去感知的对象对于主体比较有意义、比较重要的特征，而省略掉其他一些不重要的特征。大脑的主观作用还表现在表象常常不是单纯的回忆，而是包含了大脑想象力的创造——在过去的感觉知觉材料基础上创造出世界上从未有

过的对象的感性形象，如飞马、人鱼、三头六臂、牛头马面等等。这些感性形象既是大脑的主观创造，又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这就是一个矛盾。为什么说即使是这样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归根到底也是对客观的反映呢？鲁迅讲得好："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这算什么本领，这算什么创造?"(《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任何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荒唐的表象，都不可能是绝对自由的意志的创造，而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只不过是一种歪曲的反映罢了。这种主观的歪曲和夸张，往往比错觉离客观实际更远。

从感觉、知觉到表象的发展过程中，大脑的主观作用存在着不断增强的趋势。这一方面意味着我们对客观世界产生错误反映的可能性日益增大，但这只是事情的消极的、次要的方面；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人的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能力的加强，这才是事情的积极的、主要的方面。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片面地强调反映过程中次要的、消极的一面，利用存在错觉和荒唐表象的事实，来论证他们的荒谬理论。这种观点根本违背科学，经不起实践的驳斥，而在方法上则是一种抓住一点、尽量夸大、不见其余的形而上学。既然从感觉、知觉到表现的发展，是服从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的，那么它主要的、积极的方面必然是人们反映客观世界的能力的加强，而且它次要的、消极的方面会不断地得到克服和纠正。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抹杀这一重要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

表象这一感性反映的最高形式的产生，对于人们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有着重大的作用。它使人脑的反映冲破了当前直接

接触的客观对象的局限，可以保留对以往接触的客观对象的反映。这样，人脑中就有了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的可能。这种量的增长提供了产生质的飞跃的可能，而且使这种可能变为必然。表象是使反映从感性形式过渡到概念的抽象思维形式的重要阶梯。人脑只有在积累了大量感性材料以后，才有可能对这些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制作，产生抽象的理性思维。抽象思维使人们不仅可以认识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且可以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只有认识了事物的本质，把握了事物的规律，才能够进行人所特有的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从感性反映形式到理性反映形式的过渡，是一个质的飞跃。

意识的理性形式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其中概念是理性思维的最基本的“细胞”，判断是由概念组成的，推理则是由判断组成的。我们在这里以概念为代表来分析理性的反映形式。

概念是在有关同类事物的很多表象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把这些表象加以对照比较，从中抽取出这些同类事物的一些共同的特征、本质加以概括而产生的。例如“水果”这个概念，就是对苹果、梨、香蕉、桔子……等等各种各样水果的共性的抽象概括，舍去了、撇开了这些不同水果之间的区别点，它们的个性。“水果”概念所反映的是水果的一般。这种一般的水果在客观世界是没有的，谁也找不到既不是苹果，又不是梨子或其他各种水果的一般水果。谁也说不出这一般水果的色香味和大小轻重。因此“水果”概念已经失去了具体的感性形象性，它不是感性形式的反映，而是抽象的理性形式的反映。概念已经不是对客观对象的直接反映，而是通过感觉、知觉特别是表象这些中间环节而形成的间接反映。

不管概念多么抽象，距客观现实多么远，它毕竟是对客观

实在的反映。例如，人们在现实中所碰到都是有限的东西，对数学中“无限”概念，总是感到神秘莫测，往往误以为它纯粹是数学家抽象思维的产物，由此得出否认概念客观性的唯心主义结论。恩格斯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一切概念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即便是“无限大”、“无限小”这样抽象的概念也毫不例外地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原型。恩格斯说：在数学中应用“无限大”、“无限小”这样的概念，“只要数学所计算的是现实的量，它就也要直截了当地应用这个观点。对地球上的力学说来，地球的质量已经被看作无限大；在天文学中，地球上的物体及与之相当的陨石就被看作无限小；同样，对天文学来说，只要它超出最邻近的恒星的范围来研究我们这一恒星系的构造，太阳系诸行星的距离和质量就会趋于零。但是，只要数学家一退入他们的不可克服的抽象堡垒，即所谓纯数学，这一切相似就都被忘却，无限就变成完全神秘的东西，……数学的无限是从现实中借来的，尽管是不自觉地借来的，所以它不能从它自身、从数学的抽象来说明，而只能从现实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9页）

无限这样抽象的概念毕竟是科学的概念，肯定它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还可以理解。那末宗教的谬论呢？宗教纯粹是在荒唐的概念的基础上，由荒唐的判断和荒唐的推理构成的荒唐的思想体系，它是否也算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对这一点我们也不能犹豫动摇。必须肯定一切思想都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不过有的正确，有的部分正确、部分错误，有的完全错误罢了。即使是完全错误的宗教思想同样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

映，……但是除了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355页）

抽象的概念的思维，需要有物质的具体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前面已经讲过的语言。语言是思想的物质的外衣，是现实的意识。概念用一定音节的词来表示，概念所构成的判断则用句子来表示，由几个判断构成的推理可以用一系列句子来表示。抽象思维和语言思维是一回事，因为任何词都已经在概括。词是概括的形式，概念则是概括的思想内容。这种概括，可以从个别中抽象概括出特殊，再进一步由特殊中抽象概括出一般。这样，用概念（或词）来思维，就给人们在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开辟了无限的可能。因此，恩格斯说："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了无限，从暂时中找到了永久，并且使之确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4页）

反映客观的概念的理性的形式，同具体的感性形式比起来，无论在量（范围）上还是在质（深度）上，都有着根本的区别。这种运用概念的抽象思维是人类所独有的，其他一切动物，包括最高级的猿在内，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思维。在人的训练下，猿可以学会用某一个特定的桶里的水去灭火，但是它无法了解其他的桶里的水或盆里、缸里的水也可以灭火。如果把那个桶放在远离猿的地方，而在它的附近摆满了各种盛足了水的容器，

一旦火起，猿也只会从远处把那桶水拎来灭火，决不会利用附近的水。要是那个特定的桶内恰好没有水，猿也就无计可施了。可见，猿没有关于整个水的概念，而只有那个特定的桶内的水的具体形象。只有人才能形成关于水的一般概念，掌握水能灭火的规律，因而能够征服火、利用火来为自己服务。我们在动物身上已经可以看到反映的能动性，自从有了抽象的理性的形式，这种反映的能动性在人身上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由此可见，在意识这一由各种反映形式组成的完整体系中，最能标志出意识的特点的是理性反映形式，是运用概念的抽象思维，正是它才把人的意识同动物的心理明确地区分开来。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略了意识中感性反映形式的重要性。意识是通过感性反映形式与客观对象直接联系的，感性反映形式是理性反映形式与客观对象联系的中间环节，是产生反映形式的基础，如果没有感性反映形式提供的材料就不可能有理性反映形式，不可能产生概念和抽象思维。要是片面地强调理性的反映，强调概念，而忽视或抹杀感性材料的作用，就会否认概念、抽象思维和客观对象之间的联系，因而陷入唯心主义的错误。理性的形式是在感性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反过来，理性的形式又改造了感性的形式，使人对客体的感性的反映同动物心理的感性反映有了根本的区别。谁要是抹杀这个根本区别就会陷入机械论的错误。前面讲到人的感性比动物的感性能够反映客观对象的更多的特性，而且反映得更细致精确，这就体现了理性对于感性的反作用。这一感性和理性的唯物辩证关系，我们将在《认识和实践》一章中加以详细地探讨。

总之，从人们对客观外界的各种反映形式的分析中，我们就会具体地、深刻地理解到，人的意识的的确确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不管它的形式多么主观，归

根到底，它的内容毕竟是客观的。

四、意识对客观存在的反作用

从意识的起源和本质的分析中已经使我们认识到，意识是适应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这情况決定了，由客观物质所产生的主观意识，从一开始就具有能动的作用。

意识的能动性，不仅表现在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过程中，而且特别表现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上。列宁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9页）因此，那种低估甚至抹煞意识的反作用和主观能动作用的机械论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观点的错误，不仅在于它违背了科学的事实，而且也妨碍我们正确地理解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知道，动物心理活动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就在于它符合生物适应环境、维持生存的物质生命过程的客观需要；同样，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于它符合人的社会物质实践活动的客观需要。如果说，动物心理对动物进化发展的进程没有作用，它就不会产生和发展；同样地，如果意识对社会物质实践活动、对社会的发展没有作用，那末它也就不会产生，更谈不上发展。不弄懂这些道理，怎么能说明白意识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说明白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呢？当然不能。再有如果仅仅承认意识是对客观对象的反映，不进一步理解意识的反映是能动的，就会把意识看作象镜子一样死板地、简单地、消极地反映外界事物，这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意识。要知道，连动物的心理也不是这样的反映，它只是突出地反映那些

对动物生命过程有意义（直接的或间接的）的客观对象的那部分属性。意识和动物心理有着根本的区别，那末它的能动性也就更加明显了。意识不停留在反映具体客观对象的感性形象，而是进一步对这些感性材料加以抽象、概括而反映了它们的本质和规律。这就是说，意识的反映不仅比动物心理具有更大的能动性，而且具有为动物心理所没有的特殊的能动性——主观能动性。须知，物质和意识是相互对立、相互作用的矛盾双方，如果只讲物质对意识的作用，不讲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也就无法讲清物质对意识的作用。这又一次说明，离开了辩证法，就不可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

毛泽东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这里所讲的"人类特殊的能动性"就是主观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这种主观能动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主观本身是能动的反映，不是死板地、机械地、简单地反映客观事实，而是根根客观事物，引出思想，提出计划；二，主观可以指导实践活动，并通过实践活动来改造世界，使世界改变得符合主观的要求，这也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就是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

毛泽东还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的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

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6页）这里所说的在客观物质条件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是普遍适用的。

要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就不能脱离客观物质条件。我们切切不可忘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承认世界是永恒地按自身固有规律运动发展的统一的物质世界，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人类意识的能动性是巨大的；它使我们可以创造世界，统治自然界。但是，恩格斯指出：“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

人的思想可以指导人的实践活动，确定实践所要达到的目的，换言之，人的实践活动总是要受一定思想所指导，是为了达到一定的预期的目的的，这是人的实践活动和动物活动的一个根本区别。蜜蜂建筑蜂房的活动和建筑师建筑住宅的工作相似，但是建筑师不同于、优越于蜜蜂的地方就在于，他在动工以前，先要制定一个观念形式的住宅设计图。马克思说过：“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这个事实是否违反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理呢？根本没有。因为在建筑这个住宅以前，人们已经建筑了无数的住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个观念形式的住宅设计图，只有参考了已经存在的客观的物质形式的住宅，并在过去建筑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才能产

生。这里恰恰证明了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它既经产生，就对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起着巨大的作用。

人的实践是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活动，也就是说，人在行动之前，首先产生某种动机，企图达到一定目的，并为达到这个预期目的而制定相应的计划。那末，动机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表面看来这似乎纯粹是主观的，其实并不如此。原始人只有建造茅舍的愿望，决不会产生建筑钢筋水泥大厦的动机。在中世纪，人们只能有骑骏马、乘华丽的多驾马车的想法，决不会产生坐汽车的念头。为什么？因为这是由当时客观物质条件所决定的。人们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和计划，都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不是纯粹由主观灵机一动而产生的。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动机，这是由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特别是由于社会阶级地位的不同所决定的。

动机没有摆脱物质条件制约的自由，效果则被客观物质条件限制得更紧。人的活动总有预期的目的，但是，人们往往不能或不能完全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有的能够十分接近地达到；有的只能部分地达到；有的不能够达到；还有的事与愿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得到了与预期目的完全相反的结果。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具体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根本原因在于，预期的目的和行动计划是否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只要符合客观规律，就可能取得预期效果，否则就不行。毛泽东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这是被社会实践一再证实了的确定不移的真理。

总之，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意识能动作用的原理同物质

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不仅不相冲突，而且是不可分地、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意识能动作用的正确解释，不仅贯彻了物质第一的、意识第二性的原理，而且是充分证实这一原理所必需的。当然，这种正确的解释，只有在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原理的基础上才能作到。应当明确，不管意识的能动作用有多大，它总是受客观存在制约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客观存在所决定的。简言之，意识正因为是反映了客观存在，所以它才有改造客观存在的能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忽略了意识的能动的方面，因而对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不能做出充分的、科学的论证。他们不仅无力彻底批驳唯心主义，而且自己也不能把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贯彻到底。他们由于把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看做是消极被动的直观，因而不能对意识的本质做出科学的说明，不能把意识和动物心理明确地区分开来，不了解意识是在能动地抽象概括感性材料基础上产生的对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反映。特别是，他们不能说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动机、目的、计划等等主观思想为什么也是对客观社会存在的反映，也受着社会存在的制约，这就使得他们在社会历史领域内放弃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陷入了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本是处在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它的不彻底性正是资产阶级（那怕是最革命的资产阶级）缺乏彻底革命精神的哲学表现。他们之所以不敢正视意识的能动作用，尤其不敢承认意识的改造世界的作用，是由于怕广大劳动人民认识到自己彻底改造世界的力量，而动摇了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统治。在现在，这种旧的、机械的唯物主义，常常是那种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无比威力失去信心的右倾保守主义思想的哲学表现。

革命的无产阶级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世界观是积极进取的、永葆革命之青春的世界观，它同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根本不同的。

在意识能动作用的问题上，唯心主义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抓住了意识的能动的方面，把它片面夸大和绝对化，用以否定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理。他们把意识说成是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的本体；把意识的作用无限制地扩大，宣扬“精神万能论”。客观唯心主义者心目中的“万能的精神”就是上帝或上帝的别名。在主观唯心主义那里，“万能的精神”就是他们个人自己的精神和意志。这两种精神万能论都是剥削阶级的反动世界观。客观唯心主义的精神万能论，抬高神和神化了的精神的作用，贬低、抹煞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让人们做一个俯首贴耳、听天由命的迷途羔羊，一切都由上天来安排。这是一种腐蚀人们灵魂，消磨人们革命斗志的麻醉剂。主观唯心主义的精神万能论，则是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作垂死挣扎时精神状态的哲学表现。他们内心极端空虚脆弱，外表又是那么狂妄可笑。他们怀着赌棍的心理，露出流氓、亡命徒的嘴脸，明知自己思想的无力、力量的单薄，偏偏要无可奈何把希望寄托于主观的“战斗精神”，把它作为最后的赌注，用以安慰自己，吓唬别人。一般说来，唯心主义理论是比机械唯物主义更有害的理论，在当前来看更是如此。林彪和“四人帮”就是一伙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精神万能论”的政治赌徒。

辩证唯物主义对意识的能动性的科学解释，对机械唯物主义否认意识能动性的观点的批判，特别是对唯心主义歪曲意识能动性的谬论的批判，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我们正面临着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强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宏伟任务。为此，我们必须鼓足干劲，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没有干劲或干劲不足

都是无法争得伟大的胜利的。但是，主观能动性必须以客观的决定性为前提，干劲必须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不符合客观规律，是鼓不起劲的，即便是一时鼓起来了，事情也不能办好，甚至会把事情搞糟，这样的劲是无法持续下去的，也不应该持续下去。结论是：只有坚持唯物主义，才能正确理解和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

第四章　对立统一规律

一、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

二、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

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四、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五、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六、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完整宇宙观和方法论。在我们懂得了世界的物质性、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后，还需要进一步了解现实世界的辩证发展及其规律性。只有以唯物主义为前提，才能掌握现实世界的辩证规律；只有坚持辩证法的观点，才能彻底贯彻唯物主义；只有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找到坚实的立脚点。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列宁说："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谈谈辩证法问题》）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包含着一系列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的基本规律和范畴。学习唯物辩证法，首先要紧紧抓住对立统一规律这个实质和核心，同时要以它为指导线索全面地掌握其他规律和范畴。

一、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

毛泽东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矛盾论》）在第一章第二节中已经说过，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个"对子"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子"交织在一起，贯穿于哲学史和人类认识史的全过程。

形而上学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同唯心主义的宇宙观结合在一起的；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的；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产生以后，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思想又以庸俗进化论的形式，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辩证法在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提高。辩证法在发展过程中有三种基本的历史形态：古代朴素的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才是唯一科学的和彻底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它既同形而上学根本对立，又同以前的辩证法存在着质的区别。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矛盾论》）毛泽东的论述，全面地揭示了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这两种宇宙观的分歧和对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事物之间是彼此孤立的还是互相联系的？

孤立地看问题是形而上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彼此孤立、互不联系、互不相干的偶然堆积。这种观点古已有之，而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一个长时间内，在欧洲曾经占据了统治的地位。这是有它的历史理由的。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自然界，本来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古代朴素的辩证法者正确地反映了这幅总画面的一般性质，所以恩格斯称他们为“天生的自发辩证论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但是，他们还不了解这个总画面的各个细节，因而对于总画面的反映也就非常笼统。要在头脑中形成一付关于自然界的准确而清晰的总画面，必须深入到自然界的各个部分，逐个地、分别地研究和掌握它的细节，也就是说，必须分别研究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各个具体部门。这在古代是办不到的。真正的自然科学是在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发展起来的。最初，它为了搜集标本、积累材料，不得不把统一的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进行单个的、分门别类的研究。对于生命有机体的研究也不得不采取解剖的方法，分别地观察和研究它的各个茎叶、肢体和脏器。而这种脱离了整体的部分，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机能，不再是原来的东西，活的有机体变成了一堆死物。这种研究方法，只要不忘记它的局限性，当然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可是，这种方法在当时几乎成为唯一的方法，并且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只见部分、不见全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一个孤立的片段、不见总的联系和过程的积习。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一旦被人们从自然科学移到哲学中，就形成了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这种宇宙观虽有其“重大的历史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但毕竟是错误的。特别是当着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发展到整理材料的阶段之后，孤立地、

片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和方法的荒谬性和危害性就尖锐地暴露出来，从而也就敲响了它的丧钟。

同形而上学相反，唯物辩证法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存在着不同的部分侧面、因素和趋势，它们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事物内部的本质的联系；不同事物之间，也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发生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复杂的矛盾总体。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见解的正确性。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特别是细胞、能量转化定律和达尔文进化论这三大发现,使人们可能依靠自然科学提供的事实，用比较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辩证联系的清晰图画。科学的发展愈来愈深刻地揭示出，自然界从天体星系到原子核内部的"基本粒子"、从无机界到有机界，无不处在普遍联系、相互作用之中。人类社会也同自然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而且它只有在同自然界相互作用中，才能存在和发展。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或联系，这在阶级社会中本质上是一种阶级的关系或联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总之，整个物质世界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作为它的自觉反映的唯物辩证法，就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1页）。

第二，事物是静止的还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

静止地看问题是形而上学的又一显著特征。孤立地看问题同静止地看问题，是相互沟通的，因为，客观事物"是相互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形而

上学者既然割断了事物之间的联系，也就必然否认事物的运动。在他们看来，事物是静止不动、永远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那也只是现象，事物就其本性来说是不会变化的。董仲舒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这类观点的典型。由于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揭示了物质世界变化发展的事实和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形而上学者不得不承认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但他们所说的运动和变化，只是场所的变更、数量的增减和同一事物的反复重复，其中，没有质变，没有飞跃，没有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这种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实质上仍然是否认了事物的真实的发展。

同形而上学相反，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以及它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都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是处在生生不已、永无止息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是由量变到质变、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是旧东西的不断死亡和新东西的不断产生。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自然界，从没有生命到有生命，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的不断飞跃；人类社会中，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依次更替；人的认识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由肤浅到深刻，等等，所有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唯物辩证法发展观是完全正确的，证明了唯物辩证法是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

第三，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是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否认了事物的联系、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是同否认事物的矛盾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我们把事物看成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

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我们在这里看到某些特性，这些特性，一部分是共同的，一部分是相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分布在不同的事物之中的，所以它们内部并不包含任何矛盾。如果限于这样的考察范围，我们用通常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就行了。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9—160页）形而上学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本信条就是排除矛盾。在形而上学看来，矛盾就是背理、荒谬和不合逻辑，它只产生于人们的思想中，在客观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用这种观点来观察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就认为，事物如果发生了运动和变化，那也不是事物自身的运动，而是外力推动的结果，根本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运动的深刻原因。这种外因论的观点，不仅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变的现象，而且由于否认了每一事物以至整个世界发展的内在原因，就必然要到事物的外部，到现实世界的外部去找原因，因此，它必然导致上帝推动了世界运动的唯心论。在这方面，卓越的科学家牛顿的事例最能说明这一点。牛顿科学地揭示了太阳系各行星运行的规律。但是，他看不到事物内部的矛盾，只承认物质的吸引的一方，不承认物质自身排斥的一方。因此，他不可能理解太阳系产生发展的历史，而把太阳系的现有状态当作永恒不变的。牛顿在《给本特雷大主教的信》中讲：“引力可以使行星运动，但没有神的力量就不可能使它们作现在这样绕太阳而转的运动”。牛顿的这种观点就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发展观和外因论。在这里我们看清了什么是从自然科学到神秘主义的最可靠的道路。为什么康德能在他的宇宙发展假说中打开形而上学发展观

的缺口呢？就是因为“康德早已把物质看做吸引和排斥的统一体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3页）。康德说：除引力以外，“自然界还贮有其他的力，主要表现在当物质分解成微粒时它们之间的互相排斥，表现在排斥和吸引相互斗争中所引起的那种运动，这种运动好象是自然界的永恒的生命”，因而这种运动，就不再需要让“上帝直接插手”。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过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同上书第450页）。

同形而上学相反，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是由事物自身的内部矛盾引起的，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自己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这样，唯物辩证法就科学地解释了事物质的多样性，深刻地揭示了事物自己运动以及一事物向它事物转化的源泉和动力，排除了任何神秘力量的干预，把唯物主义的路线贯彻到底了。

列宁多次强调，事物的“自己运动”是一个极深刻、极重要的辩证法原理，并作了一系列论述。毛泽东又从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及其相互关系方面，进一步丰富了这个基本原理。他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论》）这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变化发展原因的明确、深刻而全面的科学论断。

内因是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它是事物存在的深刻基础；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本质；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它规定着事物发展的根本方向。所以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第一位的原因。自然界各种事物的变化发展，主要是由各种事物的内部矛盾引起的。例如，同化和异

化、遗传和变异的矛盾，推动了生物的变化发展。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由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引起的。这些矛盾在阶级社会中往往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无阶级的社会中表现为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新与旧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依次更替。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是一个普遍的原理，即使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不例外。根据牛顿的惯性定律，没有外力的作用不能引起物体机械运动状态的变化，在这里似乎外因是第一位的了。其实不然。物体机械运动状态的变化，外力的推动固然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该物体在外力作用下发生什么样的状态的变化，还需取决于它自身的质量、体积、位置、结构、形状等等内因，其中特别是取决于它的质量的大小。就是说，在这里仍然是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外因是指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即一事物和他事物之间的矛盾性。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事物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如前所述，世界上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任何一种事物的运动都是和它周围的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着。这种联系和影响，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有时还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不论外因的作用有多大，它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通过对事物内部矛盾的某些方面的加强和对另一些方面的削弱而加速或延缓事物的变化。适当的温度对于鸡蛋变成小鸡是不可缺少的，但无论什么样的温度不能使石头变成小鸡，而且只有当适当的温度才能对鸡蛋向小鸡的变化发生作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重大影响，但主要的是由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中国革命运动的广泛兴起，工人阶级登上

了历史舞台等内因决定的。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就在于向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中国内部革命因素的增长。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发展的事实都表明，决定事物变化的第一位的原因，归根到底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唯物辩证法首先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第一位的原因；同时又肯定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把内因和外因辩证地统一起来，就最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机械论，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根据内因和外因这个辩证统一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一贯主张革命和建设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同时也肯定国际条件、国际援助的重要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事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立脚点；同时也要有分析地学习外国，尽可能争取必要的国际援助，用以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正确理解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对于我们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综上所述，在事物是否相互联系，事物是否变化发展以及如何变化发展，事物为什么会变化发展等问题上，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存在着全面的、根本的、尖锐的对立。

二、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

恩格斯说："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

484页）这三个规律，是按黑格尔《逻辑学》中的顺序排列的。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注意的是辩证法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以及它们对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指导意义。因此，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他们没有能够“详细地考察这些规律的相互的内部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5页）。但是，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特殊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有所论述。马克思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恩格斯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4页）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第一次以突出的鲜明的形式指出：“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选集》第2卷第711、608页）。这是对唯物辩证法诸规律相互的内部联系的明确的规定。在列宁看来，辩证法的诸规律不是并列的，其中对立统一规律统帅辩证法的全部内容，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毛泽东深刻地领会和创造性地贯彻了列宁的上述光辉思想，在总结革命实践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地解释和发展了对立统一学说及其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

根据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的论述，对立统一规律之所以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对立统一规律是理解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钥匙。

如上节所述，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分歧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最根本的、贯穿一切的则是承认不承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性。列宁说："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在这里，列宁正是把是否承认对立统一看作是两种发展观对立和斗争的焦点。

唯物辩证法是普遍联系的科学，而联系的根本内容则是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又对立又统一的联系。唯物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而发展的根本内容、实在过程和源泉动力也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矛盾论》）对立统一就是发展本身，凡是有关发展的问题，如：什么是发展，为什么会发展以及如何发展，只有从对立统一中才能得到合理的、深刻的解释。唯物辩证法之所以能够从联系、发展中看世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坚持对立统一规律。

形而上学否认联系，最根本的也就是由于它否认了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之间的联系。形而上学否认发展或者歪曲发展，最根本的也就是由于它否认了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形而上学之所以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世界，根源就在于它否认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揭露了形而上学的种种特征，如：认为事物都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不可加以分析"，它"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

台戏”，“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形而上学是一点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0页）。“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

总之，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是理解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的钥匙，承认不承认对立统一规律则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对立和斗争的焦点。

第二，掌握了对立统一规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学说，全部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都是从不同的侧面说明联系和发展的。既然联系和发展的核心内容是对立面的统一，那么要深刻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就必须首先把握住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的联系和发展的最深刻的本质，它贯串在唯物辩证法的一切规律和范畴中。

质量互变规律或量变质变规律揭示的是，事物的量和质、量变和质变的对立统一。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这就是相对静止即量的变化的状态和显著变动即质的变化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这就深刻地说明了，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化的根本内容和根本动力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质量互变规律则是从事物变化发展的形式、状态方面进一步揭示了事物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

否定之否定规律或肯定否定规律揭示的是，事物发展过程中肯定和否定、前进性和曲折性的对立统一。事物的发展，总

是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新的肯定)的过程，肯定、否定、新的肯定……，形成波浪式前进或螺旋式上升的运动。事物为什么会作这样的运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回答得更明确："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1页)这就是说，事物发展的波浪式或螺旋式的根源，仍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从事物发展的方向、趋势和道路方面进一步揭示了事物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如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等等，无不都是一对对的矛盾，一个个的对立统一。不过它们都是些不同的对子，有着各自不同的对立统一，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进一步揭示了客观世界辩证发展的画面。

上述规律和范畴，都是唯物辩证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同对立统一规律之间不是同等的平列的关系。为了全面地掌握唯物辩证法，必须要懂得这些规律和范畴，但首先要抓住对立统一规律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只有如此，才能深刻地理解其他的规律和范畴。反之，只有懂得了其他规律和范畴，才能更具体、更深刻和更全面地理解对立统一规律。

第三，矛盾分析法是最根本的认识方法。

列宁说过："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谈谈辩证法问题》)这就是说，唯物辩证法既是科学的宇宙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既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又是认识、思维发展的规律，是科学的认识工具、认识方法。毛泽东

指出："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矛盾论》）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唯物辩证法作为宇宙观，最根本的就是关于世界的矛盾观；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的规律，最根本的就是矛盾的规律；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方法，最根本的就是矛盾分析法。"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3页）其他一切辩证的认识方法，都是矛盾分析法的具体表现和不同形式。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一贯重视运用矛盾分析法（在社会生活中则主要是阶级分析法），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指导革命。毛泽东说："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矛盾论》）同样，毛泽东也正确地应用了它，并体现在他的全部光辉思想和伟大实践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复杂的矛盾有机体的分析，是从解剖它的"细胞"——商品交换开始的。从这一最简单、最基本、最常见、最大量的关系开始，一步一步深入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以及由它所规定的其他全部深刻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才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科学地论证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还根据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深刻分析，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的环节上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在列宁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引下，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使社会主义的理想第一次变成为现实。

毛泽东把矛盾分析法这一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分析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复杂矛盾，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毛主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正确处理和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十大关系，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展指明了方向。

总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切胜利，都是同矛盾分析法的贯彻和运用分不开的。这就从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规律、作为认识和实践的方法方面，进一步表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

由此可见，无论从那个方面和角度来看，对立统一规律的的确确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在明确了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之后，就需要进而弄懂这一规律本身的各个方面。首先要懂得："世界是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88页）也就是说，要掌握矛盾普遍性的原理。

关于矛盾的普遍性，首先是指矛盾存在的普遍性。毛泽东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论》）就是说，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时时处处存在着矛盾。

怎样证明矛盾的普遍性呢？仅靠举一些实例是不够的，简单的举例还不等于论证。个别实例只能说明原理，使原理通俗化；只能部分地证明原理，即证明这个普遍原理适合于这些例子。为了证明某一原理的普遍性，就必须举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基本事实，并运用辩证的逻辑思维，从中引出可靠的哲学结论。列宁指出：辩证法不是"**实例**的总和"，"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列宁选集》第2卷第711页）。

列宁是这样说明矛盾的普遍性的：

"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同上）

在列宁的说明中，基本上包括了全部基础科学，包括了全部基本运动形式。其中，数学是研究所有科学部门、所有运动形式中数或形的关系的科学，是关于量的科学。无论什么事物和现象，都摆脱不了量的关系。既然在量中就充满着矛盾，那末，理所当然地任何事物也都摆脱不了矛盾。列宁所举的正和负的矛盾，是存在于全部数学中的普遍矛盾和基本矛盾。而微

分和积分的矛盾则是存在于高等数学中的普遍矛盾和基本矛盾。数学中的其他一切矛盾，都是这些矛盾的推移和展开。例如，乘和除就是加和减的推移和展开，乘是同一数的多次连续相加，除则是对某数多次连续减去同一数。同样，列宁在力学、物理学、化学、社会科学中所列举的矛盾都是存在于这些科学中的普遍的基本的矛盾。任何力学运动都离不开作用和反作用的矛盾。全部化学讲的都是原子间的化合和分解，各种不同原子和化合物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化合和分解，构成了复杂的化学运动。物理学中一谈到电的运动就离不开阳电和阴电的矛盾。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贯串于全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毛泽东指出，社会科学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知识的结晶。说到底，各门科学，无非都是研究各种物质运动中普遍的、基本的矛盾之推移和展开而形成的理论体系。

恩格斯指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位移之所以能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即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即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页）既然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普遍形式，那么，矛盾也就成为物质的普遍状态，这就是说，承认物质运动的普遍性也必定要承认矛盾的普遍性。

二十世纪以前的物理学家认为原子是构成一切物质的基本单位，它是不可分的，没有矛盾的。可是，科学的发展对物质结构的进一步的探讨，揭示了原子内部的矛盾性。毛泽东说："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矛盾不仅普遍地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而且贯串发展过程的始终。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的第二方面的论断是针对德波林提出的。德波林认为，矛盾在过程的开始并不存在，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按照他的说法，最初只有差异，而没有矛盾。既然在过程中最初没有矛盾，它又怎么会发展呢？可见，这种观点必然导致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在批判这种错误时，毛泽东得出了“差异就是矛盾”的著名结论。差异就是矛盾，包含有两层意思：第一，任何相互联系、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事物、方面之间，如果存在差别，也就意味着存在矛盾。把差异和矛盾看成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如德波林那样，把事物的过程分成“从单纯的等同，经过差异和对立而达到极端的矛盾”，这是完全错误的。当然，把那些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的差别都称为矛盾，也是错误的，是对差异就是矛盾这个命题的曲解。第二，差异这个辩证的范畴，是矛盾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是指那些尚未充分暴露、尚未激化的矛盾。例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第三等级中工农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差异也就是矛盾，只不过尚未激化为已。“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论》）

事物发展过程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还表现在一过程向另一过程的转化中。旧过程的结束就是旧矛盾的解决，新过程的发生就是新矛盾的出现。旧过程向新过程的转化，就是旧矛盾让位于新矛盾，这中间决没有那怕是一刹那的无矛盾的阶段。例如，有机体的生命就自始至终存在着同化和异化的矛盾，生命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东西，这个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结束，死亡也就到来。但是有机体生命的结束，并不是矛盾的终止，同化和异化的矛盾停止了，但物理的、化学的

矛盾运动仍将继续进行，而且在适当的条件下，这个死亡了的有机体，还可能变成食物或肥料被别的有机体所吸收，重新参与新的生命运动。再如，我们搞工作，总是问题一大堆，而问题也就是矛盾。一个或一些问题解决了，另一个或另一些问题接踵而来，永远不会出现没有问题、无须工作、终止斗争的时候。总之，就一个个具体事物的矛盾说，是有始有终的；就整个世界的矛盾运动说，则是无始无终的。矛盾不断发生，又不断解决，不断解决又不断发生，这是一个川流不息、万古常新的辩证过程。

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写的《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一文中，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要求我们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坚持真理，纠正错误，树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指出在革命工作中是充满矛盾的，到处都是一分为二的。对工作中碰到的情况也要一分为二，有困难也有顺利。对待困难的态度，有怕与不怕的对立统一。无论对待顺利和困难，又都有冷和热的对立统一，即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的对立的统一。总之，到处都是矛盾，任何时候都不能回避矛盾，而是要认真对待矛盾。认为工作中只有顺利，总是一帆风顺，掉以轻心，一点也不怕，这是不行的。认为工作中困难重重，无法克服，一味耽心害怕，缩手缩脚，也是不行的。这都是一点论，都是否认矛盾普遍性的形而上学。对待敌人，对待工作，对待困难，我们需要的是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哪怕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也要估计到会有困难，要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去做。哪怕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只要具有现实的可能，我们都要有勇气、有信心，坚持不懈地去努力完成它，在共产党人面前没有不

可克服的困难。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处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的头脑要冷又要热。一味的冷和一味的热，都是否认矛盾的普遍性，都是形而上学，都是办不成事的。一味的热，不做调查，不做分析，不从实际情况出发，死拼蛮干，那是要跌筋斗的。一味的冷，左调查右调查，左分析右分析，顾虑重重，没有干劲，下不了决心，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坚，那也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正确的态度只能是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的辩证统一。

矛盾的普遍性除指矛盾的存在是普遍的以外，还指同类事物矛盾的性质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同类矛盾的事物具有共同的本质，即矛盾的共同性或共性。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对于社会来说就是普遍性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具有的共同本质。阶级社会也好，无阶级社会也好，都毫无例外的具有这种性质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具有的普遍性的矛盾。又例如，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一个普遍性的矛盾，它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的共同本质。所以，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种性质的矛盾，就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共性。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矛盾性质的普遍性，总是指在一定范围或一定场合内的普遍性，而不能把矛盾性质的普遍性原理扩展到无限的宇宙。因为对于无限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来说，它们的普遍性，它们的共同本质或性质只有一点，这就是它们都存在着矛盾，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某一类或一种矛盾性质是无限宇宙的一切事物所共同具有的。所以，当我们把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一切矛盾都包括在内来说它们的普遍性，除指矛盾的存在是普遍的以外，再没有别的含义。

坚持矛盾的普遍性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坚持辩证法的根本

前提，为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指出了总的方向。但是决不能因此而轻视（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轻视）矛盾的特殊性。因为，矛盾的特殊性是矛盾普遍性的基础。矛盾的普遍性只能通过矛盾的特殊性而存在。没有矛盾的特殊性就没有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普遍性无非是从宇宙中一切事物的各自不同的、无限多样的特殊矛盾中概括抽象出来的共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则是矛盾普遍性这个共性在个别事物上表现出来的个性。离开了矛盾的特殊性谈论矛盾的普遍性，就会把普遍性变成空洞的、僵死的、枯槁的抽象。那就是背离辩证法，就会给我们带来错误和挫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等一些机会主义者，空谈矛盾的普遍性，拒绝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使革命遭到严重的挫折。针对这种形而上学的错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特别详尽地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指出："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关于矛盾的特殊性，应当从以下几种情形中去研究，这就是："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象毛泽东这样对矛盾特殊性原理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还是第一次。

具体分析事物不同运动形式的矛盾的特殊性，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运动的形式，认识不同的物质就是认识它们各自不同的运动形式。运动即是矛盾，各种不同的运动形式都是由各自特殊的矛盾构成的。因此，我们只有具体分析了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明确区分不同运动的形式，才能进一步清楚地认识不

同质的事物。把不同质的事物、现象区分开来，这是一切认识的起点。认识矛盾的特殊性，认识运动形式的特殊性，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

反动阶级要欺骗蒙蔽人民群众，常用的手法就是否认矛盾的特殊性，混淆不同质的事物。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不区分动物和人的特殊性，把人当作野兽来研究，用生物间生存竞争的现象来说明社会现象。修正主义者也是如此。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8页）林彪抹杀革命者和革命对象的区别，胡说什么"要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四人帮"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叫嚣要"改朝换代"；抹杀革命老干部和资产阶级的区别，要把革命老干部统统当作"党内资产阶级"来打倒。这些都是用混淆事物的质的界限，来进行反革命勾当。我们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就要学会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把不同质的事物区分开。当然也包括：学会分清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等等。

每一事物的特殊矛盾，规定这一事物的特殊运动形式，也就规定了这一事物的特殊本质。我们的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探讨事物的特殊本质。前面讲过科学分类的基础是根据不同的运动形式。现在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理解到，"科学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矛盾论》）

辩证法就是认识论。认识的基础，认识的起点，就是认识

矛盾的特殊性。认识的发展就是在矛盾的特殊性的基础上概括抽象出矛盾的普遍性。然后再以对矛盾普遍性的认识为指导，进一步深入研究那些尚未研究过或尚未深入研究的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接着又可以再从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更充分地、更丰富地、更深刻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这种由特殊到普遍，由普遍到特殊，再由特殊到普遍……循环往复的过程，使我们的认识不断地得到提高，这就是认识的秩序。只有按这个认识的秩序前进，才能保证我们的认识得到健康的发展。如果只研究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不进一步概括事物的共同本质，找出它们的矛盾的普遍性，就会使我们对事物矛盾特殊性的研究缺乏正确的指导，不能深入下去，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反之，如果满足于对矛盾普遍性的认识，不用以指导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矛盾的特殊性，那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使我们对矛盾普遍性的认识脱离它的基础，变成僵死的教条。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修正"，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都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

不仅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具有特殊性，而且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的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矛盾也有其特殊性。例如，同一社会运动形式中的不同社会形态，都是由各自的特殊矛盾决定了它们相互区别的过程的本质。在每一大的事物的每一发展过程中，包含有许多矛盾，对这些矛盾也必须具体分析，不能一律看待。只有逐一地分析了这些矛盾的各自的特点，分析了这些矛盾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从总体上具体把握过程的特殊本质。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分别对旧中国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各个不同的矛盾作了具体的分析，从而深刻地揭示了这两个不同的社会过程的特殊本质，就是最杰出的典范。

在复杂的事物过程中所包括的每一个矛盾，它的对立的两个侧面也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应分别对矛盾双方做出具体分析，不仅要了解矛盾的这一方面，而且要了解矛盾的另一方面，了解这两方面是如何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片面性，是形而上学。辩证法要求全面性反对片面性。“四人帮”为了反对无产阶级，攻击社会主义，表现在思想方法上的特点，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片面性，正如毛泽东指责他们时所说的，“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矛盾论》中指出：“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因此，“四人帮”在理论上，既是形而上学猖獗，也是唯心主义横行。

在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根本矛盾没有变，被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没有变，但是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矛盾的情况也会有所变化，有所不同，对此也必须具体分析。研究矛盾的变化情况，对矛盾进行具体的分析，对于确定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是极其重要的。

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同时也在于它是实践的基础。认识是为了实践，为了改造世界，也就是为了解决矛盾。而“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矛盾论》）。例如，阶级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要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来解决。同一矛盾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特点，也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要用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来解决。在社会主义制度

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则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大力发展生产力，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的方法来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矛盾论》）万恶的“四人帮”却要用他们的所谓阶级斗争去解决一切矛盾，胡说什么“阶级斗争抓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他们又要用推翻现存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办法去“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耻叫嚷什么“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要改朝换代”。这帮资产阶级野心家哪里是什么解决矛盾，而是制造混乱，破坏矛盾的解决，把社会主义“解决”为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特殊性的原理，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我们重视和学会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具体分析不同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矛盾，分别地具体分析一个大事物发展过程中包括的各个不同的矛盾，分别具体分析在一对矛盾的对立双方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还要具体分析一个过程中，矛盾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的变化，以及矛盾双方各自不同的变化。我们要牢记列宁的教导：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44页）世界充满了矛盾，认识世界就是分析矛盾，改造世界就是解决矛盾。只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够正确的认识世界和胜利地改造世界。

无论是掌握矛盾的普遍性或特殊性，都必须注意二者的相互联结。孤立地、单纯地只抓一面，那就什么也抓不到，抓不好。因为在客观事物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即共性和个性本来就是相互联结的、不可分割的，只有在它们的辩

证统一中才能把握它们。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是互相贯通的。“由于世界的范围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矛盾论》）简言之，由于场合的改变，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对整个宇宙来讲它是特殊的矛盾，它只存在于社会运动这一特殊的运动形式之中；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运动来说，它又是普遍的矛盾，存在于所有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的始终，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就必定会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个矛盾对于各个社会形态来说，是普遍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在不同社会的不同表现，比如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则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特殊矛盾，对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它又成为普遍的矛盾，如此等等。这就是共性和个性的相互联结。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还表现在它们共同存在于每一个事物之中。在每一个事物的特殊矛盾中就包含着普遍的矛盾，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任何一个最普通、最简单的命题，都同时包括特殊性和普遍性，把二者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妈妈是人”、“树叶是绿的”等等。这里就既有特殊（妈妈、树叶），又有普遍（人、绿色），特殊就是普遍。当然，特殊和普遍又不完全等同，它们之间是有差别的。任何普遍只能大致地包括一切特殊，它只是特殊的一个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反之，任何特殊也不能完全包括在普遍之中。

正因为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我们才可能从矛盾

的特殊性中抽象概括出矛盾的普遍性。也正因为如此，关于矛盾普遍性的认识才能反过来指导我们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因此，我们研究任何事物的时候，都必须既研究它的特殊性，又研究它的普遍性，研究这两个方面的联系。这种研究的方法，就是解剖麻雀的方法。“麻雀虽然很多，不需分析每个麻雀，解剖一两个就够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8页）每个麻雀和其他麻雀相比，就其大小、轻重、体态等各方面来说，都有一定的特殊性，世上没有两只完全相同的麻雀。可是，每个麻雀身上同时也包含着所有麻雀的共性、普遍性。只要解剖一两个麻雀，就可以得出结论：“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并用以指导对其他“麻雀”的认识和研究。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即共性和个性之间，又存在着绝对和相对的关系。就是说，矛盾的普遍性、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特殊性、个性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相对的。绝对不能脱离相对而存在，绝对贯串在相对之中。毛泽东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矛盾论》）这一创造性的新概括，进一步深化了对立统一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为什么说，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呢？懂得这个道理有什么重大意义呢？

第一，只有懂得了这个道理，才能对客观事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前所述，事物就是矛盾，这一点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永远如此的。因此，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任何事物以及它的任何方面，都要看到矛盾，看到这一共性和绝对性。在任何情况下，无矛盾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但是矛盾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在不同的事物以及它不同的方面中又都有其

特殊性、个性，这种特殊性、个性，则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只看到共性、绝对性的方面，抹杀了矛盾的个性、相对性，把某个特殊的矛盾硬当作普遍的矛盾，把个性硬当作共性，把它变成无条件的、绝对的东西强加于其他事物，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错误，都是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抛弃了辩证法。只有懂得了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对立统一，才可能真正懂得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懂得“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6页）这就是说，世界上的所有一切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但是，不同事物的一分为二又各不相同。这样，才能对整个世界得出一个清晰的完整的看法。

第二，毛泽东关于矛盾精髓问题的新概括，是对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批判各种机会主义的尖锐思想武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普遍真理是共性方面，具体实践是个性方面。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的道理所揭示的共性和个性的辩证法，正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的哲学基础。这一新结论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使我们懂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是离开矛盾特殊性的生搬硬套，也不是离开矛盾普遍性的就事论事，而是要把反映共性的普遍真理同体现个性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也就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武器，进一步扩展为同时也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思想武器。在我们党的历史中，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基本原则，都抛弃了矛盾问题的精髓。其中，最为恶劣的是“四人帮”。“四人帮”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割裂共

性和个性。一会儿强调个性抹杀共性，借口“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性，胡说什么，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现在“不适用了”。一会儿又强调共性抹杀个性，甚至臆造出什么在一切情况下都要永远适用的“既定方针”。他们肆意践踏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他们是暗藏在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因此，学习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掌握矛盾问题的精髓，为深入批判“四人帮”提供了强大的哲学武器。邓小平同志讲得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在什么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弄懂共性和个性的辩证法，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捍卫和贯彻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自觉性。

第三，关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理解和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全部丰富内容的一把钥匙。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讲的是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在特殊性和相对性中，就包括了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的问题；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同一性是特殊的、相对的，斗争性是普遍的、绝对的；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讲的同样还是这个道理：矛盾的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而斗争的性质和形式则是特殊的、相对的。总之，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存在于矛盾问题的各个方面，是贯穿全部关于矛盾的学说的一条红线。只有掌握了这个精髓，才能对矛盾规律各方面的内容融会贯通；同样，懂得了矛盾规律的各个方面，也就会深刻理解到，关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的的确确是关于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往下的分析，将会进一步地说明这一点。

四、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事物就是矛盾。一个复杂的事物往往包含多种矛盾。我们讲矛盾的特殊性，不仅要看到这种种矛盾的性质各不相同，而且要看到每一矛盾在复杂的矛盾总体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其中，必有一种矛盾居于领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种种矛盾则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对事物的发展不起决定的支配的作用，这就是非主要的矛盾。

我们通常把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比做"纲"和"目"。一个复杂的事物有如一张网。纲，就是网上的大绳。有了大绳，如果没有许多小绳和它编织在一起，还不能成为网。由这些小绳编织而成的网"眼"就是目。有纲有目才成其为网。目离不开纲，纲离不开目，网就是纲和目的对立统一。

网中的纲和目错综杂复地交织在一起，必须理得顺，撒得开，才能捕到鱼虾。《书经》讲："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诗谱序》说："举一纲而万目张。"这就是说，只有抓住纲才能张开网，使捕获物落入其中。我们研究一个复杂的过程，处理一件复杂的工作，都必须抓住纲，也就是抓住主要的矛盾。毛泽东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论》）

目离不开纲。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才有可能逐步解决其它非主要矛盾，这叫做以纲带目。但是，纲也离不开目，纲和

目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如果不注意相应地逐步解决非主要矛盾，那末，主要矛盾也是得不到真正解决的。就是说，忽略了目，纲也是抓不住、抓不好的。按辩证法办事，我们就要既抓纲，也抓目；在以纲带目的同时，还要以目促纲。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既抓纲，也抓目，以纲带目，以目促纲。毛泽东把这叫做“弹钢琴”的工作方法。“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展开其他方面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3页）

主要矛盾是纲，次要矛盾是目，纲和目又构成一对矛盾。在这个矛盾中，“纲”和“目”是相对而言的，和其他矛盾一样，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一个复杂的大网常常是由许多小网组成的。大网有大网的纲，小网也有小网的纲。大网有一个总纲，它是统帅一切的，小网的纲对它来讲，就是目；大网中的一些目对小网来讲，又是纲，它统帅着小网中的其余的目。“四人帮”对这些辩证法的道理一窍不通。他们只准谈论“阶级斗争是纲”，除此以外，若是提到一个“纲”字，就一概斥之为“多纲论”，扣上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果真如此吗？否！这是粗暴地践踏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从社会的全局看，“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可是，社会的某一局部、某一方面，都有着它们各自的主要矛盾，各自的中心或纲。谁都知道，毛泽东曾经多次说过：“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实行党政工团的统一领导”（《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页）；“工人以工为主”，“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四人帮”打着批判“多纲论”的幌子，分明是攻击唯物辩证法，把矛头

指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在复杂的矛盾总体中，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之分，在任何一对矛盾中，又有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之别。矛盾双方在矛盾统一体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这也是矛盾的特殊性。两个矛盾着的对立面，一方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成为主要的矛盾方面；另一方居于被支配的地位，成为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0页）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两点；两点的地位则有主次之别，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这就是说，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本身就包括了重点论。在矛盾的双方中，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重点和非重点，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由于它们相互对立，相互区别，所以看问题、做工作，都要分清主次，抓住重点，不能平衡看待，更不能颠倒主次；由于它们相互统一，相互联系，所以又要兼顾矛盾双方，不能把二者截然分开。不分主次，对矛盾双方平均看待，这是形而上学的均衡论；有主无次，死死地单纯只抓主要的一方，而不管次要的一方，这是形而上学的一点论。这两种观点，都违反了辩证法，都离开了包含着重点论的两点论，因而都是错误的。

关于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作过深刻的论述，在《论十大关系》中又进一步发展了这方面的思想。在《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讲话中，毛泽东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论述国民经济的一系列重大矛盾时，精辟地阐明了重点和非重点的对立统一关系，为我们树立了如何抓好重点的光辉榜样，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

毛泽东强调指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抓重点。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文化又很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战线千头万绪，矛盾错综复杂。如果不抓住重点，必将堕入烟海，劳而无功。重点是什么？毛主席根据客观经济规律，深刻分析了我国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它还是为主"。重工业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是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重工业发展了，才能生产出大量的农业机械，电力设备，化学肥料等，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物质技术基础；只有重工业发展了，才能为轻工业部门提供各种先进装备和原材料，促进轻工业的技术改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十分清楚，如果没有重工业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就失去了中心。因此，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

但是，当时的问题主要不在于是否承认重工业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要不要抓住这个重点。因为"这是已经定了的"。对这一点，人们是比较清楚的，并没有什么分歧。当时的问题主要在于，到底如何使重工业真正发展得多些快些，如何真正抓好这个重点。因为这个问题是过去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对立。

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69页）

前一种办法就是以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办法。这种办法主张，既然要保证重工业这个重点，就必须把人力、物力、财力，尽量投到重工业方面，尽量少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持有这种主张的人，自以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想”发展重工业，而且比别人都“想得厉害一些”。殊不知，由于他们只顾重工业，用打击、牺牲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其结果势必造成农业轻工业的落后，迟早会拖重工业发展的后腿。在这里，想快，却变成实际上的慢，农业轻工业的少，最终转化成重工业的少。这种良好的愿望，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假想”。前一种办法之所以是形而上学，就是因为它只看到重点，而忽视了非重点；只看到重点与非重点的对立，而看不到它们的统一，从而把重点论从两点论中割裂出来，变成了一点论。“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这种一点论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打着“抓重点”、“反折中主义”的幌子，给这种一点论涂上种种马克思主义的油彩，伪装成辩证法，因而更加狡猾，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后一种办法，是以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是毛泽东为我们规划的正确的工业化道路。它告诉我们：在抓住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决不可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没有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固然不会有农业和轻工业的现代化；但是，如果农业轻工业停滞了，或者发展缓慢，那么重工业也就失去了迅速发展的稳固基础。重工业作为重点，农业轻工业作为非重点，固然有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一面，例如一定数量的资金，对重工业投资多，就相应地对农业轻工业投资少；反之亦然。但是，它们更有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互相转化的一面，二者是不可或缺

的。毛泽东用人人每天都在经历着的生动事例，具体阐明了这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道理。第一，人是要吃饭穿衣的。“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第二，在我国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农业，特别是轻工业比重工业的积累要快得多。“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同上第270页）迅速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就会给重工业提供大量的资金。第三，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就会给重工业产品提供广阔的市场。

为了更多更快地发展重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强调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同上第269页）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在有些情况下，为了加强矛盾的这一方，恰恰要向它的对立一方用力；为了保证重点，必须加强非重点方面的工作。这不仅不是放弃重点，而正是更好地保证和促进了重点。所以，要“真想”发展重工业，而且“想得厉害一点”，就要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也就是说，多发展一些农业就转化为工业的迅速发展；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就转化为重工业的迅速发展。而重工业发展得多了，快了，又进一步促进农业、轻工业的迅速发展。它们之间的互相促进，互相转化的关系，就是这样地实际而生动。然而，这对于用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的人来说，却是不可思议的。

后一种办法之所以是唯物辩证法，就是因为它既看到重点又看到非重点；既看到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相互对立，又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转化。这才真正是两点之中抓重点，抓重点时讲两点，把两点论和重点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了重点论，又坚持了两点论。

矛盾双方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非主要的矛盾方面可以转化为主要的矛盾方面；同时，主要的矛盾方面可以转化为非主要的矛盾方面。这种矛盾双方地位的相互转化意味着事物性质的根本变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是主要的矛盾方面，主要是它决定着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由非主要的矛盾方面转化为主要的矛盾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也随之转化为社会主义社会。

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双方往往区分为新生的方面和陈旧的方面。新生事物在刚诞生时，总是幼稚的、弱小的，居于被支配的地位，是非主要的矛盾方面。但是，新生事物是充满活力的，它在和旧事物的斗争中不断地发展壮大，终有一天会压倒旧事物，成为主要的矛盾方面，规定事物的性质，引起根本的质变。这是一条普遍的永远不可抗拒的新陈代谢规律。无产阶级的革命乐观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两种情况，都是讲的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这是对矛盾特殊性问题进一步深化。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是无产阶级政党正确地制定路线、方针、战略和策略所绝对必需的。关于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理论，是关于矛盾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被“四人帮”弄得极其混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同其他问题一样，我们应当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深入地

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谬论，在实践中力求做到主次分清又统筹兼顾，高屋建瓴又细致踏实，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协调地、有节奏地、稳步地、高速度地向前发展。

五、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矛盾论》）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即对立统一法则的普遍性及其特殊表现之后，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这一辩证范畴本身的含义，即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

什么是矛盾的同一性呢？同一性和统一性、一致性是一个意思。矛盾的同一性，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互相渗透，互相贯通，对立面的双方都包含着依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的趋势和可能。

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着的两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组成一个统一体，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矛盾着每一方面，都不能孤立地存在。矛盾的一方总是和它对立的另一方结成对子，没有这一方就没有和它对立的另一方，反之没有和它对立的另一方，它自己这一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例如，生和死，上和下，祸和福，顺利和困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战争和和平，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等，都是这样的对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相互依存，就表现在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也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矛盾的同一性的意义，不仅在于矛盾双方互为存在条件，

共处于一个统一体内；而且在于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包含着各向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的趋势和可能。这是矛盾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这第二种意义是更为重要的。

怎样理解矛盾双方包含着依一定条件相互转化的趋势和可能呢？因为，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化，就表明了矛盾双方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存在着彼此相通的桥梁，而不是横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没有一定条件下的联系，矛盾双方是根本不可能相互转化的，只有鸡蛋是可以转化为小鸡，石头决不会转化为小鸡。为什么说，矛盾同一性的第二个方面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呢？因为，它不仅说明了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而且进一步说明了矛盾双方的联系不是死的、凝固的东西，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东西。这也就是说，它不仅说明了矛盾的同一性，而且进一步说明了同一性的相对性。只有坚持了这样的同一性，才能真正划清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避免形而上学的僵化，抓住辩证法的革命实质。毛泽东指出："只有在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矛盾论》）

有矛盾就有斗争。具有同一性的矛盾双方永远处在对立和斗争之中。和"同一"相对应的"斗争"一词，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哲学范畴，是指一切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矛盾双方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普遍地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自然界中，生物之间的吞噬是斗争；吸引和排斥、阴

电和阳电、化合和分解、遗传和变异等对立面的互相作用也是斗争。在社会中，敌对阶级、敌对势力之间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流血的不流血的、暴力的和非暴力的斗争是斗争；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同意见的争论、协商探讨也是斗争。斗争的结果，最终必然导致矛盾双方的转化，达到矛盾的解决。

坚持辩证法的矛盾斗争的观点，必须反对形而上学的调和论。敌我之间的矛盾固然需要通过斗争才能解决，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也要分清是非，通过讨论或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能求得矛盾的解决。两种不同意见争论的本质，在于真理和错误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必然导致真理战胜错误。只要这两种意见中的每一种都包含有真理，又包含有错误。在争论（即斗争）中，争论的双方都逐步弄清楚自己意见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对方意见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误的，于是彼此吸取对方正确的部分，抛弃自己错误的部分，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基础上，形成了双方统一的意见。这个统一的意见，是真理同错误斗争的结果，是真理一方克服错误的一方。因此，它比原来双方的意见都更全面、更正确。

在矛盾双方的斗争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双方妥协的情况。但是，妥协决不是矛盾的最终解决，而是因为目前解决这一矛盾的条件还不具备，暂时缓和一下矛盾，留到将来再解决。这也便于集中全力解决目前可以解决的矛盾。在阶级斗争中，为了集中全力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解决主要的矛盾，我们不仅可以而且必须缓和我们和次要敌人之间矛盾，同一切可能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求同存异"，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对付主要的敌人。我们不能一下子把所有矛盾都解决，必须分清主次

和先后。毛泽东指出："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5页）"求同"是部分地解决矛盾，首先解决那些目前可以解决的矛盾。

矛盾的解决是旧矛盾的扬弃和新矛盾的出现，是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过渡和发展。但是，一个事物本身的发展并不是"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矛盾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2页）太阳系的各行星和太阳的关系就是离心力和向心力两个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方面的相对平衡，由此形成各行星绕太阳的椭圆运动。如果离心力克服了向心力，地球就会飞离太阳系，因而地球上的万物就失去它们赖以生长的光和热；如果向心力克服了离心力，地球及其上面的万物就会落入太阳而烧毁。由此可见，矛盾的解决不仅促使矛盾的扬弃，而且创造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也就是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矛盾统一体。

"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6页）"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同上，第347页）这就是说，任何事物的矛盾双方，都存在着同一性和斗争性这两种关系，这二者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不能只看到一面，而否定另一面。无论是离开斗争性来谈同一性，或离开同一性来谈斗争性，都是错误的。因为矛盾双方的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中，反过来也是一样，矛盾双方的相互联

系、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相互对立中。

离开了斗争性谈论同一性，就会把同一性理解成没有矛盾的机械的等同，必然要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共居在一个统一体内，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而这种条件则是斗争的结果。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居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统一体内的最根本的一个条件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存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资产阶级用以向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迫使无产阶级不得不和它共居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统一体内，忍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一种手段。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又是靠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斗争（血腥镇压和无耻欺骗）来维持的，就是说，它是斗争的手段，也是斗争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是斗争的最后结果。无产阶级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力量不断壮大，逐渐形成一支具有高度自觉性和严密组织性的革命队伍，建立起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最终用胜利的暴力革命压倒资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权，从而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统一体存在的条件，同时也创造了无产阶级从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从统治阶级转化为被统治阶级的条件，创造了资本主义统一体解体，社会主义统一体形成的条件，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条件。毛泽东指出："矛盾着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的双方都不会转化。"（《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8页）而这种转化的条件本身也是由斗争来创造的。因此，离开了斗争性就不可能理解同一性的条件性，也就不能理解同一性。

修正主义者鼓吹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国家资

本主义的出现，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种谬论抹杀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根本条件，也否认了这种转化的条件只有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只有在无产阶级把自己的阶级斗争发展成为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才能够创造出来。没有这个条件，矛盾双方是不会转化的。修正主义者既抹杀了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性，也抹杀了创造这种条件的斗争性，这就表明，他们是一伙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的无产阶级可耻的叛徒。

“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一方面是说，没有不包含斗争性的同一性；同时也指出了，斗争性不能脱离开同一性，因为失去“寓所”的斗争性是不可思议的。同不能离开斗争性来谈同一性一样，离开了同一性谈论斗争性也是错误的。

有人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同一性，理由是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不能转化为无产阶级。这样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首先，这是忘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唯物辩证法要求对矛盾双方的情况要作具体分析，对矛盾双方转化的形式也要具体分析，没有一个千篇一律的公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的转化，主要表现在经过革命，无产阶级转化为统治者，资产阶级转化为被统治者。在此以后，我们还要警惕和防范另一种转化，即经过反革命复辟，资产阶级又转化为统治者，无产阶级重新沦为被统治者。这种统治和被统治地位的转化的事实，正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存在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矛盾同一性。这两个阶级如果没有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同一性，它们之间的地位就根本不能相互转化。而如果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否认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那么，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过去就是为了争取前一种转化

而进行的，在今天则是为了防止后一种转化而进行的。其次，就整个阶级来讲，无产阶级决不会转化为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决不会转化为无产阶级。可是，就个别或局部情况来看，这种转化都是完全可能的，并且在现实中是确实存在的。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在，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工人阶级以至共产党内的各别分子也会蜕变为新资产阶级分子。另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强大，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正确，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承认宪法，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就有可能逐步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资产阶级经过三十年的斗争和教育，他们中间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一事实证明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之间在一定条件之下，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二者之间是存在着同一性的。

在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根本对立的现象之间情况也是这样。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2页）这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两个根本对立事物之间，是互相联结、互相渗透的，对立的一方渗透到对立的另一方的内部去了。因而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不仅表现为两类国家之间的外部冲突，而且表现为两类国家的国内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不仅是同国内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也是同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生死搏斗。

没有同一性的绝对的对立，在自然界中也是不存在的。我

们知道光是电磁波。除了给我们带来光明的可见光以外，还存在着红外线、紫外线、无线电波、γ射线等等肉眼看不见的光线，这也就是说还存在着暗的光线。恩格斯指出："光和暗肯定是自然界中最明显、最尖锐的对立"，"因此，存在着暗的光线，而尽人皆知的光和暗的对立，作为绝对的对立，就从自然科学中消失了。"（《自然辩证法》第263、264页）

总之，割裂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联系，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同一，是一种片面性；只讲对立面的同一，不讲对立面的斗争，则是另一种片面性。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学。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同样，没有同一性也没有斗争性。马克思在批判形而上学时指出："它的全部粗俗性表现在：在它看出有差别的地方就看不见统一，在它看见有统一的地方就看不出差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2页）林彪、"四人帮"在这两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一会儿只讲斗争，不讲同一，高喊什么"斗争就是政策"，"斗斗斗"，"对着干"，"宁要，不要"。一会儿又只讲同一，抹煞差别，否认斗争，在有差别的、甚至根本对立的东西之间随便画等号。他们胡说：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整顿等于复辟，搞生产等于"唯生产力论"，学科学文化等于"白专道路"，知识分子等于精神贵族，经验等于"经验主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完全歪曲、篡改和糟踏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这是他们形而上学猖獗在理论上的突出表现。

在我们把握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联结时，当然不能忽视它们的相互差别。这二者的差别在于，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斗争性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矛盾双方同一性的相对性就在于它的条件性。只有在一定

条件下，矛盾双方才能共居在一个统一体内，也只有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才能转化。无此一定条件，矛盾双方既不能共居于一个统一体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论》）斗争性的绝对性，就在于它的无条件性。只要有矛盾就有斗争。无论是矛盾双方共居于一个统一体时，还是统一体破裂、解体时，无论是矛盾双方处在尚未相互转化的阶段，还是处在正当转化的时刻，矛盾双方无不处在斗争之中，所以说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毛泽东指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事物内部包含着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矛盾论》）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矛盾双方共居于一个统一体内，统一体没有分解，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进到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变化的面貌。事物总是由相对静止的状态向显著变化的状态转化，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由统一物的存在转化为统一物的分解。而斗争则始终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即显著地变化、质变，统一物的分解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面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我们的结论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论》）

六、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认识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矛盾是通过斗争来解决的，只有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才能解决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但是，由于矛盾的性质及其所处的条件不同，矛盾斗争的形式也不一样，所以矛盾斗争的形式又是相对的。毛泽东说："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矛盾论》）我们必须懂得各种不同的矛盾斗争形式的区别，才能正确地处理和解决矛盾。

世界上的矛盾多种多样，斗争的形式也千差万别，但从总体上可以区分为对抗和非对抗两种基本形式。

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存在着对抗与非对抗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两种基本的斗争形式。自然界中，天体星球的正常运行，生物个体的正常发育，品种的不断进化等等，属于非对抗的形式。星体间的相撞，火山爆发，生物界的弱肉强食等等，属于对抗的形式。研究这种斗争形式的区别，对于我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趋利避害，化害为利，为人类服务，是有着指导意义的。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些矛盾双方之间的斗争，最后必须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暴力革命的形式，才能解决。在根本利益互相冲突的各个敌对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最后往往也要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即采取战争的形式才能解决。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与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就是如此。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说的就是帝国主义的各

种矛盾，必然要发展为对抗。认识这些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只有革命和革命战争才能解决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要阶级还存在，帝国主义还存在，就不会有永久的和平。只有用革命和革命战争消灭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才会消灭战争，才会有永久的和平。

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除对抗之外，还有非对抗这一矛盾斗争的形式。非对抗性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或者是由于非根本性质的利害关系而引起，或者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认识分歧而产生。这种矛盾可以通过内部协商方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解决，不必通过外部冲突、暴力对抗的形式来解决。

一般说来，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实际情况是复杂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又包括某些剥削阶级，如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内部，"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质的方法来解决。对敌我之间的矛盾，我们用暴力革命，实行专政等外部对抗的形式来解决。对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则用民主的方式、教育的方式等非对抗的形式来解决。对人民内部的剥削阶级，例如对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由于它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我们也用民主的方式、教育的方式等非对抗的形式去解决。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它还有对抗性的一面，因此要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

产阶级造反。”（《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4页）

列宁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然存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第12页）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一切剥削阶级和任何的阶级差别，以便过渡到共产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要消灭。但是，社会主义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完全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影响，没有完全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因此，在社会主义下，对抗还只在消灭的过程中，而并未完全消灭。毛泽东发展了列宁的这一光辉思想，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指出：社会主义的矛盾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但仍然存在着敌我矛盾。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必须划清，不能混淆。但是，这个界限和一切不同事物的界限一样，不是绝对的、不变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可能相互转化的。

人民内部的正确和错误的矛盾，有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毛泽东曾多次郑重地提醒一些犯错误的同志，要十分警惕这点。他意味深长地说：“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5页）正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有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可能，我们更应当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尽可能地使这种不利的转化不致于发生。我们决不可以做那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削弱自己，壮大敌人的蠢事。我们一定要按“团结——

批评——团结”的公式，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积极的帮助的态度，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提高人民的觉悟，增强人民内部的团结。

敌我矛盾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我们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真理在我们手里，人民在我们一边，如果我们对敌人采取正确的政策，敌人也会发生分化。我们要把敌人中间那部分不那么坚决，不那么顽固的分子，拉过来，改造为人民的一分子，改造为我们的人。要尽量争取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死不改悔、顽固不化的敌人。这样做，既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也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革命精神。

总之，我们一定要正确地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288页）

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搞乱无产阶级的江山，疯狂篡改毛泽东思想，歪曲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大搞形而上学。他们只讲对立，不讲统一；只讲斗争的绝对性，不讲斗争形式的相对性。在他们看来，凡对立必对抗，凡矛盾即敌我。他们到处鼓吹“斗、斗、斗”，“对着干”，宣扬“斗争就是政策”，叫嚷对一切人实行“全面专政”，要“镇反”、杀人。他们到处煽动对抗，在人民内部挑起全面内战，闹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他们对革命人民恨之入骨，而对人民的敌人，对流氓、阿飞、打砸抢分子却视若珍宝。他们打倒一切，唯独不打倒他们这一伙。这一切，都充分暴露了他们所推行的那条极左路线的反动实质，证明他们所高喊的“革命”乃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学习关于斗争绝对性和斗争形式相对性相互联结的原理，要求我们把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辩证地统一起来。首先要承认斗争的绝对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敢于斗争，要有压倒一切敌人，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敢于夺取胜利的英雄气概。要不怕压，不怕骂，不怕鬼，不信邪，敢于同一切阶级敌人、一切困难、一切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同时要承认斗争形式的相对性，这又要求我们要善于斗争，善于通过具体的分析，审慎地区别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去解决这些矛盾。敢于斗争是善于斗争的前提，如果畏首畏尾，回避矛盾，害怕斗争，就等于取消了革命，也就根本谈不上善于斗争。善于斗争又是敢于斗争的实际体现，如果不懂得怎样去斗争，不讲究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到处乱打乱冲，蛮干一气，就势必把事情办坏。所以，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缺一不可的。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体现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避免犯右的或“左”的错误。

毛泽东教导说：“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矛盾论》）就是说，在研究有关矛盾的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都要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结合起来。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关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确实是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第五章　量变质变规律

一、质和量的对立统一
二、量变和质变的互相转化
三、量变和质变的互相渗透
四、飞跃形式的多样性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它深刻地揭示了事物运动的根源和内容。量变质变规律或质量互变规律则是从事物矛盾运动的形式或状态方面进一步说明了事物辩证运动的内容。事物由于其自身的内在矛盾，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事物的发展过程和向对立面的转化，表现为量变和质变两种形式（或两种状态）：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量变质变规律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之一。

一、质和量的对立统一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分为质和量两个对立面。事物是质和量这两个对立面构成的统一体。质和量是事物的两个不同的、互相对立的侧面，它们又是互相依存、互相统一的。一定的质以一定的量为其存在的条件，反之，一定的量也以一定的质为其存在的条件。世界上没有无质之量，也没有无量之质，不具备一定的质和一定的量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什么是质？质是把这一事物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一个事物的质和作为该事物的存在是一回事。质

就是事物存在的直接的规定性。事物的存在依赖于质，一旦失去了质，它就不再是原来的事物。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千差万别，绚丽多彩，就在于它们各有自己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机械唯物主义者否认或不完全承认事物质的多样性，把各式各样的事物都归结为由同质的简单粒子所构成，把运动的不同形式归结为一种简单的机械运动形式，因而给无限丰富多变的物质世界描绘出一幅枯燥、单调的机械的图景。

一个事物和它周围的事物都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都是处在对立统一之中的。事物的各种特性或属性就是在它同外部各种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比较、相互作用中显示出来的。举例说，一个杯子就具有多方面的属性。它作为饮器应当是适宜于喝水。它的式样可以多种多样，但它不同于碟子，罐子，盆子等等，最重要的是不漏水，不会拉破嘴唇。制造杯子的原料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瓷的、玻璃的、塑料的、金属的等等，但这些原料必须是不溶于水的，不是被水一泡就坏的。杯子也可以作为艺术品或文物来欣赏，这时候所要求的就是式样精美，有美丽的图案或雕刻，悦目的色彩，有纪念意义等等，至于是否有些破损，会不会拉咀唇或漏水，就成为无关紧要的了。在我们用杯子盛某种化学药品时，一些与它易起化学反应的金属杯就不适用了。这样的联系还可以举出许多。这说明，一个杯子的特性或属性是多方面的，它的各种属性是通过它与其他事物的多方面的联系表现出来的。我们在确定事物的质时，应该力求全面性，考虑到各方面的联系和作用，把握事物各方面属性的总和。但是事物的各种属性，在确定事物的性质的时候，作用是各不相同的。究竟哪些属性起着决定作用，就必须把人类实践作为实际的确定者包括在内。我们为了实践的需要而认识事物，为了实践的需要区别事物的不同的

质。不同质的事物在人的实践中有不同的作用，人们也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来改造不同的事物。因此，我们必须从事物多方面的属性中，抓住它的与实践紧密相关的本质属性。这些本质属性就是事物的质。个别的非本质的属性的改变并不改变的事物的质。杯子作为饮器，它的本质属性应包括不漏水、不拉破嘴唇……等等，一句话就是适宜于喝水，这也就是它的质。因为杯子在实践中就是用来作为饮具的。至于它到底是什么做的，样子是否好看等等其他方面的属性，我们可以不管，只要这些属性不妨碍喝水就行。这个浅显的例子告诉我们，在确定事物的质，即从事物的各方面的属性中找出本质的属性时，一步也离不开实践，离不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事物的质是多方面的，这都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能由人们任意地来确定，主观地增加或减少它。但是，人们不必要把握住某一事物的全部的质，因为不同的实践过程给人们提出不同的认识的要求，人们就得从事物的不同的侧面来把握事物质的一定的方面。在物理学实践中，冰、水、水蒸气是不同质的事物；而在化学实践中，则这三者并没有什么质的不同，都是H_2O。对于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的社会的质，把人和其他动物严格区分开。人和动物的根本的质的区别在于：人是有意识的、组成一定社会关系的、能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进行生产劳动的动物。人的本质就是在于他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即在于他的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中也就是他的阶级性）。这样的质是一切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而在医学实践中，人们所研究的则是人的生理过程的本质。这里首先要区别的是健康的生理过程还是病态的生理过程，至于人的阶级本质就成为不重要的了。就解剖尸体的实践来说，几乎完全不用管死者的阶级成分，有

时甚至人和其他一些高等动物的区别，都失去了原来的严格意义。在医学研究中，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可以用动物实验来代替对人的病理和药理的实验。上述事例说明，事物各方面的属性（方面是无限多的）为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是确定的、绝对的；但是究竟哪些属性成为决定事物的质的本质属性，却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实践需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又是可变的、相对的。因此，对于质的研究，应当从事物的客观属性和实践的需要出发，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分析。

在对事物的质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时，需要进一步了解事物的质究竟由什么所决定。毛泽东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观点，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说明。他说："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矛盾论》）事物质的多样性决定于事物内部矛盾的复杂性。事物中的每一种矛盾都决定着这个事物的质的一定的方面。但是，这些矛盾并不是平衡的，其中有根本的矛盾和非根本的矛盾。根本的矛盾决定了事物的根本性质或本质属性，事物的质主要地是指它的本质属性的总和。所以，要把握事物的质，就必须区分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从而抓住由它们分别决定的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

同一事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它的根本矛盾没有改变，它的根本性质也就不会改变。但是，由于其他矛盾的复杂变化，也会使这一事物的各个阶段之间产生部分的质的区别。例如，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它们具有共同的根本的质，即资本主义。但是，垄断资本主义以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它就

和自由资本主义具有部分的质的区别。区分事物的部分质，在我们的认识和实践中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它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它意味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已经成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

认识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把不同质的事物区分开来，是我们认识和实践的起点。没有区别就没有认识，没有区别也办不成事情。毛泽东曾说，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在我们革命和建设中，如果不能区分不同质的事物，就既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也不能正确地执行政策。

质的规定性把不同质的事物区分开来，但是在质上相同的事物之间仍然存在着区别，可以进行比较。这样，我们就由质进入到量。什么是事物的量？量就是数量，是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以及组成事物的成分，组成物体的分子、原子和粒子在空间位置上的排列等等。量和质相对立，它是事物的另一种固有的规定性。它和质的不同就在于在一定范围内量的变化不会影响事物的存在，事物仍然是原来的事物。

质是多方面的。同样，量也是多方面的。拿水来说，它有体积、重量、密度、纯度（含杂质的百分比）、温度、水压、流速等等，另外水是两种元素（氢和氧）组成的，氢和氧的比例是二比一等等。再看看商品，它有价值（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价格、产品数量以及各种质量指标（耐用的程度、精密度、光洁度、纯度……等等）。人有身长、体重、年龄、政治觉悟程度、文化水平、技术水平等等。这些量都是客观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在认识和实践中，我们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握事物的一切的量。我们只有根据客观实践的需要考察其中一部分量。因此，在我们研究事物量的

侧面时，和研究质的侧面一样，一步也不能离开实践。

区分事物的质是认识事物的开始，是认识量的前提。对事物的量的认识，是对事物认识的发展和深化。这是认识的一般规律。例如，我们对红、橙、黄、绿、青、蓝、紫等不同质的颜色的认识，只有在认识到它们的不同的电磁波的波长以后，才达到一定的科学的水平。我们要真正科学地理解各种社会形态的质的区别，也离不开对量的方面的分析。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重要的一条是"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为什么只有认识了量才能对事物有真正科学的认识，才能准确把握事物的质？其原因就在于事物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一定的质总是和一定的量相联系而存在的。不同质的事物、不同质的事物的运动，有着不同的量。最简单的物体有体积大小、重量大小，最简单的机械运动——位置的移动有速度的快慢，这都是量的规定性。至于较复杂的事物和较复杂的运动，如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社会运动更是各有其不同的量的规定性。高级运动形式包括低级运动形式，因而它也有显示低级运动的各种量；但是高级运动形式不能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所以它又具有一些为低级运动形式所没有的特殊的量。愈是复杂高级的事物和运动就具有更多方面的量的规定性。有心脏的动物有心脏跳动频率、血压高低等特殊的量，这是其他动物植物和一切无机物所没有的。这些动物如果心脏不再跳动，没有血压，失去了这些量的规定性，它就失去它的质，它就不再是动物，而成为尸体了。另外，社会运动中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科学文化和技术发展水平等其他自然界所没有的特殊的量。总之一种新质事物的出现，必然伴随出现新的量。同样，量也总是一定质的量，没有无质的量。数学是研究"纯

粹”的量的科学，就是在这种“纯粹”的量中，也充满着质的差别，有正数和负数、整数和分数、奇数和偶数、有理数和无理数、实数和虚数等等。可见，质和量，量和质都是不可分的、互相统一的。

相互依存的、不可分的质和量又是互相对立、互相矛盾的。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改变事物的某些量的特性而不致使事物发生显著的变化。例如水的温度可以升高一些或降低一些，水仍然是水。当然，任何数量的变化都会或多或少、这样或那样影响到事物的状态和特性的变化。但是，只要这种数量的变化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事物的质就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个事物仍然是这个事物，没有变成其他事物。一个事物的质是相对稳定的，而它的量在一定范围内则是变动不居的。这就是事物的质和量的对立和统一。

体现事物质和量对立统一的就是事物的度。所谓“度”，就是一定的质之所以能存在的量的限度（范围），在这个限度以内，事物质量双方处于统一状态，超出这个限度，事物的质量统一就会破裂，就转化为另一别的事物，形成新的质量统一体。例如，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水的度就是0°C——100°C，超过这个度就变成冰和水蒸气了。冰和水蒸气在量的方面固然还和水一样有温度的高低，不过冰的温度在0°C以下，水蒸气的温度在100°C以上。此外，冰和水蒸气还各自有着水所没有的特殊的新的量，如冰有硬度的高低，水蒸气有气压的大小等等。

在研究事物的时候，我们可以首先考察事物的质，而暂时撇开它的量；进而可以考察事物的量，而暂时撇开它的质。但是，要真正了解事物，就必须在认识中把质和量统一起来，即掌握它的度。毛泽东指出：“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

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2页）在这里说的“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就是度。只有了解了度，才能准确地把握事物的质，才能认识量对于质的制约作用，从而为我们的实践活动提供一个正确的准则。

要把握事物的“度”，弄清楚“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做到“胸中有‘数’”，就得用数学的工具对事物进行数量的分析，做定量的研究。由于不同质的事物具有不同的量，对不同事物的数量分析的数学工具和数学方法也各不相同。因此，如果不首先确定事物及其运动状态的性质，不做定性研究，数量的分析、定量的研究也难以进行。定性是定量的基础。反过来，定量是定性的精确化。在没有对事物进行定量研究，弄清数量关系，找到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以前，我们对事物的性质还只能是初步的、粗略大致的认识，因而对于自己实践就难以提出十分明确具体的指导。以对人造地球卫星的认识为例：如果对人造地球卫星各方面的数量关系没有一个精密的分析，未得到一系列准确的数据，如第一宇宙速度、火箭的推力、各种轨道参数等等，那末，我们对人造地球卫星性质的了解就是不精确、不完整的，我们在实践中也就无法制造出人造地球卫星，也无法把它送上预定的轨道。由定性到定量的发展，是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也是科学进步的规律。马克思指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参见拉法格：《忆马克思》）。

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也曾经历了一个由定性到定量的不断完善过程。一五四三年，哥白尼发表了《天体运行论》，宣布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都绕太阳旋转，这时太阳中心说还不过是初步确定了天体运行的性质，还只是一个假说，它所提供的只是一个大致的、粗略的认识，还不能以无可辩驳的理论威力完全制服地球中心说。由于研究天体力学的数学的发展和完善化，十七世纪末，在牛顿那里，“最重要的数学方法基本上被确定了”，天体运行的“主要规律彻底弄清楚了”（《自然辩证法》第9页），做到了如牛顿所说的“以数学定律表现自然现象”。到了这时，理论才算达到了比较的完善，科学的天文学才算是建立起来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57页）。一旦做到了胸中有“数”，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大大提高了一步。人们可以根据牛顿所发现的规律，运用完善的数学工具，推算出尚未发现的新行星的运行轨道，并测定它在太空中的位置，使人们在一八四六年发现了第八个大行星——海王星，接着又发现了第九大行星——冥王星。从此，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得到完全的证实。恩格斯在回顾发现海王星的历史时说：“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

在科学史中，首先成功地运用数学并使它自身完美化的科学是固体力学和天体力学。近百年来，各门科学越来越广泛地应用数学，甚至那些看来似乎与数学无缘的生物学和社会科学

也少不了数学。科学和技术越来越依靠数学，离不开数学，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从电子计算机在各门科学研究以及经济管理中日益广泛的应用，以及它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的事实中，就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科学技术现代化，给"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也带来了愈来愈严格的要求，有的药品、金属不允许含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的杂质，有的零件的长度和厚度不能有超过一根头发丝几百分之一的差错，……等等。否则产品就会不合格和发生事故。用放射性照射治疗癌症，剂量太大会损伤患者，剂量太小则没有疗效。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对度有一个准确的测定。门捷列也夫就说过："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现在已经出现了一门专门的计量科学，其目的在于寻求最准确可靠和方便可行的方法，实现准确一致的测量。这门计量学和数学是关系到一切科学部门发展的科学。

所有这一切说明，掌握事物的度，做到胸中有数，对于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量变和质变的互相转化

我们已经知道事物是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又知道事物总是作为质和量的统一而存在的，因此可以肯定，事物的变化必然采取量变和质变两种形式，或者说呈现出量变和质变两种状态。

量变就是事物数量的变化。在这个阶段上，事物矛盾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内，矛盾双方的斗争还没有导致统一体的解体，矛盾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还没有达到足以使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地位的相互转化。这时，原来的矛盾

的统一体仍然存在，事物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而处于相对稳定、统一、相持、平衡、静止状态之中。量变是一种变化，但是，这是一种逐渐的，不显著的变化。质变就是事物性质的变化。在质变的阶段上，由于矛盾双方斗争的激化，造成旧统一体的解体，使矛盾双方力量对比消长达到了矛盾双方地位的互相转化，原来居于被支配地位的非主要的矛盾方面上升为决定事物性质的居支配地位的主要的矛盾方面，因而引起了事物性质的根本变化。质变是旧的矛盾统一体的瓦解，新的矛盾统一体的形成，是一种迅速、显著的变化，是飞跃，是连续性的中断。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先从量变开始。量的增加或减少，在一定限度内不引起质的变化，即事物还保持自己的相对稳定性。但是，量的变化超出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超出上面谈到的度这个关节点，就引起了质的变化，旧质归于消灭，而出现了新的质。这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在质变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统一体，出现新的量的变化。这是质变到量变的转化。处于新的统一、平衡、相持、静止的量变状态，又会被新的质变、飞跃所破坏。这又是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如此，量变、质变、新的量变、新的质变……不断地互相转化，循环往复，就构成了事物无限多样的发展过程。

量变和质变互相转化或质量互变，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它已被人类全部科学发展史所证实。

宇宙是无限大的，它又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可是，“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它就转化为质的差别：物体纯粹是由分子构成的，但它是本质上不同于分子的东西，正如分子又不同于原子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6页）宇宙的无限多样化的物质客体由于物质量的不同（质量的大小，所占空间的大小），分为许多不同质的物质

层次。

层　次（质）	质量限度（量—单位：克）	空间限度（量—单位：厘米）
星系	10^{38}—10^{45}	10^{20}—10^{23}
恒星	10^{32}—10^{35}	10^{6}—10^{14}
行星	10^{24}—10^{30}	10^{8}—10^{10}
物体、小天体	10^{-15}—10^{24}	10^{-5}—10^{7}
分子	10^{-22}—10^{-15}	10^{-8}—10^{-6}
原子	10^{-23}—10^{-21}	10^{-8}—10^{-7}
原子核	10^{-23}—10^{-21}	10^{-13}—10^{-12}
基本粒子	0—10^{-23}	10^{-13}

以上图表只是表明现代科学已初步探明的物质的不同质的层次，并没有穷竭一切层次。在基本粒子中还有更小更深的层次——层子（外国叫“夸克”）。物体因其大小和质量的不同而分为不同质的层次，这是自然界由量变到质变规律的一个重要表现。

自然科学的研究揭示出，由于量的不同而造成的不同质的层次的物体，有着其特有的运动规律和吸引—排斥的不同形式。这就是量变引起了质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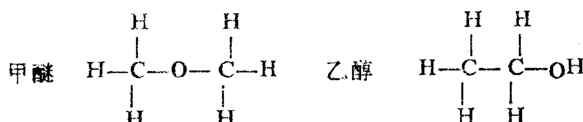
恩格斯指出：“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和分离、收缩和膨胀，——一句话，是吸引和排斥这一古老的两根对立。”（同上，第493页）一切不同质的层次的物体都是吸引和排斥的矛盾统一体。这里所讲的吸引和排斥的含义不只局限于机械的接近和分离、收缩和膨胀，还包括吸收和发射、电离和复合、化合和分解等等矛盾。一切层次的不同质的物体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基本上都是由吸引和排斥这一对矛盾的统一和斗争引起的。我们日常与之打交道的三种物质形态（气体、液体、固

体）的由量到质的变化就是由于热运动引起的分子之间的排斥力和分子之间的吸引力这一对矛盾所造成的。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水温在100°C以上，排斥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水处于蒸气状态；水温降至100°C以下，排斥的作用降低，吸引的作用升高，水处于液体状态；水温降至0°C以下，吸引成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水处于固体状态，变成了冰。

门捷列也夫周期表揭明，在自然界原子量的变化引起元素的质的变化。现代科学更加精确地断定，原子核内质子数目的变化，引起元素的质变。质子都是带正电的互相排斥的粒子，它们被巨大的核力所吸引，紧密地聚集在一起，组成原子核。当在一定条件下排斥力超过吸引力，就会使原子核发生裂变，从一种重元素可以分裂成两种不同质的新元素。在另一种条件下，由于吸引力增大而发生聚变，使两个较轻的原子核组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核，其中质子数量增加，就形成一种不同质的重元素。

恩格斯指出："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同上，第487页）化学的化合和分解，本来就是吸引和排斥两种对立力量矛盾斗争的结果。吸引力超过排斥力，就能把不同质的元素或不同质化合物的分子聚集在一起，成为一种新质的化合物。反之，排斥力增强，就会使一种化合物分解成为不同质的化合物和元素。还有，在同样几种元素组成的化合物中，仅仅由于它们组成比例的不同，也会产生完全不同质的化合物。拿氧（O_2）和氮（N_2）的化合物来看：笑气（一氧化二氮N_2O）是气体；无水硝酸（五氧化二氮N_2O_5）在常温下是结晶的固体，它们之间的质的不同，仅仅是由于其中含氧的量的不同，后者含氧量是前者的五倍。其他三种氮氧化合物NO、N_2O_3、NO_3，也都是由元素之间组成量的比例

不同而在质上互相区别。十分明显，这种变化不是由于氮原子对氧原子吸收力的变化（表现为氮原子的原子价的变化）引起的。在化学中，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还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条件下，由于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空间排列次序上的变化而引起事物的质变。有机化学可以证明这个原理。例如普通酒精（乙醇）和甲醚，它们每个分子中所包含的都是两个碳(C)原子、六个氢(H)原子和一个氧(O)原子，分子式都是C_2H_6O，但是由于这些原子之间排列顺序不同，结构式不同，就形成了两种不同质的化合物：



甲醚是气体，几乎不溶于水，酒精（乙醇）是液体，在78°C时沸腾，能以任何比例和水混合，甲醚和酒精的化学性质也很少相像。

对于上面列举的事实，恩格斯作了这样的概括："自然界中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基于不同的化学成分，或是基于运动（能）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差不多总是这样——同时基于这两者。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5页）

质量互变既普遍存在于无机界，也普遍存在于有机界和人类社会。无论在生物发展史或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发展过程的每一步都证实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不过在这两个领域中同物理化学等精密科学不同，其中的许多量往往难以用精确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

生物物种的演化，由旧物种到新物种的转化，是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通过这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使地球上最初几种极其简单的原生生物发展成为种类繁多的花草树木、虫鱼鸟兽。推动这个过程的是生物体自身的遗传和变异的矛盾以及生物体和环境的矛盾，是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由此，在生物中就有了新和旧的对立斗争。生物每一物种在其繁殖过程中，子代与亲代基本相似，这是遗传的一面；子代和亲代又不尽相同，这是变异的一面。这种子亲相似情况下的变异，一般就是量变。由于生物和环境的矛盾，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经过长时期一代代的繁殖，后代与其祖先的差别愈来愈大，这就是变异的量的积累。到了一定阶段，同一祖先的后代就会形成一个或多个与其祖先不同的新的物种，这就是质变、飞跃。华南虎和东北虎有着共同的祖先，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彼此之间在形态上和生理上已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变异的量的积累已经可以明显地察觉出来，但是还没有达到根本的质变。因为，华南虎和东北虎仍然属于同一生物物种，它们在形态上和生理上基本相同，所要求的生活条件也基本相同，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可以相互杂交，杂交后会产出能育的后代。这就是说，它们彼此之间的遗传质仍可以互相交流，遗传的方面仍是主要的方面，变异的方面仍属于被支配的方面，原有的遗传和变异的对立统一，仍然继续存在。狮子、老虎和豹也有着共同的祖先，都属于同一的属——豹属。但是，它们已是不同的物种了，彼此有着根本的质的差别，它们不能进行杂交。不能杂交或杂交不育，就意味着彼此的遗传质不能相互交流，这就是生物物种之间根本的质的差别的重要标志。这种由杂交能育到杂交不育，就是由量变引起了质变，是飞跃，是连续性的中断。这时，变异的方面已经转化为支配的方面，遗传的方面已转化为被支配

的方面，原有的遗传和变异的统一已被破坏，而建立起了新的对立统一。这就雄辩地说明了生物物种的演化，也是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

生物的不同物种之间的质的区别，它们的界限，是确定的、分明的。但是，这种分明的界限又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恩格斯指出："〔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了，鱼和两栖类之间的界限也是一样；而鸟和爬虫类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消失，细颚龙和始祖鸟之间只缺少几个中间环节，而有牙齿的鸟喙在两半球上都出现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的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页）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决不是否定了物种之间的质的区别，而只是反对把质的界限绝对化，这恰恰进一步说明了，由于量的积累（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而达到质的改变，是生物进化的普遍规律。科学的发展日益证明辩证法，证明从量变到质变规律的正确性。

形而上学者否认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有的人否认质变需要量变的准备，把质变看成突如其来出现的偶然事变，并且否认质变是事物自身的变化，把它看做是纯粹外力造成的。有的人只承认事物的量变，不承认事物的质变。这两种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在生物学的领域都有突出的表现。

十九世纪法国自然科学家居维叶提出的生物的"激变论"认为，有机界的变化是由于突然性的灾变所引起的。这种理论

虽然不得不承认地球上一些古代的生物物种消灭了、一些古代没有的新的生物物种出现的事实，但却认为生物物种的变化是没有量变作准备的突然的质变，这种质变是由某种神迹创造的一些新物种，代替了那些被突然性灾变所消灭的旧物种。这种观点，显然是神学唯心主义对科学事实的歪曲。

十八世纪法国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把一切变化都归结为纯粹的量变。例如鲁宾在《论自然》一书中说："石头、槲树、马、不是人，但在它们中间，可以多多少少地看到人的粗形。……在石头和植物中，可以找到同样的生命的主要原则，和在人类机体中所找到一样；一切差别是在于这些形质的组合，在于各种器官的数量、比例、排列和形状。"这就完全否认了不同事物之间的质的差别，否认生物和非生物、植物和动物、低等生物和高等生物、动物和人类等等之间的质的差别，也否认了事物的发展和变化。这种观点已被达尔文的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彻底驳倒。在十九世纪下半期，人们在大量的生物进化的确凿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发展。但是，形而上学者并不认输，他们却以庸俗进化论的形式来和唯物辩证法相对抗。这种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对生物的进化作了庸俗的歪曲的解释，认为生物的进化只是量变，没有质变，只有量的渐进，没有质的飞跃，只有连续性，没有间断性。这种错误理论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但它却从反面告诉我们自觉掌握辩证法，掌握从量变到质变规律的必要性，以提高我们对在"科学"幌子掩盖下的伪科学的识别力。

在社会发展中，从一个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过渡，也是按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进行的。这种变化的进程也都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所推动的。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矛盾主要地表现为阶级的矛盾，表现为新兴的革命

阶级和腐朽的反动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在阶级斗争中，新兴的革命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腐朽的反动阶级的力量不断地被削弱，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但是，在力量对比上还不足以改变反动阶级的优势地位，它仍掌握着政权，维持着旧的社会秩序，这时的社会发展就还处在量变的阶段、进化的阶段。当新兴的革命阶级的力量发展到足够强大，能够采取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压倒腐朽反动阶级的时候，社会的发展就进到了质变和飞跃的阶段，旧社会形态就合乎规律地被新社会形态所取代了。列宁指出：历史的发展“正好象自然界的生命和发展过程既包含有缓慢的进化，也包含有迅速的飞跃，即渐进性的中断一样”。（《列宁选集》第2卷第394页）

但是，这种社会发展中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也被形而上学者硬加歪曲和否定。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人运动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认为，社会的革命变革，无需量的准备，无需革命力量的积累，只要有一次偶然的突然袭击就可以完成。这种形而上学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盲动性在理论上的表现。在实践上它只能挫伤新兴阶级的革命力量，起到破坏革命的作用。列宁曾指出这是一种革命者的“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如托洛茨基、布哈林、林彪、“四人帮”之流，极力散布种种极“左”思潮，鼓吹“不间断地革命”，并不是由于他们“幼稚”，而是利用幼稚者的革命热情玩弄制造蛊惑人心的阴险的骗局，借以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一种手段。他们所推行的都是置革命于死地而后快的极“左”路线。另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就是社会领域的庸俗进化论。它只承认对社会的点滴改良否认社会的根本变革。帝国主义的奴才、实用主义者胡适，就是这种谬论的鼓吹者。他否认根本变革，主张以“进化”来代替飞跃，代替革命。他说：“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

认根本的解决。它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修正主义者所贩卖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说教，同样，也是否认飞跃的庸俗进化论的反动货色。列宁指出：“资本主义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总的状况，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列宁选集》第2卷第393页）在这里，我们就不仅可以看到形而上学发展观在理论上的错误，而且可以认清它在政治上反动的阶级实质。庸俗进化论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论。

总的说来，坚持辩证的发展观，必须承认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的转化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4页）这里所讲的转化的“矛盾性”，表现为：（一）转化即是飞跃，即是连续和中断的对立统一，存在和非存在的对立统一；（二）从量变到质变的推动力和根源，在于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统一和斗争。

三、量变和质变的互相渗透

量和质是对立的统一，没有纯粹的量，也没有纯粹的质。同样，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没有纯粹的量变，也没有纯粹的质变。量变和质变是统一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由于事物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事物的量变和质变都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是互相交错、互相渗透的。一方面，量变中渗透着质变，这就是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另方面，质变中渗透着量变，这就是根本

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

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可以区分为如下两种情况：一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未变而比较次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使事物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这可以叫做阶段性的部分质变；一是事物就全局来说性质未变而其中个别部分发生了性质的变化，这可以叫做局部性的部分质变。

事物的阶段性的部分质变，产生于事物内部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变化的不平衡性或不均一性。毛泽东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矛盾论》）这就是说，只要事物发展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没有改变，事物仍然处于总的量变过程中。但是，由于上述种种矛盾运动的复杂情况，事物的某些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虽未能改变事物的根本性质，但却使事物的部分的质发生变化，呈现出阶段性来，所以，这种变化属于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许多阶段性的部分质变，这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类认识发展中的普遍现象。例如在生物物种进化过程中，由旧物种的演化直到新物种产生以前，都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只有新物种的产生才是根本的质变。但是在旧物种演化为新物种的总的量变过程中，往往是由旧物种首先发展成为不同的

族或亚种(前面所讲的华南虎和东北虎就是虎的不同的亚种),这种亚种可以看做是同一物种内的部分质变。华南虎和东北虎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只是部分质的区别。人从生到死,这是一个总的量变过程,同时也是不断进行部分质变的过程。从婴儿时代到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这些阶段的发展,都是部分质变的表现。人死了,就达到根本的质变。

社会生活也是这样。例如,封建社会在其向资本主义社会飞跃以前,是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在这个总的量变过程中,由劳役地租到实物地租、再到货币地租的转化,都是同一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的部分质变。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垄断的资本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在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事物的根本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地量变,通过不同阶段中的部分质变的积累而准备起来的。

事物的局部性的部分质变,是由于事物内部各部分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或不均一性造成的。事物的全体和部分即全局和局部,是对立的统一。毛泽东说:“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而“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组成一全局的各个局部,其发展变化并不是整齐划一的,由于各种条件的不同,其中有些可以首先发生变化,有些可以暂时相对地不变,这就出现了各个局部变化的不平衡性。但是,只要全局的根本性质未变,只是其中的某些局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也属于总的量变过程的部分质变。

总的量变过程中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在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也是普遍的。例如,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水由0°C—100°C是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总的说来,在这个阶段内热运动所产生

的水分子之间的排斥力还不足以克服水分子之间的吸引力，使水分子可以弥散于空间，由液体转化蒸气。可是，这时水的表层分子也可能获得能量，克服分子间的吸力而飞逸到空中，造成部分的质变，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水的蒸发。生物从它出生到死亡的总的量变过程中，就整体来说，它是正常地进行着新陈代谢生理过程的活的有机体。可是其中个别部分，如某些肢体或非要害的脏器等，由于种种原因，正常的新陈代谢的生理过程被破坏，使得这些肢体或脏器发生萎缩、坏死或丧失了应有的生理机能，对这些肢体或脏器来说是质变，对生命整体来说就只是部分的质变，因为，这些部分的质变还不是整个生命的死亡。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各个部分在全局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如果有些事关全局的部分发生质变，就势必引起全局的根本的变化，这种部分质变就和根本质变成为一回事了。一个肾脏坏死加以摘除，可以不影响这人的生命，这是部分质变；如果是心脏坏死，那就意味着人的死亡，这就成了根本的质变。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道路，生动地说明了局部性部分质变的情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原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在我国的民主革命中，总的量变过程中个别部分发生性质变化的情况非常明显。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先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组织动员起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内，政权性质变了，社会性质变了，人民翻身做了主人，这无疑是质变。但是就全国来说，根本性质未变，仍然是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在一定范围内的发展，对全中国说来只是部分的质变。随着人民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而革命根据地每扩大到一个

新的地区，就意味着这一新地区发生了根本的质变，但对全国来说，仍然是部分质变。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不断扩大，也就是整个人民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三大敌人力量的不断削弱，这种力量的对比还没有达到全国性的决战阶段以前，还是属于总的量变过程。我国的民主革命就是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一个一个地夺取阵地，不断地壮大革命人民的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经过战略性的决战，夺取全国胜利的。建立了全国性的人民政权，在全国范围内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剥夺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这才实现了根本的质变。这个根本质变就是：整个中国社会性质变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变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全国性政权的性质变了，由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政变成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主义专政；局部性的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性质也变了，从实现民主改革的政权变成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总之，“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页）在这个新的时代里，这个新质的基础上，又开始新的量变和质变的辩证运动。

部分质变对于事物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部分质变促进总的量变，并为整个事物的根本质变创造条件。当然，部分质变本身也必须有量的准备，只有量的准备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引起部分质变。

应当指出，要正确地认识部分质变，必须划清两条界限，这就是：既不能把部分质变等同于一般量变，只看到事物的根本性质的变化而无视它的部分性质的变化；也不能把事物的部分性质的变化当作根本性质的变化。否则，就会犯严重的理论错误和政治错误。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是一种部

分质变，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理解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不懂得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无法弄懂列宁主义。因为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然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却把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发展说成是根本的质变，把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当成是与自由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胡说什么它消灭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消灭了竞争，消灭了危机，消灭了战争等等。他们认为，可以经过资本主义的垄断经济和平地转化为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列宁尖锐地驳斥了这种谬论。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没有而且不能自下而上的改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复杂尖锐起来，使垄断和自由竞争‘搅在一起’，而不能消除交换、市场、竞争、危机等等。

帝国主义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不是纯粹的垄断，而是垄断和交换、市场、竞争、危机并存，——这就是一般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列宁全集》第24卷第431页）

因此，列宁又着重指出：

“正是竞争和垄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则’的结合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正是这种结合在造成崩溃，即造成社会主义革命。”（同上，第431—432页）

可以看出，把由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看成是根本质变，是一种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为列宁所痛斥的叛徒的理论。

总之，量变质变规律或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量变和质变不仅相互转化、相互过渡，而且相互交错、相互渗透。深刻理解这个规律的基本内容，特别是量变和质变、根本质变和部

分质变的辩证关系，对于正确把握事物的矛盾运动，依据事物的客观规律来指导人们的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飞跃形式的多样性

从量变和质变的相互关系中我们了解到，质变虽然是量变的必然结果，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但是，只有质变才是事物旧的矛盾统一体的瓦解、新的矛盾统一体的形成，才是事物由旧质态向新质态的革命转化，才是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飞跃。所以，列宁把是否承认飞跃，作为区别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转化的标志。为了在认识上准确地把握事物的质变，在实践上促进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就必须研究事物飞跃的不同形式。

恩格斯指出：质的变化，"以对于每一个别场合都是严格地确定的方式进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5页）由于不同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以及它所处的外部条件的特殊性，因而它的飞跃形式也各不相同，产生了飞跃形式的多样性。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把千差万别的飞跃归结为两种基本的形式：爆发式的飞跃和非爆发式的飞跃。一般说来，爆发式飞跃和非爆发式飞跃的区分是与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分相联系的。

爆发式的飞跃，通常是解决对抗性矛盾的质变形式。这种形式的飞跃，是经过充分的量变准备之后，新事物与旧事物发生剧烈的外部冲突，通过一次或几次决定性的打击，摧毁阻碍新事物诞生和成长的桎梏，使新事物迅速战胜旧事物的根本质变。自然现象中的火山爆发、炸弹爆炸、热核反应等，都是爆发式的飞跃。在剥削制社会内，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剧

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这种矛盾不可能由旧的剥削制社会本身来解决，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打烂这种剥削制度才能解决。因此，从一种剥削制社会向另一剥削制社会过渡的质变，从剥削制社会向消灭剥削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质变，都是通过爆发的形式实现飞跃的。

非爆发式的飞跃，通常是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质变形式。在这种飞跃形式下，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化时不发生剧烈的外部冲突，而是通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而实现的。生物物种的进化，由一种旧物种到新物种的转变，就是这种非爆发式的飞跃。由猿到人的转化也是如此。类人猿在劳动过程中，直立行走，手和脚的分工，手的解放，语言的产生，能思维的脑髓的发展，从利用天然工具到制造石刀石斧等工具……，这一系列的新质要素逐渐积累起来，与此相对应，类人猿原来具有的一些旧质要素的逐渐地衰亡下去，最终由猿变成了人。这是一个根本的质变，是一个极其伟大的飞跃，其结果，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最高等的脊椎动物，“在它自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在整个物质发展中，产生了“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6、462页）

非爆发式的飞跃在剥削制社会中也是存在的，如语言的质的变化就是。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飞跃形式则成为经常的普遍的形式。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而无须采取外部冲突的解决办法。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由个体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的飞跃，它不是采用外部冲突的方法，而是通过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自上而下的领导和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办法来实现的。

实际生活是非常复杂的。同样性质的矛盾着的事物，由于外部条件的不同，其飞跃的形式也会不同。例如，原子核的裂变在原子弹中是爆发式的飞跃，而在原子发电站的原子反应堆中就是非爆发式的飞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通常是要采取爆发式的飞跃形式。但是在我国强大的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条件下，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采用和平改造的方法来解决，可以经过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飞跃。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其中有社会主义要素，也有资本主义的要素。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等不同的阶段，社会主义要素逐渐积累，资本主义要素逐渐衰亡，最后使社会主义要素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基本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见，事物飞跃的形式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而是可以随着事物矛盾性质的转变以及条件的改变而变化的。由于矛盾的复杂性和所处条件的多样性，还往往有这种情形：一个总的飞跃过程是爆发式的，但不排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个别非爆发式的飞跃；一个总的飞跃过程是非爆发式的，但其中也可能出现个别的、部分的爆发式的飞跃。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对具体事物的具体矛盾和具体条件，采取具体分析的方法，而不能用一种死板的模式到处去套。

在我们具体地分析飞跃形式时，还要看到它在时间持续上是各不相同的。有的质变时间很短，这固然是飞跃，有的质变的时间很长，这同样也是飞跃。从猿到人经历了上百万年的时间，但这仍然是一个飞跃，因为这是一种根本的转变，是动物发展序列的连续性的中断。上百万年时间对整个生物发展史，

对整个地球发展史的漫长岁月，对于整个自然界发展史的无限长河说来，仍然是短暂的一瞬间。所以，对于判断某种变化是不是飞跃，不能简单地以时间的短长作标准。列宁批评了那些认为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生活和苏维埃民主制的任务可以一下子解决的人，指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飞跃，往往包括十年或更多的年代。（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页）恩格斯指出，事物的变化"不管一切渐进性，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5页）

总之，我们既要看到飞跃形式的多样性，又要在多样性中把握它们共同的本质。这样才能把彻底革命精神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　　*　　*

综上所述，事物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事物的变化是量变和质变的对立统一，它们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互相转化和互相渗透；事物的质变、飞跃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它具有共同的内容，又采取多样的形式。这些就是量变质变或质量互变规律的基本思想。

量变质变规律，具有重大的、多方面的实践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这个原理提供了全面的坚实的哲学基础。量变和质变的互相转化，反映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量变和质变互相交错、互相渗透的原理，进一步揭示了不仅在新旧事物过程之间，而且在同一事物、同一过程的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都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革命的发展也是如此。革命是不断的，又是分阶段的。不能脱离革命发展阶段

论孤立地去搞不断革命论，也不能脱离不断革命论孤立地去搞革命发展阶段论，而应当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毛泽东总是教导我们，不要超过客观事物固有的阶段性，把下一阶段的事情勉强放在现时来做；但又要在上一阶段给下一阶段做适当的准备，并且在发生根本质变、全局质变或者部分质变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要抓住时机，采取符合客观事物固有的飞跃形式的恰当方法，把革命推进到新的阶段，使上一阶段和下一阶段、“上篇”和“下篇”衔接起来。

林彪、“四人帮”是一伙毫无原则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野心家。他们一会儿抓住革命阶段论来反对不断革命论，一会儿又抓住不断革命论来反对革命阶段论。他们根本反对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要发现和培育共产主义新芽，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做准备，用僵死的阶段论，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所总结的大庆经验——“城乡结合、工农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胡说这是超越阶段，对现实毫无意义。他们更多的是打着“超级革命”的幌子完全不顾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肆意践踏党的现行政策。他们不管各个农业生产队的条件和生产发展水平，鼓吹要一律向生产大队核算、甚至向公社核算过渡；叫嚷要在社会主义阶段，就取消按劳分配；在目前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并存的阶段，就妄图取消商品经济，等等。总之，他们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登峰造极，完全割裂了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统一，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革命论的死敌。

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统一，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揭批林彪、“四人帮”以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的锐利武器。

第六章　肯定否定规律

一、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辩证的否定
二、否定之否定，螺旋式的上升或波浪式的前进
三、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肯定否定规律或否定之否定规律说明了事物矛盾运动的方向和道路，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事物由于内部矛盾的斗争而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由肯定达到对自身的否定，再由否定达到否定之否定即新的肯定；揭示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抗拒的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对立统一，即螺旋式的上升或波浪式的前进运动。

一、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辩证的否定

从发展中把握事物，就会发现任何事物都一分为二，分为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肯定的方面是事物中维持其存在的方面，即肯定这一事物为它自身的方面。否定的方面是事物中促使它灭亡的方面，促使它转化为其他事物的方面，即促使事物自我否定的方面。事物内部的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互相斗争着，当其中肯定的方面仍处于优势时，事物则保持其原有的性质和自身的存在；一旦否定的方面在斗争中战胜了肯定的方面，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就使事物转化到自己的对立面，达到对事物自身的否定。因此，否定就是一事物向他事物的转化，

就是旧质向新质的飞跃。引起否定的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的矛盾。

肯定和否定这两个矛盾的方面，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双方都不能独立存在，各以其对立的一方为自己存在的条件。离开了否定就不能理解肯定；同样，离开了肯定也不能理解否定。肯定和否定的互相依赖和互相渗透在于：一方面，在一定意义上，肯定就是否定，肯定包含否定；另方面，在一定意义上，否定又是肯定，否定包含肯定。这是客观事物的辩证法。

在一定意义上，肯定就是否定。认识事物就得首先肯定它是什么，肯定了它是“这个”，同时也就否定了它是“那个”。离开了否定，不顾及到这一事物和他事物之间的差别、联系和转化，对这一事物作出简单的、肯定的论断，那末，这样的肯定就是不完全的、无生命的、僵死的。当我们肯定某人所犯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否定了它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如果我们不清楚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的差别、联系以及它们互相转化的条件，那末，我们对这一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简单的、肯定的论断，也就是不完全的、无力量的，就显得不那么确实和可靠。

肯定中包含着否定。死亡是对生命的否定，可是，生命中就包含着死亡，撇开了死亡就无从理解生命。恩格斯指出：“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生就意味着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0页）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同时学习那些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反面东西，否则我们学到的东西也是不巩固的，没有力量的，

这也就是说，在我们头脑中还没有真正充分的肯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347页）驳不倒（不能否定）反面的东西，就不能充分肯定正面的东西。

反过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也就是肯定，撇开了肯定也无从理解否定，对谬误的否定也就是对真理的肯定。批评是对错误的否定，而真正善意的批评则是"治病救人"。通过批评否定错误，这是治病；通过批评，让被批评者"恢复健康"，为他指出前进的道路，这又是"救人"。所以说，批评这种否定必定也是一种肯定。不仅从"救人"这种积极意义来讲是肯定，而且从开出"治病"的药方和指出错误的方法来讲也是肯定。同样，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肯定；反之，无产阶级的敌人象林彪"四人帮"之流对社会主义的种种否定，无非都是对资本主义的肯定，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鬼蜮伎俩。

否定中包含着肯定，也就是说没有纯粹的、抽象的否定。辩证法的否定决不是简单地宣布没有，不是转化为绝对的无，不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恩格斯曾以零为例，精辟而深刻地说明了这一问题。"零是任何一个确定的量的否定，所以不是没有内容的。相反地，零是具有非常确定的内容的。作为一切正数和负数之间的界限，作为能够既不是正又不是负的唯一真正的中性数，零不只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数，而且它本身比其他一切被它所限定的数更重要。事实上，零比其他一切数都有更丰富的内容。""甚至温度表上的绝对零度也决不代表纯粹

的、抽象的否定，而是代表物质的十分确定的状态，即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分子独立运动的最后痕迹消失了，而物质只是作为质量起着作用。总之，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碰到零，它总是代表某种十分确定的东西，而它在几何学、力学等等中的实际应用又证明：作为界限，它比其他一切被它所限定的实数都更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04—605、606页）

懂得了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就能够深刻把握否定这一范畴的辩证含义。科学的否定观在辩证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的实质之所在。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在辩证法看来，任何东西都不是绝对的、永恒的，它迟早是要被否定的；世界决不会停滞不前，它永远处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中。发展就是对旧事物的否定，“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存在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9页），因此，不理解否定，就不知道什么是发展。事物发展的动力何在？恩格斯指出：“真正的、自然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否定正是一切发展的推动力（从形式方面看）——对立之划分，对立的斗争和解决”。（同上，第20卷第673页）因此，不理解否定，也不会知道为什么能发展。

总之，辩证的否定是事物发展的契机，不理解否定，就不能理解有关发展的任何问题。我们已知道，辩证法不是别的，它就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列宁曾

经说过，辩证的否定是辩证法中最重要的因素。这个论断同前面所讲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和解决，而辩证的否定，就是矛盾一方否定另一方，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要真正抓住矛盾这个核心，就必须抓住辩证的否定这个最重要的因素。

要正确地理解辩证的否定，必须掌握它如下的两个重要特点：第一，它是发展的环节。就是说，它是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变，是新事物克服旧事物，是新旧事物的决裂，是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的中断。第二，它又是联系的环节。就是说，新旧事物又通过否定的环节联系起来。在辩证法看来，新事物产生于旧事物，并在旧事物的母腹中生长起来。新事物正是以吸取、保留并改造旧事物中积极的东西，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作为发展环节、联系环节的辩证否定，既是克服又是保留。克服是发展中的连续性的中断，是发展中的非连续性；保留则是发展的历史延续，是发展中的连续性。辩证的否定就是这种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对立统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对于否定这个“辩证的环节”，“要求指出‘统一’，也就是指出否定的东西和肯定的东西的联系，指出这个肯定的东西存在于否定的东西之中。”（《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5页）简言之，辩证的否定，就是包括着肯定因素的否定。这样，我们通过对否定这个环节的分析，又进一步加深了对于肯定和否定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解。

在生物界的发展中，一个物种转变为新物种，在新旧物种之间有一条确定的界线，这是发展中的非连续性，是新物种对旧物种的否定。在新物种对旧物种否定时，不仅不排斥而且必须保留旧物种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是新物种适应于新条件，维持其生存和繁殖所必需的。我们在新旧物种之间不难看出其

血缘联系，这就是在否定中体现的发展的连续性的方面。但是，这种连续性终究又是非连续的。因为新物种已对其所保留的旧物种的特性加以改造并容纳于新物种的遗传质之中，在新旧物种之间已经不能交换遗传质，不能杂交产生能育后代。这就是新旧物种之间的确定的界线，是否定的非连续的方面。正是这种辩证的否定构成了生物物种的进化。这种否定，是对于物种与环境（生存条件）之间矛盾的解决，其结果是，适应者生存，不适应者自然淘汰。这种否定根源于生物物种自身的遗传和变异的矛盾。通过遗传，生物个体把它在长期发展中所获得的特性传给后代，使后代能象它那样适应于环境，维持其生存和繁殖。只要生物的遗传质不变，物种也就不变。因此，遗传是生物物种维持其繁衍存在的方面，是生物物种的肯定的方面。变异是生物物种在适应环境过程中产生的某些特性的变化，包括旧特性的消失和新特性的形成。这些特性的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改变了生物物种的遗传质，形成了新的物种，这就是对旧物种的否定。因此，变异是促进生物物种变革的方面，是生物物种的否定的方面。新物种对旧物种的否定，就是旧物种中否定的方面和肯定的方面、变异和遗传斗争的结果，是否定的方面对肯定方面的克服，是变异战胜了遗传。

在新物种对旧物种的否定中，既克服了旧物种中那些不适应于环境的特征，又保留了另一些对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还有积极作用的特征，并且形成了更能适应环境的新特征。因此，新物种比旧物种优越，更能适应环境。这就是进化。生物物种的进化就是通过解决它自身的遗传和变异的矛盾，来解决它和变化了的环境的矛盾，形成更能适应环境的新物种，达到对自身的否定。

在生物的进化过程中，总的来说，物种的肯定的方面——

遗传，是保守的方面、稳定的方面；物种的否定的方面——变异，是进步的方面、变革的方面。但是在具体分析它们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以及生物进化本身的辩证性质时，还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保守和稳定也具有两重性，它们是进步和变革的必要条件。就是说，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它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使变异不断地积累起来，否则就不会有生物的进化。当然，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植物和动物就会永远停顿下来，没有进化和发展了。拿对实现农业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的农牧业生产的良种化来说吧，如果没有变异，就无从培育良种；如果没有遗传，不能保持良种的相对稳定性，也就谈不到对良种的推广和利用。遗传和变异，缺一不可，否则，也就无所谓良种化。

第二，进化和退化也是对立统一，进化中就包含着退化。恩格斯指出："由于对变化了的环境有较大适应能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生存下来的是更能适合这些环境的，但是，在这里这种适应总的说来可以是进化，也可以是退化（例如，对寄生生活的适应总是退化）。重要的是：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退化，因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然而这是一个基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1页）

包含肯定于自身的辩证的否定，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中。人类的理性是对动物感性反映形式的否定。人类的意识不同于动物的心理，它是以概念的理性的形式来反映周围世界的。可是，人类的这种理性反映形式是在动物感性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把动物的感性反映形式经过重大的改变而保

留下来。人类的理性离不开感性，但人类的感性又不同于动物的纯感性，而是带着理性的感性。这样的否定，就是既克服又保留的辩证的否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社会形态的更替也是通过辩证的否定来实现的。在历史上，新的社会形态克服了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建立了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但是，同时又保留了并改造了在旧有社会形态中人类生产力和科学文化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科学的发展，也是辩证的否定过程。例如，只有对燃素说的否定，才使化学变成了真正的科学。“但是燃素说者的实验结果并不因此而完全被排除。相反地，这些实验结果仍然存在，只是它们的公式被倒过来了，从燃素说的语言翻成了现今通用的化学的语言，因此它们还保持着自己的有效性。

黑格尔的辩证法同合理的辩证法的关系，正如热素说同热之唯动说①的关系，燃素说同拉瓦锡理论②的关系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71页）这里都是既克服又保留，既决裂又联系。

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辩证的否定，但是，不同事物的发展又有不同形式的辩证的否定。例如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对最后一个私有制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就不同于历史上其它私有制社会对另一个私有制社会的否定。新兴的私有制社会的经济基础可以在腐朽的私有制社会内部孕育成熟。这时，新社会对旧社会的否定，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对旧制度和旧传统的决裂都是不彻底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法权的很大一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

---

① 关于热是物质分子运动的理论。

② 指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建立的科学的燃烧理论——氧化学说。

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页）他们也没有可能去彻底镇压反革命的封建势力。社会主义社会是公有制的社会，它的经济基础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社会主义社会在否定资本主义社会时，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都必须同旧的传统实行彻底的决裂。无产阶级还必须彻底镇压反动的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势力。毛泽东指出：“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只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被消灭的剥削阶级无论如何是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而人民大众则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尽、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只有这时，才有这种必要，也才有这种可能。”（《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6页）总之，社会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是新旧社会之间的一次最彻底的决裂。尽管如此，这里也不排除新旧社会之间的某种联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必须保留并改造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以往社会发展起来的全部生产力以及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一切积极成果。可见，虽然否定的形式是多样的，但不论哪一种形式的否定，都是既克服又保留，既决裂又联系。

辩证法的否定观是同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根本对立的。形而上学孤立地、绝对地看待肯定和否定，否认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在它看来，凡是肯定的地方，就没有否定；凡是否定的地方，也就没有肯定。恩格斯指出：形而上学者“在绝对不相容

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形而上学的公式是，肯定就是绝对的肯定，就是肯定一切；否定就是绝对的否定，就是否定一切。费尔巴哈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就是采取形而上学的否定的典型例子。他看到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荒唐，就不管其中还包含着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把它们一并抛弃，这好象看到洗澡水脏了，就把它连同盆中的小孩一起倒掉一样。恩格斯在批判这种简单的否定时说："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干脆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象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这里所讲的"扬弃"就是既有抛弃又有发扬，就是辩证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最高成就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辩证的否定。辩证的否定是一切发展的决定性的环节，也是哲学思想发展的决定环节。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了德国的古典哲学，抛弃了它的糟粕，批判地继承、革命地改造和创造性地发扬了它的合理思想，从而把哲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使哲学成了真正的科学，成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强大精神武器。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是奉行形而上学否定观的恶劣典型。他们认为必须完全抛弃以往的一切文化遗产，一切从零开始，在空地上建立起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这是一种极左的理论，口头上非常"革命"，实质上却是地地道道的开倒车的行为。按这种观点办事，就要摧毁无产阶级的

社会主义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地和出发点。这种观点一露头，列宁就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无产阶级“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362页）

既然辩证的否定是既克服又保留，那末我们对待历史的遗产，就应该是一方面加以批判，划清是非界限；另一方面又从中继承一切积极的东西，加以改造和发扬。一句话，批判地继承，这是我们应有的基本态度。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668页）这种科学的态度，同样也适用于对待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我们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其他民族和国家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一切真正好的东西。毛泽东着重讲到，“自然科学，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286页）无论对于过去的或对于外国的东西，都不能无批判地肯定一切，也不能虚无主义地否定一切。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都是形而上学的错误态度。

林彪、“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敌视唯物辩证法，不是否定一切，就是肯定一切。在否定一切方面，他们比俄国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走得更远。他们打着“破旧立新”的幌子，妄图消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把古代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科学

文化，一概斥之为“大、洋、古”，“封、资、修”。他们竟胡说什么，“过去读的书都忘了倒好些，问题是没有忘，还在向学生放毒”，根本否定人类的一切文化和科学知识。他们把对历史遗产的批判地继承和对外国科学文化的有分析地学习，统统攻击为“复辟”和“洋奴哲学”。更有甚者，他们还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七年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教育、文化、科学、艺术等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叫嚷要“和十七年对着干”，“全国成为文盲，一样干社会主义”！从这里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林彪、“四人帮”所否定的是人类的发展，文化的进步，否定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他们是一帮腐朽透顶的蒙昧主义者，是反动以极的反革命派。“四人帮”经常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他们在“肯定一切”方面，亦使人叹为观止。他们把一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抬得比天还高，不仅高过了资产阶级，而且高过了无产阶级。他们无耻地自诩为“当代法家”。他们对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享受的一些奢侈品以及腐朽堕落的文化艺术崇拜得五体投地，不惜浪费国家的大量外汇，用来填充他们无底的欲壑。更无耻的是对他们自己的“肯定”，一个个自封为最“左”的“左派”，最“革命”的“革命家”，谁要是有一点非议，他们就扣帽子、打棍子，甚至把你定为“现行反革命”，施以“全面专政”。总之，他们所否定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需要的一切，所肯定的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帮”天下所需要的一切。可是，客观辩证法是无情的，任何离开事物固有的发展规律，主观地“肯定一切”或是“否定一切”都是行不通的。“四人帮”的“肯定一切”保护不了他们，“否定一切”结果是否定了自己。

二、否定之否定，螺旋式的上升或波浪式的前进

否定的辩证性还在于，它自身终究还要被否定。事物的发展总是由肯定的阶段走向否定的阶段，再由否定的阶段走向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如前所述，在肯定的阶段，事物内部的肯定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定的方面是非主要的方面；事物的发展进入了否定的阶段，原来的矛盾双方，互易其位，构成事物内部的新的矛盾；由于矛盾双方的斗争，使事物再一次向其对立面转化，达到了对自身的第二次否定，进入了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否定之否定阶段是事物从其肯定阶段经过两次否定，即两次向其对立面转化的发展的结果。因此，否定之否定阶段和肯定阶段在形式上有某种相似之处，表现为“仿佛向旧东西的回复”。（《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这样的三个阶段，就构成发展的一个周期，在否定之否定的阶段上，事物好象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它在实质上是和旧东西根本不同的、新的高级的东西。否定之否定或新的肯定，既是事物前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事物下一个周期的起点。如此，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即新的肯定，……无限发展下去，形成为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的运动。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自然界方面，化学元素周期性的变化，具有典型的意义。物质世界是由各种化学元素组成的，各种元素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其内在的联系和发展的线索，连贯成为一幅辩证的图景。元素周期表揭示的由轻元素到重元素的变化，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元素由其原子核正电荷数目（原子序数）的

变化而引起周期性的螺旋式的变化。由碱金属转化为非金属，再由非金属转化为碱金属，形成了一个周期。排列在每个周期之首的碱金属锂、钠、钾、铷、铯的化学性质都十分相似，但一个比一个更活泼、更强烈。

天体的演化也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在天体演化中，主要由氢元素组成的弥漫星云的各部分，由于克服了互相排斥而逐渐凝聚成为恒星、行星、卫星等天体。最后由于天体物质的过渡紧缩，使其中排斥力战胜了吸引力而发生恒星的爆炸，又重新转化为弥漫星云。在这个弥漫星云中含有较多的重元素，它的各种成分再度相互吸引又凝聚成新的第二代恒星及其行星、卫星。这显然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个辩证的过程，也适用于我们所居住的天体——地球。地质学已证明，地球的地质变化“是旧岩层不断毁坏和新岩层不断形成的系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6页)这一系列过程的积极结果，就形成了由复杂的化学元素所构成的、适宜植物成长的土壤。

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作用在生物发展过程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种子成长为植物，植物否定了种子，植物又生产出新的种子，准备自己的死亡。作为否定之否定的新种子，不仅在数量上比原来的种子多出很多倍，而且在质上也有所不同。就是在这个否定之否定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实现了植物物种的进化。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不例外。在原始社会，人们个体的生产能力很低，生产必须依靠集体的互助协作，产品常常难于保证维持生活的最低需要，没有剩余产品，因而也没有人剥削人的可能。这决定了原始社会的生产资料公共占有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个体生产能力的提高，就产生了生产的个体性质和占有的社会公共性质的矛盾。这种矛

盾使原始的公有制走向自己的反面，为私有制所否定，进入了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极端低下是肯定原始公有制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成为否定原始公有制的因素，在原始社会内部就包含着这种否定自身的因素，最后促使它向自己的对立面——私有制转化。在私有制社会内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生产过程的社会公共性质，就逐渐地增长起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发展，生产过程的社会性迅速加强，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形成了严重的冲突，促使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其对立面转化，被公有制所否定。这种公有制已不再是原始的公有制，而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能满足社会全体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公有制，这是原始公有制无法比拟的。经过两次否定，这时，所有制的性质和生产过程的性质之间的矛盾得到了根本的解决，开始了社会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

人类社会劳动的发展，也经历了和将要经历着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统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再度统一。劳动和动物活动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即由脑力劳动指导和支配的体力劳动。因此，人的劳动按其本性来讲就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统一。在原始社会，每一劳动者基本上都是体力劳动者，还没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这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原始的统一，是劳动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肯定的阶段。这种原始的统一，是在脑力劳动还处在萌芽的极不发展状态的基础上的统一。这种劳动基本上是体力劳动，它比后代人的最简单、最粗笨、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缺乏脑力劳动的指导。因此，这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

动的原始的统一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它离动物的生物适应性活动相去不远，劳动生产率极端低下。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发展脑力劳动。而在当时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每个社会成员被沉重的体力劳动所束缚，难以从事脑力劳动，不可能出现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就使得脑力劳动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到了阶级社会，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裂和分工，这是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原始统一的否定。这种分裂和分工是发展脑力劳动的必要条件，它创造了人类的文明，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是在社会每一成员的脑力劳动不可能都得到发展的条件下，对矛盾的一种解决。这种解决是不充分的，它摧残着绝大多数体力劳动者的聪明才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必须统一，这是劳动的本性所要求的。处在分裂状态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也必须统一，但是，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这种统一是通过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压迫、剥削和支配这样极不合理的方式来实现的。当然，这不是说，体力劳动者不具有任何的脑力劳动，而是说得到相对充分发展的脑力劳动，成了剥削者、统治者的专利和特权，而体力劳动则成了被剥削、被统治的广大劳动人民身上的沉重的负担。因此，这种统一是包含着阶级对立的统一，而在社会每一个成员身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仍然是分裂的。这就带来了脑力劳动的畸形发展，使它带有许多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等不健康的成分，同时也使体力劳动的效率难以迅速提高。这就构成了新的尖锐的矛盾，导致事物再度向它的对立面转化，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在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实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统一。这就是第二个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到了这个阶段上，才是对矛盾的根本的解决，使人的劳动得到了真正高度发展的可能，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

一定意义上，这时人才算最后脱离了动物界。

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实现二者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统一是一个长期的艰巨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首先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抗，建立了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同志合作关系，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消亡开辟了道路，但在长时期内还不得不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使各个社会成员的智力和体力得到全面的发展，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才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统一。这种结合同人类智力处于萌芽状态的原始结合是根本不同的，它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高级阶段。在人类发展的原始阶段，由于生产力低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是在二者没有分工可能的情况下的结合。共产主义的新结合，则是由于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科学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界限完全消失以后，所逐步实现的结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面临着逐步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为实现二者新的结合创造条件的伟大任务。为此，我们必须增进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加强团结，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这就是消灭体脑差别、实现二者统一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四人帮”打着消灭三大差别的幌子，实际上却竭力破坏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物质技术基础，恣意扩大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矛盾。他们反对工人、农民及其子女学习科学文化，胡说什么“知识到手，人被夺走”，“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等等。这是要把人类拉回到原始的蒙昧状态的极左的反动思潮。这不是要解决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矛盾，而是要把广大劳动者变成无知无识的群氓，使人民永远处于无知状态，以便建立他们

一小撮的法西斯专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矛盾的根本解决，决不是要消灭脑力劳动、摧毁脑力劳动的积极成果，而是要在保留这些积极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脑力劳动，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并不断提高体力劳动的技术水平，在二者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达到真正的统一。

我们不仅可以从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中，看到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作用，而且在社会某一特殊过程例如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它的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是对小生产私有制的否定，它剥夺了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促使其无产阶级化。资本主义私有制最后又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否定，"剥夺剥夺者"，这就是否定之否定。小生产私有制是生产者和生产手段的统一，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劳动者和生产手段的分离，社会主义公有制则在更高的形式上达到了劳动者和生产手段的统一。

作为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反映，在思维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作用。哲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朴素辩证法、形而上学、科学辩证法三个阶段。在朴素的辩证法阶段，人们从世界各个部分的联系和转化的总体上把握世界，对世界的总体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但是对世界各个部分却缺乏深入的考察。由于对各个部分没有明确的认识，使得对全局和总体的理解也就模糊不清。抓不住局部就不能科学地把握总体，为了把握总体就必须抓住局部。在认识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发生了朴素辩证法向其对立面的转化，辩证法被形而上学所否定。在形而上学思想支配下的各门科学，在注意分别研究世界各个部分的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对世界分门别类的研究，为科学积累了丰富的有价值的材料。但是，它抓住了局部又忽略了全体，在对世界总的联系和转化的理解上又大大见

绌于朴素辩证法。不了解总体，对所掌握的有关局部的材料也难作出完全科学的解释。这就构成形而上学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矛盾的发展又促使认识再度向其对立面转化，科学辩证法否定了形而上学。这是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科学辩证法在掌握各个局部的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对世界联系和转化的总体，描绘出了一幅清晰准确的图画；反过来，又帮助人们对有关局部的材料做出科学的解释。这一次否定，既克服了形而上学只看到局部忘记整体的片面性，又克服了朴素辩证法只看到全局抓不住部分的片面性。经过两次否定，才最后克服了前两个阶段的片面性，使全局和局部的矛盾得到了根本解决，产生了正确的思想方法——科学的唯物辩证法。

在哲学思想的发展中，还贯穿了另一种形式的否定之否定。承认物质第一性、忽略了思维能动性的机械唯物论，被抽象发展了思维能动性、否认物质第一性的唯心主义所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又否定了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这是否定之否定。这个第二次的否定，不仅克服了抽象发展思维能动性的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而且克服了机械唯物主义否认思维能动性的片面性，第一次全面地、科学地处理了思维和存在的矛盾，既坚持存在的第一性、思维的第二性，又承认思维的能动性、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使唯物主义哲学变成了真正彻底的科学。

在科学发展史中，人们对光的本质的认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微粒说，它成功地解释了一些光现象，但说明不了光的衍射和干涉等现象，因而被波动说所否定。由于波动说解释不了光电现象而被新的学说所否定。这种新的学说恢复了微粒说，但又不是简单的恢复，而是在吸收波动说的积极成果基础上的恢复。它认为光是具有粒子性和波动性的二重性的物质。前两种学说是互相矛盾的，其中任何一种都无法单独说明全部光现

象。新学说把光看做微粒性和波动性的统一，则能完满地解释全部光现象，它是在吸取了前两种学说的合理内容、又克服了它们的片面性的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

否定之否定不仅贯穿在整个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哲学和科学发展的历史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人们的具体的认识过程之中。毛泽东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践论》）这就是认识发展的具体道路。他又指出，人的认识包含有这样两个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深化。"（《矛盾论》）这一认识的规律体现在我们党的工作中，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毛泽东说："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又说："在集中和坚持的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同上，第855页）即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然后集中新的经验，作出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总之，在认识中，实践——认识——再实践，特殊——一般——特殊；在工作中，群众——领导——群众，个别指导——一般号召——个别指导。这都是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由上所述可以看到，和对立统一、量变质变规律一样，肯定否定规律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不过，肯定否定规律

的作用，一般说来，要在一个较长的过程中，即在事物运动完成一个周期时，才能完整地显现出来。这个周期是由事物内部矛盾经过反复两次解决，也就是经过两次质变而完成的。单靠事物内部矛盾的一次解决，一次质变，即一次否定，还不能显示出事物发展的周期性，还不能充分展现某一特定事物发展过程的完整性。在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其他两个规律，肯定否定规律带有总括的性质。从前面所列举的事实中可以看到，尽管经过一次否定，保存了被否定的事物中的积极因素，矛盾得到了初步解决，但事物发展的否定阶段与原先肯定的阶段所形成新的对立面，对立的双方都包含着一定的片面性。只有克服这种片面性，才能完成事物发展的一个周期。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则解决了前两阶段之间的矛盾，既保留了它们各自的积极因素，又克服了它们各自的片面性。因此，否定之否定是对整个发展过程的综合和总结，由此又开始了新的发展周期。这种事物发展的周期性说明，一方面，事物发展的总的方向是前进的、上升的；另方面，事物发展的具体道路又是曲折的、迂回的。所谓波浪式前进或螺旋式上升，指的正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对立统一，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最根本的内容。至于事物的发展是怎样地前进，怎样地曲折，各个阶段是怎样地划分等等，这些都是这一规律的特殊表现，需要根据事物的不同特点进行具体地分析。但是，不管怎样，事物总是迂回曲折地向前发展的，客观的过程是如此，辩证的认识过程也是如此。列宁指出："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到与肯定的东西的'统一'，——否则，辩证法就要成为空洞的否定，成为游戏或怀疑论。"（《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5页）

对于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人类的思想史中早就有所反映。中国古代的《易经·爻辞》中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老子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这都包含着事物经过否定达到周期变化的思想。但是，《爻辞》中的"复"、老子讲的"返"，都带有循环论的色彩，因此，还不是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在《论人间不平的起源和原因》一书中，阐述了社会由平等——不平等——平等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不过这也还是个别的实例。

最初以普遍的概括的形式明确表述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是黑格尔。黑格尔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描述使用了三个词："正题"（发展的起点）、"反题"（第一个否定）和"合题"（第二个否定）。一些人因此认为发展的本质就在于这种三分法或三段式。他们把否定之否定规律归结为纯粹的形式和表面的手段，把繁复多样的种种发展过程武断地通通纳入这个僵硬的公式。其实，连黑格尔都激烈地反对过这种做法。列宁指出："辩证法的'三分法'是它的外在的表面的方面"，"黑格尔无情地斥责形式主义，痛骂玩弄辩证法的把戏的无聊、空洞"。（《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8页）黑格尔反对空洞的抽象，而要求结合实际具体地分析问题。但是，黑格尔把实际歪曲为绝对观念的概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则要求从客观现实、从自然和社会出发，具体地分析事物的发展过程。它同形式主义和公式化是根本不相容的，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发展的辩证法也根本不同，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的反映。

虽然黑格尔是第一个猜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哲学家，并且利用他当时掌握的丰富知识论证了这个辩证规律，但是，他把这个规律作为制造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主要杠杆。实际上，他仍然把一切事物都硬塞到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式的框框里，甚至不惜闹到牵强附会的程度。黑格尔还把否定之否定阶

段，即所谓“合题”了解为矛盾的调和。这样，黑格尔就不仅唯心主义地歪曲了否定之否定规律，而且给它打上了形而上学的烙印。正如恩格斯批判的那样，黑格尔的错误在于：把“这些规律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的。从这里就产生出整个牵强的并且常常是可怕的虚构：世界，不管它愿意与否，必须符合于一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自身又只是人类思维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4页）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根本不同，它是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抽取出来的普遍规律，它从来不是单纯的证明工具，而只是研究的指南。马克思曾把剥夺资产者的社会主义革命称之为“剥夺剥夺者”，认为这是否定之否定。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在他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确已实现，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4页）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如德国的杜林、俄国的米海洛夫斯基等，歪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硬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是黑格尔的三段式，是用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证明工具。这是完全错误的。因此，不能把否定之否定规律形式化和教条化，看作是呆板的僵死公式，而应把它看作是研究现实世界的思维或认识的科学方法。这是因为，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是极其复杂的，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特殊的否定方式，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条件中，其表现往往相互区别，其作用也各不相同，因而必须作实际的具体分析。

唯物辩证法关于否定之否定的原理，具有重大的实践意

义。

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曲折性和前进性的对立统一。在我们所从事的伟大革命事业中，总会有顺利和困难、胜利和失败、正确和错误、前进和后退、团结和分裂等等的反复和曲折，但是最后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必然会团结一致，沿着正确的道路，克服种种困难向前迈进，胜利最终必然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毛泽东指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与此紧密相联，"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6、1375页）这样，毛主席就从正反两个方面清楚地讲明了人民革命事业的曲折性、反复性和前进性。

在人民内部和革命队伍内部必须要讲团结，但同时又要克服各种错误的思想和不团结的因素，所以又要开展必要的批评或斗争。团结和批评是两个矛盾着的对立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这也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毛泽东所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正确地反映了革命队伍发展的辩证规律，因而成为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经济建设中，有"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上马"和"下马"的曲折性、反复性。毛主席说："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我们走路，不是两个脚同时走，总是参差不齐的。第一步，这个脚在向前，那个脚在后；第二步，那个脚又向前，这个脚在后。""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

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3、314页）在工作中，我们也得有劳和逸的反复、“张”和“弛”的反复，“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工作之后必须休息，只有休息好了，才能有效地工作。

总之，无论从事任何工作，我们都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事物总是发展的，而其中总又有些曲折、反复、起伏，总是波浪式前进。正如毛泽东所说：“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61页）

只看到事物发展的前进性，看不到它在发展中的曲折性，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列宁曾经说过：“……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列宁全集》第2卷第851页）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盲动主义，从思想方法上看，就是只看到前进性，看不到曲折性，犯了直线性的错误。他们拒绝前进中的必要的后退。在第四次，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他们反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拒绝采用主动退却、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灵活的战略战术，而采取和敌人硬拚的方针。他们的理由是退却会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就是赚钱生意”。“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会使全体

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5、196页）这生动地说明了直线性的道路是反辩证法的，走不通的。我们常常为了前进而主动迂回，为了走直路（少走弯路）而主动走弯路。这是因为，社会的发展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人们必须依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事改造世界的活动。

我们反对那种只知直线前进，宁肯碰壁也不知拐弯的愚蠢的形而上学。同时，我们也反对那种一碰到曲折、困难，就看不到前途的悲观主义者或失去前进勇气的懦夫。这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毛泽东指出："在革命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61页）革命队伍中的懦夫和悲观主义者，从认识上讲，主要是看不到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不懂得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这样一条唯物辩证法的原理。

三、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事物发展的波浪式或螺旋式从内容上看，归根到底就是新生事物战胜旧事物，否定旧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或除旧布新，这是宇宙间永远不可抗拒的普遍规律。

前面讲过，任何一个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个对立的方面。其中，否定的方面是促使旧事物灭亡的方面，是促使旧事物达到自身的否定而转化为新事物的方面。因此，否定的方面就是存在于旧事物中的处在成长过程的新事物或新事物的因素。否定方面和肯定方面的斗争就是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必然导致事物转化为它的对立面，转化为新事

物。新事物必然要战胜旧事物，这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

为什么新陈代谢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为什么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第一，新生事物作为旧事物的否定方面，它与维持旧事物存在的肯定方面同时存在于旧事物之中。虽然，它是旧事物中的矛盾的非主要的方面，却是旧事物赖以存在的不可少的方面。没有矛盾的一方就没有矛盾的另一方。旧事物总是同新事物相比较而存在。在旧事物中如果没有否定它的一方，也就没有维持其存在的肯定的一方，也就没有旧事物。我们知道，矛盾就是事物，没有肯定和否定的矛盾也就没有事物。因此，新事物既是旧事物赖以存在的因素又是威胁其存在并促其灭亡的因素。对于旧事物来说，新事物是它不可克服、无法消除的威胁。旧事物不可能克服和消灭新事物，而新事物却可以而且必然要克服和消灭旧事物。生物物种的存在依赖于它的遗传性，生物又必须适应处在永恒变化中的环境，就是说，它又必须依赖于遗传性的对立面——变异性。如果没有变异性，生物就不能继续存在到今天，也就没有了生物和生物的发展。变异性的积累迟早必然导致对旧遗传质的否定而产生新的物种。变异性作为新物种赖以产生的因素成为任何旧物种的不可摆脱、无法消除的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是极力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肯定方面，是旧势力；无产阶级则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的否定的方面，是新势力。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发展威胁着资产阶级的存在和发展，同时也威胁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尽管可以使无产阶级遭受暂时的挫折而取得某种或大或小的胜利，但它却不可能彻底战胜无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因为，如果一旦消灭了无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剥削的对象，也就

是消灭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存在的必要条件，消灭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无产阶级则完全不同，它可以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被埋葬和无产阶级自身的彻底解放。

第二，新事物之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新事物比旧事物优越得多，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新生事物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在于：它在旧事物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否定了旧事物中消极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吸取、继承并发展了旧事物中积极的因素，并且还添加了一些为旧事物所不能容纳的丰富的新内容。生物的新物种抛弃了旧物种中一切不能再适应于变化了的复杂环境的消极的特性，保留了其中那些对适应新环境仍有积极作用的特性，又加进了一些能适应新的复杂环境的新特性。因而它就比旧物种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能够在优胜劣败的自然选择中，淘汰旧物种。无产阶级代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则代表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不仅保留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生产力，而且加进了为资本主义社会容纳不了的新的生产力。因此，从长远的观点看，无产阶级总是要比资产阶级强大得多，一定会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新的科学理论保留了作为旧理论论据的实验材料中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剔除了其中错误的或不精确的成分，而且增添了一些能突破旧理论的局限性、片面性的新的实验材料。正是新理论的这种优越性决定了它势必取代旧理论。

既然新事物优越于旧事物，那末，它就会以比旧事物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由此也就可以理解这样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一般地是一个加速度发展过程。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有机体发展的全部历史中，是应该

承认加速度同离开起点的时间距离的平方成正比例的。……形态愈高，进化就愈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50页）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它的发展速度是与日俱增的。（参看同上书第363页）全部自然科学发展史，特别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飞跃进步，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人类社会的发展，总的说来也是愈来愈快，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高于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更应当高于资本主义社会。认识到这个规律，可以进一步增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提高我们加快前进步伐的信心。

总之，新事物既威胁着旧事物的生存，又优越于旧事物。因此，新事物在同旧事物的斗争中，一定会达到这样的结局：新事物的胜利和旧事物的灭亡。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全部自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和思想发展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着这个颠扑不破的辩证法的真理。

懂得了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我们就应当站在新生事物的一边，把自己的命运同新生事物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做一个促进派，做一个革命者。

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善于识别新旧事物，彻底弄清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新生事物。这对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尤其重要。在新旧事物的尖锐剧烈的斗争中，旧事物为了负隅顽抗，往往会以种种新的形式来隐藏它的本质，如变换新手法，玩弄新花样，施行新的阴谋诡计，打着新旗号贩卖旧货色等等，以此颠倒新旧，混淆视听。因此就会出现许多貌似新事物的旧事物，甚至会出现比新还要更“新”的怪事。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对付的。如果我们不去认真对待，不作仔细的分辨，就不免为旧事物所蒙骗，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个促退派，上当受骗，甚至会堕入敌人的圈套。

由此可见，要识别新生事物，就必须作到不是从形式上、表面上来观察，而是从内容上、本质上把握问题。要具体地看到，新事物和旧事物相比，它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究竟是什么。在这里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十分明确地认识到，新生事物总是符合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事物。社会主义之所以是新生事物，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比资本主义提供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日益巩固，日益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尽管要经历曲折的发展道路，但归根到底她是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相符合的。林彪、"四人帮"标榜他们是"新生的革命势力"，玩弄了无数新花样，倒行逆施，大规模地破坏生产力，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地降低，把整个国民经济弄到面临崩溃的边缘，这是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由此就可以断定，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旧势力，他们是必然要灭亡的。

要真正识别新生事物，认识到它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还必须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因为，新生事物本身也有一个萌芽、成长、发展壮大的过程。在它最初诞生时，总是比较幼小、软弱，就象刚出土的嫩苗和新生的婴儿一样。但是，世界终究是属于它们的。列宁教导我们："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列宁选集》第4卷第14—15页）这是革命者对待新生事物的唯一正确的态度。

新生事物的成长过程，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个道理是

不难理解的。毛泽东说："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矛盾论》）这就是新生事物曲折成长的根源。新生事物是在和旧事物的斗争中前进的，在其成长过程中总是要遇到衰亡着的旧事物的抵抗。因此，任何新事物的成长，都要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在一定时期内，新事物可能遭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但是不管它如何受挫折，遭失败，最后胜利总是属于它的。正如斯大林所说："生活中新产生的、一天天成长的东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进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全集》第 1 卷 第 275 页）前面讲过，旧事物不可能彻底摧毁、完全消灭新事物。只要新事物还存在着，不管它受到多大的摧残，遭受多大的挫折，它必定会成长起来，而且由于在挫折中经受了锻炼，会变得更加坚强，能够经受更严重的考验。这里重提这个问题，是要强调，决不能把新事物的成长天真地想像为一帆风顺，忘记它发展的曲折性，更不要由于新事物遭受了挫折（那怕是极其严重的挫折），就失去了信心，看不到它的前途。新事物发展的前进趋势是绝对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新生事物。毛泽东经常说，战略上要藐视困难，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新事物必须同旧事物斗争才能发展，这是普遍的规律。但在不同的条件下，它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毛泽东指出："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89 页）林彪、"四人帮"曾经肆无忌惮地压抑摧残建国以来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各方面大量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

新生事物。现在他们已被打倒，最大的障碍已经被扫除，但是，如果不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把弄乱了的思想理论加以澄清，把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仅仅由于我们鉴别不清也会压抑新生事物的成长。

唯物辩证法关于新生事物不可战胜的原理，是无产阶级革命坚定性和革命乐观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不管新生事物在其初生时是多么嫩弱，无论它在发展过程中遭到多少和多大挫折，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坚定地站在新生事物一边，为它的存在、发展和取得最后胜利而奋勇斗争。这就是革命的坚定性。不管在斗争中遇到多大风浪，丝毫也不沮丧、也不稍稍怀疑新生事物最后胜利的光明前途。这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客观事实和人类的实践证明：不论在自然界和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只要我们真正坚定地站在新生事物一边，我们就一定会不断取得胜利。

第七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一、唯物辩证法范畴的实质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
二、原因和结果
三、必然性和偶然性
四、可能性和现实性
五、形式和内容
六、现象和本质

范畴就是基本的概念，它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哲学范畴是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想最普遍的对象、特性和关系的概括和反映。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是客观事物之间最普遍的辩证关系即矛盾关系的概括和反映，是辩证思维的逻辑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通过一些哲学的基本范畴来表述的，所以在讲这些原理时，就不得不涉及到一系列的范畴。例如，在阐明唯物主义原理时，就讲到了物质、意识、时间、空间、运动、静止等等；在以后阐明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时，还将讲到实践、认识、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真理、谬误和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国家、革命、人民群众、个人等等。在阐明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时，我们已经讲到对立、统一、普遍性、特殊性、对抗性、非对抗性、质、量、度、肯定、否定等等范畴，此外还有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可能

和现实、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等各对范畴。这所有每一对范畴都是客观存在的最普遍的矛盾，都是对立的统一，是唯物辩证法最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和补充。

一、唯物辩证法范畴的实质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也是唯物辩证法范畴的实质。换言之，唯物辩证法范畴的实质就在于它是客观的矛盾关系的反映。范畴是概念的一种。列宁说：概念必须是“在对立中是统一的，这样才能把握世界。”（《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4页）毛泽东也说过：“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矛盾论》）既然范畴是一种概念，那末范畴也就是必然体现和反映了矛盾。但是，哲学范畴又和一般的概念不同，它是反映最普遍的客观矛盾的最大的概念。矛盾有普遍和特殊之分，概念也有大、小之别。例如，“麻雀”、“燕子”、“鸽子”……等等概念相对于“鸟”概念来讲，就是小概念；“鸟”相对于“脊椎动物”来讲，又成了一个较小的概念。在“脊椎动物”之上还有一系列的大概念，如“动物”、“生物”、“物质”。其中，一个概念比一个概念概括性更高，适用的范围更大，直到“物质”这个概念则概括了世界上所有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共性—客观实在性。“物质”概念是一个极大的概念，因此，它是一个哲学范畴。

“物质”并不是包括无数较小概念的唯一的极大概念。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在认识论范围内，意识是物质的对立面，就是说意识和物质也是矛盾的关系。离开了物质和意识的对立统一关系，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什么是物

质、什么是意识。所以，意识也是一个哲学范畴。

除了物质和意识以外，还有其他一系列哲学范畴。这些哲学范畴所反映的是一切物质形态、物质现象都具有的共性。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因此，这些哲学范畴也同时反映了一切意识形态、意识现象的共性。一切事物的现象的最基本、最突出的共性是它的矛盾性，即对立和统一。世界上没有无矛盾的事物和现象，矛盾就是世界。事物和现象的矛盾是多方面的。任何一个对象都具有的矛盾有：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形式和内容、本质和现象等等，反映这些最普遍的客观矛盾的概念也都是一些最大的概念，都是哲学的范畴。哲学范畴是反映整个客观世界的一些最普遍的本质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按其所阐述的原理的侧重而不同，我们把它们归之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各个部分。其实，所有的哲学范畴都反映了事物的矛盾关系，如唯物论部分中的物质和意识、多样性和统一性、无限性和有限性、运动和静止等等，也都是一系列关系的反映。

除了哲学范畴以外，各门科学也都有自己特有的范畴，如经济学有商品、价值、货币等范畴。这些范畴是对客观经济现象中普遍的矛盾的反映，是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当然，相对于哲学范畴来讲，这些概念又都成了较小的概念，它们只能概括和反映客观经济现象的最普遍的本质，而哲学范畴则能够概括和反映一切客观现象的普遍本质。

范畴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实践中，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各门科学的范畴是它们各自研究的范围内的一般的概念，哲学范畴则是从各门科学中进一步概括总结出的，适用于所有各个科学部门的最一般的概念。当着人们获得了关于事物的共

同本质的认识以后，就能够以此为指导，对于尚未认识或尚未深刻认识的各种事物进行研究，进一步找出其特殊的本质。就是说，每一门科学的范畴都对该门科学的研究有着方法论的意义，起着指导的作用；哲学范畴则对所有科学部门的研究都起着指导作用，它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以普遍的认识为指导，通过对各种具体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的深入研究，反过来，又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关于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哲学范畴只有在深入研究各门具体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够不断地得到补充、丰富和发展，不然就会变成枯槁和僵死的东西。

范畴是在实践基础上从客观世界抽象出的一般的本质，它们反过来又在实践中为人们服务。没有范畴，就不会有自觉的实践和科学的思维。恩格斯说："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列宁指出："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列宁全集》第38卷第90页）自觉的人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也就是把主观和客观区分开来，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对立，把客观外在世界看做是自己的主观所要认识和改造的对象，看成是主观世界的对立面。那末，在这里已初步具有了主观和客观（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这一对范畴，那怕这对范畴在刚出现时，具有多么模糊或朴素的形式。我们知道，人的实践是一种有意识的、为追求达到某个预期目的的活动。当人们采取了一定的行动去实现预期的目的时，这个行动就被认为是达到目的的原因，而目的则被看作是这种行动的结果预先观念地存在了。如果连某种最原始的因果观念也没有，那就不可能有人的实践活动，就不能用自己的

活动来实现自己的某种主观的要求，达到自己的目的。

世界是无限复杂多样的，它又是永恒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人的实践和认识同样也是不断发展着的。因此，范畴和范畴体系并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僵死的东西。列宁指出："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末，这点是否也同思维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有关？如果无关，那就是说，思维和存在不相联系。如果有关，那就是说，存在着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的辩证法和认识的辩证法。"（《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0页）人类的认识发展史表明，范畴确实是处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中的。随着人类对世界本质的认识的不断深入，总会有一些新的范畴出现，也会有一些旧范畴（如阴和阳等）被淘汰。即使是同一个范畴，它的内容也是会不断变化的。前面讲过的"物质"、"运动"、"时间"和"空间"等范畴就是如此。

概括地说，唯物辩证法的以至整个哲学的范畴，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对世界的最一般的本质、最普遍的矛盾的概括和反映；反过来，范畴又对认识和实践具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不可缺少的思想工具，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范畴论的基本要旨。

在范畴问题上同在哲学其他问题上一样，贯穿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切唯心主义者都否认范畴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唯心主义者认为范畴先于自然界而存在，是客观事物的本源，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不过是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的体现。主观唯心主义者把范畴看成纯主观的东西，是用来整理紊乱的自然现象的工具，而自然现象本身是没有规律的。

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范畴是绝对观念的产物，而"绝对观念"则表现为发展着的一系列的范畴，"绝对观念"

的自我发展过程就是逻辑范畴的展开过程。黑格尔哲学可以说就是作为绝对观念的一个个发展环节的范畴体系。在他看来，自然界不过是作为逻辑范畴的"绝对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有的一切规律都不过是范畴本身的逻辑规律。黑格尔曾经深刻地阐述了范畴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和辩证的转化。恩格斯指出："这在黑格尔本人那里是神秘的，因为范畴在他看来是先存在的东西，而现实世界的辩证法是它的单纯的反光。实际上刚刚相反：头脑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的运动形式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31 页）黑格尔的范畴学说在形式上是荒唐的，但其中却包含着积极的、合理的内容。他在各个范畴的辩证转化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之中，天才地猜到了客观现实本身的辩证法。

康德的范畴论是主观唯心主义范畴学说中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在康德看来，范畴是整理杂乱无章的感觉表象的工具。他称范畴为"知性"的"纯概念"。他说："范畴的来源仅只是知性，独立于感性。"范畴被看成是一种先于实践经验、与感性认识无关的人所固有的天赋的认识能力。这是一种唯心主义先天论的观点。太阳晒石头，石头变热了，按康德的观点看来，其中并没有什么客观的因果性关系，只是由于人具有先验的"因果性"范畴，才把我们感觉中的这两个表象联系起来，说什么"因为太阳晒使石头变热了"。康德公然宣称，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是人把规律给予了自然界。列宁深刻地指出："'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这个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的公式是信仰主义的公式。"（《列宁选集》第2卷第162页）

关于范畴的先验性的论断是极端荒唐的。人类的思维发展史和儿童的思维发展史都有力地证明了范畴起源于实践，起源于经验。在一些原始部落中，人们只知道原因和结果等少数范

畴，而不知道其他范畴。他们甚至缺乏数的概念，更不会有什么关于量的范畴。他们在交换商品时，因为不会计算，只能一对一地交换。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缺乏计数的经验。恩格斯说："为了计数，不仅要有可以计数的对象，而且还要有一种在考察对象时撇开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而仅仅顾到数目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长期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发展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页）同样，两岁的小孩由于缺乏这种经验，也不能掌握数的概念。不仅关于数的概念、量的范畴是如此，一切概念和范畴都是实践的产物，都起源于经验。

既然康德否认范畴是实践经验的产物和对客观的反映，他也就不可能看到客观事物以及人类实践经验的发展对范畴有什么影响。他认为，范畴的数量和涵义是一成不变的。今天有多少对范畴，几万年前也有那么多对范畴。我们今天对范畴内容的理解和最远古的人类祖先的理解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康德的范畴论不仅是主观唯心的，而且是形而上学的。康德范畴论的形而上学性还表现在，他把现象和本质、有限和无限、自由和必然（不自由）等各对范畴，看成是头脑中的逻辑矛盾，认为矛盾双方是绝不相容的对立，否认它们之间的统一和相互联系。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有"两个哲学派别：带有固定范畴的形而上学派，带有流动范畴的辩证法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1页），就是说，在范畴论中，不仅贯穿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而且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

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论，既反对那种否认范畴来源于实践经验，否认范畴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唯心主义观点；又反对那种否认范畴的对立统一，把范畴看成僵死不变的东西的形而上

学观点。以实践为基础，坚持反映论原则和对立统一观点，这才是正确理解下列一系列范畴的关键。

二、原因和结果

原因和结果是人类在实践中最早产生的范畴中的一对。如前所说，原因和结果是人类进行有预期目的的自觉活动的不可少的前提。在原始部落中，人们就已经具有了原因和结果的朴素的观念。人类的认识，首先是对事物和现象产生发展的原因的认识，各门科学都是如此。不揭示事物和现象产生、发展的真实原因，就没有科学的认识。因果观念产生于指导人类实践活动的客观需要。人类要在实践中达到一定的预期的目的，必须知道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它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结果；否则人的行动就是盲目的，除非侥幸碰到了罕见的好运气，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产生于人类实践的最初阶段的因果观念，在人类全部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列宁指出："自从'一切事物的联系'、'原因的链条'的观念产生到现在已经有数千年了。比较一下在人类思想史上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些原因的，就会得出无可辩驳的确凿的认识论"。（《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4页）列宁又说：人的认识是"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同上，第239页）

无数的单个现象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组成自然现象之网。因果关系就是从这个普遍联系的自然现象之网中抽取出来的网上之结。恩格斯指出："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但是，我们不仅发现某一个运动后面跟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

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运动；我们能给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规模。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这也就是说，“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0、552页）

因果性和时间的顺序性有密切联系。在不断更替的运动中，总是原因在前，结果在后。这是因果联系的特点之一。然而，并不是任何先后相继的运动都能构成因果联系，如白天和黑夜、春夏秋冬等等，就不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包括时间先后秩序在内的由一种现象必然引起另一种现象的本质的内在联系。

在把握因果性范畴时，还必须对原因和导因加以区分。导因貌似原因，它是这样一种事件，直接先于另一事件，促使后者出现，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内在联系。例如，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制度内部不可解决的对抗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当矛盾尖锐到使战争达到一触即发的时候，任何轻轻的一触也会促成战争的爆发，例如某个政府要员的被刺以至某个普通侨民或士兵的失踪等等，都会作为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借口。那时，这类“轻轻的一触”的事件，就成了战争的导因。导因同爆发战争的联系是外部的、偶然的。不发生这件事也必然会有另一事件触发战争的爆发。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常常夸大导因的作用，把导因混同于原因，用以抹杀历史

的客观规律性，掩盖帝国主义内部的深刻尖锐的矛盾，使人弄不清战争的真实原因。

唯物主义认为，现象的因果联系是客观的和普遍的。任何现象、任何变化都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的。同时，任何现象、任何变化也必然会引起一定的结果。世上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日常我们说某人的某项工作是毫无结果的，这只是指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和没有向预期的结果前进一步罢了，并非指任何结果也没有，至少发生了“白白浪费了气力”这样一个结果。而且，这个结果也是有原因的，如工作方法不对头、用力不得当等等。承认因果性的客观性、普遍性是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的原则。决定论原则，是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逻辑前提，否认了决定论的原则，无异是否认了科学认识和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可能性。

与唯物主义相对立的是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它否认因果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都否认因果联系的客观性。英国哲学家休谟根本否认因果联系。他认为，因果联系只不过是一种心理习惯，是由于我们看到感觉和观念按一定的先后顺序出现，而且不断地重复出现而造成的。他指出，这种感觉现象之间的先后顺序的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因为，“在它之后，不等于由于它”；据此，他还进一步断言，没有理由从过去和现在的经验得出关于未来的结论。康德不同意休谟关于因果关系仅仅是心理习惯的联系的论点。但是，他把因果性看作是人们用来“整理”感觉经验的一种先天的知性形式，因果性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康德和休谟尽管在理论上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但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完全一样的，都否认因果性的客观性，都是主张非决定论的。

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对因果性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最好证

明，也是对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非决定论的最有力的驳斥。人们在实践中，不仅重复地看到某一种现象之后必然出现另外的一种现象，而且可以创造或改变某种现象，从而得到人们预期的某种结果。即便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也不能否认因果性的客观性，只要我们进一步检查，就会发现这是由于我们在创造或改变某种现象时发生了一定的偏差和错误，就是说，所以造成达不到预期目的这种结果也是有它的原因的。关于这个道理恩格斯讲得很透彻。他说："的确，单是某些自然现象的有规则的依次更替，就能产生因果观念：随太阳而来的热和光；但是在这里并没有任何证明，而且在这个范围内休谟的怀疑论说得很对：有规则地重复出现的 post hoc〔在这以后〕决不能确定propter hoc〔由于这〕。但是人类的活动对因果性作出验证。……如果我们把引信、炸药和弹丸放进枪膛里面，然后发射，那末我们可以期待事先从经验已经知道的效果，因为我们能够详详细细地研究全部过程：发火、燃烧、由于突然变为气体而产生的爆炸，以及气体对弹丸的压挤。在这里怀疑论者也不能说，从已往的经验不能推论出下一次将恰恰是同样的情形。确实有时候并不发生正好同样的情形，引信或火药失效，枪筒破裂等等。但是这正好证明了因果性，而不是推翻了因果性，因为我们对每件这样不合常规的事情加以适当的研究之后，都可以找到它的原因：引信的化学分解，火药的潮湿等等，枪筒的损坏等等，因此在这里可以说是对因果性作了双重的验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0—551页）

我们要注意，并非所有的唯心主义者都是否认因果性的非决定论者，还有一些唯心主义者承认因果性，但是他们把某种客观精神、理性或神作为决定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最后原因。基督教、佛教、道教中的"因果报应"的说教，就是这种

观点的表现。这是一种在精神上奴役人们的手段，它把人们引向听天由命的宿命论。这种神学目的论的思想甚至曾经侵入到自然科学的内部。恩格斯指出：在十八世纪上半叶，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不能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的外来的推动力作为最后的原因。根据这种理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辩证唯物论不仅反对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也反对唯心主义的目的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依据它们自己本身所固有的一定的因果联系而产生和发展的，人们头脑中的因果观念，只不过是现实事物客观的因果关系的反映。唯心主义目的论用以对抗唯物主义的手段，就是一定要探索事物的终极（最后）原因，一直要把人们引向上帝。但是这样的手法，难不倒唯物主义（确切地说，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也承认有终极的原因，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追溯到比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2页）可见，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因果观没有给任何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留下余地。

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是对唯物主义因果观的最好验证。今天科学已经高度发展，日益深刻地揭露自然界的客观因果性。现在科学已经发现了遗传物质——脱氧核醣核酸（DNA），揭露了遗传的秘密，找到了遗传和变异的客观原因。可是有一些科学家还摆脱不了神学的禁锢，有些分子生物学家却企图用这样积极的科学成果来宣扬唯心主义目的论，说什么DNA的发现是“对上帝存在的确实证据”。由此可见，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就是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唯心主义也

不会自行让出地盘。

在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这些唯心主义者企图利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来反对唯物主义的决定论。他们认为在微观世界中，基本粒子和电子等的活动具有“自由意志”，它们没有因果制约性，而是在各种可能性中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通常援引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作为证明。与宏观客体不同，微观粒子同时具有微粒性和波动性，人们不能象牛顿经典力学测定作机械运动的宏观客体的速度和位置那样，同时准确地测定微观粒子的速度和位置。但是，决不能因此得出否定因果性的结论，而只能说明因果关系在微观世界中的表现和它在宏观世界中的机械表现不同罢了。

现代科学不仅深刻地揭示并有力地证明了微观世界中因果性的客观性，而且使得人们对宏观世界的一些现象的客观因果关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现代科学不仅揭示了原子核聚变和裂变的因果关系，能够创设引起原子核聚变和裂变的条件，来利用原子能；而且进一步了解到每一种化学元素之所以具有各种同位素以及哪些同位素稳定哪些不稳定的原因。现在，人类已经可以制造出人造放射性同位素和一些人造元素。由于量子力学揭示了微观粒子的因果关系，使人们进一步找到了各种不同化学元素所以有不同化学特性和化学活泼性、以及不同的化合物所以有不同的化学物理特性的原因等等，由此，产生了分子工程学等新兴学科，从而开辟了人们寻求新化合物的广阔道路。

在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中，非决定论之所以占统治地位，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要用唯意志论来否认社会生活中的因果制约性。马赫宣称：“原因和结果是我们思维的创造物……”。詹姆士说：“关于为什么总有某

种事物出现于世上，我们能想出来的唯一现实根据，就是有人希望它出现。”他们想以此来否认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的客观因果关系，这是反动阶级的垂死挣扎在哲学上的反映。帝国主义者妄想依靠政治上、军事上的力量随心所欲地决定社会生活的过程，决定阶级、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摆脱他们无法摆脱的灭亡的命运。但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者的意志无论如何也抗拒不了的。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者，论证和捍卫了因果性的客观性，但是他们只是局限于研究因果关系的机械形式，把这种形式当作因果关系的唯一形式。因此，旧唯物主义的因果观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实际上因果联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生物学中的因果性不同于力学、物理学和化学中的因果性。社会生活中的因果性不同于生物学中的因果性，在这里，因果关系是通过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旧唯物主义者就是由于不理解社会生活中因果性的特殊性而否认了它的客观性，因此陷入了唯心主义。前面讲的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也是不了解量子力学中有自己特殊的因果关系，因而也就否认了它的客观性。在因果性的问题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形而上学、机械论是同唯心主义息息相通的。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无限复杂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统一整体，“原因和结果只是各种事件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普遍）联系和相互联结的环节，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一环”。（《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8页）因此，只有当我们把要考察的特定对象从普遍联系中抽引出来，才能具体地确定某一现象为原因，另一现象为结果。由于客观事物联系的复杂性，同一现象在一种关系中是结果，在另一种关系中又是

原因。例如，在摩擦生热，热引起燃烧，燃烧导致爆炸，……等等因果链条中，摩擦是生热的原因，生热既是摩擦的结果又是燃烧的原因，燃烧既是发热导致的结果又是引起爆炸的原因。如果我们离开了这条因果链条中的特定关系，就不可能说明燃烧究竟是原因还是结果。恩格斯指出："原因和结果这两个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

还应当看，在甲→乙→丙→丁……等一连串事件的因果链条中，原因和结果的相互转化，不仅表现在就乙对甲的关系看，乙是结果，就乙对丙的联系来看，乙转化成了原因；而且还可以表现为，乙既是甲所引起的结果，反过来乙又是引起甲进一步变化的原因，丙既是乙的结果，又是乙进一步变化的原因。例如热引起了燃烧，燃烧反过来又成为产生大量热的原因。这样一连串事件的因果联系，我们可以简单地写成：

$$甲\rightleftarrows乙\rightleftarrows丙\rightleftarrows丁$$

结果反作用于原因，使自己成为原因，成为结果进一步变化的原因，这种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的事例是大量存在的。例如，生产力的发展是促使生产关系改变的原因，生产关系的改变反过来又成了推动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原因。在社会发展中，经济是最后的根本的原因，政治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政治又反过来又会成为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的原因。科学理论的突破是生产实践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了生产大发展的原因，等等。

形而上学者看不到因果联系的复杂性，认为原因只是原因，结果只是结果，二者不能互相转化。这种机械的因果观既不能正确地说明事物的真实关系，也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

把握复杂的因果链条，对于人们的实践活动有重大意义。如果我们只是热衷于追求目前所能得到的有利的结果，看不到这个结果又可能正引起以后一系列不利变化的原因，就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后患。如为了多生产粮食，而滥伐森林或毁坏草原以扩大耕地，在目前虽然可以多得到一些粮食，可是由于滥伐造成水土流失，就会使大片土地变成不利于人类生存的荒芜不毛之地。恩格斯以米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因为滥伐森林由沃野变为荒漠的历史教训，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在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9页）世界上许多国家由于工业的大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危害着人们的健康，这也是只看到眼前效益不顾长远后果的结果。我们的生产方式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领导我们社会的是高瞻远瞩的无产阶级，我们做事决不能只看眼前的结果，还要看到它长远的后果；不仅要为我们这一代人负责，而且要对子孙后代负责。毛主席和周总理经常教导我们要保护森林和草原，要植树造林，搞好水土保持工作，在发展工业的同时要注意综合利用，防止污染，搞好环境保护工作。敬爱的周总理在视察西双版纳时，曾语重心长地指示我们，要合理开垦，保护好自然资源，改造好大自然界。要做人民的功臣，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如果说历史上人们在与自然斗争中常表现为只看到眼前结果的近视眼，那末在社会斗争中，人们更难看到深远的后果。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只研究人在生产和交换中的行为所产生的可以直接预期的社会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0页)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只要马上能赚钱，赚大钱就行，他们看不到，也不敢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自身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诞生。

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在发现某个现象的原因之后，一定要搞清这个现象对产生的原因有什么反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搞清问题，做好工作。我们常说教学相长，就是要我们不仅看到教员教好是学生学好的原因，同时也要看到学生的勤学好问反过来也是促使教员教好的原因。只有认真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的教员，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教员。这种结果对原因的反作用在控制论中叫做"反馈"。发明蒸汽机的瓦特所以获得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他实际上运用了反馈原理。在瓦特以前，人们早就制成一些蒸汽机，但都不能控制蒸汽的压力，压力时大时小，机器的转速也就时快时慢，不能均匀运行，不切实用。瓦特在蒸汽机上加上一个离心调节器，压力过大离心调节器的转速就加快，从而部分地关闭阀门，堵塞蒸汽流，减少其压力；反之，压力过小，离心调节器的旋转就放慢，从而开大阀门，加强蒸汽流，增大压力。在这里，压力的变化是离心调节器转速变化的原因，离心调节器转速的变化反过来又成为压力变化的原因。就是利用这种反馈作用，自动调节把蒸汽压力控制在一定水平，保持了机器的匀速运行，使其合乎实用的需要。现在，反馈原理已经在机器的自动控制和电子计算机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如果结果对原因不起反作用，

不能作为引起原因进一步变化的原因，那末就不可能有反馈系统。

反馈原理对生物界和社会生活的研究也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从一定意义上，可以把生物个体比拟为精密的自动控制系统，即反馈系统。例如人体内血液中葡萄糖的浓度是一定的，血糖过高会促使胰腺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则有降低血糖的作用。血糖过高是分泌胰岛素的原因，分泌胰岛素又反过来是降低血糖的原因。正是由于这种反馈系统的作用，把血糖自动控制在一定的水平。如果这种反馈系统失效，人就会患糖尿病。我们知道，正常人的体温、心率、血压等等都是一定的，这也都是靠整个反馈系统来控制的。不理解反馈原理，就无法理解生物体的正常的生命活动。社会生活也是这样，拿工农业的关系来看，工业是主导，农业是基础，没有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提供农业机器、化肥、电力等等，就不可能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是说，工业的发展是农业能够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没有农业的发展为工业提供粮食、原料、资金和市场，也不可能有工业的大发展，就是说，农业的发展反过来又成为工业能够高速发展的原因。反馈作用的普遍存在，反馈系统的广泛建立和日益复杂化，不断证实和进一步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因果观，同时有力地驳斥了形而上学的因果观。

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辩证法还在于实际生活中，一个结果往往不是由一种原因所引起，而是多种原因所造成的。例如农业收成的好坏，就是自然气候的变化、耕作技术水平、耕作制度、人的主观努力程度和农业政策的正确与否等等原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在多种原因中，又有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等等的区别。同一原因，在不同条件下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同样的气候和土壤条

件，由于主观努力的程度不同，产量就会大不相同。要研究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必然要全面地揭露造成某个结果的多方面的原因，具体分析各个原因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并且具体分析因果联系中的各种条件，从而大大提高我们改造世界的自觉性。

因果观念产生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正确地把握因果联系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条件。在工作中，只有正确认识事物的因果联系，善于估计工作的后果，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在总结经验时，不仅要肯定成绩，发现错误，而且要找出取得成绩和产生错误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扬已有的成绩，避免重复发生同样性质的错误。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毛泽东肯定我党历史上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斗争是完全应该的，同时又指出在斗争方法上有缺点，缺点之一就是“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在对待党内错误问题上，“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两个目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2页）只有把握了事物的因果联系，才能通过实践消除产生坏结果的原因，实现对我们有利的结果。

因果联系尽管多种多样，但是，它还不能概括世界上各种联系的丰富内容。认识因果联系固然重要，但它也不能代替对其他联系的探讨。因果性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小部分。科学和哲学不能只局限于研究事物的因果联系，还必须进而研究事物的其他多方面的联系。

三、必然性和偶然性

当我们深入地考察和研究因果联系时，就可以发现两种相互对立的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这两种联系都与因果性有关，但又不同于因果联系。必然性产生于事物内部的根本的、本质的原因，它是客观事物联系和发展中的不可避免的趋向。例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摩擦生热，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一定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等等。偶然性与必然性相反，它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由于外在的、非本质的原因而产生的。偶然现象对这一事物发展过程说来，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例如，某块农田遭到雹灾或虫害，社会主义革命在某一个国家正好在哪一天取得胜利等等。

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两个对立面，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等同的。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一定要贯彻下去的趋势，它决定着事物的发展前途和方向。偶然性则相反，它不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趋势，一般说来，它对整个事物的发展只起着加速或延缓以及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作用。前面讲过，种豆得豆是一种必然。豆子下地会生根发芽、破土成长，最后开花结豆，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至于每颗豆子遇到的土壤是否肥沃，它成长期间气温是否适宜，是否风调雨顺，从而影响到它成熟的迟早，结豆的多少，和豆粒是否饱满等等，所有这些，相对于种豆得豆这个必然趋势来说，无疑都是偶然的了，因为它们都不能改变种豆得豆的必然趋势。有人会说，这不对了。豆粒下地，如果遇到鸟食虫害就不可能生根发芽，即便生根发芽如果遇到特大的旱涝灾害也会

颗粒无收，这岂不是改变了种豆得豆的必然趋势？对某粒豆种、甚至某块豆田来说，遇到某种特大的偶然性灾害，的确会中断它的正常的发展、改变了它发展的必然趋势，种豆而不能得豆。但是，这却改变不了要得豆必须种豆这条必然规律。我们决不可能希望靠种其他什么东西而得到豆子。

必然性和偶然性虽然是客观事物联系和发展中两种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倾向，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的统一，它们共存于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总是既包含着必然的方面，又包含着偶然的方面。这种矛盾现象是由于事物联系的复杂性、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而产生的。每一个事物都是由它内部包含的各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综合组成的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同时，每一个事物不是孤立的，它又和外部的各种事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和作用。因此，每一事物的发展是由内部和外部、主要和次要等等各种原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其中，事物内部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着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必然的趋势，由于次要的、外部的原因的作用而发生多种多样的摇摆和偏差，表现为种种的偶然性。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实现的，偶然性是表现必然性的。地球上的北温带区，从一月到七月，气温逐渐增高，是一个确定不移的趋势，这是由太阳光对该地区从斜射到直射的变化这一根本原因所决定的。由于日照的加强，使地面吸热多于散热，造成气温逐渐增高。但是，云层的厚薄和分布的状态、气压的高低和温度的大小、气流和洋流的变化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地面的吸热和散热比例。因此，在总的过程中，某一天的气温是否一定比前一天高，就具有偶然性。气温上升这个总的必然趋势，是在无数偶然的波浪起伏的复杂变化中实现的。与此紧密相关，经过严冬必然会大地回

春，至于春来的早迟（几天）又带来偶然性了。革命的发展也是这样。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以后，党内以林彪为代表的悲观主义者怀疑革命高潮能否很快到来，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革命“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因为，当时国内阶级矛盾处于十分尖锐的一触即发的状态，“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至于革命高潮究竟哪一天到来，就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是那么确定的了。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103页）国内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矛盾日益急剧地尖锐化是决定时局发展的根本原因，它决定着“革命高潮很快到来”这个大方向和必然趋势。但是，国际条件的变化，国内革命力量的分化和重新组合，反革命力量的分化和重新组合等等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况，也会影响着时局的发展，使它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使革命高潮会提早一些或推迟一些到来。无论是提早或推迟都改变不了“革命高潮很快到来”这个总的、必然的趋势。

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对立统一在于，一方面，必然的东西是偶然的。这就是说，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必然性通过大量偶然性表现出来，这就使事物发展的进程具有丰富、生动的内容。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另方面，偶然的东西又是必然的。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

没有脱离必然性的偶然性。这就是说，凡看来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偶然性本身又始终服从于内部的隐藏着的必然性。这种偶然性始终受着内部隐藏着的规律的支配。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从偶然现象中，揭露出事物过程内部隐藏着必然的规律性。

形而上学者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绝对地对立起来，否认二者之间的联系和统一，由此提出了三种不同的错误观点：只承认偶然性否认必然性的非决定论观点；只承认必然性否认偶然性的机械决定论观点；既承认必然又承认偶然，但把二者看成是彼此孤立、不相联系的观点。

非决定论者否认世界的客观规律性，把一切现象都看成只是偶然的，否认它们的必然性。这种观点在实质上是把世界上一切现象都看做是某个自由意志（神或人）任意创造出来的，其中毫无规律可循。这样一来，现实世界中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每天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这也不是必然的，可能一天忽然太阳从西方升起。狗是四条腿的动物，然而有朝一日，它也会生出八条腿或十六条腿的狗崽子……只要上帝有这样的想法，那末，这一切荒诞的事情都可能出现。因为，上帝是万能的，上帝是不管什么必然性的。可见，非决定论是一种多么荒谬绝伦的理论。

一些近代和现代唯心主义者仍然坚持这种荒谬绝伦的非决定论。如英国的毕尔生说："必然性属于概念的世界"，而不属于现实世界本身，现实世界本身是没有必然性的。他们还为非决定论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衣，使之带有更大的欺骗性。前面讲过，他们曾利用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来否定基本粒子运动的因果性和必然性。除此以外，现在又利用分子生物学的最

新成就来宣扬非决定论。法国分子生物学家莫诺在一九七〇年出版的学术演讲集《偶然性和必然性》中宣扬，偶然性是生命的起源和发展的全部基础。他说："只有偶然性才是生物界中每一次革新和所有创造的源泉"，"进化这一座宏伟大厦的根基是绝对自由的，但又是盲目的纯粹偶然性。"在他看来，生物的进化是由在本质上无法预测的 DNA 分子结构的纯粹偶然的变化所造成的。莫诺用形象化的语言赤裸裸地描述这种观点，把每一生物物种的出现都说成是"轮盘赌"中偶然得中的彩票，认为人类的出现也不过是"在蒙特卡诺赌窟里中签得彩的号码"，是一种纯粹的偶然。就是这样，莫诺把复杂的生命现象和光辉灿烂的社会文化都归之于一种大分子即 DNA 分子的偶然变化。

科学的发展证明，生物的进化决不是毫无必然性或规律性可循的纯粹偶然。早在一百多年前，达尔文就发现了生物物种进化的必然规律。他以大量无可辩驳的科学事实指明，每个生物个体之间都存在无数偶然的差别（即个体变异），通过生物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保存了对生物生存有利的变异，淘汰了对生物生存不利的变异，从而形成了物种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个"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就是生物物种演化的必然规律。当然，达尔文学说也还有不足之处，他在"说到自然选择时，并没有考虑到引起个别个体变异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109页）莫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把个体变异说成由DNA大分子的纯粹偶然变化所造成的，并且把这一点片面地夸大使之绝对化，用以否认整个生物物种进化的必然性。要知道，DNA 大分子的变异也并非什么纯粹的偶然。生物个体出现什么样的变异，它究竟是由哪些DNA分子的变异以及何种变异引起的，这固然是偶然的。但是，这也是有

原因可循的，它包含着一定的必然性，是可以认识的。农业育种学的实践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通过杂交、使物理化学等因素干预核酸的代谢，可以改变 DNA 大分子的结构，促使生物体出现变异。人们正是利用这种客观必然性来培育新种的。当然由于DNA大分子的结构以及它们组成的遗传基因的极端复杂，加上外界干预条件的复杂多变，个体究竟出现什么样的变异又是偶然的。因此在育种时必定要同时处理大量种子，然后在大量各种不同的变异中进行选择。既然个体变异的方向是不定的，是偶然的，仅就这一点来讲，是否可以说是纯粹的偶然呢？也不行！因为，不管你采取什么方法处理，麦种的变异总是不同于稻种的变异，植物的变异总是不同于动物的变异，一种生物决不会无缘无故地一下子变为另一种生物。生物的变异总有一定范围。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变异又是一定的。“不定”中有“一定”，偶然中有必然，这才是事物本身的辩证法。莫诺在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上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他否认必然性，宣扬纯粹的偶然性，则是完全错误的。

一些腐朽阶级的思想代表之所以特别热衷于宣扬荒谬绝顶非决定论，其最根本的用意还在于否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实用主义者胡适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恶劣典型，他把任何细小的偶然事件都看作是对于历史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原因，借此来抹煞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说：“他（指我或个人——编者注）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善恶，无论是非，都在大我（即宇宙——编者注）上留下不能磨灭的结果和影响。他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林彪、“四人帮”也宣扬这种非决定论。他们认为，历史只是由几个天才人物所决定

的，天才人物的出现又纯粹是偶然的，说什么“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恩格斯早就驳斥了这种荒谬的观点，他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历史的必然性。反动派宣扬反科学的非决定论的观点，是妄图让人们消极地服从偶然性的摆布，把自己命运交给某个偶然出现的天才人物（英雄）去支配，或者依靠偶然的命运进行盲目的冒险活动。这是一切反动派惯用的欺骗和麻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卑劣手法。

机械决定论是另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它只承认必然性，全然否认偶然性。古代希腊的德谟克利特就断言：一切都是纯粹必然的，“人们捏造了偶然这个偶像〔形象〕，借以掩饰他们自己的无判断力”。他的理由是：一切现象都是有原因的，因此一切都是必然的，人们只是把那些尚未察知原因的现象叫做偶然性，实际上偶然性是并不存在的。这种思想在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地发挥，他们把必然联系和因果联系混为一谈，而把偶然性与无因果性混为一谈，用因果性普遍性的原理来否认偶然性，达到了机械决定论的结论。霍尔巴赫甚至说，在大风扬起的尘土的旋涡中，“没有任何一个尘土的分子，……其分布是偶然的……”。恩格斯指出：机械决定论，“从法国的唯物主义传到自然科学中，并且力图用根本否认偶然性的办法对付偶然性，按照这种观点，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简单的直接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1页）这一粒豌豆荚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

或六粒，是必然的；这条狗尾巴是五寸长，不长一丝一毫，也不短一丝一毫，也是必然的；某一帝王的消化不良，某个侵略者心脏血液的沸腾等等，都和战争的发生有必然的联系，等等。这样一来，事物的发展，不就变得非常神秘了吗？

这种把必然性绝对化的错误观点，是和当时科学发展的状况相联系的。例如牛顿力学（特别是天体力学）的定律所反映的似乎就是完全清除了偶然性的绝对必然。好象太阳系诸行星是根据万有引力规律，以纯粹的必然性周而复始、始终如一地运动着，在这里找不到一点点偶然性。果真如此？不！宇宙中有无限多的天体，由于万有引力的普遍起作用，它们也都会这样或那样地影响到太阳系中诸行星围绕太阳的运动，使它们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摄动，不过这样的摄动微乎其微，那时的观察手段难以觉察罢了。规律是事物运动的必然联系。但是，精密地观察每一事物（例如天体运行）的运动，总会发现它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与规律偏差，这就是偶然性起作用的表现。因此，列宁说："……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9页）因为，规律只是反映事物运动中稳定的必然的东西，未能反映出其中多变的各种偶然的方面。

既然在天体的机械运动中还不可能排除偶然性的影响，那末在其他运动（如生物运动、社会运动）中，就更不可能有什么纯粹的必然了。偶然性是存在的，并且在事物的运动发展中有着不容抹杀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本是发现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是，马克思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

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因此，与偶然性完全无关的纯粹的必然是没有的。

这种否认偶然性的存在和作用的机械决定论，本是在反对神学非决定论和发展科学的斗争中产生的。但是它却远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第一，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很强调必然性，但是实际上他们所谓的一些必然性是不折不扣的偶然性，只不过他们把这些偶然性叫做了必然性罢了。这不是把偶然性提高到必然性，而恰恰是把必然性降低到偶然性。因为，在他们看来，能量转化和守恒是必然的，同样，某一豌豆荚中恰好有五粒豆也是必然的，它们都是科学所要探索的必然规律。这样还会有什么科学呢？恩格斯指出："科学如果老从豌豆荚的因果连锁方面探索这一个别豆荚的情况，那就不再是什么科学，而只是纯粹的游戏而已；因为这同一豆荚本身，还具有其他无数的、个体的、偶然的特性：色彩的浓淡，豆壳的厚度和硬度，豆粒的大小，更不必说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个别特点了。因此，这一个豌豆荚中所要探索的因果联系，比全世界所有的植物学家所能解决的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2页）第二，把事物发展中的任何细节都说成是"必然"的，似乎它们产生的必然的因果连锁早已在太阳系形成以前的星云中就确定了。这同把它们说成是由"天数"、"神意"所决定又有什么区别呢？恩格斯说得好："承认这种必然性，我们也还是没有从神学的自然观中走出来。"(同上）这种神学的自然观就是宿命论。

第三种形而上学观点，是由于看到非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都站不住脚而产生的一种"非此即彼"的观点。它既承认必然

性，又承认偶然性，但是把必然性和偶然性机械地割裂开来。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每一事件，要么纯粹是必然的，要么纯粹是偶然的。凡意义不大的小事是偶然的；那些意义重大的大事则是必然的。纯粹的偶然不服从任何规律，只能是名符其实的奇迹。至于纯粹的必然就成了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东西，这仍然是宿命论。这种“非此即彼”的观点，本想排除非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的弊病，好象是“不偏不倚”，但其结果却恰好相反，不仅兼有上述两种观点的弊病，而且使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一些事情看作是偶然的奇迹，而把另一些事情看做是命定的必然。

这种观点对科学的发展也是极端有害的。它把必然的东西说成是唯一在科学上值得注意的东西，而把偶然的东西则说成是对科学无足轻重的东西。这无异是说，科学只应该研究那些已经知道原因、可以纳入规律的东西，而不应该去研究那些没有发现原因、还不能用科学规律解释的东西。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就完结了，因为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所不知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1页）

苏联的李森科曾宣称：“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要把偶然性从生物学中驱逐出去。”他批判达尔文的“不定变异”，说它使“发展仿佛只是建立在偶然性的基础上”。这样，李森科就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绝对对立起来，完全否认研究偶然现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恩格斯指出：“达尔文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中，是从最广泛地存在着的偶然性基础出发的。各个种内部的各个个体间有无数偶然的差异，这些差异增大到突破种的特性，而且突破的近因只在极其稀少的情况下才可得到证实，正是这样一些偶然的差异使达尔文不得不怀疑生物学中一切规律性的原有基础，不得不怀疑原有的形而上学地固定不变的种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3页）现代科学已经证明，达

尔文把不定变异作为选择的主要对象是完全正确的。在物种发展过程中，由于复杂的内部原因和外界条件的影响而发生一些不定变异，最初只是某一物种的非本质的、不稳定的性状，其中有些变异，因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断地固定下来，最后使有机体发生根本的变异，产生了新的物种。原来偶然的变异，就变成了该物种的必然性状，偶然性变成为必然性。从这里我们不仅发现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关系，而且发现了偶然性向必然性的转化。科学如果不关心、收集和研究大量的这些偶然性材料，就不可能发现和真正理解由它们转化形成的必然规律。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意义上，不了解偶然性就不可能掌握必然性。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偶然性向必然性的转化。在原始公社里，自然经济是必然的，产品交换是偶然的现象。随着生产的增长和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商品交换就从偶然转化为必然。我们不仅要看到这种由偶然向必然的转化，而且要看到这种转化本身也是必然的。

必然和偶然是相互转化的，不仅有从偶然向必然的转化，而且也有从必然向偶然的转化。例如，在生物新种形成以后，它原有的某些必然形状消失了，失去了必然性。但它的某些特征，在过了很长时间以后还可能出现，这就是生物进化中的返祖现象。有极个别的人，还会象猴子那样全身是毛（如我们所熟知的“毛孩”）或长有尾巴等等。但是，这已经是不稳定的，而且偶然的了。

当然，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还在于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可是，这绝不等于科学要把偶然性看做自己的敌人而加以排除。相反，科学的发展却离不开对偶然的研究。在现代科学的一切领域中，统计方法和概率论方法日益起着重大作用，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统计规律所揭露的仍然是客观事物自身的必然性，但是，这种必然性只是表现在大量个别偶然现象的总和之中。例如，各个气体分子的运动是杂乱无章的，各个分子之间以及它们与容器相互碰撞的速度、方向、角度……等等，都是复杂多变的，因此，每个分子运动的方向、速度等等，都是偶然的。然而，从许多单个分子的偶然性运动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了必然性。又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剧烈的竞争使某一商品在某一地点、某一时间的价格表现为几乎是纯粹偶然的，但是在对大量商品价格变化的偶然现象的统计之中，就会发现支配着商品交换的必然规律——价值规律的作用。现在统计方法和概率论方法在量子力学、信息论中都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方法，在生物学、经济管理、社会学、技术科学等各方面也都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在今天，还要说什么“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只能是一种科学上的反动。

总之，必然和偶然这对范畴是对因果联系的进一步认识。必然联系固然是对因果联系的深入一步的说明，偶然性的客观存在也不排斥因果联系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且进一步揭露了因果联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必然和偶然这对范畴同原因和结果这对范畴一样，都是客观矛盾关系的反映，都是对立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必然和偶然的原理，对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既然必然性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趋势，我们就必须着重认识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并且要善于根据必然规律来正确地规定我们行动的目的和计划，使我们的行动具有高度的自觉性。

只有遵从客观必然性来确定行动，我们才能获得自由。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

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我们的任务就在于避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不断实现由必然向自由的转化。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了解客观的必然而把希望寄托在有利的偶然事件上，那就是盲目的，就会办出一些蠢事，最后弄得事与愿违。要克服盲目性，就必须认识必然性，就必须努力学习揭示客观必然性的科学知识。

强调认识必然的重要，不等于可以不注意偶然性，而是要透过偶然揭示必然。强调在实践活动中必须遵循必然规律，但是决不可能排除一切偶然。因此，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各种偶然因素以及它们的作用，要善于利用一切有利的偶然因素来推进我们的工作，加速斗争的胜利；同时要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弱有害的偶然因素的影响，并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一切准备，做到"有备无患"，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四、可能性和现实性

可能性和现实性这对范畴比原因和结果的范畴更深刻、更全面；同时它又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进一步的发展。

现实就是现在存在着的客观实在。但是现实性这个范畴并不是简单地说明现在存在的个别事实和现象。要知道，客观实在是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在过去客观实在不是这样，到将来客观实在也不会永远是这样。因此，今天的现实在过去曾经是不现实的，到将来又会变为不现实的。目前的现实之所以成为现实，由于它是过去的"现实"发展的结果；目前的现实之所以会终于变成不现实，是由于它包含使自己转化为将来的"现实"的原因。现实之成为现实又转化为不现实，是

由于它内部深刻的规律性、必然性所决定的。一个事物或现象当它还未出现时，还是不现实的，但是，只要它合乎客观实在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它就迟早一定会变成现实。反之，每一个现存的事物或现象暂时还是现实的，只要它丧失继续存在的必然性，它迟早一定会变为不现实。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各自在历史上一定时期内都是不现实的，由于合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一个个挨次地成为现实。同样，这一个个社会当它们在历史发展中丧失了必然性的时候，又一个个挨次地变为不现实。资本主义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变为不现实了，在另一些国家中它必然迟早会被社会主义的现实所代替。共产主义社会在历史上从未成为现实，由于它合乎历史的必然，终将变为现实。这就是说，现实性是和必然性相联系的，归根到底，只有必然的东西，才是现实的。

可能性和现实性是相互对立的范畴。某种事物和现象在其还未成为现实以前，只是一种可能性。可能不等于现实，它不是指当前已经实际存在着的事物，而是指包含在事物中的、预示事物发展前途的种种趋势。可能也不一定会变为现实，因为在事物发展前途中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趋势，即各种不同的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只有其中的一种趋势、一种可能会转变为现实，而使得其他种种趋势、可能不能成为现实。

可能性和现实性这一对范畴，又是互相统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是还没有展开的现实，现实是充分展开并已经实现了的可能。现实之所以能成为现实，它必须首先是可能的，否则就不会变为现实。那些荒诞无稽的东西，之所以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中，之所以在客观世界中永远找不到，就在于它们根本没有变为现实的可能。只有那些否定因果性和必然性的非决定论者才会把一切都看成是可能的，妄图期待那些神秘莫测

的“奇迹”变成为现实。

可能和现实、必然和偶然这两对矛盾，是紧密相连的。前面讲过，凡是必然的都是现实的，这是说，每一个带有必然性的事物和现象终究要成为现实。但是，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必然是要通过偶然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因此，任何必然性在它变为现实的道路上，都无法完全避免偶然性事件的影响。它可能比较顺利地较早地变为现实，也可能遇到较大的困难和曲折，因而较迟地变为现实；它可能具有这样的特点和细节，也可能具有那样的特点和细节。任何必然性都是通过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道路而实现的。可能性与偶然性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产生某些现象和过程的可能性，主要是由物质世界的客观的因果联系、合规律的必然联系所决定的。不过它是建立在各种因果关系相互影响，许多必然规律交互作用的复杂情况的基础上的。不与一定的必然性相联系的事物和现象是不可能的。例如，今年麦子丰收的可能是与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等规律性的因素相联系的。如果各种条件保证了麦子的生长，那末，丰收的可能就变成了必然。但是，这又是和气候的变化、病虫害的情况等复杂的偶然因素相联系的。因此，在麦子入仓以前，丰收毕竟只是一种可能，它还不是现实。反之，如果麦子丰收所需要的各种条件一条也做不到，那末，丰收就是不可能的，甚至连起码的收获也是不可能的。没有耕耘，就不可能有收获。因此，我们在估计可能性时，必须同时考虑到制约这种可能性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可能性和偶然性的联系可以通过或然率这个数学范畴表现出来。

可能性这个范畴有其质的界限，它一方面和现实性相对立，另一方面，又和不可能相对立。可能性这个范畴还有它量的方面，这就是指可能性的大小，或然率就是对可能性在量

上的科学说明和测定。当然，并非任何事件的可能性都可以用或然率确切地做出数量的测定的。但是，在多种偶然现象无数次重复出现的大过程中，在数量上精确地确定可能性的大小，计算出或然率，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或然率是我们所要测定的偶然事件的数目与全部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的总数之间的比率。如n是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的总数，而m是我们所要测定的偶然事件的数目，或然率就等于m/n。n和m的比值在零和一之间，凡或然率等于零，就是没有可能性，即不可能；凡或然率等于一，就是百分之百的可能，这时的可能就完全成了必然。或然率是根据表现出一定规律的大量偶然性的计算而规定的，它不表现人的主观愿望的强烈程度，而是对条件和事件之间客观存在的联系的说明。对或然率的计算产生于实践的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在科学上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孟德尔曾利用或然率来说明遗传规律。今天，在工程设计、原子物理、医学等各方面的研究中，或然率的计算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人们不仅对有利的可能和不利的可能的大小做到"胸中有数"，而且要创设条件，增大有利的可能，缩小和避免有害的可能。

总之，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

在《对立统一规律》一章中，讲过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一章中，讲过发展过程的曲折性。我们探讨了可能性同现实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之后，就可以进一步理解新陈代谢过程的具体内容以及这一过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矛盾双方的斗争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变化。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不外是甲方战胜乙方，或者乙方战胜甲方。因此，事物的发展具有两种相反的可能。在新旧双方斗争中就既有新事物战胜旧事物

可能，也有旧事物暂时战胜新事物可能。我们讲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这只是指发展过程的总的必然趋势。至于在新旧事物的每一次具体的搏斗中，新事物的胜利只是一种可能，它不能排除旧事物暂时得逞的可能。对新旧事物反复搏斗的总的结局来说，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新事物，就不再存在两种可能了；这也就是说，新事物战胜旧事物不仅是一种可能，简直就是必然了。不过这种必然性是通过可能变现实的途径而实现的。由此可见，新陈代谢这条必然规律是通过多次反复曲折的复杂过程而表现出来的，是在多种对立的可能性的反复的斗争中得到实现的。历史上，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革新力量和保守力量之间的斗争，无不如此。

把可能同现实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是以现实的东西，而不是以可能的东西为根据的。"（《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6页）毛泽东也一贯教导我们必须"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7页）当然，这并不是说估计事物发展的种种可能，就不重要了。问题在于，可能毕竟还不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它是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的事物，因而不能作为我们当前活动的可靠的出发点。而且，为了正确地估计事物发展的种种可能，也必须从客观现实出发，决不能靠主观的猜测。

为了正确地理解现实和可能的辩证关系，我们还必须从现实出发，对可能做出具体的深入的分析。首先要分清可能同不可能。凡真正属于可能的事物，一定能在现实中找到它可能出现的根据和条件，否则就是不可能的。例如，石头变成小鸡，制造永动机，反动派发善心，等等，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现实中完全找不到能引起这类变化的根据和条件（即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在我们实践活动中，只能办那些可能办到的事

情。谁要是不顾现实的客观根据和条件，勉强去办那些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那就只能是白白花费气力，他的愿望是永远不会得到实现的。

除了需要区分可能同不可能以外，我们还要对可能性做进一步的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把它区分为虚假的（抽象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可能性。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可能性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可能性。现实的可能性是在现实中有充分根据的可能性，因而也是在目前可以实现的可能性；虚假（或抽象）的可能性则在现实中缺乏充分的根据，它在目前现实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看起来好似不可能，因而叫做虚假的可能性。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统一的。虚假的可能性毕竟与不可能不同，它同现实的可能性一样，也是一种可能性。不可能是在现实中全然找不到根据的东西，虚假的可能性却在现实中有着某种根据，只不过根据不足或不充分罢了。制造永动机是不可能的，不仅现在不可能，而且将来也不可能，因为这是违背能量守恒定律的，在现实中找不到一点点根据。"海底捞针"常被用来形容不可能的事情，但它却并非真正的不可能，实际上它是一种虚假的可能，它在现实中是有一定根据的。只要海底有针，为什么就绝对捞不上来呢?随着人类的探测技术和打捞技术不断发展，海底捞针就不再是不可能的了。也就是说，到那时它已由虚假的可能转变为现实的可能了。月中取宝在历史上本是一种虚假的可能，但是，在宇宙飞行、航天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它就变成为现实的可能了。由此可见，虚假的可能是可以转化为现实的可能的。同样，现实的可能也可以转化为虚假的可能。例如，在我国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高速度发展生产力，

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本已成了现实的可能性。可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部分地篡夺了党和国家的大权，疯狂地干扰破坏我们的建设事业，曾经一度使这种现实的可能变成了虚假的可能。只有在粉碎了林彪和“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以后又转变成了现实的可能。

善于区分虚假的可能同现实的可能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我们办不成没有可能的事，也不能在目前现实条件下办成那些只有虚假可能性的事情。放着具备现实可能性的事情不做，去办那些只有抽象可能性的事情，那就更是错误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虚假的可能性对我们毫无意义。我们可以按照客观规律改变现实状况，使虚假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可能性，然后进一步促使它变为现实；当虚假的可能性变为现实的可能性时，应该尽可能地抓住时机，促使其进一步转化为现实。把虚假的可能性完全等同于不可能，而产生消极无为的思想是不对的。

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之间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辩证关系，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是十分复杂的，大体有下面几种情形：

第一，凡在现实中有根据的事情就是可能的。但是，如果在根据还没有展开，还没有达到足以解决矛盾的程度的时候，办成事情，解决矛盾，只是一种虚假的可能。例如，反动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野蛮统治和残酷剥削，它们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劳动人民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根据。但是，在这种对抗性矛盾还没有发展到统治者不能照样统治下去，劳动人民不能照常生活下去的时候，武装起义的胜利就只是一种虚假的可能。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急于发动起义，就会犯“左”倾盲动的错误，只会给人民带来失败和痛苦。反之，如果解决矛盾

的条件已经成熟，统治者已无法照常统治下去，人民也无法照常生活下去，虚假的可能性已经转变为现实的可能性时，还不积极地抓紧时机发动起义，那就会犯右倾的错误。

第二，一件事情有了根据，但这个根据本身并不是现实的主要矛盾，那末，这也还只是虚假的可能，要立即办成它仍然是不可能的。例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存在，但是在那时要用社会主义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矛盾，还是一种虚假的可能，在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是现实的可能。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了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才成为现实的可能。

第三，一件事情有根据，也已经展开，如果缺乏一定的必要条件，要办成它也是一种虚假的可能。例如，在油田上树立起钻机，如果缺乏水和泥浆，那末钻井出油仍然是不可能的。如果不顾条件蛮干硬干，就只会弄得机毁人亡。在没有水泵，解决不了水和泥浆的情况下怎么办？铁人王进喜喊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条也要上”的响亮口号，动用了一切可以盛水的器皿，肩挑手端解决了水和泥浆的问题，从而使开钻出油成了现实的可能性。在这里，“创造条件”四个字十分重要，如果没有条件，又不创造条件，硬要去办那种没有现实可能性的事情，是办不成、上不去的。

同时应当指出，如果把虚假的可能看成是不可能，从而失去了远大的目标，不为实现远大的目标做积极的准备工作和应有的努力，那也是错误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在旧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一种虚假的可能，因而放弃这个远大的目标。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驳斥了反共顽固派要共产党收

起共产主义的狂妄叫嚣，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包括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和将来的社会主义这两个有机构成的部分，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则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二者是紧密衔接、不可分割的，都是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正是在毛泽东的这一伟大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创造了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使它成为了现实的可能性。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我们又进一步把它变成了现实，于是才有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凡是应该办的但在目前暂时办不到的事，我们都应当有步骤地创设条件，使它首先变成现实的可能，并进一步办成它。这才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积极态度。

机会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混同和颠倒现实的可能和虚假的可能，甚至混同和颠倒可能和不可能，用以搞乱人的思想，打乱革命和建设的步伐，破坏革命事业。“四人帮”说什么“即使全国人民都变成了文盲，我们也能建成社会主义”,这纯粹是一派胡言。如果全国人民都变成了文盲，没有文化就会倒退到人类的蒙昧时期和野蛮时期，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什么现代社会主义可言？！“四人帮”疯狂地反对毛主席所树立、周总理所精心培育的大庆红旗。周总理总结大庆经验时指出：“城乡结合，工农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这本是大庆的现实，他们却说这是不可能的，是什么在社会主义阶段去办共产主义的事情。另方面，他们又别有用心地要在现阶段取消按劳分配制度，不顾具体条件，强求把农村人民公社一律过渡到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他们就是这样颠倒一切，搞乱一切，给革命和生产都带来了极严重的破坏。从这些反面教员那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正确区分可能和不可能、现实

的可能和虚假的可能的重要性。

就是对于现实的可能性，也还要做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现实的可能有根据，并且根据已经达到了足以解决矛盾的程度，又具备了解决矛盾的一定的必要条件。但是，能否把矛盾解决好，还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处理得好，解决了矛盾，把可能变为了现实；一种是处理得不好，没有能够解决本已可能解决的矛盾，因而可能没有变为现实。由于现实的可能性毕竟不是现实，它始终存在着转化为现实和未能转化为现实这样两种相互对立的可能。毛泽东教导我们："世界是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8页）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我们不能贪图安逸，掉以轻心，期望对我们有利的可能自然而然地变为现实。毛泽东以战争为例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4—455页）

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国民经济有计划和高速度发展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会自动地有计划按比例和高速度地得到发展。因为这虽然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但毕竟是一种可能性。我们决不能忽视同时还存在着另外相反的可能性。如果弄得不好，我们的国民经济也会发生危机，这在一定条件下，也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历史经验证明，这两种完全对立的可能性都是客观存在的。近百年来，我国经济本来已十分落后，全国解放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

地发展，曾大大地缩小了我们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干扰，不仅拉大了我们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原已缩小的差距，而且把国民经济带到了面临崩溃的边缘。只是由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才使我们避免了这种极其危险和悲惨的结局。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即使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的现在，有计划地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仍然只是一种可能。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要我们做很大的努力。要进一步摸清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严格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调整不合理的比例关系，改革一切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这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有计划高速度发展的可能变为现实，充分地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国人民正在努力把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争取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由此可见，在变可能为现实的过程中，主观因素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这种主观因素包括，认识客观规律和按客观规律而进行的积极实践活动。我们要力求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中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以及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各种条件；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经过主观努力和积极斗争，创设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力争实现好的可能性，防止坏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在工作中，必须同时准备两手，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这就是说，在争取好的可能性的同时，估计到坏的可能性，并为克服坏的可能性积极准备条件。这样，才有利于去同坏的可能性做斗争，即使在坏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时，我们也不至于束手无策，而能够有备无患，应付自如，继续为争取好的可能性的实现而斗争。毛泽东教导我们：“要从最坏的可能来

设想”，就可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3页）

五、形式和内容

现实中任何一个事物都分为形式和内容两个相互对立的侧面，都是形式和内容的辩证统一。事物的内容是指构成事物的一切要素的总和。这些要素包括事物的各种内在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决定的事物的特性、运动的过程和发展的趋势等等。事物的形式是指把内容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表现内容的方式等等。

形式和内容这对范畴，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揭示由可能到现实的过程。当构成事物内容的诸要素还没有被一定的形式的结构统一起来时，这一事物还只是一种可能，它只有在具备一定的形式之后才变成为现实。每一种化合物都以一定的化学元素作为自己的内容，也都有一定的结构作为自己的形式。以氮（N）的氧（O）化物为例，N和O是氮的氧化物的内容，N和O的存在只是为种种氮的氧化物提供了变为现实的可能，只有在N和O以一定形式的结构组合起来时，如N_2O、NO、N_2O_3、NO_2、N_2O_5等等，才成为真正的现实。这五种化合物的组成成分都是氮氧两种元素，这是它们相同的地方。但由于形式即结构的不同，内容也有所不同：氮的原子价不同，氮氧比例不同，各种化合物的化学特性和物理特性不同，等等。这样，不同的形式就使不同的可能成为现实。

生物体的生活内容提供了产生新的生理机能的可能，而要使这种生理机能成为现实，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生理结构，即要有适应这种机能的器官形态的变化。机能和形态，即内容和形

式是辩证统一的。生物形态愈高，生活的内容愈丰富，也就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的可能，因而进化就愈快。人类和动物的生活内容不同，人不是简单地适应自然，而是力求支配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适应于人类的生存。要使这种崭新的内容成为现实，必须有相适应的人类生理形态的变化，如直立行走和手的解放、发达的大脑、能发出一个个清晰音节和抑扬顿挫音调的语言的口部器官和发达的喉头等等。人的劳动是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的活动，要使意识成为现实，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语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只有清晰的语言才能表达清晰的思想，语言混乱不过是思想混乱的表现。所以，语言形式又反过来提供了思想内容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思想内容的发展又必须有语言形式的进一步发展，有了能表现新内容的词和更精密准确的语法，才能使新思想成为直接的现实。

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是组成生产力的要素，是生产方式的内容。如果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以一定的生产关系形式结合起来，那末，它们还不能构成现实的生产力，还无法进行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劳动者一无所有，如果不以雇佣劳动的形式把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起来，这二者就仅仅是可能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可能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充分地结合起来，常常有大量劳动者的失业和生产资料的被闲置，使得可能的生产力不能全部变成现实生产力，因而造成对生产力的浪费和破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使全体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提供了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充分结合起来、全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可能，从而也就提供了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可能。但是，要使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提供的高速发展生产的可能变为现实，还必须有科学的经济管理的形式以及种种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适合生产力高速发展要求

的经济形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高速度发展生产力还单纯是一种可能，而现实却是生产的停滞和被破坏。林彪、“四人帮”一伙，对生产管理形式以及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各项政策的破坏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一个必须永远牢记的惨痛的教训。

事物所具有的形式往往有两种：一种是和内容不直接相干的、非本质的外在形式；一种是和内容紧密相关的本质的内在的形式。一本文艺作品的形式，可以是精装，也可以是平装，这是外在的形式，它和作品的内容不直接相干。而艺术的形式则和作品的内容密不可分，是它的内在形式。我们为写文艺作品搜集了丰富的素材，对这些素材又做了深刻的政治分析，使作品具备了丰富和深刻的生活内容、政治内容。但是，这只是为写出一部好的作品提供了可能，如果不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那它就还不是一部好作品。所以说，艺术形式是文艺作品不可缺少的内在形式。毛泽东指出：对小说、诗歌等一切文艺作品，“我们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6页）不仅文艺作品如此，一般宣传品如果没有生动活泼的人民语言形式，“言语无味，象个瘪三”，那也是达不到宣传的目的的。在思想斗争和学术讨论中，不采取充分说理的形式，动不动就打棍子，扣帽子，揪辫子，是没有任何说服力和战斗力的。因此，生动活泼的语言，充分的论证说理，是我们在进行宣传和学术讨论中不可少的内在形式。

任何内容都必须具有和它相适应的内在形式。现代精密科学少不了运用数学语言的形式，对事物做出定量的分析。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

的地步。电子计算机形式的变化（不断地微型化），对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在方面。它的电子器件的形式的变化，经历了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这样新老四代，现在正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方向发展。每一次形式的变化，都对电子计算机的功能和应用，带来了新的更丰富的内容，使得电子计算机在科学研究、生产技术、经济管理等各方面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以至在一些技术先进的国家内，已经逐渐成为管理家务的良好工具。

在我们说明了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的区别以后，下面凡讲到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时，主要指的是它的内在形式。

形式和内容这对范畴和辩证法的其他一切范畴一样，它们也不是凝固不变的、僵化的东西。它们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一定条件下，作为一定内容的形式，可以成为另一形式的内容。如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来讲是形式，对由它所产生的上层建筑来讲则是内容。思维是对客观世界反映的形式，同时它又是语言形式的内容。

在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关系中，一般来说，内容居于决定的地位，属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前面讲过，只有具备一定的形式才能使事物成为现实，没有无形式的事物。可是，一定的形式只有在一定内容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形式必须适合事物矛盾运动的内容，也就是说，一定的内容才使得一定形式的出现成为可能。有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的形式。我们知道，生物的器官形态与机能的关系，体现了形式和内容的辩证统一。在其中，内容（机能）的变化对生物的发展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一般讲来，在系统发育过程中，机能是积极的、变动的因素，容易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产生变异，所以往往发生新机能与旧结构之间的矛盾，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在新机能的影响下创

造新的结构。例如，古代总鳍鱼类在向两栖类演化的过程中，随着向陆地生活的过渡，由于执行爬行的职能，逐步改造了胸鳍、腹鳍，使之变成适应于爬行的结构。又如水生哺乳动物（鲸、海豚等），由于四肢要执行游泳的机能而逐步演化为鳍足的结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规模日益扩大，日益社会化，使得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形式容纳不了这样庞大的生产力，因而决定了最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式代替它。

内容决定形式并不是说同一内容只能有一种形式，由于条件不同，它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但是内容却是相同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样，同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也是各不相同的。

在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中，要反对片面夸大形式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亚里士多德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他批判了柏拉图把世界的本质看做是理念的总和的唯心主义观点，在他看来，自然界是实物的总和，而实物则是质料和形式的统一，是形式化了的质料。他还认为质料和形式的区别是相对的，二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例如，泥土是砖瓦的质料，而砖瓦则是泥土的形式；砖瓦对房屋来说又是质料，房屋则是形式。他这种看法显然是唯物主义的，并且具有辩证法的因素。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把这种观点坚持到底。他认为存在着没有任何形式的纯粹质料和没有任何质料的纯粹形式。这样，他就把形式和内容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孤立起来了。还有，他单纯地强调质料只含有发展的可能性，它只有依靠形式的作用，才能转化为现实。他不理解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中内容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因而认为质料是消极的、无定形的，而形式是积极的、能动的本原，它使一切事物变为现实。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把

所谓纯粹的形式（或叫形式的形式）看做是世界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而上帝就是最早的形式，即形式的形式。这样，亚里士多德就从唯物主义走向了神学唯心主义。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一般都把形式看做是脱离内容的绝对的东西，认为形式具有一种独立自在的价值。现代资产阶级艺术中的抽象学派，就是这种形式主义的突出表现。

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内容决定形式。因此，我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首先要注意事物的内容，反对只注意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一定的内容给一定形式的形成提供可能，只有具备充实的内容，才可能有完美的形式。鸟类的完美的飞行器官——翅膀，是鸟类飞行机能的发展所促使的，当鸵鸟丧失了飞翔的机能而使翅膀徒具形式时，翅膀也就退化了。再如，人的盲肠和蚓突因为已经没有消化的功能，而极度退化成了痕迹器官。文章的好坏也首先决定于内容，不能一味追求形式。"心苟未明，劬劳憔悴于夆句之间，不过枝叶耳，无所附之而生。"（黄宗羲：《〈南雷文定〉论文管见》）有些人不深入调查研究，情况不明，脑子空空，写起文章内容贫乏得可怜，只得搬用一些华而不实的词藻。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他们不了解"本体实而花萼振"（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韩愈：《答李翊书》）。还有些人，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材料，"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在文章中，"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这是一种"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这"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

雅、最庸俗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756页）还有一种别有居心的人，用形式主义的方法，来歪曲、阉割事物的真实内容。修正主义者就曾经用宗教的形式来歪曲、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容，俄国的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就这样干过。在林彪、“四人帮”那里，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搞什么“早请示”、“晚汇报”、“语录操”、“忠字舞”等现代迷信，用以愚弄群众，装扮自己，好象只有他们这一帮小丑才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得“最高”。其实，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任何敌视实事求是的反科学的形式主义的作法，只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践踏。

我们强调内容决定形式，反对形式主义，但决不忽视形式，决不否认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形式和内容作为一对矛盾，和一切矛盾一样，矛盾双方总是相互作用的。一般说来，内容是主要的矛盾方面，它起着决定的、支配的作用，而形式是非主要的矛盾方面，不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这并不排除，在一定的条件下，形式也会转化成主要的矛盾方面。当着不变更形式内容就不能发展时，形式的变更就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形式对于内容的反作用，有两种基本情况：凡适合内容的形式，对内容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凡不适合于内容的形式，对内容的发展起消极的阻碍作用。如充分说理、自由讨论的形式，有助于科学的发展，而蛮不讲理、专制压服的形式，就会扼杀科学的生命。无产阶级专政需要广泛的人民民主，对民主形式的破坏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内容的破坏，没有民主就会使无产阶级专政倒退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甚至倒退为封建主义专政。民主不仅是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内容，它需要有真正反映绝大多数人民利益而又必须人人遵守的法律形式来保

证，没有一定形式的法律来保证，民主也只会是一句空话。林彪、“四人帮”疯狂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弄得无法无天，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叫喊“民主”，而且要“大民主”，实际上他们的魔爪所及，民主荡然无存，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深受血腥的封建法西斯统治。

善于适应内容的需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选择最适当的形式，以促进内容的发展，是一项重要的艺术。我们党采取多种形式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整风运动的形式处理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等等，都是运用恰当的形式以促进内容发展的生动的例证。

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不是死板地表现在新形式和新内容，旧形式和旧内容之间。自然界和社会历史本身是复杂的，往往有新内容利用旧形式，或旧内容利用新形式的情况。新事物在萌芽时期，它的内容就常常是在旧形式中发展的，只有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产生适合于新内容自身发展的独特的新形式。在新事物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在一定情形下，能利用旧形式的某些方面。对于旧形式中一切只要可能为旧内容服务的东西，必须进行根本的革除，而对其中某些可以为新内容服务的成分，又应当在改造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利用。利用旧形式，不是同旧事物、旧内容妥协，而是为了更好地同它作斗争，更彻底、更迅速地消灭旧事物、旧内容，更有效地发展新事物、新内容。

列宁说：“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我们现有的工作内容（争取苏维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是这样持久，这样有力，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形式中，不论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征服一切形式，不仅是新的，而且是旧的形式，——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

而是为了能够把一切新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获得完全的和最终的、决定的和彻底的胜利的武器。”（《列宁选集》第4卷第256页）

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根本废除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但同时又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和它发展的需要，保存着商品交换以及和它密切联系的货币、银行、信用等等经济形式，并对它们进行了根本的改造，把它们纳入到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中来，以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在我们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不仅要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还要学习他们的某些经济管理形式，组织专业化的生产。列宁早就讲过：“在分散的企业联合为一个辛迪加时，就能大大节省，这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的，也是一切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的例子说明了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150页）林彪、“四人帮”不顾客观经济规律，疯狂反对利用某些旧形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新内容。他们否定商品交换，排斥专业化的经济管理形式，把这一切统统污蔑为向资本主义投降，复辟资本主义。事实恰好相反，他们才是一伙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死敌。列宁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不是由于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形式的变更。”（《列宁选集》第4卷，第257页）我们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就要有适应现代化经济所必须的专业化的组织形式，去代替那种“小而全”、“大而全”的落后的组织形式。

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中，内容是比较活泼的、易变的，形式对内容来说，则是相对稳定的、比较不活跃的。因此，形式

和内容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贯串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在适合于新内容的新形式产生时，形式同内容是相适合的，但这种适合只是基本的适合，而不是完全的适合，其中仍然存在着矛盾。由于内容比较迅速地发展，更新的内容的产生和壮大，使得相对稳定的形式愈来愈落后于内容，二者就由基本适合逐步变为基本上不适合，甚至形成尖锐的冲突。这时，落后的形式不仅不能再促进内容的发展，而且变成先进内容发展的桎梏；已经变化了的内容要求改变不适合于自己的旧形式，建立适合于自己的新形式。新形式的产生，意味着旧矛盾的解决，但在更高的基础上又出现新的矛盾。随着矛盾的发展，形式和内容又由基本适合变为基本上不适合，再一次需要改变旧形式，创立新形式。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矛盾运动，就是这样由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又由基本不适合到基本适合的不断发展过程。列宁说："内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列宁选集》第2卷，第608页）这就是形式和内容矛盾运动的辩证法。

根据内容和形式这种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我们应当自觉地解决二者的矛盾，根据内容发展的需要，抛弃旧形式，采取为内容发展所要求的新形式，为内容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不顾内容的发展的要求，抱住那些过了时的形式不放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形式的相对稳定性，承认形式在和内容相适应的时期对于内容的促进作用。因此，对于适合于内容发展的形式，要使它相对地稳定下来，并逐步趋于完善，以便充分发挥其在相当时期内的积极作用。列宁也曾强调过注意形式的相对固定和完善化的重要意义。他说："由于形式不成熟、不牢固，我们无法采取继续前进的重大步骤来发展内容，因而造成了可耻的停滞，力量的浪费……"（《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485 页）因此，如果忽视发展的阶段性，不顾条件过早地否定某种形式，那也是不对的，这样不仅不能有助于内容的发展，相反地会对内容的发展起阻碍和破坏的作用。对于某种形式是采取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归根到底，要看它是否适合于内容的性质，是否有利于内容发展的要求。

六、现象和本质

现象和本质是事物的两个不同的方面。现象是人们感官所能感知的事物的外部联系；本质是事物的内在联系，它隐藏着，不能直接被人们的感官所感知，必须靠理性思维，才能把握它。前面所讲的辩证法的各对范畴，都是我们理性思维必需的逻辑形式。人类认识的任务就在于，通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因此，我们只有懂得了现象和本质这一对范畴，才能弄清楚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并且进一步理解各对哲学范畴在认识和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

本质是事物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是由事物本身所包含的特殊矛盾构成的。“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矛盾论》）本质也就是由事物的特殊矛盾所规定的事物的因果性、必然性和事物发展的种种可能趋势，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本质和规律是同等程度的范畴。列宁说：“规律就是关系”，就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列宁全集》第38卷第 161 页）因此，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也就是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我们知道，必然性、规律性是通过大量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只有通过偶然才能把握必然，这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现象才能认识本质。现象是呈现在人们感官面

前的事物的外部联系，但现象不是单纯的偶然，而是必然和偶然的统一。事物的每一现象都只是通过某些偶然所表现的必然，都只是本质的某个侧面的表现。现象是比较片面的、表面的、局部的，它是多变的、易逝的。就事物的总体来说，现象比本质丰富、生动；本质比现象深刻、稳定。

现象和本质的统一，构成客观世界运动的无限丰富的内容。本质是同类事物的各式各样内容中所共有的一般的、稳定的东西，而内容又必须以一定的形式出现。列宁指出："形式是本质的。本质是有形式的。不论怎样形式还是以本质为转移的……"。(《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1页)因此，不把握事物的形式，就无法认识事物的本质。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我们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首先把握事物运动的特殊形式。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形式，只有弄清了某一生产方式的特殊的生产关系，才能弄清它区别于其他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概念是人类思维特有的形式，只有把握概念的形式，才能从本质上区分人类思维和动物心理。

现象和本质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任何本质都要通过一定的现象表现出来，任何现象又都是从某一特定的方面表现出事物的本质。光是自然界一种重要的现象，凭借光我们的眼睛才能看到自然界的其他各式各样的现象。光有无数的、多变的颜色，"五光十色"远不足以形容它的丰富多彩。除了可见光以外，还有红外光、紫外光，有反射、折射、干涉、衍射、红移、紫移等等，现在还发现了有广泛用途的激光。光现象真是无穷无尽，数不胜数。人类早在猿人阶段就早已接触到光现象，可就是不理解光的本质，直到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大量地觉察到种种光现象以后，才逐渐正确地理解到光的本质是电磁辐射，认识到光这种运动形式内部包含着微粒性和

波动性的矛盾，至此才真正揭示了发光的原因和光运动的规律。由于现象和本质的对立，我们看见光不能立刻理解光；由于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在掌握了大量的光现象，又对这些现象加以分析以后，终于理解了光，反过来又能完满地说明各种光现象，并日益广泛和卓有成效地利用光。在人类社会中，自商品经济出现以来，价值规律就始终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商品的价值是价格的本质，商品的价格则是价值的现象。价格一般不直接符合价值，这就是现象和本质的对立。价格常因市场中各种复杂多变的因素的影响而波动，表现为种种偶然性。但是，通过对商品价格的大量偶然变化的考察，就会发现价格始终是围绕着价值而变化的。这样，就通过偶然找到了必然，透过现象认识了本质。这也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

对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对立和统一，我们不能只看到一面，看不到另一面。如果只看到统一而看不到对立，那就会否认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如果只看到对立而看不到统一，就会否认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可能，而陷入不可知论；或者只承认事物的现象，而根本否认事物本质的客观性，得出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

否认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差别和对立，那就是说本质和现象完全一样，会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人们的感官面前，一目了然，还有什么必要费心劳神地进行科学研究去探讨事物的本质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资本论》第3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页）科学研究之所以必要，就在于本质不同于现象，它隐蔽在事物的内部。太阳东起西没，这是我们每天都看到的现象，似乎地球是太阳系的中心，是太阳绕着地球旋转。可是事情的本质完全不是这样，而是地球绕太阳旋转，同时地球又绕着地轴自转。人类曾

长期为现象所欺骗，不了解事情的本质，只是由于哥白尼在人类长期对天体运行现象观察所积累的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做了精密的观察并给予科学的分析，最后才发现了地球绕太阳旋转的秘密，找到了事情的本质，太阳东起西没的现象原不过是地球由西往东的自转所造成的。哥白尼为了建立太阳中心说，几乎耗费了自己毕生的精力，足见从现象中发现本质，是一项多么艰苦的劳动！由此可见，不能把认识局限于表面的现象，而要进一步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我们看事情必须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6页）如果对事物的认识停留在表面的现象，把某些局部现象误认为是事情的全体和本质，当作普遍真理，就会被现象所迷惑，找不到正确的方向。

个别的局部的现象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它只是从某个特定的方面表现了事物的内部必然性和本质。为了认识本质，就要从研究大量的现象和现象的各方面的关系着手。只有经过尽可能全面的观察，并对大量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才可能正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列宁指出：“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人们研究了大量的化学变化的现象，从中找到了它的本质——化学变化不过是具有不同化学特性的元素（原子）之间的化合和分解。为什么不同的化学元素（原子）含有不同的化学特性呢？由于发现了更多的元素及其特性，门德列也夫对这些材料进行了长期的整理和分析，得出了由于化学元素（原

子）原子量的变化引起了化学元素特性的周期性的变化的科学结论，制定了元素周期表。从此，人们对化学运动的认识进入了更深一级的本质，可以解释说明更多的化学现象，给化学这门科学带来了更丰富的内容，于是化学科学也从此有了条理化系统化的新形式。但是，认识过程并未就此结束。为什么元素原子量的变化会引起元素化学特性的周期性的变化呢？为什么元素化学特性的变化和原子量的变化不尽相符呢？如氩（Ar）的原子量（39.94）大于钾（K）的原子量（30.098），而钾为什么却排在氩的后面？为什么会有原子量不同而化学特性完全相同的元素（同位素）呢？如此等等，对这些现象必须说明。在人们了解了原子结构以后，才知道元素的化学特性归根到底是由原子核中所带的正电荷的数目或原子核周围的电子数目，即原子序数所决定的。于是，人们对化学运动的研究进入了更深一层的本质，可以说明更多的化学现象，给化学带来了更丰富的内容，化学科学也形成了以原子结构为中心说明种种化学现象的更完整更系统更精密的形式。认识到此，也还没有结束。人们还需要研究原子结构的变化为什么会引起元素化学性质的变化等等，还要进入更深一层的本质。人们把量子力学引用到对化学现象的研究，使化学科学具有了精密的数学形式，更多更好地说明许多化学现象，使化学科学内容更为丰富，提供了分子设计的可能，这将给化学实验带来新的形式，使人们在寻求一种新化合物时，可以不采用原先那种带有一定盲目性的大量实验，反复探索，不断筛选的形式，而采取经过精心设计，事先可以预测出实验结果的具有高度自觉性的形式。目前人们正在向这一更深的层次进军。总之，人对事物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列宁选集》第2卷第608页）在向科学进军

的道路上，应该时刻牢记：科学是永无止境的。

对社会现象来说也是如此。从林彪、“四人帮”神化领袖的现象中，应看到其理论实质是鼓吹历史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这还不够，还应进一步看到林彪、“四人帮”所以提出这样反动的理论，决不是一时的偶然的错误，而是由于他们反革命资产阶级野心家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即使认识到这一点也不够，还应再进一步看到象他们这样的反革命跳梁小丑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有它一定的历史必然。认识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深入到越来越深的本质，从而为我们的实践斗争越来越清楚地指明前进的方向。

否认现象和本质的对立是错误的，片面地夸大它们的对立，否认它们的统一，也是错误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感觉论就是片面地夸大事物的现象而根本否认它的对立面——事物的本质的客观实在性。例如，贝克莱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只是“感觉的复合”或“观念的集合”，“本质”是一种“虚无”。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也都以千百种调子重复贝克莱的谬论。例如，德国的存在主义者卡尔·雅斯贝尔斯宣称，整个世界只是一种“虚幻的假象”；实用主义、逻辑实证论和语义哲学也否认事物本质的存在。这些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之所以否认事物的本质，其目的就在于掩盖帝国主义的本质，欺骗革命的人民，妄图延长帝国主义的寿命。

康德也是片面地夸大现象和本质的对立，但是，又不同于一般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还承认事物本质的存在。这是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他把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完全割裂开来，相互孤立起来，把本质说成是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处在人们认识的范围之外；在他看来，人们只能认识现象，不能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按这种观点，人们就没有可能认识事物

本质，从而否认了取得科学知识的可能，得出了不可知论的结论。如列宁所说："康德贬损知识，是为了给信仰开辟地盘。"（《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因此，从总体来说，康德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为了批判上述观点，说明本质和现象的统一，有必要讲一下假象的问题。假象也是一种现象，它甚至给人一种和事物本质完全相反的印象。因此，假象是一种与本质的对立最为明显、最为突出的现象。如果假象和本质也是统一的，那末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也就毫无疑义了。假象终究也是事物本质的表现，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表现罢了。事实确是如此。如社会帝国主义施放"和平"烟幕，来掩盖它好战的本质，但是它叫嚷"和平"、"缓和"、"裁军"，总是和它扩军备战的活动相配合的。这种假象又是社会帝国主义极端虚伪和狡猾的本质的表现。列宁说："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7页）

我们必须注意到历来的反动派在一定时候都要以某种假象来欺骗人民，这是它们的本质所规定的。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需要无产阶级的支持，因此他们不得不处处把自己装扮成某种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保守的和封建的党派也不得不向无产阶级许下诺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89页）"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伪装出现，给人以假象。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他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林彪、"四人帮"就是一伙以极左面目来掩盖其机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但是，一切假象都不能完全掩盖其真实的本质，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

切“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能将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1页）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真象终于大白于天下，其反动实质已暴露无余。

总之，既要看到现象和本质的对立，又要看到它们的统一，只有这样，才可以既看到科学的必要，又看到科学的可能，这种辩证的观点才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的观点。黑格尔曾批判了康德割裂现象和本质的错误，阐述了现象和本质的对立统一关系，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是，他把本质和现象这对范畴说成是思维的产物。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的根本出发点是错误的，看来似乎尊重科学，其实质仍然是反科学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黑格尔推崇知识，硬说知识是关于神的知识。”（《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不仅要承认现象和本质的对立统一，而且要进一步承认这种对立统一是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真正彻底的科学理论，而且是唯一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理论。

从本质上认识事物，这是科学的重要任务。以上我们所学的唯物辩证法的诸规律和范畴，都是对客观世界辩证运动的本质的某一个侧面的反映，同时也是帮助我们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有力工具。只有正确地掌握和正确地应用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我们才可能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真正本质，并从初级的本质进入到一级比一级更深的本质，使我们的认识循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进。这也就是说，辩证法就是认识论。但是，要保证对唯物辩证法规律和范畴的正确理解和应用，要保证我们的认识真正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质，那就一步也离不开实践。

下面，我们就进入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学习。

第八章　实践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

一、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二、科学的实践观

三、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唯物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论和辩证法是统一的，这种统一集中地、鲜明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最一般规律的学说。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世界的规律，也是认识、思维的规律。认识是存在的反映，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认识的辩证法。客观世界的规律和认识的规律虽然在表现上各不相同，各有特点，但在内容上后者和前者是一致的，它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唯物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内容，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作了唯物的和辩证的科学解决，它的全部目的就在于：为主观正确地反映客观、主观有效地改造客观提供一个最完备最严整的科学的世界

观和科学的方法论，它是贡献给人类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认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广义的理解。

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又有狭义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体系中，包括了相互联系的各项基本原理，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论，则是关于认识及其发展规律的哲学理论。如上所述，认识作为客观事物的反映，它的规律和事物的规律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认识作为主观精神的活动，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有些专门性的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这就形成了关于认识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不同的哲学派别，对认识的学说都有各自的回答，而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最科学的正确解决。这就是我们在以下几章里将要介绍的狭义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一、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是关于认识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

认识论一词来源于希腊文“知识”和“学说”两个字的结合，意思是关于知识的学说。认识论就是研究关于认识的哲学理论。象认识的对象、认识的来源、认识的能力和可靠程度、认识正误的检验标准、认识的形式、认识的过程和认识的发展规律等，都属于认识论的研究范围。在这些问题中，有一个贯串一切的基本线索，提携全部认识论内容的“纲”，这就是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是解决认识论诸方面问题的根据；对认识论各

方面内容的说明，都服从于对主观和客观的关系的理解，依赖于对这个关系的回答。所以，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是认识论中最基本的关系，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是认识论所要解决的最基本的矛盾。哲学史上的不同哲学派别在认识论上的斗争，就是围绕着这个基本关系、基本矛盾而展开的。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总的来说，都是离开实践来研究认识问题，研究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因而始终未能建立起科学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使认识论发生了革命的飞跃，建立了唯一科学的认识论。和以往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把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同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联系起来，指出要正确解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就必须对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作出科学的解答。如果说，认识论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仅仅停留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则扩展为如何解决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把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深化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同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一起，作为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并唯一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认识论史上的重大革命变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认识论的伟大贡献。

在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上，一切唯物主义哲学都坚持反映论，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反对不可知论。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包括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这是认识的出发点的问题；二是思维能否反映存在，主观能否认识客观的问题，这是认识的能力或可能性的问题。对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这两方面的不同回答，划分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这些彼此对立的哲学派别和认识路线。

是主张物质派生精神，从客观到主观，还是主张精神派生物质，从主观到客观，划分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条根本敌对的认识路线。

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人的思想、知识是头脑所固有的，是主观自生的。客观唯心主义者则认为，人的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来自独立于人的头脑之外的客观精神，或者是由于神的启示。不论是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都是同反映论相敌对的，它们都主张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否认物质是意识的根源，意识是存在的反映，坚持从精神到物质、从主观到客观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

和唯心主义相对立，一切唯物主义都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坚持从物质到精神、从客观到主观的认识路线。不同形态的唯物主义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尽管在阶级性和科学性上是互相区别的，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共同的前提，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即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是产生意识的根源，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坚持反映论是一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最基本的观点。列宁说，“唯物主义的理论，即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唯物主义“认识论认真地坚决地以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为其一切论断的基础。”（《列宁选集》第2卷第107、24页）

从反映论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出发，在解决认识论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一切唯物主义者都主张世界的可知性，反对不可知论。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思想，就是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承认反映客观存在的意识和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存在之间的符合，承认人的认识可以提供客观世界的正确图

景。所以，世界的可知性已经包含在反映论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中，是从这个基本观点必然引出的结论。

不可知论是和唯物主义反映论根本对立的。不可知论者怀疑人类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否认人类能够认识或能够完全认识现实的可能性。不可知论者休谟把感觉看成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至于感觉的源泉是什么，他认为这是无法也不可能回答的。他断言，人所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感觉，在感觉之外则是“无知的领域”、不可知的领域，人类科学知识的发展也只能“把我们无知的界限略为扩展一些”。这样，在休谟看来，一切科学知识实质上都是“无知”，人类认识是不可能描绘客观世界的正确图景的。康德把人的认识和客观世界割裂开来，把客观世界看作是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认为人类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断言对“事物的本身状况”即“自在之物”，人们是“一无所知”的。无论是休谟还是康德，以及他们哲学的变种“符号论”、“作业假说”、“象形文字论”等形形色色不可知论的鼓吹者，都否认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断言世界是不可能认识的，或不可能完全认识的。不可知论者在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上是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他们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割裂了思维和存在的辩证关系。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相反，不可知论者不是把感觉看作是人和外部世界直接联系的桥梁，而是把感觉看作人们的意识和客观事物隔绝起来的屏障。这是他们得出世界不可知的错误结论的重要的认识论根源。

大多数哲学家，包括唯物主义者和不少彻底的唯心主义者，都论述过世界的可知性，批判过不可知论。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子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立

场上，肯定和论证了世界的可知性。他认为，世界绝不会隐藏起来，客观事物及其属性可以为人们所认识，就如同空气通过口、鼻和毛孔钻进我们的体内一样。他指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感官正确地反映外部世界，外部世界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人恰恰具有使他从世界的完整性、整体方面来感知世界所必需的足够的感官。”（参看《列宁全集》第38卷第64页）旧唯物主义者对不可知论的批判，虽然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却是不深刻不彻底的，因为他们没有握起实践这个决定性的武器。

黑格尔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也曾对不可知论，特别是对康德的不可知论进行过尖锐的批判。黑格尔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绝对观念”或“宇宙精神”的体现，世界的发展过程就是“绝对观念”的自我认识的过程。黑格尔的可知论的思想，已经包含在这个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之中。在黑格尔看来，人的认识同客观事物一样都是“绝对观念”的体现，是同一本源的两种现象、两种表现，它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所以，人的主观思想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就是“绝对观念”的自我认识。这样，黑格尔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和世界的可知性。黑格尔在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时指出，不能把本质和现象割裂开来，本质和现象是不可分的，现象有本质，本质通过现象表现出来，本质和现象是同一的，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通过现象可以认识本质，康德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不过是“没有真理的空洞的抽象”。恩格斯对于黑格尔对不可知论的批判给予很高的评价。恩格斯说，驳斥不可知论的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然而，黑格尔毕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是在“绝对观念”辩证运动这个唯心主义的前提下，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论证了世界的可知性。这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以及建立在反映论基础上的可知论是有本质区别的。也就是，黑格尔虽然论证了世界的可知性，但他的哲学在实践上是不适用的，不能引导人们走向认识客观真理的道路。黑格尔和康德，一个贬损知识，一个推崇知识，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康德贬损知识，是为了给信仰开辟地盘；黑格尔推崇知识，硬说知识是关于神的知识。唯物主义者推崇关于物质、自然界的知识，把神和拥护神的哲学混蛋打发到阴沟里去。”（《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182页）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才真正彻底驳倒了不可知论，其关键就在于，它第一次把实践纳入了认识论。恩格斯说：对不可知论的“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人们把有机化合物看作是由某种神秘的生命力所创造的“自在之物”，而当有机化学开始用人工合成的方法制造一个一个有机化合物时，这些“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牛胰岛素，我们已经可以不再从牛胰脏中提取，而用人工的方法合成。生物的遗传现象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神秘莫测的，但在科学实验和农牧业的发展中，人们已经初步摸清了遗传的规律，发现了遗传物质—DNA.RNA，找到了用人工方法改变遗传质，培育生物新物种的多种途径，建立了遗传工程学，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一切，都雄辩地

证明连这样复杂"玄妙"的现象也不是不可认识的。

正如唯心主义至今没有绝迹一样，不可知论至今也没有绝迹。适应反动阶级的需要，一些哲学家不断地利用科学发展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来论证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否认世界的彻底可知性，宣扬不可知论。他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为人类认识能力设置一个又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认为在这个界限以外的一切都只能是一些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但是，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一次又一次扩展了人类的认识，打破了这些所谓不可逾越的认识界限，因而一次又一次宣告不可知论的破产。历史上，有人强调感官的局限性：人眼不能分辨小于0.1毫米的事物，不能看到紫外线、红外线，不能察觉遥远宇宙中不发光的天体……；人耳不能听到超声波；鼻的嗅觉和舌的味觉的灵敏度也都有一定的限度，如此等等。但是，科学已经证明人的感官的特殊构造并不是人的认识的绝对界限，人们可以借助于种种仪器的帮助把感官无法感知的种种信息转化为可感知的形式或放大到可感知的范围。不可知论者却并不因此罢休，他们又用仪器效能的局限性来论证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例如光学显微镜的放大倍数是有限的，它最多只能放大到1,000—1,500倍，使人们能看到一些微小的细菌，至于再小的东西就不可能看到了，因为，再精巧的光学显微镜都无法帮助人辨别小于光波波长的事物。那末，光波的波长岂不成了我们所能看到最小事物的极限？不！还有波长短于光波的电子波、质子波等，波长愈短的波，分辨能力愈强。人们已利用波长极短的电子制成电子显微镜，它放大的倍数已高达50万—100万倍，人们已利用它拍摄出原子的照片。电子波长再短也有限度，碰到比电子波长更小的东西岂不又到了认识的尽头？没有！还有波长比电子还短的质子、中子，靠质子加速器、中子

加速器，人们还能分辨小于原子的原子核以及核内的结构和种种基本粒子。这个过程远远没有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当一种仪器不够用时，人们可以发明更高效能的仪器来代替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再精巧的高倍普通天文望远镜只能观察发光的天体，可是我们能用射电望远镜观察那些不发光的天体；我们不可能直接用化学分析的方法测定天体的化学成分，可是我们能用光谱仪测定它们；连过去认为根本无法认识的人的思想的神经过程，也被巴甫洛夫等人找到了客观研究的方法；……。总之，无论用人类感官结构的局限以及现有种种仪器效能的局限来论证人类认识能力的绝对界限，都是错误的。人类科学实验和工业的发展会提供更高效能的仪器来不断地扩大人的眼界。认识能力的绝对界限是没有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是不存在的，不可知论是站不住脚的。

人类认识能力的无限性，不仅表现在人们靠实践创造出层出不穷的仪器的帮助，使我们的感官的认识能力可以无限发展，没有什么我们感官永远不能察觉的现象；而且还因为我们有思维活动，能从现象中发现它的本质，找到它的规律。尽管人们感知事物的能力是无限的，我们可以依靠创造仪器感知一切现象，但是，我们实际感知的一个个现象的数目总是有限的。不可知论者耐格里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说：“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了无限，从暂时中找到了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式，因而是无限性的形式；它是把许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无限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4页）我们知道，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

纯粹的水加温到100°C就会沸腾；只要具备上述条件，这件事就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无论重复多少次以至无限次都是一样，这是普遍的、绝对的，而这种自然界中的普遍形式就是规律。人们一旦认识了规律，就是从现象中找到了本质，从个别中找到了一般，从有限中找到了无限。因此恩格斯强调指出："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同上），这种对无限性的认识的正确性同样在实践中，在实践的无限重复中得到证实。自从发明电子计算机以来，人的思维获得了一个强有力的助手，真是"如虎添翼"，使人的思维深入到过去认为极端复杂难以认识的领域，使整个科学得到了迅速的进展，进一步证明了认识决不会有一个终极界限。

我们驳斥不可知论，证明世界的可知性，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一切。但是，我们确定世界上只有尚未认识的事物，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一切事物终究是会被认识的。我们的认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不确切的认识到比较完全比较准确的认识的无限发展的过程。

一切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都是反映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又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有本质的区别。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有两个根本缺陷：一是脱离实践。"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9页）二是不懂辩证法。"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由于这两个根本缺

陷，使它既不能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也不能最终制服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脱离实践和不懂辩证法这两个根本缺陷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脱离社会实践，就不能理解主客观的对立和统一，就不能理解认识是一个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矛盾的无限发展过程，就是说，离开实践也就必然要离开辩证法。而脱离实践，不懂辩证法，就不能真正地了解人这个认识的主体，就不能深刻揭示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我们知道，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总是社会的人，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生活实质上就是实践活动，实践是人的生活的主要内容。进行实践的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在阶级社会里，则处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中。正是这种社会关系、阶级关系决定了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脱离实践，脱离社会关系的孤立的抽象的人是没有的。同时，社会生活，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又处在不断运动和变化之中，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人也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所制约，脱离历史的发展，离开实践的发展阶段的人也是没有的。总之，人的生活是社会的生活，并且是在历史上发展变化的，这就是人的实践的客观辩证法。人的认识也就是在实践生活及其历史发展中产生、形成和发展的。但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不懂得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只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看作生物学上的人。例如，费尔巴哈就认为，人完全和动植物一样，只具有自然的本质；动植物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也就是什么，人和动植物的本质是没有区别的。这样，就离开了人的生活，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即离开人的实践去观察人，形而上学地把人看作孤立的抽象的个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既然

把人的本质看作和动植物一样，当然也就不懂人的历史发展，不懂人的发展和实践发展的内在联系。简言之，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不了解人的生活是社会生活，不了解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即不了解人的生活实践的客观辩证法。正像他们把人看作是脱离社会性和脱离历史发展一样，也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孤立的、抽象的非历史的认识，因而无法懂得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不可能揭示认识的产生和发展的辩证法。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脱离实践和不懂辩证法的根本缺陷，决定了它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认识。第一，它把社会的人看作是生物学的人，看作是动植物一样只能消极适应外界环境的人，因而也就把人的认识看作是消极被动的。按照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主观反映客观就如同照镜子一样，只是被动地接受外界的对象；只能照出外界表面的机械的静止的图景。除这种消极反映外，主观对客观毫无作为，主观和客观没有其它的关系。这就是消极的、机械的反映论。第二，它把人看作脱离社会实践的、离开历史发展的人，因而也就把人的认识、主观对客观的反映看作是没有发展的、一成不变的、一次完成的。这种反映论就是僵死的“一次完成”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和局限性，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即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观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625页）毛泽东这一深刻精辟的论述，是对马

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总结和新的概括。在这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区别，指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产生的划时代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崭新的发展阶段，是唯一正确的科学认识论。

第一，它继承了唯物主义的传统，坚决地把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存在的反映这个一切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作为认识论的基础。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先是反映论，是从物质到精神，从客观到主观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从而同唯心主义、不可知论根本上区别开来。在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总结和概括中，首先指出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强调意识和存在、主观和客观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是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存在的关系。这就不仅一般地坚持了反映论的原则，而且把这一原则贯彻于社会历史领域，对社会现象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把发展着的社会存在作为认识的出发点，从而彻底唯物地解决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党性原则。

第二，它全面地、科学地解决了意识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意识和存在、主观和客观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双方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意识和存在、主观和客观一方面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正是在主观和客观的这种双重关系中，在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中，人们改造着客观世界，也改造着自己的认识能力，正确的认识才得以产生、形成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的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

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以往的哲学对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不是作颠倒的解释，像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那样；就是作片面的了解，像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那样；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对主观和客观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作出全面科学的解决，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第一次。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对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全面的科学的理解基础上，把一般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发展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能动性和革命性，就在于它把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作不仅是认识世界的工具，而且是改造世界的武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能动性和革命性包括两层意思：其一，它认为，人的认识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本身就是积极的，能动的，是由事物的现象深入本质的辩证过程；其二，它在承认由于客观事物的作用而引起人的认识活动的同时，又承认作为客观事物反映的主观认识，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反过来作用于客观事物，形成主观对客观的革命改造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紧密相联的，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这两个最显著的特点所决定的，是两个特点的表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在它的理论或学说中，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性，揭示无产阶级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的一致性，体现无产阶级的意志和要求，从而为无产阶级提供科学的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则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同人民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保持密切的联系，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并以实践来检验自己的正确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战斗的哲学，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就是这一革命的战斗的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一革命的战斗的哲学的重要体现。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科学的实践为其特征的”。(《实践论》）正是由于这一特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才成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才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消极反映论从本质上区分开来，从而也才能彻底驳倒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由于把实践排除在认识论之外，尽管它正确地坚持了反映论的唯物主义路线，但它的反映论是消极的，被动的。这样就给唯心主义以可乘之机，使它片面地歪曲地发展了认识的能动方面，使认识脱离了客观实在，成为一种纯粹抽象的理性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纳入认识论，才最终使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成为唯一科学的认识论，同时也就夺回了被唯心主义歪曲了的认识的能动方面。

上面谈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能动的革命论的基本内容，每一项都是同实践血肉般地联系在一起的。很明显，离开实践，就不可能有主观对客观的正确的能动的反映；就不可能全面地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相互关系；更不要说主观对客观的能动的改造了。可见，离开实践，就没有科学的反映，就没有反映的能动性，就没有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从这里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叫作“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列宁把生活、实践的观点看作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毛泽东把专门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著作定名为《实践论》。总之，懂得了实践的观

点，就从根本上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否认了实践的观点，也就从根本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实践论。

二、科学的实践观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征。因此，要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科学规定，懂得实践的客观内容、主要特征和基本形式，以及掌握科学的实践观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都毫无例外地把科学的实践排斥在认识之外，排斥在哲学之外。有一些哲学家虽然谈到了实践，对实践作过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但这些解释，都没有抓住实践的本质，不是作了唯心主义的歪曲，就是脱离了社会性把实践规定为生物学的生活活动，因而都是反科学的或不科学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对实践作了正确的解释，赋予实践概念以科学的内容。

在中国，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说，认为离开了"行"就无所谓"知"。他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看来似乎他已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了。然而他却把实践和认识混为一谈，把实践就归结为认识。他说："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就是说，凡情感之动，意志之决定，都是行，这是对行或实践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解释。

在欧洲，康德把他有关伦理学的著作叫作《实践理性批

判》。他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道德行为。所谓“实践理性”，乃是有关规定人的道德行为的先天准则的理性。在他那里实践和认识是无关的。与康德不同，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把实践作为认识的一个环节。在黑格尔看来，认识是理念发展的过程，认识过程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用客观存在的观念来克服理念的片面的主观性；另一方面又用实践的观念克服客观观念的片面性，依靠主观的内在本性对偶然堆积的客观事实加以整理和改造。第一方面属于理论的理念，第二方面则属于实践的理念。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把实践和认识结合起来，把实践看做是认识向客观真理过渡的一个必然的环节，实践不仅认识世界，而且创造世界。当然，黑格尔的实践观是唯心主义的，他所说的实践仍然是精神性的活动。

但是，黑格尔却以唯心主义的观念运动的辩证法论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只要剥去其唯心主义的神秘外衣，就能发现其包含着某种真切的唯物主义内容。因此，列宁指出：黑格尔的观点已经极其接近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当马克思把实践标准列入认识论时，他的观点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列宁全集》第38卷，第 228 页）在这个问题上，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大大落后于黑格尔。马赫主义者就力图把实践排斥在科学和认识论之外。正如列宁所说的：“马赫认为，实践是一回事，而认识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39 页）作为马赫主义的一个流派——实用主义，虽然标榜实践、行为、行动，但它所说的实践，实质上就是宣扬马赫主义所讲的主观经验（感觉），而且仅仅是宣扬经验。他们标榜为认识标准的实践，专指经验中对我有用的东西。上帝的观念能给人们的心灵带来安慰，在经验中证明是有用的，因此上帝就是真理。这是一种纯粹的主观唯心论的、唯我论的实

践观。

费尔巴哈在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常常提到实践，求助于实践，用实践来证明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他曾说："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48页）但是，费尔巴哈并不理解社会实践，他所说的实践只不过是个人的生活实践，是一种生物性的适应世界的活动，是卑污的犹太人的利己主义的活动。因此，他推崇理论，鄙视实践，"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是直观的唯物主义。他说："只有通过感性直观而确定自身，而修定自身的思维，才是真实的，反映客观的思维——具有客观真理性的思维"，检验思维的客观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乃是直观"。（《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78、179页）

以往的一切哲学都不能对实践作出科学的解释，有其阶级根源和认识论的根源。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无论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都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是剥削阶级的利益、意志和要求的理论表现。由于剥削阶级的立场和阶级局限性，他们必然鄙视生产劳动，贬低劳动群众的实践活动，不同程度上歪曲、掩盖历史的真相，因而不可能对实践作出科学的解释，不可能理解实践的革命意义。同时，他们所处时代的实践水平，生产规模的狭小，科学技术不够发达，也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只有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技术达到一定水平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人类、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经验，才形成了关于实践的科学概念。

马克思指出，社会实践是人的感性的现实的“客观的活动”，它体现了人的活动的“革命的”、“能动的方面”。列宁认为，实践是人类改变世界的活动，他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认识向客体的辩证运动的“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9、310页）在《实践论》、《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指明了实践是“科学的社会实践”，是“变革现实的实践”，“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是人的特殊的能动性”，是“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它包括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等等。所有这些论点告诉我们，所谓实践，就是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的社会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概念的科学规定和实践实质内容的深刻阐述，揭示了实践的多方面的特征，其中最基本的是：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

第一，实践是客观的活动。实践是主观和客观矛盾运动的统一体，它包括实践的主体（人）、实践的对象（客观世界）和实践手段（工具、机器等）。构成实践活动的这三个方面，都是客观的要素；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都是物质的运动。作为实践的主体人，是有思想的，但这并不能改变人是高度发展的物质，是物质世界的特殊组成部分；作为实践对象的客观世界，不容质疑，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作为实践手段的工具、机器等，它们的物质性、客观性也是不言而喻的。至于人和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实践的过程，自然也是这些物质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而且，这种相互作用、矛盾运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有其固有的客观的规律性。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往往遇到困难、挫折、甚至失败，其原因就在于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中，离开了或违背了实践固有的客观规

律。列宁说："'客观世界''走着自己的道路'，人的实践面对着这个客观世界，因而目的'实现'就会遇到'困难'，甚至会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1页）可见，实践活动不是主观随意性的活动，它始终为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所制约，是按照物质世界的规律而进行的客观的活动。所以，实践不论就其包含的要素还是就其实际过程来说，都是客观的。

第二，实践是能动的活动。实践是人所独有的活动，人以外的任何物包括最高级的动物的活动，都不能用实践的概念来概括。这是因为人的生活、人的活动具有区别于其它物的特殊的性质，即毛泽东所说的"自觉的能动性"、"人类特殊的能动性"。如上所述，实践是客观的活动。但是，在客观的实践过程中，人是活动的主体，而人具有思想，能够劳动，这是任何物体的运动或动物的活动所没有的。人的活动凭借思想和劳动，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这种"特殊的能动性"，把人和动物的活动从根本上区别开来。首先，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的。例如，人们在建造某一建筑物之前，就预先设计了这座建筑物的蓝图，形成了这座建筑物的形象，制定了施工的计划。人们在建造过程中就是按照特定的目的、设计方案和施工要求进行的。动物的活动虽然也影响着外部世界，引起外部世界的变化，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改变着自然环境，但是，这完全是无目的、无意识、无计划的，是动物本能活动的结果。老鼠打洞，蜜蜂筑巢，蜘蛛结网，都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进行的本能活动。在它们开始这些活动之前，它们的头脑中，既没有鼠洞、蜂巢、蜘蛛网的概念，也没有形成这些"建造物"的观念形象。它们在进行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活动将引起什么变化和后果。其

次，人凭借思想和劳动，能够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创造出自然界所没有的东西，不断开辟着新的生活道路，改善人类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自然界没有漂亮而舒适的衣服，没有宽阔整洁而能保持恒温的庭室，而人却能把它们创造出来。也就是说，人的实践活动，可以把非人的自然界，变成为人的自然界，对自然界进行自觉的革命的改造。人的活动的创造性还表现在，人能够从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使自己的创造物在质上和量上，都能够不断革新，不断改进和提高。至于动物的活动则只能消极被动的适应周围环境，接受自然界的现成事物，享受自然界的恩赐。它们不仅不会利用自然界的规律，创造自然界所没有的东西，而且在自然界的威胁和打击下，除了消极地躲避，没有积极改变自然界的办法。这种活动不具有创造性，仅仅是代代相传的本能活动的重复，它们的"创造物"如蜂巢蛛网等过去和现在也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把实践着的人看成生物学上的人，否认人和动物的区别，否认人的自觉的能动性，是毫无根据的，十分错误的。实践的能动性还表现在，只有在实践中，人们才可以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实现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能动的飞跃。

第三，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在前面曾谈到，人是社会的人，人的实践总是社会的实践，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在阶级社会则是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中进行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人的实践"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社会的集体的活动。这种活动的主体或中坚力量是人民群众。实践是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群众的实践。这些都表现了实践的社会性。与实践的社会性相联系，实践又是历史的实践，是在历史上不断发展着的实践。在封建制度的社会关系中的实践，不同于奴隶制

度的社会关系中的实践，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中的实践又不同于封建制度的社会关系中的实践，这其中有一个历史的变化和发展过程。这就是实践的历史性。实践的社会历史性对于发挥人的自觉的能动性有密切的关系。人的智慧、能力和才干的发挥和表现，受着社会制度、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在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摧残，革命首创精神受到重重压制，智慧、能力和才干得不到充分发挥。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里，在无产阶级和其它广大劳动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自觉的能动性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和彻底的发挥，群众创造世界的能力才能达到高度发展的水平。

实践的社会历史性还表现在，随着历史发展，人们在实践中的社会联系日益迅速地得到扩大和加强。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分割成一个个人数不多的、相对隔离、互相孤立的人群，如氏族、部落等等。人们的实践活动基本上限制在这些狭小的社会范围内，彼此很少交往。现在则完全不同了，全世界各地人们的实践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这种联系已经超出了国家民族的范围，差不多每个人的实践都或多或少、这样或那样地同全人类的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从生产实践看，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由小商品生产到大工业生产的发展，使实践活动的社会性日益加强，由此建立了世界性的经济联系，并促进了全人类在科学技术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到今天，每一个人、每个企业、每个民族和国家，只有自觉地把自己的实践活动以恰当的方式与整个人类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才可以得到真正迅速的发展。要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上批判地吸取人类实践经验中最先进的部分，接受前人和外单位、其他民族、国家群众实践中

种种有关的经验和教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富有生命力，就在于它总结了全部人类实践中的最宝贵的经验，而且不断地总结人类实践中所创造的新鲜经验。如果看不到人类实践日益增长的社会性，仍然受着小生产思想的束缚，把自己的实践活动和整个社会实践这样或那样的隔离开来，一心想做到“万事不求人”，办“小而全”、“大而全”的企业，不尊重其他企业、地区、民族、国家的实践，不积极学习和引用国内外一切先进的实践经验（科学、技术、文化等），那末，这就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有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实践的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性，都同实践的物质手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的实践总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手段。动物的活动所凭借的物质手段，只是动物本身的各种器官和生物能，人的实践则在自身器官以外还必须借助于人造的物质手段和外界的种种能量，例如生产实践就离不开一定的生产工具和能源。实践的这一特性进一步说明了它的客观性。实践的这一特点，还进一步表现了实践的能动性。人之所以具有动物所缺乏的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使用了工具。从手工工具到蒸汽机再到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应用，显示出人们在实践中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的不断加强。现代生产中原子能、激光、电子计算机等等先进物质手段的利用，使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得到空前的提高。实践中先进物质手段的运用，不只意味着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的增强，同时也意味着在实践中认识的能动作用的加强。高能加速器使人们能够变革原子核内部的基本粒子，同时也使人们的认识有可能深入到基本粒子的种种特性。地球资源卫星使人们能迅速准确地普查各种资源，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充分利用种种资源的可能性。实践

中物质手段的发展，也促进着实践的社会历史性的发展和变化。在实践中应用的物质手段愈是先进，愈是要求实践的社会化。现代生产工具和科学仪器的普遍使用，不仅日益加强着生产过程的社会化，而且也日益加强着科学实验的社会化。这种趋向的发展迟早要引起社会关系方面的重大变革。只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最充分、最合理地利用先进的物质手段和能源，迅速发展生产和科学。总之，实践的物质手段的发展水平，是整个实践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现在我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就是要把我们整个民族的实践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

实践的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是互相联系的整体，是不能割裂的。忽视实践的客观性，夸大实践的能动性，在实际工作中就容易犯盲动主义的错误。否认实践的能动性，只承认实践的客观性，在实际工作中，则容易犯保守主义的错误。而不了解实践的社会历史性的特征，则不懂得人的认识的社会性（包括阶级性）和历史性，不懂得正确的认识总是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样，在实际工作中，既可能犯盲动主义的错误，也可能犯保守主义的错误。所以，只有全面掌握实践的基本特征及其相互联系，才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防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侵蚀。

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揭示了实践的内容和特征，并把这一科学的实践导入认识论，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阐明了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主观符合客观的关键，指明了发现和发展真理的正确道路，这就是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指出，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不是在静止中实现的，而是在主

观和客观的矛盾运动中，在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中，即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达到的。社会实践是主观和客观相互作用的统一体，是主观和客观矛盾运动的客观过程。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不懂这一点。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因此，尽管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有反映论的正确前提，它仍然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找不到主观符合客观的桥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明，对客观事物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上，而要进一步把它同主观联系起来去理解，即把事物看作人进行活动的客体，看作社会实践的对象。同时，作为人类认识的客观对象，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即便是人们力不能及的遥远的天体，也只是在社会实践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并由于和一定的社会实践的需要相联系，才作为认识的对象而同人的主观相对立。总之，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产生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形成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运动。而人的正确认识即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就是在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及其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实践中达到的。没有社会实践，客观事物只能作为直观的对象处于人的活动之外，是人的主观认识无法积极反映的领域，它就永远不能变成"为我之物"。同样，离开社会实践，人的主观思想就象唯心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只能是一种纯粹的思想或精神的运动，只能毫无事实根据地谈论是非，论证对错，

盲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以，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既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又必须在实践中才能解决；离开实践，主观和客观就联系不起来，主观和客观就不可能达到正确的统一。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揭示了社会实践的唯物的和辩证的性质，从而在认识论中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中，认识的唯物论和认识的辩证法是互相脱节的，彼此分离的。黑格尔曾阐述了认识的辩证法，但他的认识辩证法却没有唯物主义的根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阐述了认识的唯物论，但又缺少辩证法，不懂得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科学的实践纳入认识论，才把认识的唯物论和认识的辩证法统一起来，指明了主客观的辩证联系、主客观的矛盾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认识就是在实践基础上主客观矛盾运动的永恒的辩证过程。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实践的客观性、物质性要求人们，要实事求是、唯物主义地观察问题，反对认识的主观随意性，反对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实践的能动性决定了认识的辩证性质。实践的能动性要求，认识要由事物的现象深入到本质，进而对事物进行革命的改造，反对认识只停留在对事物表面的消极的反映上，反对认识上的形而上学。同时，实践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人的认识也总是具体的历史的，要求人的认识必须依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既反对认识超越实践阶段的主观盲目性，又反对认识落后于实践阶段的停滞僵化。总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反对一切使认识的唯物论和认识的辩证法相脱离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唯物论和辩证法相统一的完整世界观和认识论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我们党的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认识论基础。

我们党历来提倡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贯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毛泽东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列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我们党的思想原则、优良作风中深刻体现出来。我们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历来尊重实践，尊重实践的客观逻辑，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不同革命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反对离开实践的“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因而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阐明了社会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和生产实践中显现的首创精神，这在我们党的根本路线，即群众路线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我们党始终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以，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就不懂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不能搞好革命工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阐明实践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也指明了实践的基本形式。关于实践形式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唯物辩证法认为，形式和内容是联系在一起的。实践的形式是由实践的本质内容、实践的特征决定的，是内容和特征的表现。也就是说，人对客观世界的革命改造活动，主观对客观的能动作用，是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展示出来的。

实践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实践的特征是多方面的，因而实践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丰富生动的。人类改造世界的一切方面，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是人的实践的领域。工、农、兵、学、商、政、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是实践的活动内容，展示着实践形式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多种多样的实践形式中，指明生产斗

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最基本的实践形式。恩格斯说："实践，即实验和工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1 页）在他和马克思《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指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列宁在阐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是基本的社会实践的同时，还认为，"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活动。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对实践的基本形式进行了新的概括。他在多种多样的实践形式中，指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三项基本的实践形式，明确指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在这三项社会实践中，"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9页）人类要生存，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然后才有可能从事其它的活动。生产活动是人们为了谋取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改造自然界的斗争。生产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和人类社会，推动着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是社会生存的基础和社会前进的最终决定力量。没有生产实践，社会生活的一切活动，如政治、科学和艺术等，既不会产生，也无从发展。生产劳动一旦停止，人类社会就将停滞、灭亡。生产实践还是认识的最基本的来源和认识发展的最基本的推动力量，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人通过生产劳动，认识着自然界的现象、性质和规律，认识着人和自然的关系，产生了自然科学。人类通过生产实践，也不断加深着对于人和人的关系、对于社会现象的认识，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因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最本质的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生产关系。只有在

生产实践的过程中才可能“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0页）无论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现代科学的发展证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相互渗透的情况。这就进一步说明，生产实践是决定一切的，它不仅是一切其他实践的基础，也是一切认识的最终的源泉。

阶级斗争是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以及由此而来的物质利益的不同，社会便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人们为了维护和发展本阶级的利益而彼此之间进行着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即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人类社会自从分裂为阶级以来，生产斗争是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一定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阶级斗争对生产斗争有着重大的影响。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认识总是同阶级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阶级斗争的实践也是推动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强大力量。除生产实践外，在其它各种实践形式中，尤以阶级斗争给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人们的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但是，阶级斗争的实践，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实践决定的，是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如前所述，没有生产活动这一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整个社会生活就会停滞下来，也就根本谈不到阶级斗争的实践了。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同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的经济关系、经济条件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决定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和状况。不同时期的阶级斗争只有从该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经济

关系中，才能找到科学的说明和最终的答案。不仅如此，社会革命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其目的是根本变革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彻底解放生产力，为逐步从阶级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社会准备条件。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消灭阶级。阶级斗争是在一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也必须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才能结束。为了消灭阶级，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深入开展生产斗争。只有生产实践，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为消灭阶级，结束阶级斗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林彪、“四人帮”敌视生产实践，空喊“革命”，不要生产，荒谬地把阶级斗争拔高到决定一切的、甚至是唯一的地位，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恶意歪曲和无耻篡改。

应当指出，把阶级斗争概括为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是针对阶级社会而言的。在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虽然仍然存在，但它的性质、地位和作用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到将来阶级完全消灭以后，原先作为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的阶级斗争就将不复存在，而代之以处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社会实践的形式了。所以，阶级斗争这种实践形式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与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同，不是同人类社会共始终的。

实践的另一个基本形式是科学实验。人们为了获得客观事物某一方面的知识，采用特殊的方法和手段，把客观对象（研究对象）置于特定的人为的条件之下，使自然过程以纯粹的、典型的形式表现出来，借以暴露研究对象在自然条件下无法显露的特性和过程，以便进行观察、研究和认识，这就是科学实验。在生产实践基础上进行的科学实验和辩证思维是科学发现的两大武器。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人们凭借辩证思维提出科

学假设、假说，尔后通过科学实验进行检验，如此反复循环，这是不断获得新的知识，探索真理的过程。科学实验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就自然科学而论，它包括定性实验、定量实验、析因实验和模拟实验等等。科学实验不仅限于自然科学的领域，研究社会现象、特别是正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实行的社会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等工作，也需要科学实验的实践形式。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越来越多地把科学实验的方法运用于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通常所说的蹲点、解剖麻雀、典型调查等，都具有科学实验的性质。

科学实验归根到底产生于并服务于生产实践。科学实验的课题是从生产中提出来的；科学实验的手段是由生产中提供的；科学实验的成果需要在生产中考验和推广；科学实验的目的是为提高生产的水平和效率。科学实验依赖于生产实践，反过来又推动生产实践，这就是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性。

然而，科学实验又有自己的特点和相对独立性，它与生产斗争之间的联系有时并不是那么直接和明显。例如早在古代的中国和希腊，人们已从磨擦生电的实验中发现了电的现象，初步知道了阴电和阳电的区别，以后又经过上千年的多种科学实验的摸索，不断地丰富和加深了对电的认识。但是，长时期内这些科学实验的成果对人类生产和社会发展几乎没有起什么明显的影响。直到法拉第通过艰苦的实验，在1831年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使电的理论有了一个极其重大的突破。但在那时，人们还不了解这项科学实验成果的实际用途。只有根据电磁感应理论发明了发电机和电动机，成功地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和把电能转化机械能，并在输电技术有了重大突破以后，有关电的科学实验（特别是法拉第的实验）对于生产和社会发展的伟大和深远意义，才逐步为人们所理解。到今天，在人们的生产

和生活中几乎每一个方面一步也离不开电的应用，离开了电气化就谈不到什么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我们对待科学实验绝不能抱狭隘的、短视的实用主义态度，绝不能要求所有的科学实验对生产和社会发展都马上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马克思主义者是从长远的观点来观察问题的，他重视一切科学实验及其成果。

科学实验的成果之所以常常不能直接运用于生产实践中，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科学实验的成果是在环境条件比较单纯稳定的实验室中得出的，要应用于环境复杂多变的大生产过程，就不得不经过一系列中间实验，要考虑到并且使之适应于在实验室中所没有的复杂多变的新的因素。二、具体生产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它是对多门具体科学成果的综合利用。单项科学实验成果，如果没有其它科学成果的配合和整个生产技术水平的发展，是很难得利用的。例如，最先进的喷气发动机的理论是我们中国科学家发明的，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干扰，我国机器制造业的科学水平、材料科学水平十分落后，反而使这项重大科学成就首先为外国所利用，至今我们还造不出世界第一流的喷气发动机。这样沉痛的教训，不仅使我们了解到科学实验的相对独立性，而且进一步了解到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阶级斗争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密切联系。只有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的全面胜利的发展，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的矛盾，才能使各项科学成果有可能尽快尽好地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起巨大的积极作用。

我们不仅要了解到科学实验是三大革命实践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形式，而且要进一步理解到科学实验在历史发展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在人类的原始时代，还没有真正的科学实验，即使有一点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实验，也没有从生产实践中分

化出来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形式。杠杆原理、浮力原理在阿基米得提出以前，没有经过任何单独的科学实验，就已在生产实践中广泛应用这些原理了。人类的生产是在长期盲目的摸索中不断总结经验而缓慢地发展起来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就逐步认识到科学实验的必要性。真正独立的自觉的科学实验是在资本主义萌芽时的十五世纪才发展起来的。此后，科学实验对生产发展的预见作用、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日益重要和显著。到了现代，如果没有科学实验提供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要高速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国人民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关键，而科学实验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是武装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实践形式。

总之，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以及将来的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的三项基本形式。这三项基本的实践，各有其独特的作用，缺一不可；同时它们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人类认识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以这三大革命实践为基础的，是以这三大革命实践为根本条件的。

现在，我们党在清算了林彪、“四人帮”歪曲阶级斗争的实践，敌视和破坏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罪行以后，把我们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以生产斗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场伟大实践斗争。通过这场伟大实践斗争，将根本改变我国生产力落后的贫穷面貌，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起真正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们党总结以往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光辉体现。所以，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容，有助于理解我们党实行工

作重点转移的深刻意义；而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意义，又会加深领会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科学内容。

三、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要懂得以科学的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除了对实践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还必须进一步研究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实践在认识中所起的决定作用。

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在人类的活动一开始就产生了。认识是人们的精神活动，实践则是客观的物质活动。认识和实践是人类活动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人类在劳动生产基础上进行各种活动时，也就开始了对外界事物的认识过程。就是说，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是同时产生的。更确切地说，是劳动创造了人，因而创造了人的认识活动。在人类的早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人的认识活动是同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直接结合、交织在一起的，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这时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虽然实际上已经存在，但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思想的生产从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专门的职业，从而使认识活动的相对独立性获得了明显的表现形式。由此产生了象科学、艺术、哲学等认识世界的各种意识形式，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也就加深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和对立，增加了主观脱离客观、认识脱离实践的可能性。并且往往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认识活动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活动，它不依赖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不依赖于人类的实践；反而认为，思想活动产生了物质活动，认识决定着实践。加上唯心主义者的歪曲，主观和客观、认识和

实践的关系，就完全给搞模糊了，甚至颠倒了。事实上，这种颠倒的认识所由产生的条件以及这种颠倒的认识本身，也是实践发展的结果。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我们绝不能把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看作是两个彼此孤立的过程，不能把认识看作是绝对独立的活动，更不能把认识活动看成是实践活动的根源。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认识和实践是对立的统一，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人类活动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在认识和实践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又存在着主次之别。正如存在决定意识，意识是存在的反映一样，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上，实践是第一位的，认识是第二位的，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是从实践中派生出来的。在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运动中，实践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的支配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是多方面的，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处处都表现出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推动力；实践是认识正误的唯一检验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认识内容的来源问题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认识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一切唯心主义都否认主观对客观、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把主观的或"客观"的精神看作认识内容的来源。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批判了这种唯心主义的谬论，阐明了实践是正确思想的唯一来源。他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

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反映过程是建立在实践过程的基础上的。只有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活动中，人们通过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同外界事物相接触，客观对象才能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再经过头脑的思维活动，进行整理和加工，形成对客观事物的特点、性质和规律性的正确认识。没有人的实践活动，不用人的各种感觉器官去和外界事物直接接触，人的正确认识是不可能产生的，也是不堪设想的。实践出真知。“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4页）

人类的科学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哲学则是它们的概括和总结。这些科学知识都是从实践中获得的。自然科学是关于生产斗争的知识，是人们在改造自然界的斗争中得来的。人们在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同气象的变化、四季的更替的关系，由此获得了天文学的科学知识。人们在丈量土地、衡量容积、计算时间和确定事物的数量等实践活动中，认识到事物的数量关系，由此而取得了数学的科学知识。人们在兴修水利、建筑、造船、航海等实践活动中，认识到物体的力学关系，由此而总结出力学的科学知识。人们在同疾病做斗争中，积累了病因、病理和防治等方面的知识，由此而产生了医学。显然，生产斗争的实践是自然科学的来源。迄今为止的社会科学则是从阶级斗争的实践中获得的。在社会实践中，人们不仅探寻着自然界的奥妙，也摸索着社会的秘

密。人类创造的文学、艺术、政治、法律和伦理等社会科学，都是不同阶级的人们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在社会斗争、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对社会现象、社会各种复杂关系的反映或认识。

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唯心主义者鼓吹"天才"论、先验论。康德认为，"天才就是天赋的才能"，是"天生的心灵禀赋"。唯意志论者叔本华认为，人的知识和智慧是先天的，一切知识都是"先天地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因而人们可以"纯粹先天地"认识到一切。另一个唯意志论者尼采则声称，一个"天才"人物可以使"千万年的历史生色"，他是"救世主"，是先知先觉的"伟大的、完全的人"。中国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几千年来，也一直在宣扬唯心主义的"天才"论。他们主张，"生而知之"，"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认为"古之无圣人"，人类早已灭绝。在知和行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上，他们则说，"知之在先，行之在后"。总之，一切唯心主义者都主张"天才"论，反对实践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由于不懂得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不能把反映论应用到社会历史的领域，也把"天才"人物看作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而"天才"人物的天才思想则来自人类的"理性"，是"天才"人物的头脑所固有的。这样，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就背叛了反映论，而陷入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泥坑。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决反对"天才"论、先验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不承认任何"天才"，而是对"天才"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所谓"天才"，不过是由于人的生理素质和反映机能的差别，有的人聪明一些，有的人则差一些。但这种由生理的素质和机能所引起的差别，只是给人们的社会活动、工作才能提供了不同的物质基础，提供了不同活动能力的可能性。要把人们这种先天的物质基础的差异所提供的活动能力的可能性变为

现实性，则完全决定于后天的社会实践。一个人生下来，不管生理素质和反映机能多么好，如果使他闭目塞耳，与世隔绝，他也不会得到任何知识。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一个人知识的多少和活动能力的大小，都是同他参加社会实践的深度和广度紧密相连的，是由社会实践决定的。我们称无产阶级的导师们是天才，主要指他们在实践斗争中，总结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远远超出别人的卓越才能。毛泽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4页）

坚持实践是认识唯一源泉的原理，反对先验主义的"天才"论，对于批判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林彪反党集团曾露骨地鼓吹"天才"论，把"天才"论作为他们反党的政治纲领。"四人帮"则以隐蔽的阴险的形式，继续坚持和贩卖"天才"论。他们打着"高举"的旗号，把领袖神化，鼓吹现代神学。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反对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们在批判"经验主义"的幌子下，否定实践经验，反对有实践经验的干部。林彪、"四人帮"推行先验主义的"天才"论，从反面告诉我们，承认不承认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不仅是以往两条认识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而且也是现实政治斗争中的重大问题。

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还要正确认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问题。我们强调只有实践才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强调只有从亲身实践的直接经验中才能获得真知。但是，这并不排斥学习间接经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都发源于实践，是从实践中取得的。在我们这里是直接经验，在他人那

里则是间接经验；反之，他人在实践中取得的直接经验，在我们这里则变成了间接经验。一切正确的可靠的经验，都是从实践中获得并经过实践检验的。因此，在实践中取得直接经验和虚心学习成功的间接经验是一致的，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古今中外的科学知识，都不是孤立地产生和发展的，而是在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和相互推动中不断深化的。任何杰出的科学家，他的科学知识，发明创造，都凝结着前人或别人的成果，是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结合，而绝非是仅靠个人的知识和才能所能达到的。这说明，人类在实践中取得的科学知识，总是社会性的，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所以，一个聪明人，总是既勇于实践，从亲身实践中取得直接经验；同时又善于学习，从书本上学习，从古今中外的先进经验中学习。只有蠢人才拒绝从古今中外的间接经验中吸取营养。历史上任何先进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都不仅建立在本民族的直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善于学习和吸取别的民族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汉唐时代的先进文化也曾吸收和溶合了外民族的大量优秀文化。世界科学技术越发展，各国和各民族之间实践经验交流的作用也就日益显著。十九世纪落后的德国在科学技术上赶上先进的英法，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落后的美国赶上先进的西欧，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崛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力量的重建和跃进式的发展，这一切成就都是和大量地吸取外国先进实践经验和引进先进技术分不开的。近百年来，我国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如果不勇于并善于学习外国的先进实践经验，使之变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就难于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

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直接经验，同时也必须尊重别人的实践经验，加以分析，吸取其真正好的东西，摈弃其坏的东西。如果只看到自己的实践经验，“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只能永远落后挨打。林彪、“四人帮”打着反对“卖国主义”“洋奴哲学”的旗号，拚命阻挠学习外国先进科学，引进先进技术，对我国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他们既蔑视外民族的间接经验，也不尊重本民族的直接经验，这绝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的无知，主要的还是由于反动腐朽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根本敌视人民的一切实践经验。

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这从根本上阐明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首先要坚持实践第一，认识第二，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一原理，丢掉它，也就从根本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展开为一个过程，同时也就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的源泉和认识发展的动力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肯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就从根本上回答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后者是从前者必然引出的结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从认识的客观内容上揭示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则从每一新的认识何以产生，即从认识的发展上阐述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这两个方面在认识过程中是交织在一起的，实质上是同一的。

实践是认识的发展动力，包含着三层意思：第一，人的科学认识、科学知识是适应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或者说，实践的需要促使了科学认识、科学知识的产生；第二，实践提供了认识发展的可能和实现这种可能的必要条件。实践推动着人的认识由不知到知、由少知到多知、由片面到全面，即推动着认

识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发展；第三，实践锻炼和提高着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

是什么力量引起人的认识活动？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一直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往的哲学家往往对引起认识活动的动因作唯心主义的解释。他们错误地把“求知欲”、“好奇心”、“科学兴趣”、“理论兴趣”等看作是引起认识活动的动力，而看不到认识活动背后的物质原因。显然，“求知欲”、“好奇心”和“科学兴趣”等，仍然是一种认识活动。用认识本身作为认识的动因，这种唯心主义的解释，丝毫没有把问题推向前进。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活动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为了适应实践的需要，为解决实践提出的问题和任务而产生的。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在古代，天文学、数学和力学之所以首先产生和发展，原因就在于这几门科学是当时发展生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实践对认识提出的要求和任务。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政治腐败和宗教神学的统治而导致的生产停滞，也就使科学技术衰落、停滞下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自然科学又迅速发展起来，根本原因是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它的工业生产，需要有探察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页）目前，在我国出现了学习科学、钻研技术的活跃局面，科学技术的成果也不断涌现。这种喜人的现象有其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需要，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实践的需要。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的推动

下，我国的科学技术将出现新的飞跃，人们的科学认识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认识随着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断地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推移。人们的认识也总是随着实践的进程而不断前进的，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认识之所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首先是因为，实践对认识不断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推动认识去满足实践发展的新需要。这样，人们就必须进行新的研究和新的探索，把科学知识推向前进。同时，人们以往的实践也为认识的发展积累了资料和准备了经验，需要进行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形成有规律性的认识和科学知识。在不断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新要求的过程中，人类的认识也就由低到高一步步发展起来，不断产生新的科学知识，出现新的科学部门。

我们翻开科学史就会看到，实践的发展对于推动认识的发展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就自然科学而论，在古代，只有象天文学、数学和力学等几门较为发达的科学，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又出现了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科学部门。特别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时代，这些科学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为适应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生活的需要，现代自然科学以空前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在质上和量上都是以往一切时代所不能比拟的。不仅每一门科学有许多分支，而且新的科学部门不断建立起来。如信息论、自动控制论、高能物理、遗传工程等科学部门，在愈来愈深入地揭示着大自然的秘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驾驭着自然，满足着人们的实践需要。

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同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一样，也是在社会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到科学的

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资本主义发展尚不成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展开的历史条件下，十九世纪初期的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一套未来社会的设想和方案，其中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天才的猜测，但他们却不能建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这除了他们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以外，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认识受到当时实践发展水平、历史条件的限制。那时，大工业在欧洲刚刚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尚未充分发展，而在法国大工业还完全没有建立起来。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就是由这种历史情况决定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9页）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大工业在欧洲许多国家建立起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这两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趋尖锐，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经济状况、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状况基本成熟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适应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需要，总结了无产阶级的实践经验，批判地吸取了前人的优秀思想成果，深入研究和科学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才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实践的发展推动人们懂得越来越多的科学知识，同时也就提高着人们的认识能力。人的认识能力总是和人所具有的科学知识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科学知识是人的认识能力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必要的自然和社会的科学知识，就无法对自然和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而认识能力又是获得新的科学知识，提高认识水平、使认识不断深化的必要条件。人的认识能力是和科学知识成正比的。但是，无论是科学知识，还是认识能力

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他们是在实践的推动下产生的，又是在实践的推动下发展的。所以，要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必须参加变革自然和变革社会的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在斗争中增长才干。

实践的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认识手段、认识工具，从而大大提高着人们的认识能力。最初，人只靠自己的感官直接去接触事物、专靠大脑思考，认识事物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但是，实践为人们创造的新的认识手段、认识工具，则加强和延长了人的感官和大脑，帮助人们去揭示大自然的秘密。例如，望远镜、显微镜、加速器、探测器、人造卫星和其它各种科学仪器、实验装备等，它们在探索自然中的作用，是仅靠人的感官所不能达到的。人的肉眼只能看到五、六千颗星体，而用望远镜则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它的视线可以达到距地球十亿光年以上的距离，这个距离的所有星体都在它的视野之内。如果用射电望远镜则看得更远，可以观察到距地球一百亿光年以上的星系。只靠人的肉眼不能看见像微生物、原子、电子等这些非常细小的微粒，而显微镜则能使我们看到物质的更深层。电子显微镜是人类探索微观世界奥秘的重要工具之一。通过它，人们能观察到致病的病毒等只有几十埃（一埃相当于一亿分之一厘米）到几埃大小的物体的内部结构，从而把人们的视野带到了原子尺度的微观世界。电子显微镜的放大倍数可达五十万倍左右，能把一根头发放大到一座礼堂的大小。加速器、探测器等科学实验的装备，则能使我们观察和研究物质更深层的内部结构，如原子内部的结构。人们运用现代科学仪器和装备，不仅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观察宏观世界，而且也在越来越小的天地里洞察微观世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为人脑提供了有力的助手，它可以准确地贮存和处理极大数量的信息、数据，可以高速地和准确地进

行逻辑和数学的演算，从而大大地提高人类的认识能力。“四色定理”是数学中有名的难题，在二百年前，已有人找到证明的方法，但由于证明的步骤太复杂，耗尽一个人毕生的精力也无法完成，以至一直没有人敢碰它。现在用了电子计算机，仅仅花了一千小时就完成了这项证明。

在实践中，人们创造了各种精密灵敏的观察仪器扩大了感性知觉的能力，又创造了电子计算机，加强了记忆、计算和逻辑推理的能力。人们还在实践中把电子计算机和各种仪器巧妙地组合起来，为进一步提高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现代科学的飞跃发展提供了可能。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实践的发展为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开辟着无限广阔的前景。

由实践所产生、所推动的人的认识，究竟正确与否，还须由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是实践决定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这个问题，在后面《真理》一章还将较为详细地谈到。

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还表现在认识的目的是为实践服务，实践是认识的归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概括这两门科学的哲学之所以存在和发展，就在于它们不仅来自实践，而且服务于实践。如果像有些唯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科学和知识是没有目的的，那么，它们就既不可能发生，也没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就失去了意义。事实上，社会各阶级的人们，都从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出发，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自己的认识和知识对客观世界进行说明和改造。毛泽东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这里讲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实际上这对以往历史上对立的各阶级都是普遍适用的。

把社会实践作为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强调认识必须服务于实践，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以往的一切哲学家虽然也是用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例如，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斗争中所提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和政治学说，实际上是企图按照他们的认识来对现实的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但是，他们却认为，这种改造工作，不在于用认识服务于实践，把认识变成实践的力量，而在于对世界的说明和解释，在于"理性"的宣传和启蒙。在他们看来，只要通过对世界的说明和解释，通过"理性"的宣传和启蒙，他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就可以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不懂得实践是认识的目的，认识必须服务于实践，这是以往一切哲学的共同点。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以往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在创立他们的学说时没有任何实践目的，他们的学说在社会实践中没有任何作用，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说，以往哲学家不懂得实践是认识的目的，主要指他们否认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否认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他们不仅否认或忽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和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也否认或忽视认识必须服务于实践。至于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不企图用他的学说去改造世界，也没有哪一个学说不是服务于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的实践需要。剥削阶级的哲学家、思想家往往宣称，他们的学说既不服务于这个阶级的实践，也不服务于那个阶级的实践，而是"超阶级"、"无党性"的，这只不过是一种欺骗罢了。所以，在认识论上，在哲学主张上，是否把实践作为认识的目的，是否认识到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这是一回事；而认识能

否离开实践，任何认识实际上有无自己的实践目的，在实践上是否发生作用，这又是另一回事。在这两个问题上，任何剥削阶级的哲学家、思想家，由于其阶级的偏见和阶级的局限性是不可能统一的。而只有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真正统一来起，指明认识来自实践，又服务于实践。这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一切哲学的根本特点。

通过以上对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的考察，我们就可以较为具体地理解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的确确是以科学的实践为特征的。

第九章　认识的辩证运动

一、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二、理性认识到实践
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生动地体现在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中。认识的辩证运动，是实践和认识对立统一关系的具体的历史的展开。

关于认识的发展过程，列宁作了这样的概括："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列宁全集》第38卷 第181页）毛泽东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思想，提出并阐发了，在实践基础上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飞跃；由理性认识向实践的能动飞跃；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发展过程。

一、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辩证的认识运动，首先是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识采取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种形式，经历了这两个阶段，实现了由前者到后者的能动的飞跃。

毛泽东说："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4页）这两种形式的知识或认识，都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一讲中已经谈到，客观物质世界的一切对象，都区分为现象和本质这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方面，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就是分别地反映了这两个方面。这两种形式的反映，都是适应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同动物的本能活动有本质区别的人的实践，不仅要求认识事物的现象，尤其需要掌握事物的本质。人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无论从内容和形式来说，都是由实践所决定的。

感性认识是人们的感觉器官直接感受到的关于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事物的外部联系的认识。它以直接感受性为特点，以事物的现象为内容。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初级阶段。

感性认识包括相互联系、依次循序的三种形式：感觉、知觉和表象（观念）。这三种形式的感性认识，都同实践直接相联系，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第一，人们只有在实践中，使自己的肉体感官同客观对象相接触，才能获得关于事物各个特性的感觉；并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形成关于事物各个特性结合在一起的完整形象，产生知觉；才能使知觉形象保留在认识中，形成表象。如果闭目塞听，与外界隔绝，上述各种形式的认识都是不可能的。第二，人们的感受器官和感受能力，也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例如，人的感受器官的敏锐程度个别地说来往往不如某些动物，但是人的感受能力从总的水平来说却是任何其他动物所不能比拟的。恩格斯说得好："鹰比人看得远得

多，但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却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更敏锐得多的嗅觉，但是它不能辨别在人看来是各种东西的特定标志的气味的百分之一。至于触觉，（猿类刚刚有一点儿最粗糙的萌芽），只是由于劳动才随着人手本身的形成而形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2页）感觉是如此，知觉和表象也莫不如此。第三，每个人的感觉、知觉和表象，都受着各自的具体的实践所制约。农民对庄稼长势的评判，炼钢工人对钢铁熔液的认识，音乐家对声调旋律的识别，画家对形象色彩的辨认……，一般地超过他人，这都是长期的实践的结果。

由感觉到知觉再到表象，使人的认识由个别的特性达到完整的形象；由当前直接的感受达到印象的保留和事后的回忆。这里已经显示出认识由部分到全体，由直接到间接的辩证发展趋势。但是，从基本的特征上说，这三种形式的认识，仍然没有超出现象的、表面的、直接的认识的阶段。就是说，相对于认识的理性阶段，它们仍处在量的变化过程。只有当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在人们的脑子里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感性材料的基础上，才发生了一个认识过程的质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进到了理性认识。

理性认识是人们借助抽象思维所把握到的关于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的认识。它以抽象性、间接性为特点，以事物的本质为内容。这是认识的第二阶段、高级阶段。

理性认识包括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概念是对于同类事物的共同的、一般的特性的反映。概念二字，顾名思义，可以理解为概括起来的观念，它是从感性认识所提供的关于事物的各种属性和具体形象中，抽象概括出共同的本质而形成的。判断是对于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的反映，是对事物是什么或

不是什么、是否具有某种属性等等的判明或断定。它在逻辑形式上，无非是发展了的概念，表现为概念之间的一定的联系或关系。推理是从事物的联系或关系中，由已知合乎规律地推出未知的反映形式。它的逻辑形式，是以判断之间的一定的联系或关系来表达的。从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是理性认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和先后的次序。但是，它们又是彼此联系不可分割的。概念是思维的细胞，它是构成判断、从而进一步构成推理的不可缺少的因子；同时，概念又通过判断来规定，依靠推理来形成。一种思维形式，脱离开其他思维形式是不可能形成的。多少复杂一点的理性认识，都是各种思维形式综合起作用的结果。

各种形式的理性认识，"超脱"了关于客观事物的具体的、生动的、直观的形象，使它能够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和内部联系。这就使得理性认识对于客观对象的反映具有间接性（以感性认识为中介）和相对独立性。但是，决不能把这种间接性和独立性绝对化，决不能把思维同思维的客体之间绝对地对立起来，把认识和认识的内容截然地分割开来。理性认识不管多么抽象，归根到底都是对于一定客体的正确或歪曲的反映，在客观世界中都有它的原型。客观世界的各种事物，一方面千差万别，同时又有共同的属性，这种客观存在着的共同的东西，就是概念的原型。客观世界的各种事物，一方面相互区别，同时又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或关系，这种客观存在着的联系或关系，就是判断的原型。客观世界的各种事物，都是一个发展过程，不同过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过渡或推移，这种客观存在的各个过程间的推移，就是推理的原型。客观事物和过程的本质、关系和推移，又是相互联系的，所以，作为它们反映的各种理性认识的形式也是不可分割

的。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无论从内容上和形式上来说，都有质的不同，它们是认识过程中相互区别、互相对立的两个阶段。在内容上，感性认识的对象是事物的现象，理性认识的对象是事物的本质；在形式上，感性认识是人脑凭借感官所得到的感觉、知觉和表象等具体形象的形式直接反映事物，理性认识则是人脑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抽象思维的形式反映事物。然而，对立的东西又是统一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两个相互区别、相互对立的两个阶段，又是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和相互渗透的。

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辩证联系中，有两个要点需要特别地注意和掌握，这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深化、发展为理性认识。

第一，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

毛泽东说："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感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起点，是理性认识的来源和必经阶段。没有感性认识，就没有理性认识。

理性认识对于感性认识的依赖关系，实质上就是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是这一关系在认识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相比较，它同实践有更直接的关系。感性认识就是在人的亲身实践中直接经验的结果。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一切真知都是从实践中取得、从直接经验中发源的。离开

从实践中获得的感觉经验，理性的认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上一章谈到，一个人的知识无非来自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个方面，但间接经验归根到底，也是古人和他人的直接经验，同样是在实践中取得的。书本上的知识，古人或他人的经验，只是流而不是源。人类知识的总体无论如何是不能离开实践的。学习间接经验是重要的，但对间接经验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仍然取决于直接经验的深度和广度，没有实践经验或实践经验甚少的人，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和真正掌握他人的间接经验。除了从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来理解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的依赖而外，我们还要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内容上所决定的认识顺序上，去理解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的依赖关系。事物的现象是感性认识的内容，事物的本质是理性认识的内容。感性认识所反映的是特殊，是个别，理性认识所反映的是普遍，是一般。事物的本质通过事物的现象表现出来，矛盾的普遍性、共性通过矛盾的特殊性、个性表现出来；本质寓于现象之中，普遍性、共性寓于特殊性、个性之中。要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和共性，首先要认识事物的现象，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个性。在认识过程中，人们只有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感性材料，首先把握住一个个事物的现象，继而用思维的科学抽象，才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从大量个别的事物中发现普遍的一般的规律性。

总之，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理性认识都离不开感性认识。要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首先就得承认理性认识对于感性认识的依赖性。“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

第二，感性认识有待于深化、发展为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起点，但它还不是完全的认识，必

须把感性认识发展为理性认识，才是比较完全的认识。毛泽东说："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坚持认识论中的辩证法，就要既看到感性认识的重要性，又看到它的局限性。感性认识毕竟是对事物的表面的、片面的和外部联系的认识，即使它数量再多、内容再生动丰富，也还是停留在事物的外部印象上，还不能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所以辩证法要求，必须把感性认识看作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东西，看作认识过程的一个环节，而不能把它凝固化，看成是认识过程的完成。

人的认识不能满足于感性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达到于论理的认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263页）任务是由目的决定的。认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变革现实，改造客观世界。单凭感性认识不能指导实践，起不了认识为实践服务的作用，不能达到自觉改造世界的目的。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实现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任务。放弃了这个任务，认识本身也就变成无目的的东西，就陷入了盲目性。每个人的认识以至全部科学发展史都说明，认识只有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把握客观规律性，才有可能按客观规律性办事而对实践活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自然科学上的观察、试验等，是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取得感性经验的重要手段。但只有把观察、试验所取得的感性材料和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才能揭示出自然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只靠感性材料和感性经验，使认识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上是不能了解自然现象的内在联系、本质规律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发现过程说明了把

感性认识发展为理性认识的重要性。在行星三大定律发现以前，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用了三十年的工夫，长期观察行星的运动，积累了大量的感性材料，具有丰富的感性经验。但是，他长于感性观察而短于理论分析，使认识停留在感性认识而未上升为理性认识，因而未能从感性材料中概括出行星运动的规律。他的助手、天文学家刻卜勒则未停留在感性材料上，而是对第谷已取得的感性材料进行科学抽象和理论分析，找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把感性认识深化发展为理性认识，从而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相对论的创始人爱因斯坦就此发表评论说："刻卜勒的惊人成就，是证实下面这条真理的一个特别美妙的例子，这条真理是：知识不能单从经验中得出，而只能从理智的发明同观察到的事实两者的比较中得出。"只有靠抽象的理性思维的帮助，才能从感性经验材料中得出真理性的知识。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是这样，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也是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个工人都感觉到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每日都看到社会上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但仅有这些感性认识并不能使他成为有觉悟的革命工人。当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的时候，了解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现象，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因而意识不到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找不到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道路。只有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总结了无产阶级的实践经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以后，无产阶级才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才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真正意识到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伟大使命，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事业的真正道路。

从感性认识到达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质变，使认识进

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举例说，只凭我们的感性直观，我们只能说，“物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或东西，如金、木、水、火、土之类。这是否反映了“物质”的全体和本质呢？它反映的仅仅是部分而不是全体，仅仅是现象而不是本质。如果我们说，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且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这就不仅概括了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各种物质现象，而且揭示了各种物质现象的本质特性，即客观实在性。表面看来，“物质”这个概念似乎离开了我们的感官所直接感觉到的具体的物质形态，似乎离开事物的客观真理越来越远，实际上却反映了物质现象的全体，反映了物质现象的本质，因而更接近于客观真理，更完全，更可靠。列宁说：“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它等等，一句话，即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也只有从感性过渡到理性，获得了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才使人的认识不同于动物的反映，才成为了真正的认识。因为人类认识的发展是一个无限深化的过程，这个无限深化的规律就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使之确定起来。正是理性认识，对普遍性东西的认识，对规律性东西的认识给人类的认识和实践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天地，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展示了无限光辉的远景。这一切都说明：必须重视理性！

由感性认识而来的理性认识，反过来又促进着感性认识的发展。毛泽东说：“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我们很容易感觉到一个人的脉搏，

但是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也不容易感觉到脉搏的变化，而那些精通脉理的医生却能敏锐地、清晰地感觉到一个人脉搏的各种各样细微的变化，并由此做出准确的诊断。每个人在自身经历中都会发现，任何一个对象，只有当人们理解了它以后，才能比较容易、比较清晰地感觉这个对象的各方面的特点和变化。理解得愈深刻，感觉就愈锐敏、愈准确。感性认识提高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又加深着感性认识，这就是二者的相互转化。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统一，不仅表现在它们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转化，而且表现在它们的相互渗透。在实际存在着的人的认识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总是相互胶着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方面，感性中有理性。人的感觉与其他动物的感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的感觉是包含着理性的感觉，是由理性认识大大加强了的感性。前面所举人和鹰的视觉的比较，人和狗的嗅觉的比较，即说明了人的感觉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也说明了在人的感性认识中渗透了理性认识。另方面，理性中有感性。理性认识不仅以感性的材料为基础，而且以具有一定声响或文字符号等感性形式的语言作为自己的物质外衣和表达手段。离开感性的纯粹理性，正如离开理性的纯粹感性一样，在现实的人的认识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人们只能根据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各自的特点，指出某些认识侧重于感性的方面，某些认识侧重于理性的方面，把它们加以相对地区分。要把二者从现实的认识中截然分开，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的。

感性认识和理性的相互渗透，在科学知识中有着明显的表现。通常把科学区分为经验科学（实验科学）和理论科学（纯科学）。经验科学偏重于处理感性经验材料，理论科学侧重于抽象的理论思维。这二者的区分也只有相对的意义，它们之间

并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经验科学离不开理性思维，对于这一点几乎没有人怀疑。但是，不少人却认为有摆脱感性经验的纯粹理性思维的科学，数学往往就被看做是这样的科学。有的人特别是一些数学家，把数学奉为科学的皇后，而数论这一纯粹数学思维的最错综复杂的产物，又被看做是“纯粹之王冠”。可也奇怪，就连这门最纯粹的科学，又可以称之为经验科学，甚至可以称之为实验科学。因为，许多数论上的定理，开始都是凭经验作为假设提出的，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严格的证明。例如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如此。哥德巴赫猜想是数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被人看做是数论这顶“纯粹之王冠”上的宝石。这样一个纯粹又纯粹，抽象又抽象的问题，归根到底也是经验的产物。一七四二年，哥德巴赫发现，一些偶数是两个素数的和，进一步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结果都是如此。由此他得出一个经验公式，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这个公式至今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证明，被称为“哥德巴赫猜想”。有人用经验的方法（即实验的方法）对一个一个偶数进行检验，一直验算到三亿三千万之数，都证明是对的。当然，只靠这种单纯的经验的验算方法永远不能彻底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正确性。因为数目序列是无限的，一个大的偶数之后，还有更大、更大更大……的偶数，即使采用电子计算机来验算，也永远不能算完一切偶数，而只要有一个偶数不符合这个公式，整个哥德巴赫猜想就会被推翻。所以，哥德巴赫猜想毕竟不是纯粹经验问题，它到头来仍然是一个需要高度抽象思维来解决的问题。我们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要否认它的高度的抽象性，而是要说明，象哥德巴赫猜想这样一个公认的高度抽象的科学问题，也离不开经验和实验，即使将来猜想变成为定理，仍然需要靠实际的验算来证明其正确性。这就雄辩地说明，不包含感

性经验的纯理性的科学是没有的。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统一，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人的社会实践，不仅解决现象问题，而且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斗争中，才能接触到事物的现象而感觉它们；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斗争中，才能暴露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反复进行，人们对于某种事物和过程的感觉和印象，不断积累和丰富起来，这才有可能经过思考的作用，在脑子里形成反映事物本质的概念，并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实现由感性到理性的质的飞跃。这就是说，实践所以是感性和理性相统一的基础，不仅在于它是产生二者的来源，而且在于它是促进认识飞跃的动力。脱离实践的冥思空想，既不能获得感性知识，也不能正确地实现由感性到理性的飞跃。

深入实践，反复实践，获取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的感性材料，是正确实现由感性到理性飞跃的基础和前提，为这一飞跃提供了可能。但是，可能性还不等于现实性。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这一精辟的论述，不仅指出了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指出了实现这一飞跃的正确途径。

毛泽东关于对感觉材料“加工制作”的十六字概括，是在认识过程中贯彻矛盾分析方法的光辉范例。这里所讲的粗与

精、伪与真、此与彼、表与里，都是认识中的一系列的对立统一。人脑这个“加工厂”的任务，就是要采取科学的思维方法，把这些原材料和半成品，“加工制作”成合格的理性产品。进入头脑“加工厂”的原材料，应是全面真的，这是一个尽可能的要求，实际上很难做到。人们所搜集到的感性材料，往往是粗精混杂、真伪并存、彼此相隔、表里莫辨的。科学的思维方法要求：去粗取精，去掉无关要紧、可有可无的材料，抓住最能表现事物本质的、典型的、主要的东西，不要粗枝大叶，为非本质的东西所迷惑；去伪存真，剥掉虚假的东西，发现事物的真象，不要认假为真，为假象所蒙蔽；由此及彼，把零碎的、孤立的材料联结起来，不要满足于一鳞半爪，更不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由表及里，通过事物的外部联系发现事物的内部联系，不要浮光掠影，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停留在事物的表面。

这种“加工制作”的过程，就是我们在下面第十一章将要专门讲到的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的过程。为了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就要象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7页）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是对各种感性材料单个地加以分析比较，作出初步的分类和选择，去掉那些不重要的、不真实的东西，留下有价值的、真实的东西。这主要是分析，同时又有综合，是在综合指导下的分析。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就是要考察有关问题的各方面的材料，对它们进行综合地研究，从总体上把握事物，从现象深入本质。这主要是综合，同时也离不开分析，是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作为辩证的思维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在统一中把握其对立；所谓综合，就是在对立中把握其统一。辩证

的分析和综合，就是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体现。

对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我们要特别看到它是一次能动的飞跃。就是说，这个飞跃不是消极地、自然地实现的，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表现。为了实现这一飞跃，必须勇于实践，勤于思索，还要不断地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有一个科学的思维方法。实践上的懦夫，思想上的懒汉，是不能正确实现这个飞跃的。在实践上胡碰乱撞的莽夫、在思想上脱离实际缺乏逻辑，胡思乱想的玄学鬼，同样也是不能实现这个飞跃的。古今中外，一切在科学上有成就的人，都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既勇于和善于实践，又勤于和善于思索的人。马克思说得好："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页）

以上所讲的，"这种基于实践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以及二者的关系问题上，历史上的一些哲学家曾经提出过不少合理的思想，这些都被批判地吸取和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哲学，从总体上看，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或者是根本错误的，或者是只具有片面的真理。哲学史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就是两种相反的典型。

欧洲近代早期的资产阶级哲学，为了反对中世纪宗教神学，为了给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和方法，注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其中一些哲学家侧重于经验，把实验的方法、分析归纳的方法绝对化；另一些哲学家强调理性，有的则把数学的方法、演绎的方法看做万能的方法。这样，就形成了经验论

和唯理论两个不同的派别。经验论认为感性认识是可靠的，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唯理论则只承认理性认识的可靠性，否认感性认识的可靠性。在经验论和唯理论内部，又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

唯心主义经验论不仅否认理性认识，而且也否认感性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唯心主义经验论，如贝克莱主义、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等主观唯心论认为，感觉、经验是唯一的存在，是主观自生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过是我的感觉，我的经验，"存在就是被感知"，我认为有用的就存在、就是真理，等等。唯心主义经验论必然要走向唯我论，它的荒谬性是十分明显的。

唯物主义的经验论承认感觉经验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它主张，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必须搜集资料，进行实验。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脱离实践，不懂辩证法，因而不了解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在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者看来，对事物的感性反映是认识的全部内容，科学认识不仅就其来源说来是来自感觉经验，而且科学认识的本质内容也为感觉经验所穷尽。他们认为，感觉经验是唯一可靠的，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理性认识只能对感性材料进行一些总括、整理和分类，对感性经验作一些描绘和说明，而不能对科学知识提供新的内容。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著名代表洛克断言："凡是在理性中所有的，最初无不在感觉之中。"洛克认为，人们凭借感觉得到的关于客观世界的表面特性、外部联系的经验认识，如关于客观事物的大小、形状、运动、静止等认识是真实可靠的，而理性认识则是靠不住的。在洛克的心目中，理性认识只不过是对个别的单纯的东西已有的特性作简单的抽象和分离，从抽象中所得的概念并不反映事物的本质，事物都是个别的、特殊的，普

遍性、共性只是人的理性的产物，因而是空洞的抽象，是不可信的。由此，洛克作出了“科学知识究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错误结论。可见，洛克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以及二者的关系上，不仅犯了机械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而且有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的因素。

同经验论夸大感性认识相反，唯理论则夸大理性认识的作用，并把理性认识绝对化。唯理论也有唯物主义的唯理论和唯心主义的唯理论的区别。

唯心主义的唯理论不但不承认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的依赖关系，而且完全颠倒了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否认理性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笛卡尔断言，有些观念并不是从感觉中得来的，而是生来就有的，是“天赋观念”。他认为，感觉是会骗人的，是靠不住的，只有理性认识才是可靠的，不证自明的。莱布尼兹继承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说，认为理性认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完全是先天的，是“心灵”、“理性”本身所具有的。笛卡尔、莱布尼兹的唯理论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

唯物主义的唯理论承认物质世界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的知识都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但是，唯物主义的唯理论者如斯宾诺莎，在肯定意识是存在的反映的同时，却否认感性认识的作用。他认为，感性认识虽然来源于客观事物，但它却是混乱不清的，不正确的，甚至是造成错误的原因，因而是不可靠的。在斯宾诺莎看来，理性认识不依靠于感觉经验，人凭“直觉”就可以把握客观事物。他断言，只有理性认识，只有凭理性的能力从定义、公理推论出来的知识，才能避免热情和感觉的蒙蔽，才是清晰明白的、真实可靠的。不难看出，斯宾诺莎在这里离开了唯物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辩

证唯物主义批判斯宾诺莎的唯理论的直觉观，但它并不否认直觉在认识中一定的意义。我们有时能敏感地直觉地猜测到某种真理。但是，这种直觉的能力仍然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即以从前所获得的实际知识为基础的。有时一个人被某个问题长期困扰，百思不得其解，突然思想贯通，豁然开朗，洞察其奥秘，这就是所谓“神思”、直觉。这种事例在科学发展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如果不具备解决这个问题必需的经验材料，所谓“神思”直觉，是根本不会有的。

经验论和唯理论虽然各持一端，但它们的错误却有共同的认识论根源。这就是，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孤立地、片面地理解它们在认识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这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妨碍着一些哲学家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原则贯彻到底。而一旦把认识过程的一个片段夸大为绝对，就会导致从根本上颠倒了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整个地陷入唯心主义。从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形而上学是通向唯心主义的桥梁。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些曾经犯过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在思想实质上，就是重复了唯理论或经验论性质的错误。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是指导革命斗争的普遍真理，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他们却不正确地理解了认识和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了解理性认识对于感性认识的依赖关系，似乎理性认识不是经过感性认识就可以形成的，而一旦形成之后则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千古不变的抽象公式和宗教教条。这样，他们在实际上就颠倒了认识和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

识的正确关系，犯了类似唯物主义唯理论的错误。

犯有经验主义毛病的同志，一般有较多的实际工作经验，有较丰富的感性知识，这是非常宝贵的。如果把这些实际经验、感性知识认真加以总结，使其系统化，条理化，飞跃到理性认识，上升为革命理论，不仅不是经验主义，而且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要求的比较完全的科学认识了。但是，由于这些同志不懂得感性认识发展为理性认识的必要性，不了解革命理论在革命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使自己的认识只停留在低级的感性阶段，用局部经验代替了全体，满足于表面的、片面的感性经验，抓不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因而犯了类似历史上唯物主义经验论的错误。

因此，弄懂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正确关系，摆正二者的地位，对于我们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避免在工作中发生上述两种错误，是很有益处的。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唯物辩证统一的原理，也是我们批判林彪、“四人帮”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有力武器。林彪、“四人帮”为了在中国建立封建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帮”天下，一方面，他们否定感性经验，“抬高”理论的作用。他们故意把实践经验和经验主义混为一谈，提出什么“反经验主义为纲”，大肆攻击有革命实践经验的老干部；极端夸大思想理论的作用，提出“理论决定一切”的谬论，为他们这伙自封的“理论权威”“转化为组织上的权威”，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制造反革命舆论。另方面，他们又打着注重“实际运用”的招牌，极力贬低科学抽象、科学理论的作用，反对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破坏基础理论的研究，大搞反动腐朽的蒙昧主义。林彪、“四人帮”一伙，野心极大而思想空虚，既无实践经验，又无革命理论，然而在他们那里，唯心主义的唯理论和唯

心主义的经验论，却样样齐备。这比起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唯理论或唯心主义经验论的单调色彩来，不仅更加花样翻新，其反动作用也更为明显。从这个绝好的反面教员中我们可以看到，完整准确地掌握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关系的原理，是多么地重要和迫切！

二、理性认识到实践

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飞跃为理性认识，即由实践到认识，还不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一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要完成对一个具体事物的认识过程，还需由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即由精神到物质，实现认识过程的又一次能动的飞跃。

理性认识到实践，是统一认识过程的“十分重要的”一次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所以是认识过程的又一次能动的飞跃，而且是十分重要、意义更加伟大的飞跃，可以从认识的目的和作用，认识过程本身的唯物辩证的性质，这两个方面来说明。

认识的目的是实践，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改造世界。人的全部活动也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认识世界，一是改造世界；或者说，一是在实践中形成思想，一是在实践中实现思想。第一次飞跃解决的是认识世界、形成思想的问题，第二次飞跃解决的主要是改造世界、实现思想的问题，同时又是认识过程的继续和完成。因为，认识的唯一目的就在于实践。在实践的基础

上，物质的东西经过感性阶段达到理性阶段，变成精神的东西，这是认识过程的一次质变或飞跃；经过实践，主观见之于客观，精神的东西又转化为物质的东西，这当然是认识过程的又一次质变或飞跃。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不会自然地实现；从理性认识到实践更需要主观的努力，所以，它也是一次能动的飞跃。这两次飞跃相互区别，各自有所侧重；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在这两次飞跃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第一次飞跃是第二次飞跃的准备，第二次飞跃是第一次飞跃的归宿；前者是后者的手段，后者是前者的目的。毛泽东把理论和实践比作"矢"和"的"，正确处理它们的关系，就要做到"有的放矢"。这里，"矢"就是手段，"的"就是目的。他说："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既然第一次飞跃和第二次飞跃可以说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而"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9页）那末，第二次飞跃比起第一次飞跃来，自然是更加重要、意义更加伟大的了。

手段服务于目的。理性认识、科学理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以及作为二者概括和总结的哲学，都要为实践服务，换言之，它们都要以自己特有的职能作用于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理论的作用愈是得到充分的发挥，也就意味着它为实践服务得愈好。所以，强调第二次飞跃更加重要，这本身就包含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的充分肯定。如果理论对实践毫无作用，那么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第一个飞跃也就没有必要，毫无意义了。

理性认识、理论思维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由人类实践的本性所要求、所决定的。人类实践同动物本能的一个根本区别

在于，它是有意识有目的活动。马克思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活动的结果在开始时已经观念地存在着的东西，就包含着人们在以往实践中所取得的关于事物的理性知识，它是客观过程的内在联系和必然趋势即事物所固有的规律性在人们思维中的再现。正是这种观念地存在着的东西，赋予人的实践活动以方向性和预见性。很显然，这种观念地存在着的东西，愈正确、愈深刻、愈丰富，愈是能发挥其能动的指导作用，实践的自觉性就愈高，就愈富有成效。

自然科学史表明，科学技术上的重大发现、发明和突破，几乎都是在一定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海王星的发现可以说明这一点。1781年发现天王星后，人们注意到它的位置总是同根据万有引力定律计算出来的不符。于是，人们根据万有引力定律预言，这可能是受另一颗尚未发现的行星所吸引的结果。后来，亚当斯和勒维叶这两位青年，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和对天王星的观察资料进行推算，果然在1843年和1846年先后发现了这颗被命名为海王星的新行星。内燃机的发明同样说明了科学理论的巨大作用。1774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以后，人们为提高它的效率而不断努力，但一直未能有根本的改进。后来随着热功转化理论的进展，使人们认识到如果不在蒸汽机内部点火燃烧，蒸汽机的效率就无法大幅度提高，然而这却是蒸汽机原理所不许可的。这就启示人们要有新的突破。于是，法国人卡诺在1824年提出了内燃机的设想，接着，德国人狄塞耳在

1897年制成工业上能普遍采用的自动点火内燃机。内燃机的发明，可以说是在科学理论的自觉指导下实现的。其他如高斯推算出谷神星的轨道，麦克斯韦预言电磁波，狄拉克预言正电子的存在等等，这些不胜枚举的事例，都说明了科学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现代化的生产实践，如果不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简直寸步难行。

至于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作用，更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半个多世纪来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预见到剥夺者将被剥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列宁在帝国主义条件下，预见到无产阶级能够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毛泽东在白色恐怖笼罩全中国的情况下，预见到革命的星火必将燃为燎原之势；在抗日战争之初，预见到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和胜利前途；在1957年初，从苏伊士运河事件中，预见到整个国际形势将按照两类矛盾（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和三种力量（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二等的帝国主义国家、被压迫民族）的交互作用而发展。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预见，照亮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实践的道路。如果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广大群众的革命实践就不得不陷于徘徊不定、暗中摸索的盲目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列宁全集》第21卷第332页）

由此可见，正确的理性认识、科学的革命的理论确实是很重要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这就是说，承认理论之重要，不是贬低、抹煞实践之重要，而恰恰是以肯定实践之更加重要，强调由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具有更加伟大的意义为前提的。

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之所以更加重要，还在于理性认识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是由认识过程本身的唯物辩证的本性所决定的。人的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过程，这一唯物辩证的本性要求，主观必须同不断发展着的客观相符合，认识必须同不断发展着的实践相适应。然而，理性认识是否达到了这个要求，这在第一次飞跃中是没有得到解决的。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由实践加以检验。由感性认识发展而来的理性认识，可能是基本正确的，可能是根本错误的，可能是部分正确、部分错误的，这三种情况（细分起来还有多种）究竟属于哪一种，究竟这种理性认识是否正确以及正确的程度如何，必须由实践作出判定，自以为是，自以为非，都不能解决问题。人们在第一次飞跃中所达到的对于多少复杂一点的新的事物的理性认识，由于受着客观对象本质的暴露程度，实践的地位、手段和水平，自身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知识水平等客观和主观条件的限制，一般说来，完全正确的情况是罕见的，部分的错误是常有的，全部错了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通过实践的检验，肯定对的，推翻错的，补充新的，使认识的真理性得到证实和发展。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我们在下一讲中

将较为详细地讲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理性认识、理论学说在未被实践检验、证实之前，即使有着一定的根据，也还是一种科学的假设或假说，只有被实践证明了的假说，才能称为可靠的科学结论、科学真理。一般说来，假说和结论之间，不仅是量的区别，而且有质的不同。所以，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过程，不仅从精神转化为物质的意义上，而且从认识本身的证实和发展的意义上，都是一次能动的飞跃。许多自然科学的原理、定理和定律，往往都经历过和现在仍在经历着由科学假说到科学结论的发展过程，如化学周期律、太阳中心说、天体演化论、原子模型、层子模型、生命的物质结构等等。许多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原理，甚至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样的科学原理，也经历过科学假说的阶段。列宁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列宁全集》第1卷第122页）毛泽东也说："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我们用来指导自己实践的理性认识，应当力求是经过实践所检验的科学理论，而不应完全依靠于尚待证实的假设上（当然，这并不排斥用假设来指导我们某种探索性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科学实验），更不能用已被实践证明其为错误的理论捆住自己的手脚。只有被实践证实其可靠真理性的理性认识，才能更好地达到其为实践服务的目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的极端重要性。

当然，我们不能等待理性认识被完全证实后再去实践。在

实践基础上获得的理性认识，如果不去再实践，理性认识是永远证实不了的。

上面为了说明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的特殊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才从理论必须服务于实践、理论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两个侧面，分别地加以考察。事实上，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既是理论服务于实践、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理论在实践中得到证实和发展的过程，这两个方面，是统一不可分割的。

理性认识向实践之能动飞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如上述。那么，怎样才能正确地实现这一飞跃呢？

第一，理论要和具体实践相结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如前所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依赖于实践。理论是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即规律性的认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不仅表现于理性认识的形成过程中，也表现于理性认识的实现过程中。理论对实践的重大指导作用，并不能改变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指导作用始终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必须考虑到具体实践中所遇到的特殊的、具体的实际情况，把普遍性的理论与具体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理论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指导作用。射箭要有靶子，抛开被指导的对象以及该对象的特性，指导者也就会落空，因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射箭还要对准靶子，脱离实践的具体特点和具体情况，理论的指导就成了一纸空文。因此，同在第一次飞跃中一样，在由理性认识飞跃到革命的实践时，仍然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脱离实践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不能脱离实践的具体特点。同时，实践是历史的，变化发展的，在实践中会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从理性认识向革命实践飞跃时，决不能置实践的发展于不顾而“我行我素”。当情况变化了的时候，不是“削足适履”，让发展变化

了的实践去适应原来的理性认识，而要"量体裁衣"，使原来的理性认识适应实践的发展而适当改变。

在由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中，是坚持从实践出发还是从理论、概念出发，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着眼于实践的特点和实践的发展，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用理性认识指导革命实践的出发点，是使理性认识正确飞跃到革命实践的基础，是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的进一步贯彻。相反，像教条主义者那样，不顾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忘记了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抛开实践的特点和实践的发展，把理性认识看作死板的模式、僵死的教条，看成可以抹杀特殊的一般，简单移用，生搬硬套，就不可能使理性认识正确地飞跃到革命的实践，再好的理性认识也不能发挥其指导实践的作用，这是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唯心主义的曲解。林彪和"四人帮"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们发明了一种"理论"，叫做"事实服从路线需要"。他们的一整套理论和路线，本来就是背离客观实践的反革命、反科学的货色，当把这些东西付诸实现的时候，他们又从反革命的主观需要出发，任意裁剪事实。凡是不符合他们需要的事实，即使是大量存在，也视而不见，舍而不取；凡是他们需要的事实，即使是个别的、不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也要精心地挑选来大肆宣扬，为他们的反革命理论制造根据。为了贯彻他们的反革命意图，甚至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想圆就圆，想方就方，把造谣说谎当作"路线的需要"、"阶级的需要"。真是唯心主义横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二，要把握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辩证联系。

理论和实践是一对矛盾，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和过渡同一切

矛盾双方的转化一样是有条件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是不能实现这种转化的。有些理论由于一时历史条件不具备，还无法实现其向实践的转化。甚至有些理论在目前还看不出它究竟会在实践中起什么作用。但是，理论和实践毕竟又是统一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是一种必然。凡是来自实践的真正科学的理论，在历史发展中迟早一定会创造出能够实现其向实践过渡的必要条件，从而进一步推动历史的发展。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我们重视理论，坚信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但要使理论的指导作用由可能变为现实，还必须注意到由理论向实践飞跃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这些环节也就是为实现理论向实践飞跃的必要条件。

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就是把已经获取的理性认识付诸实现；从社会的范围来说，就是用理论、路线、科学、知识等等武装群众，化为广大群众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革命实践。理论向群众实践的飞跃，是一个复杂的辩证过程。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按照马克思的教导，在从理论向群众实践的飞跃过程中，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理

论要发挥作用，必须掌握群众；要掌握群众，就应能说服群众，使人心服口服；要能说服人，理论本身就应当是彻底的，首尾一贯的，完整科学的；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即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反映实践的迫切要求，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时代的革命精神。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掌握了这些环节，精神的东西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在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里，理论向实践飞跃过程中要经过哪些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环节，同样是一门大学问，它涉及到科学的划分这样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现代自然科学，最基本的可以划分为理论科学或基础科学（数、理、化、天、地、生等）和应用科学或技术科学两大门类。再具体一些，有的同志主张，现代科学技术应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推广研究等四个门类；有的同志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大致包括基础理论研究、技术科学研究、工程技术的应用研究、产品设计与发展、工艺研究与生产等五个层次。这些门类或层次，就是在理性认识（自然科学理论）向实践（现代化生产）推移过程中，层层推进、步步接近的过渡环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门类越分越细，日益专业化、专门化；另方面，各门科学技术之间又越来越紧密地相互衔接，相互依赖，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表现为高度的综合性。从横的方面说，生产中的重大发展、提高和突破，都是各门科学和技术“联合作战”、综合起作用的结果；从纵的方面说，现代化的大生产，有赖于从理论到实践之间各个环节的严密分工和紧密配合，任何一个重要环节上发生中断或故障，都会影响到社会生产这架“大机器”的正常运转。因此，自觉掌握这些环节之间的辩证联系及其相互推移的规律性，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要不断地、及时地总结经验，促使理论的进一步完

善化、精确化。

如前所述，从第一次飞跃中得来的理性认识，其正确性是尚待证明的。当把它付诸实践时，往往会遇到前所未料的情况，使原来的认识或多或少地同实际情况发生矛盾。因此，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往往要反复多次，才能达到预想的结果，一次成功的事是很少有的。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肯定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认真仔细地分析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在实践中达到预期的目的 。

承认错误不可避免，承认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的反复性，并不是说犯不犯错误无所谓，更不是说反复的次数越多越好，而是要尽可能地少犯错误，力争缩短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的过程。这里，善于及时地总结经验，就显得十分重要。“吃一堑长一智”，交一次“学费”学一次“乖”。在生产活动和实际工作中所进行的实验室的试验、中间试验、产品试制、蹲点、种试验田、小范围推广等等方法之所以必需，其认识论的根据就在于此。通过总结经验，正确的得到巩固和发扬，错误的得到纠正和避免，不完善的得到补充和发展，就会使理性认识到实践的每一次反复，在水平、规范化和精确程度上都能提高一步。所以，有了一系列试验、总结经验的准备工作为先导，在现代化的正式生产中，要求理论向实践的飞跃达到一次成功，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遗传工程、分子设计等新理论的出现使人们在培育新生物物种，寻求新的化学物质过程中，大大减少了盲目性、缩短了摸索的过程，为在科学实验的实践中一次获得成功开辟了可能。

总之，把从某一客观过程中得来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等等，再应用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

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0页)

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分别考察了两个能动的飞跃之后，对认识的全过程作了这样的概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这一科学的概括，言简意赅，有着丰富的内容和重大的意义。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揭示了认识过程的反复循环和无限发展，揭示了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运动。

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飞跃到实践，这是统一的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对于一个具体事物的认识来说，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种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发展，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完成。例如，人们对于原子结构的认识，就是如此。从1808年道尔顿发现原子开始，到1932年查德维克发现原子核里的中子为止，经过了一百二、三十年。在这期间，科学家们付出了艰巨的劳动，经历了实验、认识、再实验的多次反复，才对原子的结构形成了比较正确的认识。直到现在，这个认识仍在进一步地深化中。而对原子结构认识的每一步深化都意味人类实践能力的进一步加强。如对放射性元素的利用、原子能的利用等等，都大大地加强了人们与自然作斗争的能力。

对于社会现象的认识也是如此。例如，我们党的许多政策，都是首先在实践的基础上了解情况，总结经验，然后提出一个草案，再把草案拿到实践中进行试点，在试点中进一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草案再进行修改和补充，又把修改了的草案即新的方案拿回到实践中去实行，继续接受实践的检验。一个方针政策性的草案，往往经过这样的几次反复，最后才能形成一个正确的方针政策。只有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才能保证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前进。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无论对自然现象，还是对社会现象，要完成一个正确的认识，总要不断实践，不断认识，经过认识和实践的多次反复，最后才能成功。这就是认识的反复性。

经过这样多次反复，某一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等等，在实践中得到了预想的结果，这才算是完成了对于某一具体事物、过程的认识运动。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还是没有完成的。自然界和社会的任何一个具体的过程，都不是凝固不变、静止不动的，“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毛泽东：《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作为主观对客观的反映，人们的认识也应该跟着客观具体过程的发展而发展。客观世界及其发展是无限的，从时间上说，一过程向另一过程的推移和转变是无限的；从空间上说，物质结构的水平和层次是无限的，大到总星系小至层子都没有穷尽物质结构的层次；就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如生物运动形式来看，也有亚细胞、细胞、器官、机体、群体一种、生物群落、生物层等不同的结构水平；同时，某一事物的具体过程同其它过程的联系和关系也是无限的。作为人们改造和认识对象的客观世界本身纵横两方面的无限发展、无限的层次和无限联系，决定了人们的实践和认识也

必然是一个无限循环、无限发展的过程。毛泽东说："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这就是认识过程的无限性。

认识过程的反复性和无限性说明，它既不是封闭式的循环，也不是直线式的前进，而是螺旋式的曲折上升运动。客观世界和人类的实践是一步一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以客观世界为对象、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人的认识也一步一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认识的这一发展，从形式上看，表现为认识和实践之不断分离和重合的反复循环；从内容上看，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人类认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不仅表现在认识的广度、深度、精度和能力上，而且还表现在认识的速度上。科学史表明，无论在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合乎规律的趋势：事物的新陈代谢运动，愈是向前推进，发展的历程就愈是缩短，发展的速度就愈是加快。拿生物的进化来说，从地球上出现单细胞生物起，直到出现人类，经过了至少三十三亿年。有的同志把这个漫长的过程，用电影来比喻。这部取名为《生命进行曲》的影片，每分钟表现三千万年之间的变化，从最初的单细胞生物开始，一直看到现代人种出现，共须一小时又五十分钟。从单细胞生物出现，发展到最简单的植物和动物，电影已经演过了一半。在剩下不到一半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系列复杂的变化：海洋里的低等植物和动物、鱼类、两栖类、爬虫类相继出现。最大的爬虫类动物是恐龙，它们占了

大约五分钟的时间。然后出现了哺乳类动物，一直到人类的直接祖先类人猿。从早期猿人诞生到现代人的出场，只占了电影结束之前的五六秒钟。事物的这种加速度的发展，在社会生产领域里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一百三十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百余年来，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又获得了成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长。同客观世界的发展相适应，人类认识的发展也是如此。以自然科学的发现和发明为例，十六世纪时，总数不过二十六项，十七世纪则有一百零六项，十八世纪为一百五十六项，十九世纪达到五百四十六项，本世纪头五十年就达九百六十一项，而近十年来，科学技术的发现与发明，则比过去两千年的总和还要多。恩格斯在谈到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时，风趣地说："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得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仿佛要向世界证明：从此以后，对有机物的最高生物、即对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6——447页）对于这一合乎规律的现象，恩格斯还作过这样的概括："科学的发展则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正比，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1页）结合自然发展史、生产发展史和科学发展史，明确科学认识的这一发展规律，对于我们认清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增强我们掌握人类知识的总量、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紧迫感，具有重

要的方法论意义。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体现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是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认识过程中的其他矛盾，如感性和理性、粗和精、伪和真、此和彼、表和里、抽象和具体、相对和绝对等等矛盾，都是这一基本矛盾的具体化和某一个侧面的表现，并为基本矛盾所制约。认识的运动过程，就是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发展过程，就是客观（物质、实践）和主观（精神、认识）这样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过程，就是这一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的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所以是认识的普遍的基本的规律，就在于它集中体现了认识过程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集中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对立统一规律。

由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基本规律所决定，认识的任务就在于不断地克服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之间的矛盾，求得它们之间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个统一应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就是说，主观认识要同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客观实践相符合；这个统一应是历史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是说，主观认识要同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实践相符合。客观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主观认识也应当是具体的历史的。当事物的具体过程已经向前推移，转变到另一具体过程的时候，主观认识就应当随之而转变，如果主观认识仍然停留在原来的阶段上，这就脱离了客观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特点，思想就落后于实际，就会犯右的保守主义的错误。当事物的具体过程尚未结束，原有的矛盾尚未得到充分的暴露和展开，向另一具体过程推移转变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如果人们硬要把这一具体过程推

移到新的具体过程，把将来才能做的事情勉强拿到现在来做，企图超越阶段，这同样是脱离了客观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特点，是一种“左”的错误。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彻底唯物主义的，也是彻底辩证法的，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在实践和认识的辩证运动中，实践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和主导着认识的全过程，正确的认识路线只能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次序，而不能颠倒这个次序，这是认识的唯物论；从实践中形成的认识，又不是被动的，而是一个能动的发展过程，它不仅从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而且从理性认识又飞跃到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中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这又是认识的辩证法。主观必须统一于客观，认识必须统一于实践，这是认识的唯物论；这种统一是认识和实践的矛盾在发展中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又是认识的辩证法。认识和实践的循环往复，以客观的实践为起点和归宿，这是认识的唯物论；而这种循环往复又是无限深化和提高过程，是对立面的转化，由量变到质变，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这又是认识的辩证法。总之，在实践、认识、实践的矛盾运动过程中，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每一个环节上，无论从实践和认识本身还是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上，都贯穿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这条鲜明的红线。所以，从对认识的辩证运动的分析中，我们进一步具体地懂得，唯物辩证法的的确确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既是唯一科学的

认识路线，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唯一科学的工作路线。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社会实践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实践。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二者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把认识论化为群众路线，使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从群众中来"，大体上相当于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即由实践到认识、由物质到精神的过程。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正确认识的来源，是制定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置身于实践第一线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从总体上说，是丰富的、生动的、接近客观实际的。但从群众的每一成员来说，他们的意见又往往是分散的、无系统的、正确和错误夹杂在一起的，就是说，它偏重于感性的认识。这就需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集中起来"，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方能形成比较系统的、全面的、反映事物本质的意见，从而提出关于路线、方针、政策的初步设想。离开这个基础性的工作，任何领导的意见，都会成为空中楼阁。

"到群众中去"，大体上相当于从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

即精神到物质的过程。集中起来的意见究竟正确不正确，只有靠广大群众的实践来检验；同时，群众在实行这些意见的过程中，又会创造出许多新的经验，从而丰富和发展领导的意见。所以，“坚持下去”的过程，就是检验和发展领导的意见的过程，是认识的继续，调查研究工作的继续。决不能把未经群众实践检验的领导意见，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即使被群众实践证明行不通也硬要强迫实行，那就违背了“坚持下去”的主旨，是一定要遭到失败的。

一项正确的方针、政策、意见、办法等等，只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一次循环还不行，往往需要多次反复，才能正式形成。至于随着情况的变化，党的方针、政策也要相应地发生改变，那更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如同实践和认识需要反复循环一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也要永不间断地实行下去。

总之，“实践——认识——实践”，“群众——领导——群众”，这两个公式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认识路线是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群众路线是认识路线的具体运用，是表现于实际工作中的活生生的认识论。坚持实践第一，就一定要尊重人民群众；而尊重群众的实践，也就是尊重辩证法，尊重唯物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如何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如何从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的认识规律，对于如何从群众中集中上来、又如何再回到群众中坚持下去，是完全适用的。当然，两个公式的一致并不是机械的等同。如果把两个公式完全等同起来，就会产生这样的误解：似乎实践只是群众的事情，认识才是领导的职责，或者群众只有感性认识，领导才有理性认识。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它既违反了实践第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又违反了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统一，对于批判一切机会主义、特别是林彪和“四人帮”具有重大的意义。林彪和“四人帮”鼓吹“天才论”、先验论，提出“理论、实践、理论”的反动公式，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时，他们又宣扬英雄主宰历史的唯心史观，实行封建法西斯专制独裁，践踏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在他们那里，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路线，是相互为用，互为表里的。因此，把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紧密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揭批林彪和“四人帮”，同时也才能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掌握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第十章　真　　理

一、客观真理

二、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三、真理和谬误，为真理而斗争

四、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也就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论》）的过程。认识的任务和目的，就在于不断地排除谬误，获得真理，并在真理的指导下，去不断地改造世界。所以真理问题是认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对于真理问题，历史上不同的哲学派别众说纷纭，长期争论不休，但都没有彻底地、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才第一次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科学的回答。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凡真理都是客观真理，这是真理观中的唯物论；真理是一个由相对到绝对的推移过程，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是真理观中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贯穿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辩证唯物主义还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推动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发展的动力，也是驳斥谬误的有力武器。唯物论和辩证法相统一的科学的真理观，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客观真理体系，是我们探求真理的指南，是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思想武器。对每一个革命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坚持真理，要有一生为真理而战斗，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

一、客观真理

列宁提出："有没有客观真理？就是说，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列宁选集》第2卷第121页)这是真理观中的首要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在真理观中的进一步贯彻。对于这个问题，一切唯物主义者都作了肯定的回答，而一切唯心主义者都作了否定的回答，两条哲学路线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和尖锐的斗争。

辩证唯物主义承认客观真理，是从它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在实践的基础上主观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这一基本前提出发的。从这一前提出发，就必须承认人们的认识内容是客观的，这就等于承认了客观真理。所以，列宁说："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承认客观真理；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都是一回事。"（《列宁选集》第2卷第129页）承认客观真理，这是唯物主义一元论本身所要求的，否认客观真理也就背离了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把真理看作是主观意识对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作为一种反映，真理当然要有一定的主观表达形式，但这种思想形式的内容是客观的。永恒运动和无限发展着的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是真理的内容，是真理的唯一源泉。这个内容、源泉虽然反映在人的表象中，但它却是不

依赖人和人类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只有主观同客观相符合、相一致，才算达到了真理性的认识，获得客观真理。例如，“自然科学关于地球存在于人类之前的论断，是客观真理。”（《列宁选集》第2卷第122页）因为这个论断正确地反映了天体和人类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揭示了不以任何阶级、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个论断也就是客观真理。一切科学的定律、定理、学说、理论之所以是真理，只是因为它们是同客观事物及发展规律相符合的。如果不符合，就算不得真理，就是谬误。所以，凡真理都是客观真理，主观的真理是根本不存在的。真理性和客观性就是一回事，而同主观性（主观主义）是水火不容的。

同唯物主义相反，各派唯心主义从其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基本前提出发，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否认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否认人们的认识是对于外在的物质世界的反映，因而也就必然否认认识的客观内容，否认客观真理。

黑格尔把世界看成是独立存在的“绝对精神”的体现。他认为，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就是认识“绝对精神”本身。宗教教徒们把“上帝”看作是真理的化身，认为真理只不过是“上帝”对人们的启示。客观唯心主义宣扬的这种“绝对精神”、“上帝”，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把主观精神客观化了，神秘化了，把地上的王国搬到了天上。在他们看来，认识的内容就是来自这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神”或某种虚幻的“精神”，而不是来自物质世界，这就从实质上否认了客观真理。

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感觉的复合”，是主观精神的自由创造物，客观物质世界要以他们的主观意志

为转移。因此，他们的主观意识就是真理。从贝克莱主教到马赫主义者，再到实用主义者，都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

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认为，“真理是思想形式，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的组织起来的经验”。列宁曾严厉地批判了这种谬论。第一，如果真理只是人类经验的形式，那就否认了不依赖于主体、人和人类的客观内容，也就不可能有客观真理了。第二，如果真理只是“思想形式”、具有“普遍意义”，那末，一切谬论、谎言、迷信和妄想也都有被称为真理的权利了，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思想形式”，甚至一时还能欺骗大多数人，而具有“普遍意义”。例如，直到现在，宗教在一些国家里还普遍流行，受到大多数人的迷信和崇拜，那末，宗教的教义，就成了真理的信条。由此可见，这是一种反动的、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信仰主义的真理观。

实用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又一个流派。它所狂热鼓吹“有用就是真理”的谬论，更加荒唐和反动。实用主义的老祖宗詹姆斯说：“你可以说‘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也可以说‘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满足我们双倍需要的，这便是最真的。”（转引自陈元晖《现代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哲学》1963年版第24页）实用主义者把“有用”和“真的”完全等同起来，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客观真理的存在，而把真理看作是按照个人“需要”而随意确定和制造的。他们的主观真理论也就是“人造真理”论。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詹姆斯和杜威的忠实门徒胡适，就曾经公开地宣扬过这一点。他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

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们手里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实验主义》，《胡适文存》第2卷，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435页）这段典型的自供和表述说明，实用主义者的所谓“真理”，完全是为了满足他们主观利益的需要而捏造的谬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反动腐朽的势力都特别需要实用主义，需要这种“‘最时髦的东西’”（《列宁选集》第2卷第349页）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林彪和“四人帮”这伙骗子也是这样。他们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肆意歪曲事实，臆造“规律”，完全颠倒了谬误和真理。

上述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论，都是真理的多元论者。他们认为，真理是因人因时而异的。对于同一条件下的同一个事物，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时间，可以有不同的真理。这是他们从主观出发去观察和判断事物的必然结果。从个人主观出发，必然是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使得真理没有确定的客观内容，没有客观标准，对同一个事物，不同的人可以作出多个“真理”性的结论。这种多元论的真理观是完全错误的。实际的情形是，在同一个时间内，在同一条件下，对于同一个事物的认识，只能有一个真理。这也是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656页）这就是真理问题上的唯物主义的一元论。

承认客观真理，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真理观，必然要否定林彪、陈伯达、“四人帮”所鼓吹的“阶级的真理”。

如前所述，客观真理或真理的客观性的最基本含义，就在于它的内容是客观的，是不依赖任何个人、任何阶级的意志为转

移的。如果象陈伯达之流所宣扬的那样，以“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真理和谬误，香花和毒草，不同的阶级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为由，肯定有什么“阶级的真理”，那就是把依赖于主体、依赖于阶级的含义强加给真理，这恰恰是同真理的客观性质背道而驰的。实际的情况也告诉我们，客观真理决不因为有哪个阶级的人不承认它而丧失其真理性，相反，那些否认客观真理存在的人最终总是逃避不了客观真理的支配和受到真理的惩罚。

客观真理或真理的客观性的其次一个基本的含义，就在于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也是客观的。以“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看法”为由，来肯定“阶级的真理”，就是把主观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把真理和谬误的区别归结为阶级的分野。这样一来，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真理还有什么客观标准可言？事实上，阶级的划分根本不能代替实践标准。因为，阶级的归属同认识的对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阶级的划分并不能提供检验主观和客观是否符合的标准；无论哪个阶级的人们，其认识正确与否，除了用客观的社会实践来检验而外，别无他法。

可见，“阶级的真理”论，无论从内容和标准上，都是对客观真理或真理客观性的抹煞，是对真理本身的否定，是一种以“左”的词句装扮起来的唯心主义的真理观。林彪、“四人帮”一伙正是抡起这根“阶级的真理”的大棒，到处压人、整人、打人。他们给正确的东西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诬之为谬误，要统统“横扫”；又把他们自己那一套反动的货色贴上“无产阶级的”标签，封之为真理，到处招摇撞骗，以售其奸。所以，坚持客观真理，批判“阶级的真理”，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真理是客观的，真理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和运用，是受阶级的制约和影响的。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总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运用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去观察和认识问题，尤其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和认识更是如此。反动阶级由于它们坚持反动的立场，由于它们的根本利益、愿望和要求与历史发展的规律相违背，因此，不可能发现、特别是不敢于承认关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真理。历史上进步的、革命的阶级，由于它们的地位和利益，在当时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有一定的一致性，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发展有所认识。但由于它们受阶级局限性的制约，又不可能真正发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进步、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它们的根本利益是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全承认、掌握和运用一切客观真理，特别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真理。就是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达到阶级性和真理性的高度统一。正如恩格斯说的："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54页）因此，只有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掌握和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彻底地认识客观真理，彻底地坚持客观真理。

真理是客观的，真理没有阶级性，在真理面前就应该人人平等。所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从认识论上说，主要指真理只有一个，谁能认识真理，不取决于一个人的地位、职务、身份和权势等，而取决于他是否如实地反映客观事实，按照认识的发展规律办事。为什么说在真理面前应该人人平等呢？这是因为，真理既然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那么，不论什么人要掌握真理，都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否则，真理对他是无缘的。也就是说，任何人只有眼

睛向下，抱着虚心学习的科学态度，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通过实践，而且是反复实践，才能认识真理、把握真理。其次，真理的客观性，决定它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对任何勇于探索真理的人，都一视同仁，不偏不倚。谁采取科学态度、勇于探索真理，真理就为谁所认识，它就属于谁。反之，真理就不为他所认识，真理对他就是陌生的。同时，认识的发展规律也决定着在真理面前必然是人人平等的。任何个人、任何阶级想要认识真理，都毫无例外地必须遵循认识的发展规律。换句话说，任何人、任何阶级，即使是先进的无产阶级，为求得真理性的认识，也要在"实践—认识—实践"的反复过程中，从斗争实践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把这种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认识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决不能认为无产阶级是一个先进的阶级，或者某一个人属于无产阶级，真理就自然而然地属于它(他)。这是不符合认识发展规律的。同样，也不能认为一个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即使他有虚心学习的科学态度和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由于其剥削阶级出身而注定他不能掌握真理。这同样是违背认识发展规律的。所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

林彪、"四人帮"曾经把"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专横地诬之为"资产阶级口号"，硬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讲平等。这种"批判"在理论上是毫无道理的,是违背逻辑的。如上所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认识论含义，无非是说在能否认识真理的问题上，任何人都没有特权，只能老老实实的按科学办事，按认识发展规律办事。谁这样做，谁就能认识真理；谁掌握了真理，就应照谁的意见办。这就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含义。

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平等”根本不是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平等，根本不牵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林彪、“四人帮”把这两个问题硬扯在一起，显然在逻辑上偷换了命题，理论上玩弄了诡辩手法。

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知道，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他们极力推行反革命的强权政治，鼓吹强权即真理的谬论。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势标榜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是法律的化身。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只许他们有鼓吹谬论的权力，不许别人有宣传真理的资格。他们依仗权势，任意宣布别人的“错误”，判定别人的“罪行”，而不许别人据理申辩，用强权剥夺别人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知道，人们一旦在真理面前失去平等，在法律面前也就谈不到有什么公民权，即使真理在握，也就失去了申辩和保护自己的权利。为真理而斗争的张志新同志，就是在强权即真理的屠刀下残遭杀害的。所以，为了开辟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的道路，必须彻底批判“强权即真理”的反动谬论，大力宣传和贯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

二、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真理就其内容来说，是客观的，这是真理问题上的唯物论；而就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和掌握的程度和过程来说，真理又是绝对的和相对的，是由相对到绝对的发展过程，这是真理问题上的辩证法。每一个真理，既具有客观性，同时又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或者说，每一个真理，都同时是客观真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

列宁提出“有没有客观真理”的问题的同时，紧接着提出：“如果有客观真理，那末表现客观真理的人的表象能否立即地、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表现它，或者只能近似地相对地表现它？这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121页）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既肯定了第一个问题，又科学地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既反对否认客观真理的唯心主义真理论，又反对割裂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辩证关系的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

什么是绝对真理呢？绝对真理或真理的绝对性包含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任何真理都包含着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客观内容，都是人们的认识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都同谬误有原则的界限，都不能被推翻，否则，就不成其为真理，这一点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这个意义上，承认客观真理也就是承认了绝对真理。列宁说：“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承认感官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也就是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列宁选集》第2卷第132页）第二，人类认识按其本性来说，是能够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认识每前进一步，就是对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接近，这一点也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人能够获得对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正确认识，即承认能够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的可能性，也就承认了绝对真理。

什么是相对真理呢？相对真理或真理的相对性是指，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具体的客观过程的正确认识总是有限度的。其含义是：第一，从广度上看，任何真理只是对无限宇宙的一个部分、一个片断的正确反映，人类已经达到的认识总是有限的，世界上以至宇宙间还有很多事物我们没有认识或没有认识

清楚。物质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人们对无限物质世界的正确认识，总是认识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体。也就是说，人们对客观真理的认识，总是处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内的认识，因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和有限的，对真理的认识是没有穷尽的。所以，承认了世界上尚有未被认识的东西，我们的认识有待于扩展，也就是承认了相对真理。第二，从深度上看，任何真理，都只是对客观事物一定程度、一定层次的正确反映，对事物深度的反映也总是不能穷尽的，总是具有近似的性质。所以，承认我们的认识有尚未穷尽的对象，有待于深化，也就承认了相对真理。

懂得了什么是绝对真理、什么是相对真理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弄明白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

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虽然是互不相同的两个概念，是真理性认识的两个互不相同的方面，但是，它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辩证统一的。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可以从以下两层意义上来把握：一是它们的相互渗透、相互包含；一是它们的辩证转化。

先说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包含。这是指：一方面，相对之中有绝对，绝对寓于相对之中，任何相对真理之中，都包含有绝对真理的颗粒；另方面，绝对之中有相对，相对是绝对的一个成分，绝对真理通过相对真理表现出来，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构成绝对真理。人们对于自然或社会的每一个正确认识，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代的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认识，所以，它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但在这一定条件、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对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在这个限度内它永远不能被推翻，并作为一个稳定的因素保留在客观真理的体系中，所以，它又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绝对和相对，总是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总是这样相伴而生，如影随形。任何一项客观真理，从一种意义、一个角度上看，它是相对真理，或具有相对性；从另一种意义、另一个角度上看，它又是绝对真理，或具有绝对性。脱离对方而孤立、单独存在的绝对真理或相对真理，实际上是没有的。

再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转化。这是指：真理是一个过程，它永远处在由相对到绝对的转化和发展中。列宁指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它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135页）人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是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的过程。毛泽东在阐述列宁这一思想时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实践论》）这是一个恰当的比喻。如果把绝对真理比作一条“长河”，那么，相对真理就是这条“长河”中的“水滴”和“河段”。人类已经取得的任何一项真理性的认识，都是绝对真理“长河”中的一个成分、一个阶段，或者说，都是无穷的绝对真理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它既是以往实践和认识业已达到的终点，又是进一步迈向绝对真理的起点。它是一个个承先启后的中间站，是一个个由相对向绝对转化的关节点。由无数这样的相对真理所构成、所连接的绝对真理之长河，川流不息，万古不竭，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概括地说，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从它们的相互渗透（姑且可以说是从“静态”的观点）上看，任何客观真理既是绝对

的，又是相对的；从真理的发展（姑且可以说是从“动态”的观点）上看，任何客观真理都是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转化的一个环节。这就是客观真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是同人的认识能力、思维能力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统一相联系的。人类的思维，按其本性、能力和可能性来说，是能够认识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这就是思维的至上性，亦即思维的无限性和绝对性；但是，每一个以至每一代人，由于受到客观事物及其本质的暴露的程度，社会历史（生产状况、科学技术状况、阶级斗争状况）的实践水平，主观的条件（个人的经历、受教育的程度、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以及生命的有限性等等各方面的限制，他们的思维又是非至上的，亦即有限的和相对的。这就是一个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6页）既然人的认识、思维的能力是至上和非至上、无限和有限的矛盾统一，那么，作为认识、思维成果的真理，自然也只能是绝对和相对的矛盾统一了。

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统一、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已为人类对于自然和社会认识史所证明。

人们对天体的认识，起初只知道地球、月亮、太阳等少数的星体，而且很多地方还弄错了。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才扩展到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并且正确认识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人们的认识又从太阳系扩展到银河系，又从银河系扩展到河外星系、总星系。现在，人们已经能够观察到宇宙的大约十亿个星系，并且仍处在继续扩展和深化中。此外，人们对物

质结构的认识，对同人类息息相关的能源的认识，对人类身体构造和生理活动的认识，等等，都是由相对认识走向绝对认识的过程，都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互相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

人类对于社会的认识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使关于社会的理论成为名符其实的科学。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继承了全部人类认识发展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也是人类的认识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一个阶段。而且，它就体现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正确反映了社会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科学地概括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一百多年来社会实践反复证明了它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绝对真理；然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一切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人类认识的一切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相对真理。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一切科学真理一样，既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随着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必然要用新的经验、新的知识、新的成果来补充和丰富自己，使自身得到不断地发展；它的某些结论和原理，也必然要由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代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创造性的科学，它的力量和生命力也正在于此。任何停止的观点，僵化的思想，都是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相违背的。毛泽东告诫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7页）。当然，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

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但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发展的原理，恰恰正是不能违背的马列主义最基本的原理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英明、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们能够根据实际斗争的新情况、新条件，把自己的思想不断地推向前进。以革命导师为榜样，我们就应当以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的观点，以创造性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创造性的科学。

对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对立统一，人们会觉得二者的区分是不确定的。列宁回答得好：这种区分正是这样地“不确定”，以便防止把科学变为僵死的教条；但同时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线。

对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是无法理解的。在他们看来，要么就是绝对，要么就是相对，绝对和相对是没有联系的。列宁批判这种错误观点时指出：“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来说，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而“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列宁全集》第18卷第408页）

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者，片面夸大真理的绝对性，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认识的发展，否认真理是一个过程，认为人们可以一下子穷尽绝对真理。他们虽然承认绝对真理，但不承认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这种看法，必然使认识凝固化，把活生生的科学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必然使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

我党历史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就是这种绝对主义的表现，他们都看不到真理的相对性。教条主义者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绝对化，使马列主义脱离实际，变成僵死的教条。经验主义者把自己的经验绝对化，看不到经验的局限性，把它夸

大为普遍真理，否定理论的普遍意义，走向了形而上学的另一个极端。

与绝对主义相反，相对主义只看到真理的相对性。它否认真理的绝对性，否认相对中有绝对。它否认真理的客观内容，把真理的相对性夸大为主观随意性，从而抹杀了正确和错误的原则界线，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诡辩论。在相对主义看来，任何一件事，在同一的条件下，既是这个，又是那个，既是正确的，又是错误的，结果就成了“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没有界线，没有原则。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列宁选集》第2卷第136页）辩证唯物主义是在承认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前提下，承认相对真理；而相对主义则把知识的相对性夸大为一切，否认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存在，所以，它是错误的。

林彪和“四人帮”一伙奉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根据他们的“需要”，有时贩卖绝对主义，有时又贩卖相对主义。

当他们“需要”贩卖绝对主义时，他们就鼓吹“顶峰论”，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发展到了“顶峰”，不需要再发展了；胡说什么不管事物发展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如何，要永远遵循一成不变的“既定方针”，要我们“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这样就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生生的灵魂抽掉了，使之变成万古不变的、僵死的、空洞的教条。他们把真理的绝对性加以夸大，说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要人们“字字照办，句句照办”。他们把时间、地点、条件，从认识中抽掉了，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和可变性。他

们还把人民领袖加以神化、偶像化，看作是绝对真理的化身，使领袖脱离人民、脱离实际，而便于他们从中捣鬼。他们借树革命领袖的“绝对权威”，来树他们自己，似乎只有他们才是“最、最、最”革命的，有权指挥一切，主宰一切。而当他们“需要”贩卖相对主义的时候，他们就鼓吹马列主义“过时论”。胡说什么马列的著作“现在不适用了”，“当时是对的，现在看来不行了”。他们甚至狂叫“马克思活到现在，也可以批判”，要给恩格斯“贴他一百张大字报！”这伙骗子，高喊“字字照办，句句照办”，可是对于“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却一点儿也没有照办。在林彪、“四人帮”那里，一切以反革命需要为转移，不论是绝对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是用来篡改和否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都是为了达到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三、真理和谬误，为真理而斗争

探索真理，就必然排除谬误。真理与谬误既有原则的界线，又有密切的联系。真理与谬误的对立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这是对真理发展规律的一个科学的概括。

不同的东西才能比较。真理与谬误“相比较而存在”，是以二者的原则区别为前提的。如前所述，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谬误则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歪曲反映。前者是主观符合客观，后者是主观对客观的脱离。

自然科学是真理，宗教迷信是谬误；辩证唯物主义是真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是谬误。真理与谬误是根本对立，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的。

要划清真理和谬误的界线，必须廓清一些糊涂观念。例如，有人觉得，相对真理中似乎包含着某些认识上的错误，甚至有人还提出，相对真理也可以说是相对错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真理和谬误是人类认识中两个不同的方面，它们是根本对立的。如果说真理中可以包含错误，那么，就把真理和认识混同起来了。人类的认识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正确的部分，符合客观的那种认识，才是真理，它已经把错误的部分排除在外了。如果认为真理中也包含着错误，那就等于取消了真理和错误的原则界限。相对真理是对绝对真理而言的，是真理的一个方面，它本身同时又是绝对真理、客观真理，它是作为谬误的对立物而存在的。真理的相对性，只是说明真理本身受着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的限制，说明它是无限发展着的真理的一个侧面、一个环节、一个阶段。它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地去克服与它相对立的各种谬误，并战胜它们，而不是相对真理本身中有什么“相对的谬误”。如果把真理的对立物即谬误加之于真理，那就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大开方便之门。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真理和谬误的根本对立，并不是相互完全隔绝，而是对立的统一。真理与谬误“相比较而存在”，就是说，二者是相互依赖的。真理和谬误这两个矛盾的方面，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是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没有真理作比较，就无所谓谬误；反之，没有谬误作比较，也就无所谓真理。这就是真理和谬误的统一性。

真理和谬误的统一性还在于，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对立面的双方依一定的条件都包含着相互转化的趋势和可能。在一定条件下，真理可以转化为谬误，谬误也可以转化为真理。这说明真理和谬误之间存在着相互过渡的桥梁。这就是说，同任何矛盾着的对立面一样，真理和谬误的对立，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了一定的范围和条件，“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0页）

真理向谬误的转化，有如下两种情况：

第一，任何真理都有自己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如果超出这个条件和范围，就会如列宁所说：“多走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257页）。比如，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基本完成之前的一段时期里，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是，超出这个范围，把上述矛盾说成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的主要矛盾，原来的真理性就丧失了，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变成了谬误。

自然科学的情况也是一样。恩格斯举例说：“水在摄氏零度和一百度之间是液体，这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但是要使这种自然规律成为有效的，就必须有：（一）水，（二）一定的温度，（三）标准压力。月球上是没有水的，太阳上只有构成水的元素，这个规律对这两个天体是不存在的。”（《自然辩证法》1955年版第199页）其他如：牛顿力学在量子力学的范围内是不能适用的，欧几里德几何学解释不了相对论领域中的问题，在十进位的数学中 $1+1=2$，而在二进位数学中 $1+1=10$，等等，莫不都是如此。

第二，真理适用的范围，不仅表现在空间方面，而且也表

现在时间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在不断地变化，认识在不断地发展，如果在变化了的情况下，还要照搬老一套，就会在实践中碰壁，就会犯错误。真理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把它凝固在某一点上，把适用于一定时期的原则，看作是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教条，真理同样也会转化成谬误。客观真理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中的每一个原则都同其他原理处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之中。如果把其中的一个原理孤零零地抽出来，切断同其他原理的联系，不受其他原理的制约，它也会丧失自己的真理性。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是一切社会及其发展的基础的原理相联系的；对敌人要实行专政的观点，是同在人民内部要实行民主的观点相联系的。如果把它们割裂开来，夸大一个而否定另一个，象林彪、"四人帮"所鼓吹的那种"阶级斗争"和"全面专政"，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

真理向谬误的转化，比较地好理解，那么，如何理解谬误向真理的转化呢？第一，根据上述的原理，既然超出一定的条件，真理就变成了谬误，那么，只要条件得到恢复，谬误回到原来界限之内，它就又成为了真理。波义耳定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超出一定的条件，波义耳定律就失去作用，而恢复原来的条件，在原来的限度内，它又作为科学的定律而发挥着作用。同时，有些谬误只在一定范围内才是谬误的，当超出了这个范围进入到一个新的范围时，它就可能转化为真理。例如，"一种化学元素可以转化为另一种化学元素"的原理，在局限于研究化学运动的范围内曾被证明是错误的。当科学研究深入到原子核物理的范围时，人们就发现了它本是真理，只要用原子核物理学提供的科学手段，就可以使一种化学元素转变为另一种化学元素。当然，如果有谁试图用较为简便的化学方法来实

行这种元素间的转变，他就会仍然陷入错误。第二，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失败常常是成功之母。人们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以及在科学试验中，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人们在失败中，找出原因，吸取教训，做到吃一堑、长一智，就能一步一步取得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错误转化为正确，谬误转化为真理。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上、理论认识上的错误，通过总结经验的方法，通过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即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使错误得到克服，真理得到发扬。这是错误向真理转化的一种情况。对于敌对阶级和反动分子的谬论，我们也要认真研究。不承认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说："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页）毒草可以肥田，反面的东西可以从另一方面起着教员的作用，从反面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问题。这是谬误向真理转化的另一种情况。这两种转化，性质是不同的，但是谬误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真理，对追求真理的人民来说则是共同的。谬误向真理转化的条件是多种多样的，是非常复杂的，但最根本的条件是斗争。真理和谬误相斗争而发展，这种矛盾斗争，正是真理本身发展的动力。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而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

一部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

学的斗争史，也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不断战胜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不断得到发展的历史。自然科学的真理也是按照这个规律而发展的。许多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为了探索真理，坚持真理，在与宗教迷信作斗争中，受到了残酷迫害，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例如，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医学家塞尔维特，他发现了心脏与肺部的血液小循环，粉碎了统治医学很长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和伽伦的旧医学的错误观点，但他却被卡尔文教派当作异端而活活地烧死了。与他同时代的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由于热情宣传和坚决拥护哥白尼的学说，被宗教裁判所逮捕入狱，严刑拷打，最后也被活活烧死。然而，不管斗争的情况多么尖锐复杂，斗争的道路多么曲折迂回，真理最终总是要战胜谬误的。这是因为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也是任何人推翻不了的；只要是真理，总是能够经受住实践的考验，而一切谬论终究要被实践所否定。所以，只要客观世界在发展，人类的实践在发展，那么，作为客观世界和客观实践的正确反映的真理，终究是不可战胜的。

真理不可战胜，这是对真理的发展趋势，对最终的结果而言。而对真理的探索过程和真理的实现过程来说，却是一个艰苦斗争的曲折过程。真理是对谬误、迷信和偏见的否定。在阶级社会里，真理不能不遭到反动阶级和保守集团的竭力反对。一切反动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总是用谬误、迷信和偏见维持自己既得的阶级利益，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他们像害怕洪水猛兽一样，害怕真理，敌视真理。因为他们承认真理，就等于宣布自己的灭亡。正因为如此，在阶级社会里，探索真理是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只有不畏艰险、勇于进取的人，才有希望发现和求得真理。求得一个真理，需要艰巨的劳动、顽强的工作

和痛苦的斗争，甚至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探索真理，求得真理，特别是在社会领域中，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不经过一番艰苦的斗争，有时甚至是殊死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的。这是被以往人类探索真理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社会主义消灭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为发现和发展真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发现和发展真理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探索和坚持真理再不会有什么阻力，却是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事实上，探索和坚持真理的道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是径情直遂的，它永远是一条不平坦的道路。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旧制度中生长发展起来的，特别像中国这样的曾经长期受封建主义统治的国家，要在短期内消除旧社会的谬误、迷信和偏见是不可能的。而且，真理和谬误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还会产生新的谬误、迷信和偏见，真理也依然会遭到歪曲、压制和扼杀，它也不能不在同各种谬误、迷信和偏见的斗争中发展。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了探索真理和坚持真理，也需要冲破各种阻力和排除各种艰险，甚至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党和人民的好女儿张志新为真理而捐躯的事迹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她为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行径进行了顽强的较量，同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误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为真理流下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张志新同志为坚持真理而惨遭杀害的悲壮事例，虽然是在特定条件下发生的，但它告诉我们，探索真理，坚持真理，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求得真理是需要斗争的，需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勇于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

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应该树立终生为真理而奋斗，随时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无产阶级是彻底革命的阶级，它的利益和真理完全一致，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一致。无产阶级光明磊落，大公无私，没有阶级的局限和阶级偏见，因而它能永远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作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无私才能无畏。只有大公无私，以无产阶级的事业为己任的人，才能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不畏艰难险阻，以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始终为真理而斗争，为真理而献身。所以，探索真理，坚持真理，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有的阶级本色。

即使到了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真理和谬误的斗争也仍然存在，只是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罢了。

四、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

阐明了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以及真理和谬误的对立统一这些原理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回答：判断认识之是否具有真理性，依靠什么来确定呢？这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根据什么标准来判定认识之是否正确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哲学史上争论不休。有人干脆否认任何的真理标准，宣扬“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是真理标准问题上的虚无主义。多数哲学家主张要有个标准，但这个标准是什么，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唯心主义者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认为，应当以“圣人”的意见为标准，如“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以《圣经》来裁判一切等。有的认为，应以自己的观念为标准，如王阳明把所谓“良知”作为“自家标准”。有的人认为，应以多数人的意见、感觉为标准，如贝克莱所说的“集体的知觉”就是“实在性的证据”。有的认为，应以“有用”、“效果”为标准。如实用主义的创始者詹姆斯就说：“凡是有利于我们工作，并使我们获得效果的东西就是真理，这也是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他公然宣称“上帝”的观念也是真理，理由是“上帝的观念至少能给人以安慰的效果”，“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休息日的利益”。有的虽然接近于主张以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如黑格尔，但是他所讲的实践仍然是一种精神的活动。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检验认识的标准放在主观的范围之内，都是用认识去检验认识，都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实践论》）。这样的标准，都是主观的、不确定的，实际上等于没有标准。

旧唯物主义者承认真理的客观性，他们以是否符合客观现实作为真理的标准。如狄德罗就说过：“事物仅仅在我们的理智中时，就是我们的意见；就是一些概念，它们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可能被认可，也可能被反对。它们只有和外界的东西联系起来时才坚实可靠。”（《论解释自然》）狄德罗的观点，相当典型，几乎为一切稍微彻底一点的唯物主义者所共有。但是，这只是回答了什么是真理的问题，并没有回答真理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得到证明。什么是真理和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问题。正确解决第一个问题，是正确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前提，但是并不能以第一个问题来代替第二个问题。对于第二个问题，包括狄德罗在内的

近代唯物主义的哲学家，曾作过一些有益的探讨。狄德罗提出，要以经验、实验和观察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说："除了实验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识别错误。"费尔巴哈也说过："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这些思想都是非常可贵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它的反映论是消极的直观的反映论，总的来讲不是以实践为特征的，而且它们对于实践的理解也是狭隘的、片面的，只局限于实验室的实验或者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没有把社会的实践、特别是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看作检验真理的标准。

由此可见，对于真理标准的问题，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没有作出正确的解决。旧唯物主义只知道自然界，而唯心主义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第573—574页）

只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才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真理标准的问题。早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刚刚问世的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就明确地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嗣后，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都反复强调和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他们多次以十分明确的语言向人们指出，实践，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外再也没有别的标准。

为什么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

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所决定的。

前面一再说过，所谓真理，就是人们的思想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就是说，只有主观同客观相符合的认识才称得上真理。那么，怎样才能判明主观同客观是否符合以及符合的程度呢？只停留在主观的范围内兜圈子，是根本无法解决的。很明显，不超出主观思想的范围，不同客观世界打交道，就不可能、也没有资格去谈论在人的表象中是否包含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同时，客观世界本身也不能充当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离开人的活动而独立的外在客观世界本身，不具有把主观认识同客观现实加以对照的“本领”，所以，它本身也无法判明某种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由此可见，对于检验真理的标准来说，主观思想和单纯的客观事物都是无济于事的，二者都不符合真理的本性。真理的本性所提出的要求是主观同客观相符合，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不是主观的思想，也不是“单独的自然界”，而只能是把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沟通起来的“桥梁”、“纽带”或“交错点”（参看《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9—310页），这就是人们的社会实践。

实践，只有实践，才能满足真理本性的要求，充当检验的标准，这是由实践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0页）正是直接现实性的特点或优点，决定了实践之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性。

实践的直接现实性的基本含义，就在于它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一方面，实践是同人的主观世界直接相联系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实践是人的实践，而“‘自觉的能动性’，

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7页），是人的实践活动区别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区别于外在的物质世界即“单独的自然界”的特点。正是由于实践活动的这种自觉性，才使它有可能作为检验主观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的标准。如果不同主观世界直接相联系，它就不可能成为这个标准。另方面，实践又是现实的客观的活动。实践活动，是物质的人，以自己物质的肉体器官，运用人所制造的物质的手段（工具、武器、仪器等），去同外在的物质世界相接触的活动。它虽然同主观意识有联系，但却又超出了主观的范围，是一种外在的，看得到、摸得着的感性的物质活动，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特别重要的是，实践能够把主观的东西变成客观的东西，使思想、理论等等现实化，使外在客观世界发生变革，或如恩格斯所说，在自然界中（社会更是这样）打上人的“意志的印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人们在实践中，按照一定的思想、观点、意图去做，引出一定的客观效果，这样就能够拿主观去同客观相对照，从而确定主观同客观是否符合以及符合的程度，这就是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主要根据，也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实际过程。正如毛泽东所说：“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实践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这并不排斥逻辑证明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所谓逻辑证明，就是运用已知的正确概念和判断，通过推理，从理论上确定另一个判断的正确性的一种逻辑方法。逻辑证明，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也是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可以帮助人们用理性方法来的

整理感性材料，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建立起科学的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以便更深刻、更正确、更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可以说，任何一门科学如果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前后一贯、不相互矛盾的逻辑体系，那么它就不能被认为是一门严密的科学。全部科学史表明，在探索、认识、论证科学真理的过程中，逻辑证明的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理论思维方法，决不能对它有任何的轻视。

但是，逻辑证明再重要也不可能代替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

第一，逻辑证明的前提，是人们从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前提是否完全符合客观实际，还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并获得发展。例如，欧几里德几何学定理，被人们认为是不证自明的数学公理，当作逻辑推理的前提。但是，这些公理，实际上正是通过人们的无数次实践活动总结出来并加以证明的。而且，这些公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欧几里德几何学第五公理认为：经过直线外一点可以而且只能作一条平行于它的直线。可是，人们经过两千多年的实践和苦心研究，由罗巴切夫斯基提出了一条相反的公理：通过不在直线上的一点，至少可以引出两条直线平行于已知的直线。从这个公理出发，得出了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小于180°等一系列新结论。实践证明，在比较小的空间范围内，欧几里德几何学是正确的；而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例如在广义相对论所研究的空间范围内，就必须采用非欧几何学作为它的空间的描述。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即使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也是来自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第二，逻辑证明所运用的规律、规则和方法也是在人类社会长期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的。列宁说："逻辑规律就

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5页）。又说：“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同上，第233页）。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如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都是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于客观事物质的相对稳定性的反映。逻辑证明的方法，如演绎法、归纳法等，也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从亚里士多德总结了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以来，演绎方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十七世纪的莱布尼兹把数学的方法运用于逻辑上，扩大了演绎推理的学说，并为数理逻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数理逻辑在现代有了飞速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在控制论、计算机科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即使今天被认为是十分严格的数学推理方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第三，通过逻辑证明得到的结论，还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确定它是不是真理。一般说来，根据正确的前提，运用正确的推理方法，得到的结论应当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人们实践水平的限制，往往不能保证推理的前提百分之百的正确；或者由于思维能力的限制，在逻辑证明的过程中可能在推理的某个环节发生错误。这些都可能使逻辑推理的结论不一定正确，这就要由实践来作最后的判决。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勒维烈根据牛顿引力理论，研究了天王星的运行轨道发生偏离的情况，运用了形式逻辑中叫做剩余法的逻辑推理方法，推算出一个未知行星的存在和位置，后来果然被加勒的实践——科学观察所证实，这颗被命名为海王星的新星体的发现，是逻辑推理的一个成功的实例。可是，同一位勒维烈，运用同样的逻辑

推理方法，预言在水星轨道的内侧，存在着一个更接近太阳的行星，结果却被几十年的科学观察所否定。直到一九一六年，爱因斯坦建立了广义相对论以后，才从勒维烈的这个逻辑推论与事实不符的矛盾中，发现了作为这个推论前提的牛顿引力理论的近似性和局限性，从而使人们的认识从牛顿力学发展到了相对论力学，在真理的长河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两次逻辑推论证明，一个成功，一个失败，生动地说明了，逻辑推论的结果，一定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裁决，辨明其真伪，并推动人类认识的前进。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这样。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运用了演绎的和归纳的分析方法时写道："在这里，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进行检验。"（《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自然，《资本论》中所得出的具体结论还要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继续接受检验。

以上都说明，逻辑证明既不能代替实践、也不能同实践并列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恰恰相反，逻辑证明之所以有力量，正在它以实践为基础，它的作用进一步证明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根据同样的道理，科学的理论、甚至象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科学理论，也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们认识和研究一切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它以科学的预见，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指明了方向，使人们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用这种科学的方法论和科学的预见武装起来，有助于人们破除迷信，摆脱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精神枷锁，能够动员、教育和组织群众，投入改造世界的伟大斗争。所有这些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但是，革命的理论再重要、再正确也不能成为检

验真理的标准。第一，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且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却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正确的理论是具有现实性的，它反映了现实，又会变成现实的东西；但是，理论属于主观的东西，它的现实性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它本身无法自己实现自己、产生实际效果并从中显示自己是否与客观存在相符合，它同现实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贯通，是以唯一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实践为“中介”的。第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本身就陷入了自己否定自己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把理论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或者把理论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从而违背马克思主义。企图以理论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又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对极其丰富多变的实践的一般概括，而“任何一般只能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普遍规律不能代替它在各个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能代替各门科学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具体方法。如果把理论当成衡量认识的真假对错的标准，不仅会使理论变成悬在空中、毫无用处的套语，而且会拿它来剪裁、限制甚至歪曲客观的实践，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陷入了唯心主义。第四，马克思主义者承认自己的学说、理论是真理，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认为他们那一套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真理。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自己的理论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能陷入真假难分，是非难辨

的境地。所以，究竟谁是谁非，只有依靠客观的实践。在实践面前，一切谬论必然彻底破产，一切真理必然灿烂生辉。由此可见，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不仅不能否定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相反正是以实践标准的唯一性为前提的。离开实践标准，就无法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更谈不上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所以，只有彻底坚持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才能充分发挥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这二者是完全统一的，相辅相成的。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作为改造世界的感性活动是客观的，它所产生的效果是客观的，它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客观的。这就是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唯物论。同时，实践是一个过程，认识是一个过程，实践对认识的检验也是一个过程。这又是真理标准问题上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首先要求坚持真理标准的唯物论，同时也要弄懂真理标准的辩证法。如果不搞清这个辩证法，反过来也会动摇真理标准的唯物论，导致怀疑实践之是否能够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对于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的辩证法，列宁曾经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所谓实践标准的确定性或绝对性，指的就是实践标准的客观性、唯一性，即离开实践就无法检验真理。这一点，上面已经讲过了。所谓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或相对性，指的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是一次完成的，不是一劳永逸的。

实践和认识的过程是充满矛盾的复杂的运动过程，不可能是直线式进行的。实践活动是人所参与的社会活动，它的水平直接受着参加实践的人们的水平以及各种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人们对于客观世界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人们采取的实践方法是否对头，人们从事各项实践活动所使用的工具和仪器的功能和精密程度，以及人们对于它们使用的熟练程度等等，都会影响到实践的效果。实践只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的实践。因此，第一，它不可能一下子证明所有的真理。大量的真理性的认识，都是在它提出以后很久才被实践逐渐证明的，有些真理的认识，甚至需要实践无限地证明下去。毛泽东说："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科学的真理，包括马列主义这样的真理，其真理性既不是不证自明的，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全显现出来的。尽管它们在提出的时候就是真理，也仍然只有经过尔后的实践的检验才能显现其真理性，才能被承认为真理。很多理论属于科学的预见，它们常常跑到实践的前面，这就不是当时的实践所能一下子完全证实的，而有待于实践的发展逐步地加以检验和证实。像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世界多样性统一、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等原理，虽然是科学的真理，但对它们的证明则要靠长期的、持续的实践的发展来实现，永远也不能宣布实践对它们的检验已经完毕。否则，就会陷入杜林的那个算完了无限数列的形而上学的泥坑。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发现和证实了的真理，较之尚未发现和证实的真理，简直是微乎其

微。无穷多的真理等待着人们在世代更迭的实践中去发现、去证实。第二，具体的实践对于认识的检验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近似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在实际生活中经常有这种情况，正确的理论，由于实践过程的不完善，照了做去，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即被一时一地的实践所否定；随着实践的继续和不断完善，才逐步地得到证实。就是说，实践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它对认识的检验也有一个由不准确到比较准确的过程，如果孤立地看待整个检验过程中的某一两次结果，并把它绝对化，宣布它是最终的结论，就会使人们的思想陷于僵化；而一旦发现这个结论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又不去具体分析检验过程中各种复杂的具体情况，从中找出合理的解释，于是又跳到另一极端，从把实践标准绝对化而走向根本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错误道路。这种要么只承认绝对否认相对，要么只承认相对否认绝对的观点，是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形而上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就必须把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辩证地统一起来，既反对唯心主义，又反对形而上学。

总之，实践标准的客观性、唯一性，进一步揭示了真理的客观性；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进一步揭示了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换言之，凡真理都是客观的、绝对的和相对的，可以从实践标准之唯物的、辩证的本性中得到说明。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实践的观点，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之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同样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全部真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实际问题。从一九七八年五月开始，在我国展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公开讨论。这次讨论抓住了

林彪、“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要害，深深地触及了人们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极大地促进了从现代迷信中挣脱出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次讨论作出高度的评价。全会公报指出：这次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要我们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实践来检验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在实践中拨乱反正，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会永远保持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革命威力，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会生机勃勃，就会胜利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较快地把我国建成为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强国。

第十一章　辩证逻辑

一、辩证思维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二、概念、判断、推理、假设
三、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具体和抽象
四、逻辑和历史的辩证统一
五、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一致

在前面各章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各项原理的论述中，特别是在第八——十章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真理论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多次涉及到辩证思维即辩证逻辑的问题，但又都未能来得及充分地展开。而对辩证逻辑没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不能深刻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论，正如列宁所说，辩证的思维是人类的认识所固有的；“逻辑学＝关于真理的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6页）

辩证逻辑以人类的理论的（逻辑的）思维为专门研究对象，它是关于辩证思维的一般规律、形式和方法的哲学学说，简言之，是关于思维辩证法的科学。研究思维的辩证法，不能同客观世界本身的辩证法相脱离，不能同人的全部认识的辩证过程相脱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

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列宁全集》第38卷第89—90页）列宁的话，言简意赅，应是我们研究和掌握辩证逻辑原理的纲领性的指导。

一、辩证思维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要明确辩证逻辑的对象和任务，就必须把握思维规律和客观规律，即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关系。恩格斯指出："……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一方面，外部世界（自然和社会）运动的规律和人类思维运动的规律本质上是同一的。这是说，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客观辩证法决定主观辩证法，后者只是前者的反映。如列宁所说："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思维和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社会的产物。人首先是在自然界的影响下学会思考的。思想如果不能正确地反映自然界，不能有成效地指导人们向自然界作斗争，那么人就不可能生存。同时，人也是在社会生活中学会思考的。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来向自然界作斗争

的。如果人们不合乎逻辑地思考，人与人之间就将无法交流思想、协调动作，也就无力向自然界作斗争。正是劳动生产实践使猿变成了人，形成了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正是在实践中发展和提高了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即客观世界迫使人们学会逻辑思考，迫使主观的辩证法同客观的辩证法相一致，不然就要受到惩罚。

客观辩证法创造思维辩证法、二者本质上的同一性决定了，辩证逻辑研究思维规律，必须联系客观的辩证法，并以它为基础和出发点，不然就会陷入唯心主义。

另一方面，外部世界的规律和思维的规律在表面上又是不同的。外部世界的规律，采取外部必然性的形式，离开人的意识、思维而独立存在。思维的规律，则采取主观的、逻辑的形式，同人的自觉的活动相联系。逻辑思维的形式，如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方法，如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等，虽然以客观辩证规律为基础，在客观世界中有其“原型”，但这种形式和方法本身并不存在于客观世界，而为人的思维所特有。因此，只研究客观世界的规律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对思维规律进行专门的特殊的研究，不如此也就不会有逻辑这门科学。

不仅如此。一切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都是产生于实践的需要，以服务于实践为目的的。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的一般规律，也是为了实践，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了给人们一个科学的认识工具和方法，用以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外部世界的辩证运动的一般规律，正是为了揭示思维的辩证规律，为了给人们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离开思维规律单独地、“纯客观”地去研究外在世界的一般规律，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实践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

是具体的、特殊的，只有把一般规律作为指导我们研究具体的特殊的问题的思想方法，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才是必须的。

从以上关于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唯物辩证关系中可以引出这样的结论：必须联系着客观的辩证规律来研究思维的辩证规律，这就是辩证逻辑的任务。

人类思维是由动物心理发展而来的。逻辑思维能力已经以某种萌芽的形式出现于动物的心理活动中。我们知道，动物只有正确地反映周围世界才能适应环境维持其生存，这种生物式的适应环境，使得它们的反映只具有感性的形式。然而要对外界有一个正确的感性的反映，就不得不把各式各样的感觉联系起来，按照感觉对象之间固有的联系加以整理。借用康德和黑格尔的术语来说，这种活动是区别于理性思维活动的悟性(也译作知性）活动。悟性活动已具有低级的逻辑规律。恩格斯指出：人和动物都具有一切悟性活动。悟性活动包括有归纳、演绎、分析、综合以及实验等等。例如，在动物那里，同剖开果核的行为相适应的心理活动，已经是分析的开端；它们的机敏动作，也初步表现了综合的能力。再如，狐狸能够正确地运用它关于地形的丰富知识来躲避追逐者，又能够出色地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势来中断它的踪迹，这中间就有归纳、演绎等思维活动的萌芽。还有，在有新的阻碍和不熟悉的情况下，动物所做出的各种尝试，也可以说是一种最低级的实验。“就种类说来，所有这些方法——从而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对人和高等动物是完全一样的。它们只是在程度上(每一情况下的方法的发展程度上）不同而已。只要人和高等动物都运用或满足于这些初等的方法，那末方法的基本特点对二者是相同的，并导致相同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5页）这种普通逻辑（即形式逻辑）的规律不仅早以萌芽的形式

为动物心理的反映过程所具有，而且也为今天的电子计算机所遵守。以上的一些基本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认为逻辑纯粹是心灵的构想或上帝对人的恩赐的唯心主义谬论。

形式逻辑及其所揭示的规律，对人的正确思维是绝对必需的。但是，把逻辑学仅仅归结为形式逻辑，是完全错误的。除此以外，还有高等的逻辑——辩证逻辑。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外部形式，而且只从孤立的、静止的方面来研究，它不可能成为关于认识的哲学理论，不能揭示人的思维的辩证本质。恩格斯指出："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现代哲学中才达到。"（同上）

在人类思想史中，曾经积累了不少关于辩证逻辑方面的材料，但是，它作为一门科学只是在黑格尔那里才得到了比较全面和完整的研究。不过，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同他的整个辩证法一样，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是被唯心主义形式严重歪曲了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从黑格尔逻辑学中吸取了它合理的内核，从而建立了科学的辩证逻辑。辩证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对于完整准确地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在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处处可以看到缺乏辩证思维对科学带来的巨大损害，这也说明了研究辩证逻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都是以人类思维为对象，因此，研究辩证逻辑，如果不了解普通的形式逻辑，不研究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区别和联系是不行的。辩证逻辑是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它包含有形式逻辑，但又不归结为形式逻辑。恩格斯曾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比喻为初等数学（常数数学）和

高等数学（变数数学）的关系，“而变数的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4—175页）这是我们正确把握两种逻辑关系的指导原则。

形式逻辑撇开了思维的内容，单纯从形式方面考察思维；撇开思维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主要从现成的形态中分析和研究思维。形式逻辑的规律反映了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区别和客观事物相对静止的方面；至于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发展，则不是形式逻辑所能胜任的任务。辩证逻辑则不同。它是辩证法在逻辑学方面的运用。它不仅反映了事物的相互区别和相对静止的方面，而且反映了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绝对运动，反映了相互对立的方面的统一。辩证逻辑从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中把握思维的形式，从思维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把握思维的规律。恩格斯指出：“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象后者满足于把各种思维运动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互相平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隶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同上，第545—546页）。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撇开思维形式中反映的具体内容——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因此，辩证逻辑包括形式逻辑又高于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有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同一律的公式：A是A。它是说：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一个思想（概念、判断等）反映的对象是什么就是什么对象，不能是别的东西。矛盾律的公式：不能既是A又不是A。它是说：一对矛盾判断或反对判断不能同真，其中必有一假。排中律的公式：或者是A或者不是A。它是说：一对矛盾判断不能同假，其中必有

一真。这些规律要求我们的思想必须是确定的；不能自相矛盾；不能“亦此亦彼”、模棱两可，模糊不清。这些规律都是任何一个正常思维必须遵守的规律。其中，同一律是最根本的；矛盾律不过是同一律的“否定的说法”；排中律则不过同一律和矛盾律的推衍。

形式逻辑的规律虽然是一切思维过程必须遵守的规律，但它们却仅仅是思维的初步的规律，是带有极大局限性的规律，是在一定范围内才适用的。其局限性就在于没有进一步从同一中看到差异，看到矛盾。这是由于形式逻辑规律只是对人们在反映事物的相互区别以及它们的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相对静止方面所应遵循的规律。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把事物看做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我们在这里看到某些特性，这些特性，一部分是共同的，一部分是相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分布在不同事物之中的，所以它们内部并不包含任何矛盾。如果限于这样的考察范围，我们用通常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就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9—160页）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是指旧的受形而上学影响的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人们在“碰不到任何矛盾”的范围内考察事物所必须遵循的思维规律。这种范围就是事物的相互区别、相对独立、相对静止，这些确实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的一个侧面。因此，形式逻辑的规律是有客观根据的，在它考察的范围内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形式逻辑规律适用的范围任意扩大，变为适用于一切范围的世界观，把同一性抽象化，看不到自身包含着差异的具体的同一；把无矛盾性绝对化，认为一切内部矛盾都等于荒谬，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了。错误就在于，把事物的相对独立绝对化，从而否

认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把事物的相对静止绝对化，从而否认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这样，就否认了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而陷入形而上学。从这里可以看出，形式逻辑的局限性本身就包含导至形而上学的可能和趋势，这也是旧的形式逻辑中难免带有或多或少的形而上学影响的一个原因，不过，在形式逻辑适用的考察范围内，思维方法的形而上学性未能得到充分的暴露罢了。列宁教导我们：在讲形式逻辑时"要加一些修改"（《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453 页）。这就是说，必须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清除形而上学对形式逻辑的影响。

辩证逻辑是研究矛盾的逻辑，它克服了形式逻辑的局限性。恩格斯在指出形式逻辑仅仅适应于考察事物的相对独立和相对静止的方面以后，接着说："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60 页）辩证逻辑不同于仅仅反映事物相对静止方面的形式逻辑，它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逻辑。对立统一的规律是辩证逻辑的根本规律，它揭示了客观事物自己运动的原因，也揭示了思维自己运动的根本原因。因此，在辩证逻辑看来，"抽象的同一性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37 页）在无机界中，"每一个物体都不断地受到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作用，这些作用经常在改变它，在修改它的同一性。"（同上），在生物界，生物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使其在每瞬间都既是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相区别。在我们思想中的每一个命题，都表现出"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同上）。同样，从发展的观点看来，辩证逻辑不承认有什么"绝对分明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

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页）

列宁指出：辩证逻辑则要求："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象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观察事物。……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的那一点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列宁所指出的这些要求，也是辩证逻辑同形式逻辑的根本区别。

辩证逻辑高于形式逻辑，但并不排斥形式逻辑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如高等数学的出现并不会排斥初等数学一样。形式逻辑的规律，是一切正确思维、包括辩证思维必须遵守的规律，是认识现实的必要条件。列宁指出："'逻辑矛盾'——当然在正确的逻辑思维的条件下，——无论在经济分析中或在政治分析中都是不应当有的。"（《列宁全集》第23卷第33页）这里所说的"逻辑矛盾"，就是由于违背形式逻辑规律而造成的思想混乱。"逻辑矛盾"不同于如实反映了客观矛盾运动的辩证思维的矛盾，它是由于违背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而使思想丧失它应有的明确性、确定性和一贯性而造成的逻辑混乱。辩证逻辑要反映客观的矛盾运动，首先必须弄清是什么东西在相互矛盾着、运动发展着，否则就无法明确地反映事物的矛盾运动，就会把整个世界看成变幻不定、无法分辨、不可捉摸的一团糟，从而走向不可知论。否

定了形式逻辑的规律，就是否定了事物的相对静止和质的相对稳定性，势必导致相对主义、诡辩论和折衷主义，那里还会有什么辩证的思维。这同不懂得简单的加减乘除，就谈不上掌握微积分，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在强调学习辩证逻辑的重要性的时候，决不意味着可以轻视形式逻辑，特别不是意味着否认学习形式逻辑的必要性。

形式逻辑作为一门科学不仅仍然存在着，而且还在不断地发展着，人们已把数学运用于对形式逻辑的研究，创立了数理逻辑，为利用电子计算机代替人脑进行部分逻辑思维提供了理论基础。

无论辩证逻辑或形式逻辑都是历史发展着的科学。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而这对于思维的实际应用于经验领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一，思维规律的理论决不象庸人的头脑关于'逻辑'一词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形式逻辑本身从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激烈争论的场所。而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然而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466页)

二、概念、判断、推理、假设

人类思维区别于动物心理的根本点就在于：它是以概念这一逻辑形式来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概念是构成人类思维过程的逻辑“细胞”，是最基本的辩证思维形式。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一系列的基本概念，并通过特定的概念体系来揭示其所研究的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矛盾是概念的本性。辩证逻辑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概念自身的矛盾。

概念是主客观的矛盾统一。概念的内容是客观的，因为它反映存在于人类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概念的形式则是主观的，因为它属于人类的意识。人类意识以概念形式反映现实时，割断了事物本身的现象和本质的联系，撇开其丰富变化的现象的方面，舍去其偶然的、非本质的属性，抽取和概括事物中的一般的、必然的、稳定的、本质的东西。就这一点来说，概念在反映客观事物时，经过了人类思维的一番加工制造功夫，因而是主观的。就概念的内容来说：它毕竟来自客观事物，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因而它又是客观的。列宁说：“自然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现象又是本质，既是瞬间又是关系。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隔离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泉源来说却是客观的”。（《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3页）唯物辩证的概念论，是同否认抽象概念在认识中作用的经验论和抹概念内容客观性的唯心主义根本对立的。

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家都不了解概念中所体现的主客观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他们从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原则出发，否认概念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康德否认概念来源于经验和实践，而把它看作是纯主观的东西。他割裂了主客观之间的联系，

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黑格尔批判了康德，但他却把概念说成是现实存在的独立实体，认为客观对象或现象只是概念的表现。黑格尔所说的概念的“客观性”，实际上是认为，概念的内容就是概念自身。现代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经验主义哲学在其否认理性认识的同时，竭力抹煞概念所具有的客观内容，说什么概念、范畴只不过是用来组织、整理人的主观经验的手段，而与现实世界无关。直觉主义者则说，概念把现实僵化了，他们提倡用神秘的直觉代替概念。语义哲学把概念看成是不反映任何现实的“单纯的”词，并把逻辑归结为纯粹的语言分析。

作为思维的逻辑形式，概念分为两个不同的方面：外延和内涵。概念是外延和内涵的矛盾统一。在形式逻辑看来，外延指概念所反映对象的范围，即所包括的对象的数目的多少；内涵则指在这个范围内所有事物的共同属性的总和。事物的数目越多，它们的共同属性就越少。由这一事实出发，形式逻辑得出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反比关系的定律——概念的外延越大，则它的内涵越贫乏；反过来，概念的外延越小，则它的内涵越丰富。在这里，形式逻辑着重研究的概念的“量的”方面，注意的是概念外延的大小和含有属性的数量。当然，这也是必需的、重要的。但是，这里缺乏对概念作“质的”分析，没有分析概念所揭示的属性对事物和现象的规律性联系反映的深刻性程度。形式逻辑没有注意到，外延主要反映量，内涵主要反映质，因而它没有接触到存在于概念外延和内涵之间的量和质的矛盾统一。

概念是事物中本质的东西的反映。但是只有从发展上考察事物，才能正确地确定事物的本质。形式逻辑却把概念作为现成的东西，只从形式上对各种概念加以比较，而忽视了概念在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内容不断深刻化的过程。因此，形式逻辑

把概念的内涵看作是属性的总和，只注意到属性数量的多少，而没有对属性作进一步的“质的”分析：区分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一级本质、二级本质和更深刻的本质等等。实践是区分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的唯一标准。形式逻辑脱离开实践来考察概念的内涵，因而也就不能区分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概念是由抽取出同类事物中的共同的属性所形成的，然而并不是所有某类事物之间的共同点都可以成为该类事物的共同本质。就是说，概念在抽象中形成，但并不是任何抽象都有助于概念的形成，这里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能否同实践相联系。费尔巴哈不理解社会实践，他把每个人的自然的、生理的共性概括为人的本质。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费尔巴哈的错误，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这里所说的“在其现实性上”，就是指社会实践。在现实上，人都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发现事物的本质，形成事物的概念。因此，辩证逻辑强调，概念不是脱离实践单纯地反映事物的共同点，而应该在与实践的密切联系中深入地反映事物的本质。

辩证逻辑要求从认识的发展上，从量和质的统一上把握概念。概念内涵所有的特性不仅有数量的差别，而且有质上的差别，即认识深入程度的差别。辩证逻辑注意的不是概念的外延越大，它的内涵越贫乏；而是注意这些为数虽少的属性，却是由于认识的深入发展而揭示了事物的更为深刻的本质。辩证逻辑从形式逻辑所说的大概念内涵的贫乏处看到了它的内涵的深刻性，并指出，正因为这些内涵的深刻，它们才能说明更多更丰富的事物，因而具有更大的外延。在形式逻辑看来，“物质”概念是外延最大的概念，也是内涵最贫乏的概念，它的内涵只

有一个特点，即客观实在性。辩证逻辑却看到“客观实在性”这一特点的深刻性，看到它揭示了无限丰富多样的世界中的一切事物、现象的本质，从而彻底地说明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形式逻辑之所以得出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反比关系的定律，还由于它只看到概念形式的抽象性，而撇开了概念内容的具体性。辩证逻辑则认为，概念是抽象性和具体性的对立统一。形式逻辑通常把概念看做是单纯的抽象，凡是能概括更多的个别事物、更为广泛、更为一般的概念也就更为抽象。物质的一般、运动的一般、劳动的一般、价值的一般等等就成为纯抽象的概念。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它没有看到抽象和具体的对立统一。马克思说：“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07 页） 例如，只有在劳动分工最丰富最具体发展的地方，在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形成劳动一般的概念。“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是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已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同上）在这种抽象性上表现了实际真实的东西，即具体的现实。同样，一般的运动就是变化，这样抽象的概念，只有在深入地研究了物质运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以后才能形成。当人们还只是比较深入运动一种具体形式——机械运动时，人们就只能够把运动了解为物体在一定时间内在空间中位置的移

动。这种关于运动的概念看来似乎具体一些，但它却无法说明运动的丰富的多样的具体形式。当科学深入发展到要对机械运动以外的其他运动形式（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社会的）进行认真研究的时候，原来的运动概念的内容就显得贫乏无力，难以正确反映物质运动的具体的丰富的多样性。抽象产生于对事物具体深入的研究，反过来，抽象又有助于推动进一步对事物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

列宁说："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自然是具体的客观实在，科学的抽象不仅更深刻、更正确，而且更完全地反映着客观的具体，因而科学的抽象是具体的。概念不是丧失现实世界的丰富内容的抽象，它是充满着具体内容的东西。概念是以抽象的形式反映着客观事物的具体内容，这就是概念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统一。

概念所反映的具体的客观事物，无不充满着矛盾和矛盾双方的转化，无不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因而，概念具有变动性和灵活性。列宁说："概念不是不动的，而就其本性来讲＝转化"。"……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转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3、277页）毛泽东也指出："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1页）

概念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矛盾的绝对性并不排斥矛盾双方的相对的统一性，事物的绝对运动并不否定它的相对静止和稳

定。特别是由于辩证的概念所反映是各种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这正是事物相对稳定、静止的方面。因此，概念又具有稳定性和确定性。

概念中灵活性和确定性的统一，是概念自身所具有的两重性。无论是确定性或灵活性，都来自概念自身的矛盾。

每一概念的存在都是以它的对立概念的存在为条件的，每一概念的定义只有通过它和对立概念的联系和比较才能确定的。因此，在每一概念中都包含着它的对立面，它的否定的方面。定义就是否定：概念是通过自己的对立面，即通过自己的否定来下定义的。例如：上和下、动和静、物质和精神、因和果、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形式和内容、美和丑、真和假、善和恶、民主和集中、微粒和波动……等等概念，都是对立的统一。其中，每一对概念双方都是对立的统一，一个概念离开了它的对立概念就不可能有明确的定义。什么是物质？我们只有通过它和精神的关系来给它下定义；什么是精神？我们也只有通过它和物质关系来给它下定义。撇开了物质和精神的对立统一，就不可能有关于物质和精神的科学概念。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和集中这一对概念，也是如此。集中是人民的共同意见、意志的集中，没有民主，人民没有权力充分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意志，又如何能集中呢？不体现人民的共同思想、意志的“集中”，人民就不会心悦诚服地承认、接受并用以协调统一自己的行动，这就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反过来，如果没有集中，每个人都离开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就会妨碍和破坏其他人的民主，因而也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总之，离开了民主就不会有关于“集中”的科学概念，离开了集中也不会有关于“民主”的科学概念。任何一个概念如果离开它的对立的概念，不考虑

它们之间的对立，就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含义，就会成为含混模糊的思想而丧失了它的确定性。

但是，每对对立概念之间的区别、界限又不是绝对的、固定不变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是灵活的、可变的。关于概念的灵活性、可变性，我们在《唯物辩证法诸范畴》一讲里已经作了说明。范畴就是一些外延最广、反映最一般的共性的概念，如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等，它们之间的界限都不是凝固的、僵死的，而是灵活的、可变的。其它概念也无不如此。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意味着对无产阶级敌人的专政，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它们之间并没有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

概念的灵活性和可变性的重要表现，就是随着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不断获得新的内容。概念的变化发展和更新，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制定新概念。随着实践和科学知识内容的扩大和变化，会形成新的概念。当人们的实践达到变革原子，深入到原子内部结构时，就形成了关于原子核、电子、质子、中子以及各种基本粒子的概念，形成了关于原子能、实物和场的概念等等。没有这些概念，就不可能有原子物理学，也不可能有原子能的应用。现代科学正酝酿着新的巨大革命，新的概念还将会层出不穷。社会科学方面也是如此。当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而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时，也只有形成反映这些关系的新的科学的概念，才可能对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人类靠着这些新的概念来扩大和加深自己的知识，加强自己改造世界的能力。

第二，抛弃旧概念。随着科学发展中真理战胜错误的斗争，

那些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旧的错误的概念不断地被新的正确的概念所代替。例如废除了燃素、热素、生命力等错误概念，而用一些新的科学概念来研究燃烧、热运动和生命运动等现象；批判了“天命”、“生存竞争”等错误概念，而用历史唯物主义所制定的科学概念来研究人类历史社会现象，就明显地体现了概念发展中的破旧立新。

第三，“改造”原有的概念。由于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眼界扩大到更大的层次，深入到更深的层次时，我们碰到了旧概念与在新层次中起作用的不同质的更为复杂的新的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除了要制定能确切反映具有特殊新质的客观规律的新概念之外，还必须对原有的概念加以“改造”，给予新的解释。例如，在人们深入到研究电子和微观客体的初期，就碰到了经典力学概念与量子力学规律的矛盾，只有在量子力学中制定了一系列与古典力学的概念不同的新概念，才解决了这个矛盾。这对古典力学中一些旧概念，并没有象错误的概念那样被废除，而是保存下来，不过被限制于它自己适用的界限之内。这种被保存下来的旧概念，也有一个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精确化和深刻化的过程。例如哲学概念和每门科学中的最根本最一般的概念，都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它们在人类科学发展中没有被废除，也不会被废除。但是，这些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不断被新的科学和实践材料补充新的内容，它们经历着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如物质、运动、空间、时间、因果性、质量、能量、元素、原子等概念就是如此。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空间概念只反映了曲率为零的空间，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发展了空间概念，使它既能反映曲率为零的平直空间，又能反映曲率大于零或小于零的弯曲空间，这就使空间概念具有了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

辩证逻辑中的概念的灵活性、可变性，并不意味着没有确定性，而是意味着对事物的确定性的最准确的反映。原因和结果这一对概念是可以相互转化、相互过渡的，是灵活可变的。例如甲现象是引起乙现象的原因，乙现象是甲现象所引起的结果，同时，乙现象又是引起丙现象的原因。乙现象从甲现象所引起的结果转化、过渡为引起丙现象的原因。这就是因果关系。因果概念的相互转化，是概念的灵活性、可变性。但是，就乙现象对甲现象的关系来说，乙现象只能是结果，不能既是结果又是原因。同样，就乙现象对丙现象的关系来说，乙现象只能是原因，不能既是原因又是结果。也就是说，就一定的发展过程、一定的关系来看，原因只能是原因，结果只能是结果，在这里，形式逻辑的同一律(A = A)是完全适用的，概念是十分确定的。但是，形式逻辑没有考虑到一个过程到另一过程的过渡，一种关系到另一种关系的转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概念间的相互过渡、相互转化。这种概念间的相互过渡、相互转化，这种概念的灵活性，不但没有否定概念的确定性，反而揭示了使得这个概念具有确定内容的具体关系和具体过程，因此这意味着更为准确的确定性。我们在这里看不到任何抹煞原因和结果的差别，混淆、颠倒原因和结果的迹象，没有给折衷主义诡辩留下任何可乘之机。概念的灵活性，是由事物从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过渡、从一种关系向另一种关系转化的客观实在过程和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否定了概念的灵活性，就无法确切地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变化；否定了确定性，概念模糊不清，也不是辩证的灵活性。总之，辩证的概念是确定性和灵活性的对立统一。事物的永恒的运动变化是概念灵活性的客观基础；事物每一阶段、每一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则是概念确定性的客观基础。而相对静止本身就包含在绝对运动之中，是绝对运动的一个因

素和必要条件。因此概念的灵活性包含着确定性、与确定性相联系的灵活性；概念的确定性也包含着灵活性、与灵活性相联系的确定性。列宁指出："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2页）

形式逻辑之所以只看到概念的抽象性、确定性，而看不到它的具体性、灵活性，是同它不懂得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相联系的。形式逻辑只看到概念反映了事物、现象的共性，只看到共性和个性的差异和区分；没有进一步看到共性和个性之间的联系和转化，没有看到二者的矛盾统一。在辩证逻辑看来，概念不仅反映同类事物中所有个别事物的共性，同时也反映了它们各自不同的、丰富多采的个性。概念是共性和个性的矛盾统一。这也就是说，概念所反映的共性是包含着个别事物丰富多样个性的共性。如果共性内部不包含个性，那就不是概念所要求反映的共性。因为，这样的共性只能是无生命的、不开花的枯槁僵死的共性，它不能深入生活、不能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客观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个别事物有所帮助。不包含个性的共性是不存在的，是对认识毫无用处的空洞的抽象，辩证的概念不需要这样的共性。

概念中所反映的共性是从同类事物中各个个别事物丰富多样的个性中抽取概括出来的共同的本质，这并没有使个性的丰富内容在共性中消失，而是把它们保存下来了。这种概括，跟那种失掉个性的丰富内容只剩下空洞抽象的概括有根本的不同。例如前面讲到的"人"这一概念，费尔巴哈把它看成是一

切人脱离各自的具体实践的所有种种共同属性的总和，这就只能是一种空洞抽象的概括，它无法说明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个性。马克思则与费尔巴哈完全不同，他指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也是对人的共性的概括，因为，一切人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活，离开了社会关系就找不到人，脱离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人就会退化为野人、退化为动物，不再成其为人。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概括就不再是空洞的抽象的概括，这样的共性也不再是丧失了丰富多样个性的共性。而是抓住了人的本质的共性。因为，人的丰富多样的个性产生于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产生人的不同的个性。抓住了社会关系这个人类的共同的本质，就能对每个个人的丰富多样的个性作出深刻的说明。只有这样的概念才体现了共性和个性的具体的辩证的统一。

为了能够认识概念是共性和个性的具体的统一，必须明确概念中所确定的那种共性，不是相似属性的总和，它有为“属性的总和”所包括不了的、更深刻的东西。“属性的总和”是把各个事物中各种各样相同的属性，用纯粹量的步骤机械地相加在一起，这并不能促使我们的认识进入事物的更深刻的本质。在概念所确定的那种共性应该是也必须是各个个别事物中的规律、本质。因此，共性同个别事物的属性的单纯总和有着质的区别。共性作为个别事物属性的总和，是不能体现共性和个性的具体统一的。只有反映事物规律、本质的共性，才能反过来深刻说明各个个别事物的个性。

列宁在说明科学的概念所反映的共性（普遍）时，引证了黑格尔的话：“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列宁称赞这个思想“好极了！”（《列宁全集》第38卷第98页）这个深刻的辩证法思

想说明，共性来自个性，共性包含个性，它是个别事物中的规律、本质，因而共性又反过来能回到个性，居高临下地观察个性，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个性。无论在概念中所概括的各个个别事物多么不同，多么多种多样，它们都可以在概念中得到反映，而且不是反映它们的表面现象，而是把握其本质。前面所提到哲学的“物质”概念，就可以反映无限多样的具体物质形态：不管是大至总星系，还是小至微观粒子；不管是有静止质量的东西，还是没有静止质量的东西；不管是无机界，还是有机界；不管是自然，还是社会。因为，哲学的物质概念揭示了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的共同的最深刻的本质——客观实在性。它说明一切事物或现象不管它与其他事物有多么大的区别，它都是客观实在，它的一切特性都是其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特性。我们研究任何事物都应从其客观实在性出发，按其本身原有的面貌来解释它，不能有半点主观任意性。只要加上一丝一毫的主观任意性，就不能完全准确地说明其特有的多样的个性。再看看“国家”的概念，有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把“国家”定义为土地、人口、主权。这三者确实是所有国家的共性，但这些都只是一些空洞的抽象的共性，它无从说明各种类型国家的不同的特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这样的国家概念才真正揭示了一切国家的共同的本质，同时也能够说明不同国家的不同的特性。这些多种多样的特性都是由于阶级矛盾性质和状况不同而构成的。

以上说的是概念的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自然，这种统一是以共性和个性的差别、矛盾为前提的。共性不能与个性直接相符合，个性也不能简单、直接地表现为共性。概念中的共性是事物的本质属性，概念所反映的只是大量现象中本质的、必然

的和规律性的东西。它并不直接反映那些个别的、偶然的东西。例如，商品的价值反映了多种多样变动不居的商品价格的本质——消耗于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价值并不与价格直接相符合，价格也不简单、直接地表现为价值。当然，共性和个性的差别，并没有否定它们的统一。价格不管怎样复杂多变，它始终摆脱不了价值的制约，价格归根到底是由价值所决定的，它在价值周围波动着。在我们看到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时，不能忘了共性和个性的对立，反过来，在我们看到它们之间的对立时，也不能忘了它们的统一。

考虑到概念中共性和个性的对立和考虑他们的统一一样，对认识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共性不直接反映个性的多样性，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共性来代替个性，而是应当把共性具体地应用到个性上去。就是说，在认识过程中，不能从概念出发，用概念来代替个别事物、现象，而是要使概念与个别事物、现象结合起来，进行具体的分析。就运用物质概念来说，我们必须考虑到物质存在的各种具体形态：低速运动的物质的质量"不变"，而高速(接近光速)运动的物质却显示了质量的"可变"性。以光速运动的光子、中微子居然"没有"质量，无论是质量相对不变的、质量"可变"的或"没有"质量的东西，就其本性看来都是物质的。就"质量"概念来说，在不同的情况下也有不同的特点，有静止质量、运动质量。所谓相对不变的质量，原是指事物的静止质量，变化的质量是静止质量向运动质量的变化或运动质量向静止质量的变化。而"没有"质量的光子并非真的没有质量，仅仅是没有静止质量，而有运动质量。不管物质怎样变化，它的总质量(静止质量和运动质量的总和)都是不变的。我们如果只是从物质概念、质量概念出发，不同它们的个别的具体的形态相结合，就不可能得出世界统一性在于物质性

的正确结论，就会导至“物质消灭了”、把物质归于“虚无”或从虚无中产生物质的错误观点。

我们花了较大的篇幅来说明概念中共性和个性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是因为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问题的精髓，我们在理解概念的矛盾本性时也必须紧紧抓住这个精髓，这样做既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作为认识细胞的概念，也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由概念到判断、推理的辩证转化以及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的辩证关系。

判断是在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更复杂的思维形式。任何一个判断，哪怕是最简单的判断，都是由两个以上的概念构成的。因此，可以说，没有概念就没有判断，任何概念的内容都又是由判断来揭示的，关于概念的定义就是一个判断或一系列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判断也就没有概念。判断同概念是密切不可分的，这两种思维形式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相互转化的关系。

概念是共性和个性的矛盾统一。不过这一矛盾是以隐蔽的、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概念之中。而在判断中，概念的这一矛盾则被发现和被揭示出来。在任何一个简单的判断中，概念中共性和个性的矛盾通过主词和宾词的关系以鲜明的展开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在“妈妈是人”、“铁是金属”、“树叶是绿的”等等判断中，主词和宾词的关系就是个性(个别)和共性（一般）的关系，主词代表个性、宾词代表共性。从中就得出了这样表现形式——个别（个性）就是一般（共性）。在判断中，共性和个性的对立就是如此的鲜明突出，但又在统一中结合起来。必须指出，这种结合决不是机械的结合，宾词所反映的共性存在于主词所反映的个性之中，主词所反映的个性使得宾词中反映的共性得到表现和具体化。共性是以个性为基础的共性，个性是

表现共性并使之具体化的个性。因此，判断也就是概念内部固有的矛盾（共性和个性的矛盾）的展开，它是在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概念如果不通过判断展开其内部固有的矛盾，就没法真正明确地揭示它的内容。不用判断给概念以精确的定义，这样的概念只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概念和判断之间的联系就在于他们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矛盾统一，而他们之间的区别却在于，他们是共性和个性矛盾统一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判断是概念的发展或发展了的概念，概念是没有得到发展的、最原始的判断。最原始的判断没有主词，只有宾词。它表现为："这是树"、"这是人"、"这是房子"等等。要说有主词那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这个"。"这"是最一般的字，算不得什么真正的主词或概念，因此，这里实际上只有一个概念（宾词），而且只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其具体内容并未充分揭示的）概念。

黑格尔把由概念到判断的辩证过渡看成是一种纯粹观念的自我发展的过程。他认为，概念"是一切生命的原则"，它创造一切存在，判断就是由于概念自身的共性和个性的矛盾展开而形成的。他否认由概念到判断的过渡是人们对客观世界深入认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完全相反，认为概念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判断中概念与概念之联系也不过是客观事物的联系和关系的反映。由概念到判断的过渡完全是由于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对客观事物关系和联系深入认识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指出："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页）没有对客观世界的周到和必要的考察，对考察所得材料不进行联贯的思索，仅仅靠概念的自我发展是无法作出正确判断的。

形式逻辑对判断这种思维形式做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但是，至少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没有涉及：第一，在判断中如何反映客观世界内部矛盾及其矛盾运动；第二，不同种类判断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他们各自在认识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这些问题是辩证逻辑的任务。

判断这种思维的逻辑形式通过肯定或否定来反映客观实际的关系。形式逻辑正确地看到肯定和否定之间的区别、对立和矛盾，把判断分为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规定，对同一关系的客观对象不能同时做出肯定的和否定的两种判断，要末肯定，要末否定，不能既肯定又否定，既不肯定又不否定，否则就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也就是“逻辑矛盾”。这些规律反映了客观事物的相对稳定性，表现了思维的确定性和首尾一贯性的要求，它们无疑是正确的，是我们在思维过程中必须遵守的，但是，这些规律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它们只看到了肯定和否定之间的区别、矛盾和对立，没有进一步看到在一定条件下肯定和否定这两个相互区别、矛盾和对立的方面又可以同时存在于客观事物的同一关系中，看不到在同一的客观事物中存在着既肯定又否定的矛盾。如果把这些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绝对化，上升为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会导至形而上学的错误，就会否认矛盾的客观性和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恩格斯指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页）在恩格斯的这个判断中包含有两个直接对立、相互矛盾的判断：一个是肯定判断——“某物某时在某

地”；一个是否定判断——“某物某时不在某地”。恩格斯把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判断结合在一起，揭示了客观运动的实质，也揭示了“运动”概念的矛盾内容，许多受形式逻辑思维规律所局限的思想家不满了，愤怒了，他们叫嚷：这是思想混乱的极端表现，是不可容忍的“逻辑矛盾”！其中有一些人因此否定运动的客观实在性，硬说因为“运动”概念中包含着矛盾，所以它是虚幻的。也有些人认为，运动的客观实在性是不能否认的，“逻辑矛盾”也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运动是一个物体某瞬间在一个地方；另一瞬间在另一地方。在这个判断中也包含两个不同的肯定判断，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对立和矛盾。但是，这两个判断只是分别说明了，一个物体在不同时间的静止状态，若是要用以说明一个物体在同一时间的运动，那才是真正违背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逻辑矛盾”。因此，要抹煞矛盾、回避矛盾，就不可能对运动做出科学的判断，因而也不可能揭示“运动”概念的科学内容。因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

康德认为人类理性思维具有辩证的性质，可以同时证明两个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判断，如：世界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世界是单一的，又是复合的；世界是必然的，又是自由的；世界有一个最高存在者存在，它又是不存在。他把这些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判断叫做“二律背反”。但是，康德却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不包含矛盾的，包含矛盾的理性思维不可能揭示世界的本质，因此，世界的本质是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康德的这个不可知论的结论是错误的、反动的，但是，就他揭示了理性思维具有辩证的性质来说，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性。

世界的本质是充满着矛盾的，由于对世界本质的深入认识，在近代现代科学的发展中，产生了一系列包含着矛盾的判断：

光是微粒，又是波；生命既是生，又是死；生物繁殖后代既有遗传，又有变异；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出现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要巩固统一战线必须加强团结，又不能放弃必要的斗争；如此等等。在辩证唯物主义中更是充满了一系列包含矛盾的判断：世界是统一的，又是无限多样的；事物是永恒运动的，又是相对静止的；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事物的矛盾双方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等等。所有这些包含着矛盾的判断，都是经过实践反复证明的科学的判断。那末，是不是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已被现代科学和辩证逻辑推翻了？不是的。是不是我们在科学研究中进行辩证思维时可以不遵循形式逻辑规律，允许出现“逻辑矛盾”了呢？也不是的。凡属于正确的辩证的思维，不仅不违反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不容许丝毫的逻辑混乱和“逻辑矛盾”，而且具有更严格的逻辑性，更高的确定性和思想的首尾一贯性，不过这是包含着灵活性的确定性，包含着揭示客观对象的运动变化的思想的首尾一贯性。就是说，辩证思维的判断，遵守了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又不局限于这些规律。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分两点说明：

第一点，辩证的矛盾判断，肯定了客观事物内部存在的矛盾和矛盾的统一，否定了否认矛盾的思想。在事物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上，辩证的判断肯定了应当肯定的，否定了应该否定的，决没有作出既肯定又否定的、模棱两可的判断。这是完全符合形式逻辑的。

第二点，我们知道，现实中任何一个客观对象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个对立的方面，是他们二者的矛盾统一。根据这两个不同的客观方面分别做出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并将它们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辩证矛盾判断。这是对现实的、具体的矛盾的反映，决不是什么逻辑混乱、“逻辑矛盾”。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对客观矛盾每一个方面所做出的判断都是十分确定的，不能既肯定又否定。这也就是说，我们对客观矛盾的每一方面所作出的判断都是完全符合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的。例如：我们根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腐朽势力，它必然会被革命人民所打倒这一事实判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又根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手中还有武器，它还会残害人民这一事实判断，“帝国主义是真老虎”。这有什么含混不清和不确定的呢，又怎样违反了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呢？没有，完全没有。只因为这两个事实是同一个帝国主义同时具有的两个不同的矛盾的侧面，我们才把“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和“帝国主义是真老虎”两个相互矛盾的判断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统一的辩证的矛盾判断——“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这决没有违背形式逻辑，只是做了形式逻辑应该办的事以外，又做了形式逻辑无力办到的事罢了。

由此可见，辩证的矛盾判断在遵守形式逻辑的基本思维规律的前提下，更进一步深刻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辩证的矛盾判断的出现说明了，形式逻辑的“‘非此即彼！’是愈来愈不够用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页）

辩证逻辑的判断和形式逻辑的判断的另一个区别是，它不象形式逻辑那样只满足于把各种不同的判断形式毫无关联地列

举出来和排列起来，而是要求从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过程中来揭示各种判断形式之间的联系，揭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化，揭示它们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辩证逻辑指出，与人们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历史相适应，判断的形成和发展经历着从单一判断向特殊判断再向普遍判断转化的过程，即认识经历着从单一的现象深入到特殊的本质，再进一步深入到普遍的、更深刻的本质的过程。如“摩擦生热”，这个判断是一个个别性的判断，它记录了摩擦生热这个单独的事实。摩擦生热这个事实，在实践上是史前人就已经知道了的，这个判断就是与当时的实践和认识发展的较低水平相适应而得出来的单一判断；嗣后经过了多少万年，在1842年，迈尔、焦耳和柯尔丁根据摩擦生热这个个别现象与当时发现的其他类似现象的关系，做出了“一切机械运动都能借摩擦转化为热能”这样一个判断，这是一个特殊性的判断；随着生产实践的进一步发展，认识的迅速提高，仅仅过了三年，迈尔就进一步做出了普遍判断，即：“任何一种运动形式都能够而且必然转化为其他任何一种运动形式”。恩格斯指出：“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判断看作个别性的判断：摩擦生热这个单独的事实被记录下来了。第二个判断可以看作特殊性的判断：一个特殊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形式）展示出在特殊情况下（经过摩擦）转变为另一个特殊的运动形式（热）的性质。第三个判断是普遍性的判断：任何运动形式都证明自己能够而且不得不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到了这种形式，规律便获得了自己的最后表达。由于有了新的发现，我们可以给它提供新的证据，提供新的更丰富的内容。但是，对于如此表述的规律本身，我们是不能再增加什么了。在普遍性方面——其中形式和内容都同样普遍——这个规律是不能再扩大了：它是绝对的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7—

548页）

与实践和认识的发展相适应，判断形式的发展还表现在由形式逻辑的同一判断到辩证的矛盾判断的转化。在人类对客观现实矛盾的认识过程中，常常是分别认识矛盾的一个侧面，先后做出两个各自独立的、相互矛盾的形式逻辑的同一判断，然后才进一步把这两个各自独立的、相互矛盾的同一判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辩证的矛盾判断，从而全面地揭示了客观对象的矛盾实质。人们对光的认识就是这样。首先是分别认识光的微粒性和波动性，做出“光是微粒”、“光是波动”两个各自独立、相互矛盾的同一判断，最后，人们终于发现了微粒性和波动性都是同一“光”的客观属性，是光的不可分的两个相互矛盾的不同属性罢了。于是，就形成了“光是微粒又是波，是微粒和波的矛盾统一”这样一个辩证的矛盾判断。做出这个判断的是能够进行辩证思考的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观点在深受传统逻辑影响的科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天爱因斯坦的朋友问他：“光究竟是什么呢？是波还是微粒？要知道两者不能并存！……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爱因斯坦回答说：“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为什么不可以既是这个，又是那个呢？光既是波，又是微粒；是连续的，又是不连续的，自然界喜欢矛盾……”。由此可见，如果不喜欢包含着矛盾的辩证判断，就无法正确地反映“喜欢”矛盾的自然界。

“光既是微粒，又是波动”，这还是一个特殊的判断。由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又做出了“一切微观粒子（无论是实物粒子还是场粒子）都既是粒子又是波”这样一个判断。用前面引证的恩格斯的话来讲：这个判断，就是“形式和内容都同样普遍”的“不可能再扩大了”的自然规律。

人的认识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由一种判断形式向另一种判断形式的过渡，而且表现在由判断向推理的过渡。

判断是概念之间的矛盾的展开，从而它更深刻地揭露了概念的实质。推理则是判断之间的矛盾的展开，它揭露了各个判断相互间的必然联系，即从已有的判断（前提）逻辑地推论出新的判断（结论）。判断构成推理，在推理中又不断地得出新的判断，不断地丰富和加深概念的内容并凝结出新的概念。这说明，推理同概念、判断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推理不仅是概念、判断的矛盾的展开和发展的结果，而且反过来在概念、判断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从推理这种从已有的知识得出新的知识的思维形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思维的创造性，人们用推理的方法去认识那些不能直接观察到的现实过程时，只要能够在实践中证实推理的复杂链条中的必需的重要环节，并且合乎逻辑地进行推论，那末所做出的新判断（结论）、提出的新概念就是科学的。这种情况特别鲜明地表明在高等数学和现代各门精密科学的理论研究中。科学推理形式的创造性，还表现在它不仅能揭示眼前的直接的现实对象、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且能够看到事物前进的必然趋势，可以回溯、总结既往，也可以预测、推断未来。这种事例无论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发展中，都不胜枚举。

推理是适应于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人类实践活动的特点在于，在行动之前，人们已对行动的后果做出了某种预测。这种对行动后果的预测，就是推理的产物。人们运用推理的形式，把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和现有的条件结合起来，就能推论出事物发展的进程，预见事变的结果。实践的需要产生了推理；反过来，推理又使人类的实践变成为真

正创造性的活动。

科学的推理的前提必须是科学的判断，科学的判断又必须由科学的概念所构成。而科学的概念和科学的判断，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符合于客观现实的概念和判断。因此，科学的推理必须从实际出发的，以现实存在为根据。列宁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真地坚决地以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为其一切论断的基础”。（《列宁选集》第2卷第24页）

科学的推理的合逻辑的推理形式（逻辑的格），也是以客观现实发展的逻辑即客观规律为基础，是在人类漫长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黑格尔曾力求把人的合目的性的活动归入逻辑的范畴，说这种活动是“推理”。但是，他认为逻辑的格只是绝对观念自身发展的规律，人的实践不过是逻辑的格的异化和外在的表现。列宁指出：“‘行动的推理’……对黑格尔说来，行动、实践是逻辑的‘推理’，逻辑的格。这是对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逻辑的格把人的实践当作它自己的异在（=绝对唯心主义），相反地，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3页）列宁又说：“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同上第203页）

把实践归入逻辑，这是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根本区别。形式逻辑只是从形式上要求推理合乎逻辑，不考虑作为推理前提的判断和概念是否经过实践检验，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形式逻辑也没有考虑逻辑的格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与从推理引出实践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逻辑根本不同，唯物主义辩证逻辑则

是从实践引出推理，认为推理结论的正确性要受到实践的检验，推理的形式（逻辑的格）也只是在经过亿万次实践的检验后才获得公理的意义。

不同的逻辑的格（推理的形式），是从不同的方面对客观事物的个别、特殊和一般的关系的反映。矛盾贯彻于一切事物和一切思维形式之中。在概念和判断中存在的同一和差别、个性和共性等矛盾，在推理中仍然存在，并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在概念中共性和个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未经分化的形式而存在。在判断中，以“个别就是一般”的形式把个性和共性的矛盾公开地揭示出了。在推理中，个性和共性的矛盾运动达到了新的、逻辑上更为复杂的形式。作为三段论前提的这两个不同判断中，包含着一个共同的概念——中项。通过中项的中介作用使两个不同判断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判断（结论），使得共性和个性又重新结合成一个统一体。例如：“生产关系是不依赖于意识的客观实在”和“物质是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两个判断，通过中项“不依赖于意识的客观实在”为中介联结起来，推导出一个新的判断（结论）——“生产关系是一种物质的关系”。在这里，个性（生产关系）和共性（物质）结合成了一个新的统一体。逻辑思维矛盾运动的进程是，从概念中共性和个性不可分割的统一，达到二者在判断中的分解，再进一步达到在推理中通过中介以新的、更高的形式恢复它们的统一。推理的各种形式，只是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现实的个别、特殊和一般的矛盾。推理的任务就在于揭露：某一个性是如何和共性相联系，共性又如何从个性中抽引出来，各种具有不同个性的东西又如何通过共性而相互联结等等。所以，推理的形式不是思维的空洞的外壳，而是现实事物的联系和矛盾关系的反映。

形式逻辑在考察概念和判断时，都把他们看做是现成的东西，不从它们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形式逻辑的推理也是运用现成的概念和判断作为推论的前提，并不去研究这些前提的真实性。由于形式逻辑没有把实践纳入逻辑，它也无力去考察推论前提的真实性。同时，形式逻辑建立推理的规则时，也是从研究相对稳定和相对静止的对象和现象出发的。因此，只要我们把矛盾运动的因素引入形式逻辑的推理图式中，就会发现它的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例如，在研究生物物种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时，形式逻辑的推理是够用的，我们说：卵生动物不是哺乳动物；昆虫、鱼类、两栖类、爬虫类、鸟类都是卵生的；因此，它们都不是哺乳动物，这样的推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进入研究生物物种的进化过程，研究生物物种演变的过渡形态时，形式逻辑的推理就显得不中用了。鸭嘴兽是卵生的，可是它是哺乳动物。这是个别的卵生动物物种获得了新的属性——哺乳的属性。鸭嘴兽是由卵生动物向哺乳动物过渡的一个中间形态。它既有与卵生动物相区别的哺乳的属性，又有与哺乳动物相区别的卵生的属性。在这里，形式逻辑的"非此即彼"的思维规律同客观现实的不一致，就格外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研究事物矛盾的辩证逻辑的推理，不满足于从现成的概念和判断出发，哪怕它们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概念和判断。要知道客观规律在事物发展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或在事物的不同的层次中，其表现是各不相同的。我们不可能用十七——十八世纪经典力学所提供的概念和判断为前提，推论出能科学地说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所发现的一些新现象的新理论。十九世纪末以来自然科学中的一些新的伟大发现，使得科学家们已经察觉到，从某些已知的普遍原则进行简单的推论，解释不了这

些新的事实。其中，有一些科学家既受着已有的科学结论的束缚，又拘泥于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无法解决旧理论和新事实的矛盾，因此而对科学发生怀疑、动摇，感到悲观和绝望。奥地利物理学家波尔茨曼（1844—1906年）由于完全绝望而自杀；量子论的创始人普朗克（1858—1947年）不考虑量子论已经突破了经典物理学概念的事实，硬要将量子论纳入经典物理学的逻辑体系，徘徊歧路达十五年之久，也得不出什么积极的成果。后来普朗克本人说："我的许多同事认为这是近乎悲剧的事。"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1853—1928年）曾创立电子论，提出时间空间坐标的洛伦兹变换式。他为狭隘相对论的建立，做了一些重要的准备工作。但是他跳不出经典物理学的框框，深为旧理论和新发现的矛盾所困扰。他说："我很懊恨我没有在这些矛盾出现的五年前就死去"。爱因斯坦与他们不同，他不单纯依据旧原理作为推论的前提，不单纯靠逻辑推理的方法来得出新理论，解释新现象。他对新发现做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因而创立了相对论。由此可见，推动科学前进的不是那些在已有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得到解释的事实，而是同那些理论发生矛盾的事实和由此产生的对这些事实做出新的概括、提出新的理论的迫切需要。这时，逻辑的推论必须把实践包括在内，把对在实践发展过程中揭示的新事实、新材料的概括包括在内，把实践对推论的前提以及推论的过程的检验包括在内，要求整个逻辑推论的进程与客观实在发展的逻辑进程相一致，主观的逻辑和客观逻辑相一致。

逻辑的推理不是万能的，只有社会的历史的实践才是认识的最坚实的基础。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出了无产阶级必须夺取国家政权、掌握国家政权的结论，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推导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掌握现成的国家

机器，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结论，这是因为当时革命实践的发展还没提供做出这个结论的必要经验，直到1852年马克思才做出了这样的论断。列宁指出：得到这个结论，“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而是根据实际的事变发展，根据1848—1851年的生动的经验”。（《列宁选集》第3卷第196页）出于同样的原因，在1852年马克思还没有提出用什么具体的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直到1871年马克思才在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结论：“工人阶级必须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国家”。因此，在辩证逻辑看来：实际的实践经验要比逻辑推论更基础得多，更强有力得多。根据实践经验可以得出根据逻辑推论无法得出的科学结论；任何一个根据逻辑推论得出的结论的科学性，还必须通过实践经验的检验才能得到证实。

概念、判断、推理是逻辑思维的三种基本逻辑形式。科学理论是正确反映客观现实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的体系。一个科学理论只要还没有被实践所证实，那末，不管有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九的可靠性，它也还只是一种假说。假说是未经实践充分证实的理论，它是逻辑思维必不可少的另一种基本的形式。

人类对客观现象和过程的认识，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当人们在实践中还没有取得足以揭示现象和过程的本质的全部必要材料的时候，或当人们还难以采取精确的实践手段对所取得的材料的可靠性进行检验的时候，在思维中就不得不依靠我们的想象力推测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不得不采用假说的形式。

恩格斯指出：“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

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构成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末这就是在此以前要把运用思维的研究停下来，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1页）

在十七——十八世纪的一些持机械论和狭隘经验论观点的科学家如牛顿、拉普拉斯等看来，假说属于幻想的领域，不属于科学的领域，科学只能依靠确实的经验材料，不能依靠想象和推测。牛顿曾说：“凡不是从现象中推导出来的任何说法都应称之为假说，而这种假说……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它们的地位”。这种把幻想与科学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列宁高度评价想象在科学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幻想是极其可贵的品质”。“有人认为，只有诗人才需要幻想，这是没有理由的，这是愚蠢的偏见！甚至在数学上也是需要幻想的，甚至没有它就不可能发明微积分。”（《列宁全集》第33卷第282页）事实就是这样。那个否认幻想的牛顿，却是十分富有幻想力的，他能把直线同曲线联系起来，并发明了微积分。牛顿讨厌假说，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假说——宇宙的“第一推动力”。但是，同样讨厌假说的拉普拉斯，却因为他做出天体演化的“星云假说”，而在科学史上占据了一个显赫的地位。

也有一些科学家，如普列斯特里和道尔顿，根据科学发展的史实，觉察到假说的重要性。普列斯特里说：“……一切向前的运动，都与采取某种特别的假说有关，这种假说只是对有关情况或自然界的某种影响的原因的猜测”。道尔顿则提出了对近代化学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原子假说。恩格斯指出：“化学中的新时代是随着原子论开始的”，称道尔顿为“近代化学之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37页）门德列

也夫也曾说："假说是科学，尤其是科学研究所必需的。它能提出一种没有假说便很难达到的严整性和单纯性"。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在最初也是以假说的形式出现的，这个假说的出现以及被实践所证实，由于发现了各种化学元素之间的规律性的联系，使近代化学进入一个具有真正"严整性"和"单纯性"的新阶段。对现代科学做出伟大贡献的爱因斯坦，也非常重视想象力。他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把想象力的重要性看成超过知识，是过分了，因为，只有在人类实践积累的知识的基础上才可能有具有创造力的想象。但是，如果说想象力能使人们摆脱旧知识的束缚和局限，窥测新现象的奥秘，那无疑是正确的。

在现代科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是不经过假说阶段的。社会科学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最初出现的时候也是一种假说。只有这个假说才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科学地对待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提出了这个假说以后，马克思就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具体的实际的研究。他分析了大量的材料，"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进行检验"。（《列宁全集》第38卷　第357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如此成功而又如此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因此，"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说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列宁全集》第1卷第122页）

强调假说在认识中的作用，决不是要求人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尽量多地提出假说，也不是说所有的假说都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假说固然是根据尚不充分或不十分充分的产物，

但是，如果在尚未掌握一定的事实材料，不以一定事实材料为根据的时候，就毫无根据地胡乱推测，那末，这样的假说就不可能对科学的发展有什么积极的意义，而只能是无稽之谈。拉普拉斯否认假说在认识中的作用，这是错误的。但是，在拿破仑问到他，为什么在宇宙演化的星云假说中没有提到至高无上的上帝，他明确地回答：我不需要这样的假说。就这一点来讲，拉普拉斯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关于上帝的假说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这也是拉普拉斯比牛顿高明的地方。

由此可见，提出一个有积极意义的假说，固然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但是也不能脱离实践。以实践为基础，以事实为根据，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力戒主观片面，是提出科学假说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方法。而且思维的想象和推测的过程也必须符合于由实践所证实的逻辑思维规律。只有这样的假说，对科学的发展才会起真正积极的作用。这样的假说并不一定为尔后的实践所证实，它很可能为实践所推翻。即便被实践所推翻的虚假的假说对科学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一个假说的被推翻，同时就意味着我们对真理逼近了一步。这是由于推翻旧假说，并不否定作为旧假说所依据的可靠的基本事实，只是更进一步掌握了与旧假说相矛盾的新事实。这就使得人们有可能进一步在比较充分的事实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假说。只要新假说能够比旧假说解释说明（当然必须不是牵强附会的）更多的有关事实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它就比旧假说更加接近于客观真理。等到能够充分而完满地解释说明全部有关事实时，假说就变成了被证实的科学真理。自从康德、拉普拉斯提出天体演化的“星云假说”以来，到如今，人类对天体演化的研究还没有完全超出假说的阶段。一个个旧假说被推翻，一个个新假说被创立，使人们对天体演化的过程的认识越来越接近于客观的真理。

我们要注意到推动这个发展过程的最根本的因素，是在对天体的观察中不断发现的丰富的新事实，新材料。

假说是否正确，能否成为科学理论，要依靠求证，要看它能否得到实践的证明。求证是从假说过渡到科学理论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求证不仅是一个逻辑思维的过程，而首先是一个实践的过程。科学的求证的方法，必须尽可能地引用有关的全部材料，并且要进行反复多次的实践。实践越充分，积累的证据就越多、越丰富、越典型；同时，实践越充分，各种不同证据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揭示得越清晰、越准确、越深刻；因而，假说成为定论的可能也就越大。仅仅依靠个别例子和材料，而不考虑这些材料和其他有关材料之间的内部联系，是不足以证实假说的。列宁曾指出："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假说必须靠在实践中所揭示的确凿的事实来证实；如果在实践中发现假说与事实不符，就必须抛弃这一假说，另立新的假说，并进一步在实践中检验新的假说。就是这样，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实现由假说到科学理论的过渡。

辩证逻辑的假说与实用主义者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根本对立的。实用主义者把"知识"、"真理"和"规律"等等，一律看做"应付环境的工具"，不管他们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只要对自己有用就行，有用的就是真理。因

此，在实用主义者看来；“假说”的任务，也不外是按自己主观需要和兴趣，来找出一套“应付环境的工具”；所谓“求证”也不过只是看这个假设是否真正“有用”、能否“应付环境”。实用主义者的所谓“大胆”，也就是可以不管基本事实，纯粹依靠主观的想象。实用主义者的“小心”，则是从事实的总和中，“小心”地挑选个别适合证明“假设”需要的片断的、个别的事例，撇开其与整个事实总和的联系。这样的连儿戏还不如的事实，是不难找到的。因为，客观事物是复杂的，随时都可以找到个别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种意见。这样的假说和求证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林彪、“四人帮”这伙匪徒无赖，诬陷革命干部，罗织罪状，用的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辩证唯物主义既反对否定“假设”的狭隘经验主义，又反对对科学假说形式的唯心主义歪曲。辩证唯物主义承认想象和假说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性，但认为这种想象和假说必须以一定的必要事实为基础，并且要同逻辑思维规律相符合。只有充分的确凿的事实才能证实假说，无论是提出假说和证明假说都离不开实践。

三、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具体和抽象

恩格斯指出：“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辩证法也是这样，只不过是更高超得多罢了；而且，因为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更广的世界观的萌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4页）逻辑既然首先是探寻新知识的方法，那末它就不能仅限于思维形式的研究，还要进一步揭示创造性思维赖以进行的

逻辑方法。这些方法是：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等等。

归纳和演绎在认识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切认识方法中，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得到最充分的研究的是这两种方法。归纳是从个别事实走向一般的结论、概念；演绎是从一般原理，概念走向个别的结论，归纳是从个别到特殊、从特殊到一般的思维运动；演绎是从一般到特殊，从特殊到个别的思维运动。因此，归纳和演绎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但是，它们又是统一认识过程的两个相互依存的方面。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讲得很清楚：人类的认识运动，就是由个别、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和特殊，不断循环、不断深化的过程。（参阅《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归纳和演绎在认识过程中的统一是客观现实中个性和共性、矛盾特殊性和矛盾普遍性的对立统一的反映。

在旧逻辑中，归纳和演绎常常被人们看作是两种不相容的认识方法，而看不到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统一。有的思想家强调归纳，有的则强调演绎。例如，亚里士多德只是着重研究了演绎推理的形式，弗兰西斯·培根则认为只有归纳推理才是引导我们走向真理的唯一科学方法。他们各自片面地强调演绎或归纳的作用，这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人类的经验知识还很贫乏，对客观现象的哲学猜测占据主要的地位，其特点是从少数原理原则出发，用演绎的方法来说明问题。这种方法后来又为敌视经验知识的宗教神学、经院哲学所强调和广泛引用，要求一切从圣经中所提出的“神圣原则”出发说明一切，可以完全不考虑客观事实本身的真象究竟如何。在弗兰西斯·培根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验科学的发展，要求摆脱经院哲学的枷锁，注重对

观察和实验中所积累的大量经验材料进行归纳，于是培根的归纳推理，沿着同亚里士多德相反的方向，片面地发展起来。

人们的认识，应该从自然和社会的客观现象出发，不应该从某种原则出发。所以，归纳推理是认识的基础。恩格斯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否认从观察和实验中所取得的客观经验材料出发，否认归纳的重要性，要求事实服从原则不是原则服从事实，就是背离唯物主义，背离科学；就是提倡迷信和盲从，就是奉行唯心主义。

但是，如果片面地强调归纳而否认了演绎，否认了从一般到个别的重要性，也就违背了辩证法而陷入狭隘的经验论，同样最后也必然会陷入迷信和盲从，陷入唯心主义。恩格斯说：这是"两极相通。因此，当我们要寻找极端的幻想、盲从和迷信时，如果不到象德国自然哲学一样竭力把客观世界嵌入自己主观思维的框子里的自然科学派别中去寻找，而到那种单凭经验、非常蔑视思维、实际上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地步的相反的派别中去寻找，那末我们就大致不会犯什么错误。后一个学派是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它的始祖，备受称颂的弗兰西斯·培根，曾经渴望应用他的新的经验归纳法来首先达到延年益寿，某种程度上的返老还童，改容换貌，脱胎换骨，创造新种，呼风唤雨。他抱怨这种研究被人遗弃，他在他的自然历史中开出了制造黄金和完成各种奇迹的正式方子。同样地，伊萨克·牛顿在晚年也埋头于解释约翰启示录。"这个牛顿也片面地强调归纳法，恩格斯曾叫他为"归纳法的驴子"（《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3卷第472、532页）

弗兰西斯·培根和牛顿都是归纳万能论者。归纳是重要的，但决不是万能的。归纳虽是认识的基础，因而也是演绎的基础，但是，归纳本身也离不开演绎。如果说没有归纳就没有演泽，那末同样，没有演绎也就没有归纳。第一，归纳是从观察和实验中搜集大量经验材料开始的，搜集材料也必须有某种理论原则的指导，决不能盲目地进行。因而在这里已有了从某种理论原则出发的演绎推理。演绎规定着归纳活动的目的和方向性。第二，在对已经搜集到手的大量经验材料进行归纳时，也必须按着归纳推理的逻辑规律正确地进行，也必须受已知的一般理论所指导。这也就是说，没有演绎，不仅无法开始有目的的搜集材料的活动，无法为归纳进行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而且即便在已经掌握大量经验材料以后，也无法进行归纳的活动。第三，归纳所得出的结论也不是充分可靠的，还必须靠演绎的补充和修正。因为单纯的归纳不能抛开事物的次要方面，不能避免认识的片面性、表面性，只能对事物的表面特征进行概括。而且，即使看到某一特性在一系列事物中不断重复，也不能证明这一特性对于一切同类事物都是共有的，无法确证它是这类事物的共同的、必然的本质。恩格斯指出："归纳法绝不能证明：任何时候决不会出现无乳腺的哺乳动物。从前乳房是哺乳动物的标记。但是鸭嘴兽就没有乳房。""黑格尔曾经说归纳推理本质上是一种尚成疑问的推理，这个命题多么恰到好处地得到了证明！而且，由于进化论的成就，有机界的全部分类都脱离了归纳法而回到'演绎法'，回到亲缘关系上来——任何一个种属确确实实是由于亲缘关系而从另外一个种属演绎出来的，——单纯用归纳法来证明进化论是不可能的，因为进化论是完全反归纳法的。归纳法所运用的种、属、纲等概念，由于进

化论而变成流动的，因而成为相对的了；而用相对的概念是不能作归纳推理的。”（《自然辩证法》第205—206页）

科学发展史也表明，归纳离不开演绎。片面夸大推理作用的牛顿之所以能在科学上做出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除了运用归纳法以外，在实际上还不自觉地运用了演绎法。任何重大的科学发现都必须同时运用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即不仅要以当时积累的经验材料为前提，而且要以当时已经掌握的一般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就不仅以大量经验材料为依据，而且也依据了“宇宙万物都具有共同的本质”的原理，才能推导出来。在推导过程中他还运用了微积分的知识以及伽利略和刻卜勒提出的科学原理。牛顿在得出万有引力定律以后，他还运用演绎推理检查了刻卜勒定律，指出行星并不是按严格的椭园轨道运行的。由于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实际运行的轨道都会多少偏离严格的椭园。以后经过多次的精密观察，最后证明了牛顿原理的真理性。

归纳的重要性就在于，在对客观事实进行逻辑抽象的过程中，它从客观事实中得出概念和判断，使认识有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因此，它在经验科学中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但一进入理论思维的阶段，在经验科学发展到理论科学时，演绎则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演绎是从概念到概念、判断到判断的推理。在理论思维中，归纳不是推理的主要部分，只有演绎才是推理的主要部分。爱因斯坦说：“适用于科学幼年时代以归纳为主的方法，正让位于探索性的演绎法”；应该“由经验材料作为引导，……提出一种思想体系，它一般是在逻辑上从少数几个所谓公理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来的。”

在科学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演绎方法有公理法，假说演绎法等等。

公理法要求我们首先找出作为演绎出发点的公理，然后再从公理按严格的逻辑规则推导出一系列的结论，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公理不同于人们根据小范围内实践经验中归纳出来的经验定律或经验公式，而是从大量的、庞杂的经验事实中间抓住的某些对认识有重大意义的、可用精密公式表示的普遍原理。在自然科学史上第一个严整的光辉思想体系——欧几里得几何学，就是用这种方法建立起来的。如果当年欧几里得只满足于把丈量土地的具体经验，归纳概括为几条经验定律，那末，几何学的发展不知会延缓多少年。公理法的应用最初主要限于数学的领域，现在已经渗入到物理学、生物学甚至语言学等一系列的科学中去了。爱因斯坦就是在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两条公理的基础上，推导出了他的狭义相对论。

假说演绎法和公理法在逻辑实质上并没有多大差别，区别仅在于前者不是从公理出发而是从假设出发。为了阐明复杂的经验材料而提出某种假说，然后再从假说推导出一系列结论。如果这一系列的结论同经验材料相矛盾，那就表明，或是假说不可靠，或是经验材料不准确，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如果这一系列的结论与经验材料符合得很好，能完满地、充分地解释所有的有关的经验材料（包括原有的和新发现的），那末假说就为经验知识所证实。

演绎法，从古代亚里士多德揭示了它的最简单、最基本的规则，奠定了它的基础，到现在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为近代和现代科学产儿的符号逻辑、数理逻辑，揭示了演绎法的比较复杂的规律，并力求用精密的数学形式来表示。这就为电子计算机模拟演绎思维的图式提供了可能，反过来大大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发展。

不管演绎法在现代科学发展中起怎样重大的作用，它也不

能排斥归纳法，不能离开归纳法。第一，演绎不是推出知识的唯一的方法。作为演绎的出发点的公理、定律、假设等等，都是运用其他认识方法(包括归纳方法)的结果。演绎是以非演绎方法得出的结果为前提的。第二，演绎方法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是由一般到特殊，由特殊到个别的思维运动。演绎推理由以出发的前提，是有关多种多样个别事物的共性和本质的判断。演绎本身只能揭示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不能进一步揭示共性和个性的对立。共性不能全部包括个性，个性并不全部进入共性。因此，从共性出发不能揭示个性的多方面丰富多采的属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地考察个别事物本身的多样性，并对此进行及时的归纳和分析。

马克思主义反对把归纳绝对化，也反对把演绎绝对化。恩格斯指出："归纳和演绎，……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48 页）归纳是从特殊到一般，演绎是从一般到特殊。毛泽东同志讲得好："这是两个认识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85 页）

归纳和演绎的对立统一并没有穷尽认识方法的一切丰富的内容。分析和综合就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认识方法。

归纳是演绎的出发点，但是，仅仅用归纳的方法并不能从大量经验材料概括出它们的共同的必然的本质。要为演绎提供可靠的前提，还必须运用分析的方法。这也就是说，仅仅靠归

纳的方法并不能完成归纳所要完成的任务。恩格斯指出："我们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都永远不能把归纳过程弄清楚。只有对这个过程的分析才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8页）归纳法得出的似乎可靠的结果，却常常会被新的发现所推翻。在科学史中曾流行一时的热素说和光的微粒说都是归纳法的成果，现在早已被抛弃到历史的后面了。法国物理学家萨迪·卡诺（1796—1832）发现最理想的热机循环（卡诺循环）用的不是归纳法，他并没有从很多的蒸汽机中进行归纳，而只是对一部蒸汽机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十万部蒸汽机并不比一部蒸汽机能更多地证明这一点"。（同上第549页）仅仅归纳还不能为演绎提供确实可靠的前提，但是分析可以帮助它。演绎是思维从一般到个别或特殊的过程，要从中推导出正确的结论，就不仅要靠归纳和分析为它提供一个确实可靠的前提，而且要考虑到个别或特殊是具体的，有着多方面本质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只有借助综合方法，把各方面的本质联系起来，才能避免把一般抽象化和僵化，才能更好地揭示个别和特殊的多方面本质的具体的、真实的联系。乍看来，分析和综合跟归纳和演绎似乎一样，都表现了思维由个别到一般和由一般到个别的运动。其实，分析和综合更能使我们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能确定个别和一般、现象和规律的内在联系。

通常把分析看作是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和认识其中的每一个部分。一般说来，这是对的，但很不够。我们必须看到分析的任务是从事物或现象的总体中，分出构成该事物或现象的基础和本质的东西，即把事物的各部分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或引起这些现象的根本的东西。例如人，具有会说话、有思想、会生产、要恋爱结婚、相互之间有血缘的联系和社会的关系，……等等各个方面属性，分析决不是从中分解出这些不同的方

面，把它们一一罗列出来，而是要从中找出本质的方面，找出能把各方面联系起来的、能说明各方面的基础的东西。马克思对“人”做出了正确的、深刻的分析，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思想和意识是社会的产物，意识始终是社会的意识；语言是由于人与人在交往中交流思想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生产是社会的现象，没有社会的分工和合作就不会有生产，不同的社会生产中分工和合作的形式各不相同；人与人之间的性爱无论就其形式和内容都受着社会关系的制约，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生物关系；人的血缘关系在社会中已成为亲属关系，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起着不同的作用；人在道德，知识以及身体素质等方面的差异也只有用他的种种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来说明……等等。把这各个方面联系起来的，就是社会关系。只有这样的分析才真正揭露了人的本质，才真正达到了分析的目的。把分析仅仅理解为把整体分解成它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机械论的观点。在辩证逻辑看来，分解，只是分析方法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它的全部。分解，只不过是一种手段，通过分解，再进一步从多样性的现象中、从事物的许多属性和方面中发现主要的本质的东西，这才是辩证分析的关键。正因为如此，分析才可能弥补归纳的不足，得出仅用归纳法得不出的、确实可靠的、反映事物必然性的结论。分析是人们用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外部表现的矛盾的一个工具。

正确的分析首先必须从实际出发，对所分析的对象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分析的过程也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大致说来，它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两个步骤。“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

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6页）

科学分析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是矛盾分析法。列宁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页；第31卷第144页）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反复强调了这一思想，并进一步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我们既要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又要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要分析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要分析质和量，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形式和内容等矛盾；从而解决现象和本质，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等矛盾。不同的科学研究有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对象又有不同的矛盾，因而也有不同的分析方法。适用于各门科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大约有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因果分析等。定性分析法是要判定事物所具有的各种因素、属性。定量分析是要判定各种因素、属性的数值与数量关系。事物都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量变引起质变，只有对事物作了精确的数量分析才能准确地判定事物的质以及质的变化。因此，数学分析的方法是每门精密科学必须采用的方法。任何一门科学采用了数学分析的方法，就意味着它已开始进入精密化和完善化的阶段。数学分析方法在现代科学研究中的广泛地采用，促使科

学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因果分析则要求找出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找出其规律性和必然性，为人们主动地干预事物的变化发展，即为人们自觉的实践，指出正确的道路。

综合是同分析相对立的一种方法。综合通常被看作是在把整体分解为各因素的基础上，再组合成一个整体的思维活动。但要注意，综合决不是把各部分、各组成因素机械地凑合在一起、装配在一起。对综合的正确的、辩证的理解应该是：在思维中把对象的各个本质的方面按其内在联系有机的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资本的最根本的实质——剩余价值——的基础上推演出资本的一切具体表现和形态，如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信贷资本、地租等，并把它们综合成资本的整体，这样就可以既看到各种不同资本形态之间的统一性，又看到它们的多样性，达到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如果只是把资本的各种形态机械地联合在一起，那就不可能正确地、深刻地理解资本。

稍微复杂一点的客观对象，都是各方面的多样的本质的统一整体，因而只有对其各方面本质加以综合，才可能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它。从这一点看来，综合比分析更为深刻。例如，生物运动的实质是蛋白体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这是生物运动区别于其他运动形式的根本特点，但是在生物运动中也包含着力学、物理、化学等运动形式，只有把力学、物理、化学等运动形式的规律综合地运用到对生命运动的研究，才可能深刻而正确地理解生命。由于力学、物理、化学等运动形式在生物运动中的表现与其原有形式又有着质的差别，我们不能把这些运动形式的规律原封不动地、机械地运用到生物学领域中去，因而就产生了生物力学、生物物理、生物化学等综合性学科。我们还必须把这些综合性学科研究所得的成果进一步综合起来，才

能全面而深刻地对生命作出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解释，不仅了解到生命是蛋白体新陈代谢、自我更新的运动，而且进一步了解到这一复杂运动的机制。

综合和演绎都是由抽象的一般回到个别，回到具体的经验事实，这是它们的相似之处。可是综合和演绎又不同，它克服了演绎的某些局限性。演绎从一般的东西中推导出个别事物的属性时，无法反映具体事物属性的多样性；而综合则通过部分、具体的东西，通过实践和经验的材料，使一般能反映出和估计到具体事物的多样性。这样，一般在综合过程就逐步具体化，变成为同个别和具体事物的内容相联系的、有血有肉的东西；只有这样的一般，才表现为实在现象的深刻基础；一般之所以是客观现象多样性的本质，也只有在它同个别和部分的联系中得到证明。这些都是仅仅从一般推演出个别的属性、即把个别归入某一“类”的演绎法所做不到的。

综合离不开分析。综合要使其成果能真正反映现实的多样性，它就必须以客观的现实的多样性的统一为基础，而绝不能是主观幻想的统一，更不能是唯心主义的臆造。恩格斯曾经指出：“思维，如果它不做蠢事的话，只能把这样一种意识的要素综合为一个统一体，在这种意识的要素或它们的现实原型中，这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我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1页）因此，正确的综合必须首先了解在现实的统一体中究竟存在哪些因素，它必须依赖于对客观现实的周密的分析。不管综合在认识中起怎样重要的作用，它却一步离不开分析。分析是综合的基础，“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同上）为了综合必须分析。毛泽东同志讲得好，“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

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6页）

分析又离不开综合。前面讲过，最基本的分析方法是矛盾分析法。要认识统一体的矛盾着的各方面，必须进行分析。但是，矛盾着的双方毕竟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要对统一体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就必须懂得矛盾的双方是怎样统一的，怎样能够统一的，为此就必须综合。没有综合就不能全面而正确地认识统一体。当然，在综合以前必须首先了解包含在统一体中的究竟有哪些矛盾着的方面，也就是说必须首先分析；但是，要清楚地认识矛盾的任何一方，如果离开它同另一方的联系，不了解它在矛盾统一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一个整体的观念，那也不可能对部分做出正确的分析。

总之，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完成。分析和综合，是两个相互对立、又是相互联系的认识方法，只有把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方法。列宁把“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确定为辩证法的一个要素，（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607页）是非常正确的。离开二者的结合，既不能懂得分析，也不能懂得综合，那就是离开了辩证法。

分析和综合的结合，体现在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常用的理想模型法就是如此。

理想模型法是一种最简单的科学研究方法。我们周围的客观对象都是具有多样质的统一体，在其中起作用的规律也是多样的，而且各种不同规律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一幅十分错综复杂的图景，我们要一下把它们认识清楚是不可能的。为了

认识上的方便，往往要用理想化的模型来代替客观实在的错综复杂的图景。前面所讲的卡诺用以发现蒸汽机热机循环的科学方法，就是理想模型法。恩格斯指出：卡诺“他研究了蒸汽机，分析了它，发现蒸汽机中的基本过程并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是被各种各样次要过程掩盖住了；于是他撇开了这些对主要过程无关重要的次要情况而设计了一部理想的蒸汽机（或煤气机），的确，这样一部机器就象几何学上的线或面一样是决不可能制造出来的，但是它按照自己的方式起了象这些数学抽象所起的同样的作用：它表现纯粹的、独立的、真正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9页）这里所讲的理想的蒸汽机就是理想的模型。设计这种理想的模型的方法，就是对由分析所得的与主要过程有重要关系的那些重要情况进行综合。这种理想的模型，既然表现了“纯粹的、独立的、真正的过程”，那么就使我们有可能比较容易地、清晰地认识有关主要过程的规律。

科学史中采用理想模型法的例子很多，如几何学上运用的点、线、面、正方形、圆……；物理学研究中提出的理想气体、刚体、绝对黑体等等。

理想气体是一种在理论上把实际气体的性质加以简化，把气体分子体积和分子间的作用力忽略不计的假想气体。波义耳定律——一定质量的气体在保持温度不变时，它的压强（P）和体积（V）正反比——只有对理想气体才严格成立。密度小的实际气体的状态变化规律与理想气体比较接近，在这种情况下运用波义耳定律，就不会有大的偏差，基本上和实际情况相符合。波义耳定律对认识密度大的实际气体状态的变化也是有意义的，不过需要进一步综合分子的体积以及分子间作用力等因素的影响，对波义耳定律加以必要的修正罢了。刚体是在外

力作用下形状和体积都不会改变的假想物体，实际物体都不是刚体。经分析，发现在很多场合下，物体本身的变化对整个运动过程影响很小，因此，把它看作刚体可使问题大为简化，而所得结果仍和实际基本相符。

除理想模型法而外，科学研究中还有其他一些方法，如数学方法、结构法、系统法等，也都是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可以说，没有分析和综合的结合，科学的研究，简直寸步难行。

与分析和综合紧密相联的，是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分析的过程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也是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综合的过程是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也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事物都是具体的。这个具体性表现在：任何一个客观对象都具有许多的本质的规定，是多样性的统一。这种具体不仅是事物整体内部各个部分、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和关系，而且是事物整体与它们所处的客观环境、客观条件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置于我们感官前的客观对象，可看、可听、可尝、可嗅、可摸，十分生动而具体。从我们感官中所获得的生动而具体的知觉表象，还只是感性的具体。在我们思想中却显得十分模糊而抽象，因为单凭我们的感官只能认识到对象各方面的多种多样的表面现象，而不能立刻认识事物各方面的多种本质规定以及各方面本质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因此还不可能对该事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作出清晰、深刻、全面、具体的说明，不能把握多种多样的现象的统一。最初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客观世界以及各个客观对象，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在我们面前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的具体事物，隐藏着它自身内部的具体内容——它的各方面的本质以及这些本质间的联系、关系，即多种多样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它们的统一；在

我们对它进行深入地研究以前，在弄清楚它内部各方面本质规定以及内部联系以前，我们对这一具体事物的认识还是模糊不清的、十分抽象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对于没有理解的东西，就难于做出稍稍具体一点的解释。感性上的具体往往掩盖着思维中的抽象。不了解这一点，满足于感性上的具体，就不能得到真正的具体的知识。这就是俗话讲的，"熟知不等于真知"。人类早就熟悉了苹果落地的现象，却并不知道它的实质，只有不满足于这一点的牛顿，才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万有引力。

感性的具体虽是认识的最初出发点，要获得真正的知识，还得依靠思维的抽象，通过从感性具体到抽象的过渡，深入掌握事物的本质。抽象过程的主要手段是思维的分析活动，通过分析把整体分解成各个部分、区分开必然的本质的方面和偶然的现象的方面，从中分别地抽取出各个必然的本质的因素。对具体事物的某一个方面本质的认识，就是一个思维的抽象。这样的认识，已抛开了具体的感性的形象，是用概念表示的事物的本质、必然和规律，是关于事物的抽象的规定。思维的抽象是感性的具体的对立面，它比感性具体离开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似乎更远了，但是，只要这种抽象是从客观具体事物出发的郑重的抽象，又是通过科学的分析方法得出的正确的抽象，却更深刻、更正确地抓住了事物的本质。

当然，这样的认识，还只是对事物某一方面的本质的认识，只是有关事物的一个抽象的规定。要真正达到对具体事物的全面具体的认识，还必须运用综合的方法把对事物各方面的本质的认识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关于统一的事物整体的认识，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进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是从抽象上升到

具体的方法。这种具体并不是现实的具体对象，而是思维中的具体，是对具体事物的具体认识。马克思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思维的具体（精神的具体），只要它是科学的、郑重的，就能使我们在思想中掌握了客观具体对象自身的各方面的本质以及它们相互间的联系，就能对有关的多种多样现象作出统一的全面的解释，从而也能帮助人们更敏锐、更精密细致地察觉到各种有关的现象。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只有这样的认识才算得上真正与客观对象相符合，才算得是真理性的认识。因为，客观对象都是具体的。同样，真理也是具体的，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的认识才算有了一个真正的结果。马克思讲："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认识开始于对客观现实的直观，也就是开始于感性的具体；然后通过抽象；最后再达到具体（思维的具体）。这是认识的实际过程。适应这一认识过程的科学方法就是：从感性的具体出发；通过分析，由感性的具体达到抽象的规定；然后，再通过综合，由抽象的规定达到思维的具体。这是一个具体——抽象——具体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抽象是对感性具体的否定，它离开了具体。但是，抽象又是走向具体的一个步骤和阶段，因而它又包含着对自身的否定，它在接近着具体。列宁

写道："一般（即抽象—引者注）的含义是矛盾的：它是僵死的，它是不纯粹的、不完全的，等等，而且它也只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完全认识具体事物。一般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抽象是达到具体所必需的，因为"认识向客体的运动从来只能是辩证的进行的：为了更准确地前进而后退"。（《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9—310页）所以说，抽象是"离开"和"接近"的统一，它离开具体是为了更好地向前跃进，更好地认识具体。抽象所离开的是混沌的、表面的感性的具体，而接近的却是清晰的、深刻的理性（或思维）的具体。思维的具体好象是向感性的具体的复归，但在实际上，它却高于感性的具体，它意味着我们达到真理性的认识。列宁说："真理就是由现象和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要正确地掌握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必须要掌握好抽象的度，即究竟抽象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基本结束从具体到抽象的进程，转而开始由抽象到具体的进程。作为由抽象到具体进程的出发点的抽象，必须至少具备下列两种性质：

第一，它必须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原因的抽象。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抽象，就是我们认识各种具体社会的思维过程的起点，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发，从它们二者的对立统一出发，特别是从生产关系出发，我就可以了解社会整体和它的各个方面的社会关系的本质，以及它们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原因。又如，只有从蛋白体（包括蛋白质和核酸）的抽象出发，才可能具体地说明生命，因为生命是蛋白体存在的形式，是蛋白体的不断地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蛋白体构成的不同，决定着新陈代谢、自我更新的方式的不同，蛋

白体构成的改变，决定新陈代谢、自我更新方式的改变，蛋白体的抽象反映了生命的本质，生命产生、发展、变化的原因。

第二，它必须是极度的抽象。物极必反，正因为它是极度的抽象，所以必须反过来走向具体。什么是极度的抽象？这种抽象不需要用事物的其他方面和属性来解释说明，它却能解释说明事物的其他方面和属性，这样的抽象才是极度的抽象。仍用上两例来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抽象，就是对社会的极度抽象。它们无须用其他社会关系来定义，它们却可以从根本上（即有时并不是那末直接的，而要通过许多中间环节）解释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关系，解释整个社会形态及其各方面关系的变化和发展的原因。与生产关系的抽象相比，阶级的抽象还算不上极度的抽象。因为，生产关系的概念无须用阶级的概念来定义，而阶级的概念则必须用生产关系的概念来定义。阶级并不是社会从来就有并永远存在的本质的方面，阶级只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生产进一步发展到一定的高度，阶级又会被消灭。因此，阶级概念无法说明一切社会关系，无法说明在阶级产生以前的原始社会和阶级消灭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所有的社会关系。在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阶级对抗已经基本消灭，阶级概念已不足以说明社会中的一切关系，它不能完全说明在今天社会中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然，这不等于否定阶级的抽象对阶级社会来说，的确带有某种极度抽象的性质。在一切阶级社会中，离开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具体的理解。即便在我国，由于现在还存在有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在广大人民思想中还存在阶级的影响，因此就不能完全撇开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忘记阶级观点。当然我们只能把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到应当运用的场合，在这些场合，我们必须保持

明确的阶级观点，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错误。林彪和“四人帮”一伙把政治思想当作极度的抽象，用政治思想的差别而不是用人们在生产关系中地位的不同作为划分阶级标准，他们又用这种“阶级观点”来说明一切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人们的思想中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在实践中造成了极度的破坏，使整个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沿。再用生物学研究中例子来说。规定生命本质的极度抽象是蛋白体以及它的基本成分蛋白质和核酸。在过去，生物学曾把细胞作为生物学的极度抽象，从对细胞的研究出发建立生物学的体系。现在看来不对了。因为现在已经发现了一类没有细胞结构，但有遗传、变异、共生、干扰等生命现象的微生物——病毒。从细胞出发不能说明这样的生命现象，而从由蛋白质和核酸组成的蛋白体出发，则不但能说明非细胞结构的病毒，而且能说明一切单细胞生物和多细胞生物的生命现象，说明它们新陈代谢、自我过程的机制，以及新陈代谢、自我更新的方式的保持和改变，即遗传和变异。现代生物学已从对蛋白体（蛋白质和核酸）的研究出发，建立了崭新的科学的体系。

事情总是矛盾的，极度的抽象也是非常具体的。为了正确地理解极度的抽象，还必须注意两点：（一）极度的抽象究竟还有一个“度”，决不是无度的抽象，不是越抽象越好。我们一定要对这个极度抽象的“度”，有一个具体的了解。量变必然导致质变，抽象超过了度，就会失去研究对象的原有的质。从这样的抽象出发，是不可能形成关于对象的正确的、具体的认识的。例如，费尔巴哈对社会的研究从人与人之间的爱，特别是性爱出发，这就是完全错误的。恩格斯曾尖锐地指出，这“是抽象的人，因而本身又是一个想象的形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32 页）这种抽象脱离了现实的、具

体的人。因为，人都是社会的人，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对人做出超出社会范围（度）的抽象，只能是一个生物学的抽象（即便在生物学范围内，这也算不得科学的抽象）。从这样的抽象出发，使费尔巴哈的整个社会学变成为空洞抽象的，因而也是背离客观真理的。他甚至对性爱本身也不能做出具体的正确的说明。他不能科学地具体说明性爱的形式（婚姻制度）的变化发展，更不用说他从性爱出发而得出的对宗教、道德等问题的结论是多么的贫乏、荒唐和可笑！再就生物学的研究来看，一旦抽象超出了蛋白体（蛋白质和核酸）的抽象，进入到化学元素的抽象，那就起了质的变化，不再属于生命的范围，因而也不能直接说明生命现象。而只能说明化学的运动。（二）这种极度的抽象，是同客观对象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最初的萌芽状态、原始状态的具体相符合的。人和人类的社会，是从人与人结合成一定社会关系（生产关系）而进行生产的实际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即从劳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劳动从来是社会的（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的）劳动。因此，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抽象出发，才能对全部社会关系及其发展作出科学的说明，达到具体的、详尽的、正确的认识。同样，生命起源于由化学元素构成的各种蛋白质和各种核酸所组成的蛋白体。有了蛋白体才有生命。因此，研究生命现象的科学研究方法，也必须从对蛋白体的研究出发，才有可能深刻、详尽、全面、具体地说明无限复杂的生命现象。正是由于对蛋白质和核酸的深入研究，给生物科学带来了重大的突破，人们将由此而真正具体地掌握生命的奥秘。

总之，极度的抽象是十分具体的，它是包含具体的多样性的抽象。当然，具体的多样性，最初还只是以胚胎的形式隐藏在抽象之中。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这些以胚胎形

式隐藏着的具体的多样性，就会逐渐“生长”、成熟起来，愈来愈清晰地显示出它自身的丰富内容，最后使我们有可能全面地认识事物的具体的多样性，达到思维中的具体。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运用的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忽视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他总结了“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走过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指出这条道路是一条由具体到抽象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同上）。这时，只走了认识道路的一半，还不足以形成一个对各种复杂经济系的具体多样性的完整认识，停留在抽象的一般的关系，那怕是有决定意义的关系，也是错误的。这些经济学家并未认识到具体，没有到达真理，他们的有关经济体系的理论是不科学的。马克思在这些经济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有关经济体系的“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和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同上）以后，运用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科学地、有步骤地综合了各方面有关的个别要素，形成了有关经济体系的科学的理论，完满地、正确地、彻底地解释了经济体系的具体的多样性。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对经济体系的完整的真理性的认识。

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最发展的形式。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具体多样性都萌芽于商品。马克思就是从对商品的抽象的研究，对商品的本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的研究出发，开始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资本论》这部伟大的著作就是这个思维过程的伟大成果。列宁经典地概括了马克思的方法，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

（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为我们揭明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的存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中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0页）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马克思的这种研究方法，非常重视列宁对这种研究方法的概括。他在《矛盾论》中全部引证了列宁的这段话，并进一步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

由上所述可以看到，从抽象到具体决不是把各个抽象的规定任意地组合起来，而是从事物的单纯的、基本的、极度的抽象出发，也就是从事物的基本矛盾出发，逐步综合由基本矛盾所导出、所产生、所规定的其他矛盾，从而逐步达到对复杂的矛盾的总体——事物——的认识，达到对具体多样性及其统一的认识。这个综合的进程也不是任意的，而是和具体事物内部基本矛盾发展和展开的客观进程基本一致的，这是一个充满着矛盾转化的过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事物是复杂的，我们的认识决不能简单化。事物是具体的，真理也是具体的，只有达到了对事物的具体的认识，才算得真正把握了真理。

在本章一开始，我们就引证了列宁的话，"逻辑学＝关于真理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全部逻辑方法，（包括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等基本方法）归根到底，无非是引导我们对具体事物得出具体认识的

方法，是引导我们通向真理的方法；全部逻辑形式（概念、判断、推理、假说等）也都是我们进行逻辑思维必须具备的形式，没有这些逻辑形式，就无法在思维过程中运用这些逻辑方法，没有这些逻辑形式组成的体系就无法反映客观实在的具体内容，就无法获得和表达真理。由此可见，不了解辩证逻辑就不可能充分深刻地理解真理论以致认识论。

四、逻辑和历史的辩证统一

从对逻辑形式和逻辑方法的研究中，我们初步理解了人的思维活动一般来说是怎样进行的。为了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思维的逻辑运动，为了把唯物辩证法彻底地贯串于对思维逻辑运动的研究之中，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考察逻辑和历史的关系。这里讲的历史包括两个方面：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和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自身发展的历史。

逻辑和历史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辩证逻辑的基本问题。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作为整个哲学研究的出发点的问题，回到了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历史的东西这个范畴包括两方面：既包括客观实在（自然界和社会）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又包括作为对客观实在反映的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科学史、哲学史、语言发展史等）。逻辑的东西这个范畴是指上述历史的过程在概念等思维形式中的概括反映，是历史的东西在理论思维中的再现。对于逻辑和历史两个范畴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才第一次给予了正确的解决。

以康德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者把逻辑的东西看成为脱离客观历史内容的纯粹的思维形式。黑格尔曾经批判过康德的逻辑

形式主义，正确地指出逻辑形式是有内容的，逻辑的东西同历史的东西是一致的。但是，他又错误地认为逻辑的东西是基本的，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历史的东西不过是逻辑的东西的体现。现代资产阶级的逻辑实证论，则把逻辑形式主义发展到了顶点，把逻辑变成为一种脱离历史、脱离现实、脱离实践、脱离客观真理的空洞的东西。

同一切唯心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历史的东西是第一性的，是逻辑的东西的基础；逻辑的东西是第二性的，是历史的东西的反映。毛泽东指出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也就是要求逻辑和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统一。

下面我们分两个方面来说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第一，逻辑和人类认识发展历史的统一。

我们知道，高等动物个体胚胎发育的过程，是这一高等动物由单细胞动物演化而来的全部进化史的一个缩影。与此相类似，个人头脑中思维辩证运动的逻辑，一般说来，基本上与整个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相一致。恩格斯说：“在思维的历史中，某种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实体和变体）的发展和它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如某一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和它在胚胎学中（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关系一样。这就是黑格尔首先发现的关于概念的见解。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的思维中，就象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包括在必然性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4—545页）恩格斯指出，是黑格尔首先发现了思维发展中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在黑格尔看来，研究哲学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哲学本身的研究，这也就是说，哲学史不应是把各种哲学体系、理

论和观点按其出现时间的先后顺序简单地罗列，机械地排列而成。哲学的历史的发展（如果撇开其中偶然性的曲折）是有内在必然的规律的，是和正确的哲学体系的逻辑发展相符合、相一致的。黑格尔说："我认为哲学体系在历史中的次序同观念的逻辑规定在推演中的次序是一样的。"（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1页）

黑格尔这一思想是十分精辟和深刻的，但是，黑格尔从他的唯心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出发来整理哲学史，把哲学发展的实际历史过程，硬塞入到他的逻辑图式中。他力图修改哲学史，拚命攻击唯物主义，以便维护唯心主义的路线，论证唯心主义，把他自己的唯心主义体系说成是整个哲学发展的最高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和批判了黑格尔的神秘的唯心主义的错误，从中拯救出合理的内核，肯定了逻辑和历史统一的原则，并给予了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解释。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开始于具体的感性的表象，这是关于事物整体的混沌的反映。作为哲学史发端的典型代表——古希腊哲学也是如此。恩格斯说："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古希腊哲学所反映的正是这样一幅画面。但是，这幅画面是"原始的、朴素的"，"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页）这幅"看不清的总画面"就是感性的具体。每个人对具体事物认识，如果停留在感性具体的阶段，进展是极为缓慢的，只有对事物进行分析，由感性具体过渡到抽象，认识才会迅猛地向前发展。对个人认识过程说来是如此，对人类的认识的发展说来也是如此，正如恩

格斯说的："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步的基本条件"。（同上）由于把这种认识方法片面夸大，并加以绝对化，形成了哲学上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到了十九世纪，在科学发展所达到的成就的基础上，要求进一步考察自然界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重新构成一幅具体清晰的关于世界的总画面，这也就是由思维的抽象到达思维的具体。为了具体地认识具体事物，唯物辩证法世界观的产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只有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才能促进现代自然科学的飞跃发展。

由此可见，由感性具体到思维的抽象、由思维的抽象到思维的具体的逻辑进程，是同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同从古代朴素辩证法到形而上学再到近代辩证法的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相符合、相一致的。要正确地把握逻辑思维进程，必须很好研究人类思维（哲学、科学等）发展的历史进程。列宁指出："总的说来，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当和思维规律相吻合"。要正确地掌握逻辑思维规律，就"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5、154页）反过来，研究和掌握辩证逻辑，也有助于对人类认识史的科学总结，因为"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总计、总和、结论"。

第二，逻辑和客观实在的历史的一致。

承认了逻辑和人类思维的历史的一致，按照唯物主义反映论原则，必定要进一步承认逻辑（以及它所概括的认识史）和客观实在发展的历史相一致，这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事物发展

的原始状态最简单、最单纯，使它也常常成为我们思想的起点，逻辑运动的起点。恩格斯指出："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商品关系——出发的，是从对商品关系的分析出发的。

国家问题是被资产阶级学者弄得最混乱的问题之一。为了澄清这个问题，列宁指出，"要最科学地来看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的情况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列宁还指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运用的正是这种科学的方法，因而产生了极大的逻辑力量，使人感到"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同上）

使理论的逻辑顺序同实际的历史顺序相符合，不仅是研究社会科学问题所必须的方法，而且也成了研究自然科学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法。达尔文之所以能对品种繁多的生物物种做出科学的理论的说明，就在于他运用了历史的方法，研究了古生物学，研究了生物物种演化的历史。现代生物学的发展表明，

要真正揭示生命的奥秘，还必须追溯到更远的历史，必须研究最原始的生命，研究生命的起源。对生命的研究是如此，对非生命的研究也是如此。要了解太阳系的现状，只有研究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的历史，才能得出合乎逻辑的理论。要提出一个真能在实践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探矿理论，就必须研究矿物生成和聚集的历史。李四光正是由于对石油的生成和聚集过程做出了深入细致的历史的分析，才为我国石油资源的勘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象对自从太阳系形成以来的亿万年的岁月中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化学元素这样的对象，人们也开始了历史的研究，开始了化学元素的起源和演化的研究。正是这样的研究，才能对宇宙中各种元素的丰度、稳定性等等提出科学的理论。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总之，要对自然现象提出合乎逻辑的科学理论，也不能忘了逻辑和历史的一致，不能忘了历史的方法。

可是，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开始，并没有采用历史的方法，只有在科学进入了比较发展的阶段，人们才发现了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才在对客观对象的研究中日益广泛地采用历史的方法，来建立具有严密逻辑性的科学理论。这是因为，客观对象的丰富多样的特性，在其原始状态中往往以隐蔽的、潜在的形式存在着，使人不易察觉，只有当客观对象的发展，到了如恩格斯所说的"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时候，才有可能对事物的原始状态作出清晰的、全面的分析，然后再对它作历史的考察，从其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事物各有关因素如何在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发展、展开、成熟的。现实的具体事物总是在过去的历史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是由于这种历史的分析可以对客观事物做合乎逻辑的理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

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由于解剖了人体，才更清楚地理解了猴体身上的“人”的征兆，由于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古老的商品的本质。立足于发展了的形态，反过来再追溯它的历史，这才能对人体，对现代经济作出全面深刻、逻辑上前后一贯的理论概括。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运用这种逻辑的和历史的方法的典范，“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成熟、最典型的形式，为我们提出了解剖商品的锋利的解剖刀。我们理解了商品的内在矛盾——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就可以开始进行由商品到货币、由货币到资本、由绝对剩余价值到相对剩余价值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分析。正如列宁指出的，“开始是最简单的、普通的、常见的、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把它当做社会关系来加以分析。两种分析：演绎的和归纳的，——逻辑的和历史的（价值形式）。在这里，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进行检验”。（《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这样，就建立起了逻辑严密的、全面而深刻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科学理论。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同任何辩证的统一一样，是包含着差别的统一。辩证逻辑要求，不仅要看到二者的统一，而且要看到二者差别、矛盾。

逻辑和历史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是指，前者是主观的，后者是客观的；而且是指，逻辑的东西反映历史的东西，

不是机械的照像，不是简单的复制和翻版。历史的发展过程包括无数的细节和偶然性因素，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总不是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偏差和曲折为自己开辟道路。如果逻辑思维企图把一切具体的细节都包罗无遗，就不得不常常打断思路，难于揭发对象或现象发展的客观逻辑。理论思维的任务，就是要依据历史事实、经验材料，经过抽象概括的加工改造功夫，抛弃细节，抓住主流，抛弃偶然，抓住必然，抛弃曲折和偏差，抓住基本方向和基本线索，从而形成理论概念体系，以便能够在比较“纯粹的形态”上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所以，恩格斯把逻辑的反映称为对历史“修正过的”反映。这种“修正过的”东西不是对于现实的歪曲和背离，而是以严密的逻辑、前后一贯的形式使历史本身的规律性以更单纯的形式、更鲜明、更突出地显现出来，变得更加清晰和易于了解。就是说，按照历史固有的逻辑“修正过”的东西，比起未加“修正”的历史说来，更能够深刻地反映历史。

逻辑的东西既然是“修正过的”历史的东西，因而为了更深刻地再现现实的客观逻辑，逻辑的东西不需要绝对准确地追随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离开历史发展的顺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典范。

土地所有制和地租的出现在历史上先于资本和利润的，然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论述的却是资本和利润。他指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者同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0页）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因素

的相互关系中占优势的、起支配作用的是资本。“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同上）马克思在对资本进行了多方面的解剖之后，直到《资本论》第三卷的末尾部分，才论述了地租。但是，这也并没有放弃用历史的方法。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它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同上第109页）资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就是这样一种“普照一切的光”，马克思就是牢牢地抓住了资本，对它进行了历史的（也是逻辑的）分析，从而把资本之光普照下的全部经济关系的画面，清晰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再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资本的论述，也没有完全严格地按照历史的次序来叙述。他把资本的原始积累放在了第一卷的末尾。因为只有分析了资本主义基本规律即剩余价值的规律以后，才能使人们更深刻、更明确地了解资本主义的前期历史，了解到资本主义产生的先决条件是剥夺小生产者，使他们破产和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对于历史的这种逻辑分析，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是从每一个现象发展的最高点上，即过程达到“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发展点上”来观察这个现象，从而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常常表现得模糊不清的东西。

总之，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既是同一的，又是有差别的；差别不是取消统一，而是更清楚地表现出逻辑的东西是历史的东西的深刻的反映这一事实。

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统一和差别，也正确地解决了

两种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的研究方法的相互关系。

历史的研究方法是根据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来揭示历史规律的方法。为了再现历史发展的最完整的情景，在研究过程中，人们常常不得不追随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曲折和偶然性的因素，并通过分析重大的历史事件，考察同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及其活动，来研究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历史的方法是研究历史科学的唯一恰当的方法。例如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就主要是采取历史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是舍弃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和偶然性因素的研究方法。它是通过一系列的概念、范畴来揭示历史规律并形成理论体系的科学方法。逻辑的研究的方法是根据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研究，根据现实事物的相互关系来安排、建立理论的体系。它以承认一定对象发展的本身的内在的逻辑为基本前提。我们不能把逻辑的研究方法理解为属于纯粹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佐证，需要与现实不断接触，即列宁所说的，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进行检验”。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主要是采用了逻辑的研究方法。

科学的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和具体运用。两种方法有区别，不能把它们加以混淆；然而它们又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排斥逻辑方法的历史方法是经验主义的，排斥历史方法的逻辑方法是唯心主义的。历史的方法决不能只限于历史现象和具体事例的堆积，而是要进一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这里是离不开逻辑的分析的。因此，历史的方法同资产阶级历史学中烦琐的经验主义的历史描述方法是截然相反的；同样，逻辑的方法必须以历史

的实际发展为基础，它实质上就是摆脱了历史形式的历史的方法，因此，它同唯心主义、逻辑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根本对立的。学习和掌握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及其相互关系，对于自觉应用唯物辩证法，对于批判学术研究中的烦琐主义，唯心主义等反科学方法，都具有现实的意义。

五、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一致

逻辑同认识史的统一，逻辑（以及认识史）同客观事物辩证过程的统一，表现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相一致或相统一的原理，对正确地理解逻辑学的实质，对正确地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实质和理论体系，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哲学中，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的关系，从未得到过真正科学的解决。在黑格尔以前的哲学家们，通常把哲学分成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个部门。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学说，它研究世界的本原及其规律；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学说，它研究认识的能力、认识的源泉、认识的过程、认识的作用以及真理等问题；逻辑学是关于理论思维的学说，它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这三个部门总的说来是互不相关、各自独立的。

旧唯物主义者正确地认为，认识是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思维的逻辑不应当同事物本身相分裂。如斯宾诺莎曾经提出过下列著名的思想："观念的次序和联系与事物的次序和联系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旧唯物主义者不懂得辩证法，他们既不能辩证地考察客观存在，也不能辩证地考察人的认识和思维过程，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不了解思维的逻辑规律是在

亿万次实践中确定下来和得到证实的，因此，他们不可能正确地解决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相一致的问题。

在唯心主义那里，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也是相互割裂的，其中，康德哲学是最突出的典型。由于康德承认不可捉摸的、神秘的“物自体”，否认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因而他把三者割裂开来了。在他的哲学中，认识论与本体论无关（世界的本质是不可知的），逻辑学与本体论无关（逻辑范畴是没有客观内容的先天的形式），逻辑学也与认识论无关（逻辑的认识和经验的认识是没有联系的），三者各有各的规律，没有任何同一性。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们，仍然以拙劣的形式重复割裂三者的做法。他们讲认识论时宣称不管本体论，硬说世界的本质及其规律与认识无关，他们讲逻辑时宣称不管认识论和本体论，硬说逻辑学研究的只是思维规律，不管什么是思维的对象和思维的真理性。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他们用以掩盖其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的伎俩罢了。

黑格尔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观点，特别是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论和先验逻辑，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相一致的思想。黑格尔正确地主张，人的认识、逻辑思维是有对象、有内容的，都是受辩证法的规律所支配的；他认为，没有对象的认识不是真正的认识，不包含辩证内容的思维形式是空洞的形式。关于这一点，列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黑格尔确实证明了：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更正确些说，不是证明了，而是天才地猜测到了。”黑格尔“特别天才地指明了逻辑和认识论的一致”。（《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2、205页）但是，黑格尔的这一天才思想却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唯心主义的立脚点上。他认为存在的本质是思维，是某种神秘的绝对精

神，因而他没有也不可能科学地解决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一致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哲学关于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三者一致的合理思想，同时又对这一原理加以根本的改造。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脚点与黑格尔哲学根本不同，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而不是思维，三者一致的基础是物质世界的辩证发展或辩证发展的物质世界。

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世界的物质性以及物质世界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也就是说，揭示了存在的本质及其规律。看来，辩证法似乎相当于旧哲学所说的本体论，可是作为自然、社会和人的思想（认识、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唯物辩证法科学，本身就包括了认识论和逻辑学。

辩证法和认识论是一致的。列宁指出："辩证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同样也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其本身包括现时所谓的认识论"。（《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甚至干脆说："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上第714页）"包括"也好，"就是"也好，无非都是强调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一致性。它们的一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唯物辩证法科学地揭示了人类认识对象的物质性和矛盾运动的辩证性质。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理论，但是科学的认识论决不能只局限于纯粹认识的领域，它必须同认识的对象相联系来研究人的认识，没有对象的认识是不存在的。而认识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它处在怎样的状态，这是需要由唯物辩证法来揭示的。人和人的认识，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认识是辩证运动着的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从自然物质中分化出人和人脑以后才产生的。如果离开辩证法，把认识看作永恒的现象，或者看作凭空出现的神秘物，那就谈不上什么科学的认识

论。所以，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论赖以成立的根本前提和出发点。

第二，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规律贯穿于认识的全过程。唯物辩证法要求用发展的观点考察自己所研究的一切对象，这个对象，既包括客观物质世界（自然和社会），也包括人的认识。就是说，贯穿着辩证法精神的“认识论同样应该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即从不知到知的转化”。（《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辩证法所理解的认识，“是活生生的，多方面（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同上第714—715页）人的认识既然是物质世界辩证发展的产物和反映，因此，它的本性必然是同物质世界的辩证本性相一致的，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最一般规律，同样也是认识发展的规律。认识论所阐明的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感性和理性、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等等一系列关系，无不都是辩证法规律、特别是它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所以，唯物辩证法又是科学认识论的基本内容。

第三，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工具。唯物辩证法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就在于，“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唯物辩证如果不作为认识的工具、认识的方法、认识的武器，如果不作为科学的认识论，它就既没有产生的必要和可能，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同列宁一样，毛泽东同志

所特别强调的也正是这一点。他指出：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页）就是说，辩证法对于我们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不在于别的，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分析矛盾）和改造世界（解决矛盾）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就在于它同时又是科学的认识论。

第四，唯物辩证法的真理性和力量只有用人类认识发展的全部历史来证明。辩证法既然贯穿于人类认识的全过程，既然“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714页）那么它的内容的丰富性，它的正确性和生命力，就必须由全部人类实践的历史、认识的历史来证明。正如列宁所说，辩证法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同上，第711页）离开认识论所揭示的人类认识的历史，就不能证实和确立辩证法科学。

以上四点，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第二两点侧重说明了，离开辩证法，就没有科学的认识论；第三、第四两点侧重说明了，离开认识论，就没有科学的辩证法。对于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一致，我们所以要比较详细地加以说明，是因为，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对于辩证法和逻辑学的一致、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一致，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辩证法和逻辑学是一致的。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逻辑学，是辩证逻辑，或作为逻辑的辩证法。这个名称，它所研究的内容，都表明了逻辑学和辩证法是不可分割的。前面几节关于辩证逻辑的对象、形式、方法和原则的阐述中，处处都体现了辩证法和逻辑学的一致性。概括起来，二者的一

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一般辩证法所揭示的规律和范畴，同时也就是逻辑的规律和范畴。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也是辩证逻辑的根本规律。辩证逻辑就是研究概念的矛盾运动的科学。列宁说："概念的关系（=转化=矛盾）=逻辑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概念（以及关系、转化、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逻辑学之不能脱离辩证法，不仅是指逻辑思维的内容本质上是辩证的，是对客观的辩证规律的反映，而且逻辑思维的形式和方法（同内容不可分离）本质上也是辩证的，都是辩证法规律的逻辑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那些看起来纯粹属于逻辑的范畴，如概念、判断、推理、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等，无一不受辩证法所揭示的规律所支配。没有辩证法所揭示的规律和范畴，科学的逻辑思维、科学的判断和推理就无法形成，不管进行逻辑思考的人们是否承认或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例如，没有"量"的范畴，"A＞B"这个简单的判断就无法成立；没有"时间"、"空间"的范畴，"A在B以前，C在A以前，则C在B以前"这一类型的推理就无法进行。至于"必然性"、"因果性"、"规律"等范畴，更是由已知向未知过渡（这是推理这种思维形式的特点）的基础。总之，逻辑学研究主观的、概念的或观念的辩证法，而"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同上）所以，离开唯物辩证法，也就没有辩证的科学的逻辑学。

第二，唯物辩证法只有当它同时作为一门逻辑科学，才具有实际的意义。一切科学都产生于实践的需要，并以服务于实践为目的，唯物辩证法科学也不例外。唯物辩证法既研究客观世界（自然和社会）的一般规律，也研究思维、逻辑的一般规律，

而研究客观规律正是为了揭示思维规律，为人们提供一个科学的思维方法，就是说，唯物辩证法的一切规律和范畴都具有逻辑学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那些看来似乎纯粹是关于物质世界自身的本质和联系的范畴（按传统的说法，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如物质、存在、实体、关系、有限、无限等等，同时也都是逻辑的范畴，对于辩证地思考世界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辩证法如果不同时又是逻辑学，辩证规律如果不同时又是逻辑思维的规律，那么这样的辩证法就没有丝毫的用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唯物辩证法。

认识论和逻辑学是一致的。这也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第一，认识论包括了逻辑学。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研究的是全部人类认识及其发展规律，其中自然包括了认识发展的重要阶段——理性的逻辑思维及其发展规律，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去掉了逻辑学，认识论不仅会变得残缺不全，而且会从根本上取消了认识论，因为理性思维正是人的认识区别于动物“认识”的一个根本特征。反过来说，如果离开了认识论，离开了认识论所揭示的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感性和理性的唯物辩证关系，单纯地、孤立地去研究人的理性思维，那就不会有辩证逻辑，至多只能达到形式逻辑的水平。所以，认识论和逻辑学，是彼此不可分离的。

第二，逻辑学是关于认识的学说。在本章开头引用的列宁关于“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结、结论”、“逻辑学＝关于真理的问题”等经典论断，都说明，逻辑学是从抽象思维的角度研究认识的主体对客体的关系，研究认识发展的过程，研究接近、掌握、发展真理的途径，而这些也都是认识论所研究的问题。从这个意义说，逻辑学也就是认识论。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

从不同领域和角度反映客观规律，但是它们的根本原理是一致的；它们的根本作用和任务也是一致的；都是为人们指明通向客观真理的道路，为人们提供探寻真理的方法。只有正确地理解三者一致的原理，并以此为指导，才可能真正理解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从而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并使其发挥出无比的威力。马克思之所以能完整，准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原理之所颠扑不破的具有客观真理的性质，就在于马克思贯彻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的原理，完整、准确地运用了他自己所创立的伟大哲学。列宁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都产生于实践，并在实践中达到统一。实践，只有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切理论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从而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逻辑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只有坚持科学的实践观点，才能正确理解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正确理解它们三者的一致，才能一贯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

第一章"绪论"阐明了哲学的最高问题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这是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提出的最广泛、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类一切活动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为人们正确地解决主观和客观（意识和物质）的矛盾，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第二、第三章，从物质和意识

的关联中，分别阐明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这就使我们理解到：多样的又是统一的物质世界，是我们认识和实践的唯一正确的出发点，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认识的能动性就在于它能深入地和正确地反映客观物质世界，反过来有效地指导人们去改造世界。在第四——七章中，阐明了物质世界处于永恒的辩证运动状态，运动的本质和根源是事物自身的内在矛盾，从而进一步深刻揭示了认识和实践的出发点，也就是客观实在自身的矛盾运动。认识无非是分析客观存在的矛盾，实践则是处理这些矛盾。唯物辩证法是客观世界矛盾运动的最一般的规律，把它见之于实践就成为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方法论。在第八——十章中，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说明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至无穷的辩证运动，告诉我们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现真理、修正错误和发展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作用，真理的力量，就在于它们能够服务于并指导着人们的实践。在第十一章，我们同认识论、真理论相衔接，概述了辩证逻辑的最初步的一些原理，最后又回到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在实践基础上的一致。以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轮廓和基本线索。